

列甯 著
莫師古 譯

國家與革命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三月

列寧關於國家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

初版序言

關於國家這個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上、或在實際政治上，都獲得了特別重大的意義。帝國主義的戰爭極度地加速了並加劇了由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國家與資本家的強大集團日益密切地融合起來，其加於勞動羣的異常嚴重的壓迫，也是益嚴重起來了。先進各國（我們這裏是指牠們的「後方」說的）都變成工人們底軍事苦役的監獄了。

長久的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空前未聞的悲慘與災難，使羣衆的地位困苦得無可忍受，使羣衆的憤恨加強起來。國際的無產階級革命，顯然在生長着，關於牠和國家的關係的問題，也就獲得了實際的意義。

幾十年來比較和平的發展所積聚起來的機會主義底原素，在全世界各國正式的社會主義黨裏面造成了一種很流行的社會國家主義的思潮。這個思潮（在俄國有：

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勃列什科夫斯卡亞、路班諾維契，以及在形式上稍許掩蓋着的蔡雷特利先生，威爾諾夫先生和他們的同僚；在德國有：謝得曼、李謹、達微特；在法國和比利時有：倫諾德、蓋德、萬德威爾；在英國有：海德曼和費邊派諸如此類等等），在口頭上爲社會主義、在實際上便爲國家主義，其特點就在『社會主義』底『領袖們』不僅卑膝下心的去迎合『本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底利益，而且正是卑膝下心的去迎合『本國的』國家底利益，因爲大多數所謂大列強早已經剝削並奴役着很多的弱小民族了。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大戰恰是分割和重分這種贓物的戰爭。要解放勞動羣衆而脫離一般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的影響，非反對機會主義對『國家的』偏見，是不可能的。

本書首先研究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的學說，尤其關於這種學說被人所忘記或遭受機會主義曲解的諸而說得特別詳細。其次我們特別來研究曲解這個學說的主要的代表者——考茨基。考氏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到一九一四年）的最著名的首領，而第二國際在這次大戰期間竟遭遇了可憐的破產。最後，我們把俄國

一九〇五年、特別是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經驗，作一主要的總結。後面的這一次革命，現在（一九一七年八月中旬「初旬」）好似正在完結它發展的第一個階級；可是一般的講來，整個的這次革命，祇有把牠當作被帝國主義戰爭所引起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鎖鍊中的一環，才可以明瞭。因此，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的問題，不僅是獲得了實際的政治意義，而且還獲得了最緊迫的意義，因為這是向羣衆說明，他們要使自己解脫資本的羈絆，在最近的將來，應該怎樣幹的問題。

著 者

一九一七年八月

再版序言

本書再版幾乎沒有改變。其中僅僅增加了第二章第三節。

著者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十號(十七號)於莫斯科

571.1
347-3
(519)

2

目

目次

國家與革命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和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一
- (二) 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六
-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一
- (四) 國家「衰亡」和暴力革命.....一六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的經驗.....二七

- (一) 革命底前夜.....二七
- (二) 革命底總結.....三三
- (三) 一八二五年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四二

488949

十

國家與革命

第三章 國家革命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馬克思底分析 四七

(一) 公社社員底企圖底英勇精神何在? 四七

(二) 用什麼來代替被打破了的國家機器呢? 五四

(三) 代議制底消滅 六一

附錄 (四) 民族統一底組織 七〇

(五) 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七五

第四章 恩格斯底補充說明(續上) 八一

附錄 (一) 「住宅問題」 八一

(二)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八五

(三) 給培培爾的信 九一

(四) 愛福特綱領草案底批評 九六

(五) 一八九一年馬克思爲「法蘭西內戰」而作的序言 一〇七

(六) 恩格斯論民主制之破除 一一五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一二一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一二一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之論戰……………一三五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一三五

(三) 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一三四

(四) 共產主義社會底高級階段……………一三九

第六章 機會主義者之糟踏馬克斯主義……………一五三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之論戰……………一五四

(一) 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一五六

(二)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一六七

(三) 考茨基與班雅普克的論戰……………一八三

初版書後

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八五

序言……………一八九

考茨基怎樣把馬克思變成庸俗的自由主義者……………二〇七

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民主……………二二一

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之間是否能有平等？……………二二一

考茨基

著

夏民立

不口

目

次

能

蘇維埃與

國家

蘇維埃不能變為國家的組織嗎

二二二

立憲會議與蘇維埃共和國

二四三

蘇維埃的憲法

二五八

第三國什麼叫做國際主義？

二七三

「經濟的分析」而為資產階級効勞

二九四

附錄二 葛德威爾論國家的新書

三三五

要專政 論「民主」和專政

三四七

雙條 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會上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

級專政的提綱與報告

三五五

論專政問題底歷史

三八三

註釋

四一七

國家與革命 ●

第一章 階級社會與國家

一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馬克思學說，在今日的遭遇，正和歷史上數見不鮮的被壓迫階級解放鬥爭中的領袖們和革命思想家們的學說，所遭遇的一樣。在大革命家活着的時候，壓迫階級經常的緝捕他們；對他們的學說極端的憎惡，極端的仇視，和瘋狂似的造謠與中傷。在他們死了之後，便企圖把他們作為無害的神像，所謂把他們加入聖人之列，略略表彰他們的名字以「安慰」和愚弄被壓迫階級，同時，却阉割革命學說底內容，磨滅這個學說底革命鋒銳，使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內部的機會主義者，正在用這種方法來「製造」馬克思主義。他們忘記、拋棄、曲解馬克思學說之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他們把那資產階級所能接受，或似乎可以接受的部份，



提在第一位，而加以頌揚。所有社會國家主義者，現時都儼然自號爲「馬克思主義者」了！德國資產階級的學者，昨天還是摧殘馬克思主義的專家，今天却在談論「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了，他們以爲這個馬克思對於進行劫掠式的戰爭訓育了極有組織的工會！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空前流行的情形之下，我們的任務，首先便是恢復馬克思關於「國家」的真正的學說。因此我們便不能不從馬克思和恩格斯自己的著作中引出許多長篇大段的引證來。自然，過長的引文，對於行文上不免笨重，而且也難於通俗；但是這種摘引，是萬不能免的。凡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論及國家問題的一切章句，或至少是最重要的章句，必須盡可能地完全的摘引出來，使讀者自己能夠獨立地知道科學社會主義創造者底見解底總和，以及這些見解底發展，同時，使現時佔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義」對於這些見解的曲解，得以證據確鑿地證明出來和一目瞭然地顯露出來。

我們現在先來從傳播最廣的恩格斯著作：家庭、私有財產和國家底起源一書講

起。這部書於一八九四年在斯都德加爾已發行第六版。我們必須從德文原版中翻譯出引句，因為該書的俄文譯本為數甚多，其中大半不是譯得不完全，便是譯得極不好。恩格斯在總結他的歷史分析時說道：

「國家絕不是從外面來強制社會的一種力量，也絕不是如黑格爾所說的什麼「道德觀念底實體」或「理性底外形和實體」。●。國家是社會發展到某一階段上的產物；牠是社會捲入於自身不可解決的矛盾和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而又無法擺脫時的表現。而為使這些對立，這些經濟利益衝突的各階級，不致在無結果的鬥爭中互相吞噬，并使社會同歸於盡，於是一種表面上似乎站在社會之上而用以緩和衝突，使這些衝突不致超出「秩序」範圍之外的力量，就成為必需了。這個產生自社會但却超出於社會之上，且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疎遠的一種力量，便是「國家」。』（德文第六版一七七至一七八頁）

這一段話已經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底歷史作用及其意義的基本觀念，十分明確地表示出來了。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凡是發生國家的地方和時間，就是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和時間。倒過來說，國家的存在，就證

明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所以，對馬克思主義之曲解，恰是從這個最重要的基本觀點上開始的。這種曲解分成兩個重要的派別：

一方面，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尤其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因為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逼得他們不得不承認祇是在有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的地方，才有國家，但是他們却這樣來『修正』馬克思，說國家便是階級調和底機關。按馬克思底學說，如果階級調和是可能的，則國家既不能發生，亦不能存在。而小資產階級和庸俗的大學教授們與政論家們（他們往往好意地援引馬克思底言論呢！），則以為國家正是在調和階級的。按馬克思底學說，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階級的機關，牠建立一種『秩序』使這種壓迫成為合法的，并使牠鞏固起來，同時以緩和階級底衝突。據小資產階級政治家底意見，秩序就是階級底調和而不是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的壓迫；他們以為制止衝突就是調和，而不是剝奪被壓迫階級用以打倒壓迫者的一定的鬥爭工具和方法。

比方在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中，關於國家底意義及其作用的問題，恰恰成了非常嚴重，成了立刻行動，而且是羣衆直接行動的實際問題，此時所有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都一齊完全傾向於由『國家』來『調和』階級的那種小資產階級的理論了。這兩個黨底無數的決議案和兩黨政治家底論文中，充滿了這個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的『調和』論。至於國家是一定的階級底統治機關，而這個階級不能和牠的對抗階級調和起來，——這一點是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所絕對不能了解的。他們對於國家的態度，極明顯地證明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並不是社會主義者（這是我們布爾維克常常指明了的），而是喊些類似社會主義的空調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義』之曲解馬克思主義，更爲巧妙。牠在理論上並不否認國家是階級的統治機關，也不否認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是牠忽視了或抹煞了下面的話：如果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如果牠是站在社會之上而『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疎遠』的一個力量，那末很明顯的，被壓迫階級之解放，不但非有暴力革命，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所建立起來和體現這個『疎遠』的國家的政權機

關，是不可能的。這個結論，在理論上已十分明白，在後面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根據具體歷史的分析革命任務即十二分肯定的得了這一結論，而考茨基……所『忘記』和曲解了的（我們以後還有詳盡的說明），也正是這個結論。

二 特殊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恩格斯繼續說：

『——國家與宗法的（氏族的或部落的）舊組織不同之點，第一就是牠依照地域來區分共治下的人民——。』

這樣的一種區分，看來似乎是『自然而然的』，可是牠曾與宗法的或部落的舊組織作了長期的爭鬥之後，才發生出來的。

『——國家的第二個特點，就是社會政權底建立。這個政權是和那個自行組織爲一個武裝力量的民衆，已經不能直接符合了。這個特殊的社會政權所以必要者，是因爲自從社會分裂成諸階級之後，民衆自動的武裝組織，已經成爲不可能的事了……。這個社會政權

是在每一個國家裏都存在着的。構成這個政權的，不僅有武人，而且還有物體的附屬品，如監獄以及其他種種強迫的機關——這些都是氏族社會（部落社會）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這裏又把那叫做國家的「力量」——由社會產生出來，超出於社會之上而又日甚一日地與社會疎遠的一種「力量」——概念加以發揮。這一力量的主要地是在什麼地方呢？就在於特殊的武裝隊伍，這些隊伍，還握有監獄等等。

我們所以有權說特殊的武裝隊伍者，是因為一切國家所特具的社會政權是跟武裝人民，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不能直接符合」的了。

恩格斯像其他一切大革命思想家一樣，竭力叫覺悟的工人們，來注意那盛行的、一般庸人所認為最不值得注意的、最習慣了的、而為堅如石玉的偏見所奉為神聖的事實。常備軍和警察便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工具，——難道這能夠不是這樣嗎？

在十九世紀末大多數歐洲人底眼中看來（恩格斯底話就是向他們講的，他們沒有親身經過，也沒有親眼看過一次偉大的革命），這不能不是這樣的。他們根本不了解什末是「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何以需要超出於社會之上而與社會疎遠

的特殊武裝隊伍（警察和常備軍），西歐和俄國的庸人，對於這個問題，一味抄襲斯賓塞或米海洛夫斯基底三言兩語，援引什麼社會生活複雜、什麼職權底差異一類的話，來作答復。

這樣的援引似乎是『科學』的，而且最能催眠庸人而蒙蔽主要的基本事實——社會分裂為不可調和的敵對階級。如果社會上沒有這樣的一個分裂，則『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其與使用木棍的猿猴，或原始人類、或聯合在氏族社會的人們之原始組織不同的，也許是其組織複雜，技術的高度而已，但這樣的組織，是可能的。

這種組織之所以不可能，是因為文明社會已分裂為敵對的、而且是不可調和的敵對的階級了，如果這些階級各有其『自動的』武備，便會引起牠們之間的武裝鬥爭。於是國家就因此形成起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裝隊伍，也就由此造成出

* 就是說，社會上的分工，在此地是指行政、軍事等等之分立。（編者）

* 即『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校者）

來；同時每次革命破壞國家機關……，很明顯地顯示出，統治階級是在如何企圖恢復爲牠所御用的特殊的武裝隊伍，被壓迫階級是在如何努力企圖創造這樣的新組織——不是爲剝削階級而是爲被剝削階級所御用的新組織。

恩格斯在上面的一段議論中，從理論上所提出的一個問題，在實踐上，每次大革命都已明顯地而且以羣衆行動底大規模形式提出來了，這個問題就是：『特殊的』武裝隊伍與『人民自動的武裝組織』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我們以後便可看到這個問題，被歐洲和俄國革命底經驗怎樣具體地表明了。

但是我們現在再來研究恩格斯底解釋。他指出，有時候（譬如在北美有些地方）這個社會權力是弱的（他這裏所講的祇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罕見的例外，和北美洲帝國主義以前自由的移民佔優勢的那些地方），但是一般的講來，這個政權是一天天加強起來了：

『……社會政權，是隨着國內階級矛盾之劇烈，隨着鄰近國家之強盛與其人口之增加

在原文上是：『偉大的命革』。（編者）

而加強起來的。試拿現在的歐洲來觀察一下就够了，這裏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把社會政權增到了這樣高的程度，牠竟有併吞全社會，甚至併吞國家之虞了——。

這一段文字至遲不過是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時候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作於一八九一年六月十六日。此時進到帝國主義的轉變——就托辣斯底完全統治，最大銀行之握有一切權力，以及大規模的殖民地政策等等而言——在法蘭西還祇剛剛開始，而在北美和德意志，甚至更要薄弱些。從那時起，『侵略競爭』有了長足的進步，特別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之初，全世界已被這些『互相競爭的侵略者』，就是說，被這些巨大的強盜的列強所完全分割了。從此海陸軍備便無限地增加，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英、德兩國之互爭世界霸權和瓜分贓物的強盜戰爭，致使社會所有的力量被掠奪的國家政權所『吞食』，而走近完全的崩潰的局面。

還在一八九一年的時候，恩格斯就能夠指出『侵略競爭』，是大列強之對外政策中最重要的特徵之一，可是到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當這種競爭已經加劇了

許多倍而產生出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社會國家主義混蛋們，却拿『保護祖國』，『保護共和國和革命』等等的鬼話，來遮掩他們袒護『自己的』資產階級底強盜的利益了！

三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的階級的工具

爲要維持超出於社會之上的特殊的社會政權，便需要賦稅和國債。恩格斯說：

——「官吏們掌握了社會政權和徵稅的權利，他們便成爲駕乎社會之上的社會機關。

從前人們對於部落（氏族）社會機關的那種自由自願的敬意，在現在的一般官吏們看來已經是不夠了，就假定他們能夠獲得這種敬意的話——「對於官吏之神聖不可侵犯的特殊法律也訂立起來了。『區區一個小警察員』，其『威權』要大過部落社會的代表；可是甚至文明國家底軍事首領，一見了部落酋長所享受的那種『不因威迫而發出來的社會底敬意』，也許要發生羨慕的心理吧。

這裏已經講到關於成了國家政權機關的官吏們底特權地位的問題了。同時指出

了一個根本問題：什麼使他們能夠駕於社會之上呢？我們讀到下面就會知道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怎樣在實際上解決了這個理論問題，而一九一二年考茨基又怎樣反動地來抹煞這一個問題。

「……國家既是由於控制階級對立之必要而發生的；同時牠既然是在這些階級衝突本身中產生出來的；所以，按通例講來，牠便是最强有力的、經濟上居於統治地位的那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借助於國家，因而在政治上也變成統治階級，並且由此而獲得了壓迫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不僅古代的國家和封建的國家是剝削奴隸和農奴的機關，就是『現代議制的國家也是資本剝削雇用勞動的一種工具。但是我們也可以遇到例外的情形：就是有這樣的時期，那時鬥爭的階級達到一種勢均力敵的情形，使國家政權對於這兩個階級的關係，暫時得到一種若干的獨立性，表面上鬚鬚是這兩階級間的中間人……。」「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底君主專制政體、法國的第一帝國和第二帝國底拿破崙主義、和德國的俾斯麥，都是這樣的（四）。

我們還可以補充說，俄羅斯共和國的克倫斯基政府，在進而壓迫革命的無產階

級之後，即當蘇維埃因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底領導已經沒有力量，而資產階級却還沒有充分的力量能夠來直接解散蘇維埃的時候，也是這樣的。

恩格斯繼續說：

在民主共和國裏面，『富者間接地但因此却更可靠些地運用牠的政權』就是：第一、用『直接收買官吏的』方法（例如美國）；第二、用『政府與交易所勾結』的方法（如美國與法國等）。

到了現在，帝國主義和銀行的統治，已經在所有民主共和國中非常巧妙地『發展了』這兩種擁護並實施富者萬能權力的方法。舉例來說，在俄羅斯民主共和國初創的頭幾個月當中，也可以說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這兩種『社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聯姻的『蜜月』期間，巴爾欽斯基先生在聯合政府中對於一切約束資本家和防止他們掠奪行爲，以及阻止他們在軍事供給上盜竊國庫的種種方法，都實行怠工；後來巴爾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自然用另一個完全與巴爾欽斯基相同的人來代替他的），他就從資本家方面獲得每年十二萬盧布薪俸的位置，以爲『謝禮』；試

問這是什麼呢？是直接的收買，還是間接的收買呢？是政府同新迪卡的資本家們的聯盟呢，或『僅僅』是一種友誼關係呢？威爾諾夫輩、蔡雷特利輩、奧克遜切夫輩與斯可比列夫輩底作用究竟怎樣呢？他們是那些劫掠國庫的百萬富翁底『直接』盟友呢，抑僅僅是間接的盟友呢？

在民主共和國中，『財富』底全部權力之所以更可靠些，是因為牠不依靠着資本主義惡劣的政治外形。^{*}民主共和國是資本主義最好的可能的一種政治外形。所以資本一經握住了（經過巴爾欽斯基輩、威爾諾夫輩、蔡雷特利輩等等）這一種最好的外形，牠就很可靠，很有把握地建立自己的政權，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底無論何種人物、機關或政黨之變換，都不足以動搖這個政權。

我們還應該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稱普選制為資產階級統治底工具。他很明顯地估計到「德國社會民主黨」底久長的經驗，同時他說，普選制是：

『工人階級成熟底標誌。這種制度在現代的國家中，不能而且永遠不會給予再大的結

* 在原稿上說：「與政治機構之個別缺點」。（編者）

果』。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如俄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以及他們的同胞兄弟們——西歐的社會國家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他們對於這種普選制都正是希望着『更大的結果』。他們自己起一種妄念，而且用這種妄念去鼓動民衆，以爲普選制『在現代的國家中』真正能夠表現大多數勞羣動衆底意志，而且能夠擔保這種意志底實現。

我們在這裏只能指出這一種妄念，只能指出：恩格斯底十分明顯的、確定的和具體的申說，在『正式的』（就是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黨底宣傳和鼓動中，到處都被曲解。以後，我還要敘述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現代』國家的見解，那時我們將詳細地說明此地恩格斯所駁斥的這個觀念底全部虛偽性。

恩格斯在他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見解作了一個總結，其詞如下：

於是，可知國家不是向來就存在的。從前有過沒有國家的社會，在這些社會裏面，簡直不知『國家』和『國家政權』爲何物。在經濟發展底某一個階段上——這個階段必須與

社會之分爲各階級的分裂有連帶關係——國家就因這一個分裂而成爲必要了。我們現在正在快步地行近到生產發展底這樣一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此等階級不僅再沒有存在的必要，而且還成爲生產底直接障礙。將來階級之歸於消滅，正與過去牠之發生，一樣是不可避免的。階級一經消滅，則國家也必然隨之而消滅。在一切生產者自由平等的結合底基礎之上，按新的方法而組織生產的社會，要把整個的國家機器送到最適宜於牠的地方去：就是送到古物博物館中去，與紡綫車和黃銅斧一並陳列起來。

這一段文字，在現代社會民主派的宣傳和鼓動的作品當中，是很難得遇見的，即使有時引用了這一段文字，他們也往往似乎是崇拜偶像，就是說，對恩格斯表示一種正式的敬意，而絕對不想去思致一下，『要把整個的國家機器送到古物博物館中去』，先要有何等深刻而廣闊的革命。他們甚至常常不懂恩格斯所稱爲『國家機器』的是什麼東西。

四 『國家』衰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關於國家『衰亡』的言論，既然負有這樣大的盛名，被人引證得這樣多，而且這樣明顯地指出了機會主義偽造馬克思主義的慣技底本質何在；所以我們對於這個言論應該加以詳細的討論。現在我們把這段言論全部照錄如下：

『無產階級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有財產。可是，這樣一來牠就消滅了牠自己無產階級的本身，這樣一來牠就消滅了一切階級的差別和階級的對抗，同時就連國家都消滅了。在階級對抗中進展着的社會——過去以及現今所存在着的社會，必需有國家，就是說，必需有剝削階級底組織，以便維持牠的生產底外部條件，特別是強力地來迫使被剝削階級在現存生產方法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如奴隸制，農奴制，僱傭勞動制）以內去過活。國家曾經是整個社會底正式的代表，是社會之集中為有形的團體；但是國家之所以成為這樣，祇是因為牠是某一個階級底國家，這個階級在當時是單獨地代表整個社會的：在古代，牠是奴隸主（國家底公民）底國家，在中世紀時代，牠是封建貴族底國家；而在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牠是資產階級底國家。到了最後，當國家真正變成全社會底代表的時候，牠（國家）本身便使自己成為廢物了。一旦沒有任何一個應被壓迫的社

會階級，一旦跟着階級統治之消滅，和由現代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所造成的各個生存競爭之消滅，同時由這種競爭所產生的衝突和過分行動也一起消滅的時候——從那時起，便沒有東西要壓迫，也無需乎特殊的壓迫力量的國家了。國家真正以全體社會代表的資格而作的第一個行動——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資料——，同時也是牠（國家）的最後的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於社會關係的干涉，將由一部門又一部門地成爲不需要，而無形中自然泯沒了。此時管理物品的機關和指導生產過程的機關，便來代替治人的政府。國家並不是被『廢除』的，牠是自行衰亡的。我們應該站在這個觀點上來估量『自由人民國家』這一句話，這句話在鼓動的意義上可以暫時存在，可是從科學意義上講來，牠是不能成立的。同時我們應該站在同一的觀點上來估量一晝夜間廢除國家的所謂無政府主義者底要求。』（見恩格斯著的反杜林論、德文第三版，第三〇二至三〇三頁）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從恩格斯這一段具有極豐富的思想的議論中，現代各個社會主義黨所奉爲社會主義思想底真正遺產的，僅僅是馬克思所說的國家『衰亡』，以別於『廢除』國家無政府主義的學說而已。這樣的截斷馬克思主義，這無異於把

馬克思主義化爲機會主義，因爲這樣的『解釋』，僅僅是留下了一種模糊的印象，以爲只有緩緩的、平順的、逐漸的變化，而沒有突變和怒潮，沒有革命。對於國家『衰亡』之一般流傳的風行一時的了解，顯然是抹煞革命，——如果不是否認革命。

但是，這樣的『解釋』是最魯莽的曲解馬克思主義，這種曲解祇是有利於資產階級，而在理論上是由於忽略恩格斯底『總結』議論（我們已在上面完全引出來了）中所指出的最主要的論點和理由。

第一、恩格斯在那段議論底起頭幾句中就說，無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他『即此便消滅國家之爲國家』。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一般人都沒有加以思索。尋常一般人對於這句話不是完全置之不理，便是認爲這是恩格斯底『黑格爾學派的』『弱點』。可是實際上在這幾句話當中，已經簡潔地把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之一底經驗、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驗，表示出來了。關於這次革命我們以下將另闢一章更詳盡地來討論。實際上恩格斯在這裏所說的，是以無產階級革命來『消滅』資產

階級底國家，至於他所說的關於國家『衰亡』的話，是指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無產階級國家底殘餘而言的。據恩格斯底意思，資產階級的國家不是『衰亡』，而是革命中被無產階級所『消滅』的。在這個革命之後，無產階級的國家或半國家就會衰亡的。

第二、國家是『特殊的壓迫力量』。恩格斯這個巧妙而極其深刻的定義，他在此地完全明顯地說出了。從這個定義中所得到的結論，就是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少數富豪對千百萬勞動者的『特殊的壓迫力量』，是應由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特殊的壓迫力量』（無產階級專政）來替代的。『消滅國家之為國家』便在於此。以社會的名義取得生產資料的『行動』也就在於此。而且很明顯的，以另一個『特殊的力量』（無產階級的）來代替一個『特殊的力量』（資產階級的），這樣的更換，是絕對不能以『衰亡』的形式來實現的。

第三、恩格斯十分明顯而確實地用『衰亡』二字，甚至更特出和更鮮明地用『泯沒』二字的時候，他是指『國家以全體社會的名義來取得生產資料』之後，

就是說，在社會主義革命之後的那個時期而言的。我們大家都知道，這時候『國家』底政治形式是最完滿的民主制。但是在無恥地曲解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者當中，沒有一個人想到，恩格斯在此處是同時講到民主制底『泯沒』和『衰亡』。這一眼看來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那些『不了解』這一點的人，祇是因為他們不曾思索到，民主制也是國家，因此，一旦國家無形消滅，民主制也隨之而無形消滅。祇有革命才能夠『消滅』資產階級的國家。而一般的國家，就是說最完滿的民主制，祇能自行『衰亡』的。

第四、恩格斯提出了著名的立論，說『國家是自行衰亡的』，同時，他立刻就具體地加以解釋，說這個立論是用來反對機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恩格斯把『國家衰亡』這個立論中演繹出的結論、用以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放在第一位。

我們可以擔保說，曾經讀過或聽到過國家『衰亡』的論調的一萬人當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人完全不知道，或是不記得恩格斯從他這個立論中所得出來的結論，不僅是用以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而在其餘的十個人當中，或許有九個人不懂得什麼

叫做『自由人民國家』以及爲什麼向這個口號進攻，便是向機會主義者進攻。歷史就是這樣記載出來的！偉大的革命學說就是這樣的被人暗中假造爲流行的庸人主義了！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結論，被人千萬次地重述了、糟蹋了、印入了一般人的頭腦中而爲最簡化的東西、成了很鞏固的偏見。可是關於反對機會主義者的結論，却被人抹煞了而且『忘記』了！

『自由人民國家』是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派底政綱的要求和流行的口號。在這個口號當中，除了對民主制概念之小資產階級性的誇大的描寫以外，便沒有一點政治的內容。既然人們在這個口號中合法地暗示了民主共和國，所以，恩格斯曾經站在鼓動的觀點上準備『暫時』替這個口號作『辯護』，但是這個口號確是機會主義的，因爲牠表示了不僅把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加以粉飾，而且不了解社會主義者一般國家的批評。我們承認民主共和國是資本主義之下對無產階級最有利的國家形式，但是我們決不能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中，民衆底命運仍是僱傭奴隸制。再則，一切國家都是對於被壓迫階級的『特殊的壓迫力量』。因此一

一切國家都是非自由的非人民的。在七十年代的時候，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再三把這一點向他們黨內的同志們解釋過了。

第五、在恩格斯底著作中，大家記得他關於國家衰亡的議論，但在同一著作中，還有他關於暴力革命底意義的議論。恩格斯把這種革命作用之歷史的估量變成了對暴力革命之真實的頌揚。這一點『沒有一個人記得』，在現代各社會主義黨中對於這一種思想底意義不肯談論，而且甚至不肯加以思索；而其在羣衆中的日常的宣傳和鼓動中，這種思想簡直是不發生任何的作用，可是這種思想終究同國家底『衰亡』是不能分離地溶合成爲一個和諧的整體的。請看恩格斯底這個議論：

『……暴力在歷史上還有另一個作用（『除了造惡之外』），就是革命的作用；據馬克思底意見，當一個舊社會孕育着一個新社會的胎胞的時候，暴力便是這個舊社會底產婆；暴力是社會運動所藉以開闢自己的道路和破毀腐舊死殭的政治形式的一種工具——凡此一切，杜林先生一字也沒有提及。他僅僅在歎息和呻吟聲中勉強地承認，爲推翻剝削者的經濟計，暴力也許是必要的——可惜！——，因爲一用暴力會使應用牠的人敗壞德性的！雖

然每次勝利的革命之後常有那種道德上知識上的極大的進步，他終竟說這個話了！而這種話又是在德國說的，在德國，民衆也許不能不進行暴力的衝突，而在德國發生這個衝突至少可以獲得這樣的利益：就是說，至少可以打破因三十年戰爭之失敗而滲透在國民意識中的一種奴隸精神。而杜林那種黯淡的、凋零的、無力的、僧侶的思想，何敢提出到歷史上獨一無二的最革命的政黨中來？」（見反杜林論德文第三版第一九三頁第二編第四章）

怎樣可以把對於暴力革命的頌揚——這是恩格斯從一八七八至一八九四年（就是說，至其死的那一年）曾經堅決貢獻給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來與國家「衰亡」底理論相併合而成爲一個學說呢？

人們往往藉折衷主義來把牠們併合起來，用無原則的或詭辯家的方法任意抓住（藉以取惠於當權者）其中一種議論，有時取其前者，有時取其後者，而且一百次當中有九十九次（就算不再多的話）恰恰是把國家「衰亡」的理論提在第一位。以折衷主義來代替辯證法——這是現代正式的社會民主黨人在其論馬克思主義的著作

• 三十年戰爭（一六一八至一六四八年），是德意志的天主教與基督新教之間的宗教戰爭。（譯者）

中最慣用的最普遍的現象。這樣的一種代替，自然不是新發明；我們就在希臘的古典哲學史上也看見過了。當人們把馬克思主義偽造為機會主義的時候，把折衷主義偽造為辯證法，最容易欺騙羣衆，能夠給一種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牠顧及到過程底各方面，發展底一切趨勢，以及一切矛盾的影響等等；可是事實上牠沒有給任何一個對於社會發展過程之完整的、革命的了解。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暴力革命之不可避免的學說，是對於資產階級國家而言的，這一點，我們已經在上面說過，而在以後的敘述中，我們還要更詳細地說明。無產階級國家（無產階級專政）之代替資產階級國家，不能用「衰亡」的方法，而按通例，唯有用暴力革命的方法才能實現。恩格斯對於暴力革命的頌揚，是完全同馬克思屢次所宣佈的言論相符合的（我們還記得哲學之貧困與共產黨宣言這兩個著作底結尾，在這裏曾公開地揚言暴力革命之必然性，我們又記得，約及三十年以後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書，在這部書裏而他毫不姑息地對這個綱領機會主義加以鞭撻）——這一種頌揚，絕不是「感情衝動」，絕不是誇張其詞，

也絕不是論戰伎倆。必需有系統地用這種關於暴力革命的觀點，而且唯有用這種觀點來訓練羣衆，這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全部學說之基礎。現在極盛一時的社會國家主義和考茨基主義的思潮之背叛馬克思和恩格斯底學說，其特別鮮明的表現，就在於這種思潮忘記了這種宣傳和這種鼓勵。

沒有暴力革命，要以無產階級的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是不可能的。無產階級國家之消滅，即一切國家之消滅，除了任其「衰亡」之外，便沒有別的道路。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個個別的革命的形勢，分析每一個個別的革命經驗之教訓的時候，曾詳細地、具體地發揮了他們所持的這些見解。我們現在就在下面來研究他們學說中這一個顯然最重要的部份。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 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

年的經驗

一 革命底前夜

成熟了的馬克思主義之最初的著作——哲學之貧困與共產黨宣言，正是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前夜出現的。由於這個事實，所以在這些著作中，除了闡述馬克思主義底一般原則以外，在相當程度內還有當時具體的革命形勢底反映。因此在我們探究這二部著作底作者在他們從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經驗中做出的結論以前，來考察他們關於國家的一切言論，也許是較為適宜的。

馬克思在哲學之貧困裏說：

「……工人階級在發展底行程中，將創造一個沒有階級和沒有階級對抗的社會。以代替舊的資產階級底社會；從此已不會再有任何真正的政權，因為正是政權，才是資產階級

社會中階級對抗之正式表現。」（一八八五年出版的德文版第一八二頁）

我們拿這個關於階級消滅之後國家便無形消滅的觀點之一般的解釋，來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幾個月後，即一八四七年十一月所著的共產黨宣言中的解釋比較一下，是很可注意的。

「——當我們研究到無產階級發展一般的階段時，我們看見了現社會中那種比較隱蔽的內戰，直至這種內戰變成了公開的革命，無產階級以暴力推倒資產階級來建立自己的統治——。」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見，工人革命中之第一步是變（原文是：『提昇』）『無產階級爲統治階級，獲得民主制。』」

「無產階級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來逐漸地把全部資本山資產階級方面奪取過來，把所有的生產工具集中到國家手裏，就是說，集中到組織成爲一個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裏；並且盡可能地來迅速增加生產力底總量。」（一九〇六年的德文第七版第三一頁和三七頁）

這裏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在國家問題中最出色而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即「無產

階級專政」(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之後所開始常說的)之思想底公式。其次還有一個極有趣味的國家底定義，這個定義也是屬馬克思主義中「被人忘記了的話」。

「國家就是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這個國家底定義，在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底流行的宣傳和鼓動的作品中，不僅從來未被加以解釋，而且簡直被他們忘記了，因爲牠與改良主義完全不能調和，而同一般機會主義的偏見和小資產階級的幻想，所謂「民主之和平發展」，是直接相衝突的。

一切機會主義者、社會國家主義者和考茨基主義者都衆口一詞地說，無產階級需要國家，而且肯定地說，馬克思底學說就是如此，可是他們「忘記」補充，按照馬克思底意思，第一，無產階級所需要的，祇是正在衰亡的國家，就是說，組織起來便立刻開始衰亡而且不能不衰亡的國家；第二、勞動者需要的是「國家」，「就是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國家是力量之特殊組織，是鎮壓某一階級的暴力底組織。無產階級所要鎮壓的是那一階級呢？自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勞動者之需要國家，僅僅是爲鎮壓剝削者底反抗，但是只有無產階級才能領導這個鎮壓而使之實現；因爲無產階級是唯一的澈底革命的階級，只有無產階級能夠聯合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來作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把資產階級完全剷除。

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的統治，來維持剝削制度，就是說來謀極少數人底自私的利益，反對大多數的人民。被壓迫階級需要政治的統治，來完全消滅一切剝削，就是說來謀大多數人民底利益，以反對現代極少數的奴隸主，即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這些夢想以階級調和來代替階級鬥爭的假社會主義者，其對於社會主義改造的見解也是幻想的，他們以爲這個改造不是用推翻剝削階級底統治的方法，而是用少數人之和平的服從已經明瞭自己責任的多數人的方法來實現的。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烏托邦和承認超階級的國家是有不可分離的聯繫的，在實際上、這種烏托邦的結局是叛賣勞動階級底利益，這已經爲歷史所證明了的。例如一

八四八與一八七一年的法國革命史，以及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社會主義者』之參加英、法、意以及其他各國的資產階級內閣的事實，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馬克思曾畢生盡力與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牠現在由俄國的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所復活）奮鬥。他澈底地引中階級鬥爭的學說直到政權的學說，國家的學說。

推翻資產階級底統治，只有無產階級才能完成；因為牠是一個特別的階級，牠的生存底經濟條件養成牠去完成這個責任，給牠完成這個責任的可能和力量。資產階級分散和拆散農民和一切小資產階級階層，同時牠却聯合起、團結起、組織起無產階級。只有無產階級——由於牠在大規模生產中的經濟作用——能夠領導一切勞動的和被壓迫羣衆，這些羣衆受資產階級之壓迫和剝削，往往較之無產階級有增無減，可是他們却不能爲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獨立的爭鬥。

馬克思所用於國家和社會主義革命問題上的階級鬥爭的學說，必然要歸結到承

認無產階級之政治的統治，承認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說，承認不讓任何人分享而直接依靠羣衆武裝力量的政權。只有把無產階級變成統治階級，才能推倒資產階級，無產階級能夠把資產階級之必然的拼命的反抗鎮壓下去、而組織一切被剝削的勞動羣衆以建設新的經濟制度。

無產階級必需有國家政權、力量底集中組織、暴力底組織，以鎮壓剝削者底反抗、以領導廣大的民衆——農民、小資產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來『佈置』社會主義的經濟。

馬克思主義訓練工人的政黨，教育無產階級底先鋒隊，使牠能夠奪取政權、引導全體人民走到社會主義、指揮和組織新的制度、並且使牠能夠在沒有資產階級和反對資產階級的生活之建設事業中，成爲一切勞動者和被剝削者之教師和領袖。反之，現在正得勢的機會主義從工黨中訓練出離開羣衆的工資較優的工人代表，這些代表在資本主義之下『營謀』安適生活，爲着一飯之惠而賣去自己的嫡長權，就是說，放棄反對資產階級的民衆之革命的首領作用。

「國家就是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馬克思這個理論，和他所有關於無產階級在歷史上的革命作用之學說，有不可分離的聯繫。這個作用底實現，便是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政治上的統治。

但是，既然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作爲反對資產階級的暴力底特殊的組織，那末自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不先打破和毀滅資產階級爲自己而設的國家機器，則創造這樣一個無產階級的組織是否可能？共產黨宣言幾乎說到這個結論，而馬克思在總結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年革命底經驗時，便說到這個結論。

二 革命底總結

關於我們現在所講的國家問題，馬克思在其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的著作中，得出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年的革命底總結如下：

「……然而革命是澈底的，牠還正在經歷艱苦的道路。牠正在有條理地執行牠的事業。在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日」（拿破崙第三完成政變的日子●）以前，牠已經完成了

牠的預備工作底一半，現時牠正在完成這個工作底後一半，牠首先完成立法權，以獲得推翻牠的可能。現在牠已達到了這個目的，牠便來完成行政權；使這個權力變成爲最純粹的形式，並使之孤立，使之與自己對立成爲唯一的受攻擊的中心，以便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來反對牠」（着重點是我加的）。『當革命完成其準備工作底後半部的時候，歐洲便會站起來歡呼：老田鼠，你掘得好呀！』

『這個行政權有無數官僚和軍隊的組織，有種種複雜的矯揉造作的國家機器，有五十萬官吏和五十萬軍隊；這個可怕的寄生蟲，機體，密網般地籠罩着整個的法國社會，阻塞着牠遍體的氣孔，產生于君主專制時代，正當封建制度崩壞（且牠加速了這個崩壞）的時期。』法國第一次革命發展了集中制，『但是同時却擴大了國家政權底容量、屬性和輔助機關底數目。拿破崙完成了這個機關。』合法帝制和七月帝制。『除了很大的分工外，什麼新的東西都沒有增添出來……』

『……最後，代議制的共和國在牠反對革命的鬥爭中，除壓迫底辦法之外，已經不能不加強國家政權底手段和集中。所有的政變都使國家機關臻于完善，而並沒有破壞牠。』（着重點是我加上的）『那些相互更替爲着取得統治權而鬥爭的政黨，都把這個巨大的國

家建築物底奪取，視為自己的主要的勝利品。」（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九〇七年在漢堡出版的德文第四版九八至九九頁）

馬克思主義在這一段出色的議論裏，較之在共產黨宣言裏，有了長足的進步。在共產黨宣言裏，關於國家問題還提得極抽象，在最普遍的概念和詞句中表現出來。在後一著作中，這個問題就提得很具體，而且做出格外正確、肯定、實際而明白的結論說：過去一切的革命，都使國家機器臻於完善，可是現在我們必須打碎牠，破壞牠。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學說之主要的、基本的地方。而正是這個基本的地方，不僅被勢盛一時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所忘記了，並且被「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考茨基所公然地曲解了（我們以下要說及的）。

在共產黨宣言上作了歷史底一般的總結，這些總結使人們不能不認識國家是階級統治底機關，而且得到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獲得政權，不得到政治上的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牠就不能推翻資產階

級；並且這個無產階級的國家在牠勝利之後馬上會開始衰亡，因為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裏，國家是不需要的，並且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還沒有提到（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上來看）以無產階級的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其方式應當怎樣的這個問題。

馬克思在一八五二年所提出並解決了的正是這個問題。忠實於他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底哲學的馬克思，拿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這個偉大的革命時期之歷史經驗，來做他學說底基礎。此處也像平常一樣，馬克思底學說是由深刻的哲學宇宙觀和豐富的歷史智識所闡明的經驗之總和。

國家問題提得很具體：資產階級的國家，對於資產階級統治所必需的國家機器，在歷史上是怎樣產生的？在資產階級革命過程中和在被壓迫階級獨立的鬥爭面前，國家機器底變遷如何，牠的進化如何？無產階級對於這個國家機器又有什麼任務？

此地是指上述的馬克思底著作：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編者）

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集中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專制政體崩壞的時代。這個國家機器所最特別的兩種機關就是：官吏和常備軍。在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著作中，屢次說到這兩個機關是千頭萬緒地恰恰與資產階級相聯繫着。每個工人底經驗能把這種聯繫證明得格外明顯和特別動人。工人階級在其切身的經驗中學習認識這一個聯繫；因此工人階級這樣容易地明瞭並且這樣穩固地領會這種聯繫之不可免的理論，——對於這種理論，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不是不識時務地和輕意地否認牠，便是更輕意地『一般地』承認牠，可是忘記做出適當的實際的結論。

官吏和常備軍——這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破壞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產生的寄生蟲，但是恰恰又是『塞住』生命所關的氣孔的寄生蟲。現時盛行於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內的考茨基式的機會主義，認為這種把國家當作寄生的機體的見解，是無政府主義所僅有的特性。自然這樣的曲解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極端誣蔑社會主義而把『保護祖國』的觀念用於帝國主義戰爭中，來擁護和掩飾這個戰爭的小資產者，是很有益的，然而這終究是絕對的曲解。

自從封建制度崩壞之日起，歐洲有了許多資產階級革命，經過這些革命，這個官吏的和軍事的機關，便發展、完成和鞏固起來。部份地說，正是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並且受其支配；其所用的方法大半就是利用這個官吏與軍事機關把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底上層份子安頓到比較舒服、安靜、和尊榮的地位上去，把這些地位底佔有者抬到人民之上。我們試看一看俄國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二月二十七日）之後，在半年中所發生的事件：以前寧肯給黑幫派佔有的官吏職位，現在成爲立憲民主黨人、孟塞維克和社會民主黨人底贓物了。他們實際上沒有想到任何認真的改良；他們努力要把這些改良延期到『立憲會議』，而同時又把立憲會議偷偷的延期到戰爭底結束再說！但是對於瓜分贓物，佔據各部總長和副總長、將軍省長等等位置，却沒有延期，沒有等候任何的立憲會議！配置政府要職的把戲，實質上不過是全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中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去瓜分重分贓物底表現而已。從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二月二十七日）到九月九日（八月二十七日），這半年中的結果、客觀的結果，毫無疑義的是：把改良事業都延期

了，官吏位置都瓜分好了。在瓜分中的『錯誤』也因幾次重新瓜分而改正了！

但是在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如以俄國為例，就是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黨）之間『重新瓜分』的事件愈多，則一切被壓迫階級，以及領導牠們的無產階級，便愈明白地認清他們對於整個資產階級社會的不可調和的仇視性。因此，一切資產階級的政黨，甚至最民主的政黨——而『革命民主的』政黨也在內——就必然地要加強壓迫，來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並且鞏固壓迫機關，就是說，還是鞏固那副國家機器。事變底這種過程逼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來反抗國家政權，使牠認定任務，不是改善這個國家機器，而是要破壞牠，毀滅牠。

任務底這樣決定，並不是得之於邏輯的推論，而是得之於事變底實在的發展，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活的經驗。馬克思堅持歷史經驗底事實基礎，其嚴格的程度如何，我們可以從下面的事實中看出來：他在一八五二年還沒有具體地提出拿破崙來代替那必須推倒的國家機器這個問題。當時的經驗還沒有給牠提出這個問題的材料，只到後來，在一八七一年，歷史才把這個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去。在一八五

二年，祇能根據自然的歷史的觀察來很確切地指出，無產階級的革命已經達到了要『集中一切破壞力量』以反對國家政權的任務、『破壞』國家機器的任務。

此處可以發生一個問題：把馬克思底經驗、觀察和結論作為公理，把牠們移用到比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年這三年間的法國歷史更大的範圍上去，這是否正確呢？為答覆這個問題，我們把恩格斯底一段話回憶一下，然後再來研究實際的材料。

恩格斯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第三版中所作的序言裏說：

『……法國是這樣一個國家，其中歷史上的階級爭鬥較之其他各國都要澈底些，每一次鬥爭都達到了決絕的終點。這個階級鬥爭所由進展以及牠的結果所由表現的變化不居的政治形式，也在法國表現得最為特色。在中世紀時代，法國是封建制度底中心，從文藝復興時代以後，牠是一個純粹的等級的帝制底模範國，當大革命時候，法國撲滅了封建

十五世紀與十六世紀西歐文藝復興時代，其特點就是：古典藝術與古典文學之復興；科學創造之高漲；思想與人格之解放；封建制度之崩壞以及教堂權威之衰落。（校者）

制度，而創立了純粹資產階級底統治，此種統治所具有的標本式的明顯性，爲歐洲任何其他國家所不能及，同樣，法國正在抬頭的無產階級反對正在統治着的資產階級的鬥爭，其形式的尖銳亦爲其他各國所未見。」（一九〇七年版，第四頁）

最後一句話，現在已經陳舊了，因爲自從一八七一年以來，法國無產階級底革命鬥爭中發生了停頓，雖然這個停頓不管牠的期限如何久長，但絕對不能說在未來的無產階級革命中法國就沒有成爲階級鬥爭堅持到底的模範國之可能。

現在我們試把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各先進國底歷史來作一個概括的觀察。我們可以看出同樣的過程發現於更廣大的舞台上，進行比較遲緩而且複雜：一方面，制定『立法權』的不僅在共和國（法國、美國、瑞士）而且在君主國（如英吉利、在相當程度上的德意志、意大利和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等等）；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位置底『賊物』的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爲搶奪政權而爭鬥，同時，資產階級制度底基礎却毫無變動，最後，『行政權』以及牠的官吏和軍事機關，都完善並且鞏固起來了。

毫無疑義的，這是一般資本主義國家之一切最新的進化底普通現象。在一八四八至一八五一這三年中，法國在迅速的、銳利的、集中的形式中，表現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特有的那些發展過程。

特別是在帝國主義時期，財政資本時期，偉大的資本主義壟斷時期，壟斷資本主義之轉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時期，因加於無產階級的壓迫加劇了，故表現着『國家機器』之異常加強，官吏和軍事機關之空前的增長，這些現象無論在君主國裏與在最自由的共和國裏都是一樣。

世界歷史現時無疑地進到一個比一八五二年還廣大得多的階段，把無產階級革命底『一切力量集中起來』以『破壞』國家機器。

至於無產階級用什麼來代替這個國家機器 對於這個問題『巴黎公社』已經供給了最豐富的材料。

三 一八五二年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一九〇七年梅林格把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致衛登麥爾一信的摘要披露於“*Neue Zeit*”。（第二五卷、第二期，第一六四頁）上，那封信裏却有下面一段出色的議論：

『至于講到我呢，無論是發現現代社會中有階級存在的功勞和發現各階級間之鬥爭的功勞，都是不屬於我的。在我以前，資產階級的歷史學家老早就敘述過階級鬥爭底歷史的發展；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已經敘述過各階級之經濟的解剖。我所做的新工作是在證明下列各項：（一）階級底存在僅僅是與生產發展所特有的一定的歷史上的鬥爭相聯繫着的（*historische Entwicklungskämpfe der Produktion*）；（二）階級鬥爭必然要進到無產階級專政；（三）這個專政不過是消滅一切階級而進到無階級社會的一個過渡……』

在這一段話裏面，馬克思極鮮明地表示了：第一、他的學說和資產階級最先進最深刻的思想家底學說，有重要的根本的區別；第二、是他的國家學說底實質。

●本節是再版時的補作。（編者）

●新時代，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報。（編者）

一般人常常說馬克思學說中之要點便是階級爭鬥。但是、這種說法是錯誤的。而且從這個錯誤中往往就發生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曲解、改造馬克思主義，使之爲資產階級所能接受。因爲階級鬥爭的學說，不是馬克思所創造，而是馬克思以前的資產階級所創造的，一般地說來，這種學說是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僅僅承認階級鬥爭的人，還不能算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還許是未脫離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的政策之圈套。以階級鬥爭的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便是裁切了馬克思主義，曲解了馬克思主義，使他成爲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東西。只有把承認階級鬥爭擴大到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庸俗的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於這一點。我們必須在這塊試金石上去試驗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了解和承認。當歐洲底歷史使工人階級實際上去解決本問題的時候，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的「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之間的人們）都變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這是毫不足怪的。考茨基著的無產階級專政那

本小冊子，出版於一九一八年八月，即在我著的此書第一版刊行了很久以後；他這本小冊子便是小資產者之曲解馬克思主義和口頭上虛偽地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完全背棄牠的一個榜樣（參閱我的小冊子：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一九一八年出版於彼得格勒和莫斯科）。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在的機會主義，完全站在以上馬克思所說明的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因為這個機會主義承認鬥爭底範圍祇以資產階級關係底範圍為限（而在這個範圍以內，無論那一個有智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的）。機會主義恰恰沒有把承認階級鬥爭引伸到最主要之點，引伸到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引伸到推翻資產階級以及完全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在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空前劇烈的階級鬥爭以及此鬥爭具有空前尖銳的形式的一個時期，所以這個時期底國家，必然應為新的民主的（代表無產階級和一般貧民的）國家和新的專政的（是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家。

見本書第一四七至二六六頁。（編者）

再則，只有那些能夠了解：一個階級底專政不僅爲任何階級社會所必需，不僅爲推翻了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所必需，而且爲分割資本主義與「無產階級的社會」和共產主義的整個的歷史時代所必需的，只有懂得這一點的人，才算領會了馬克思國家學說之實質。資產階級國家底形式非常複雜，可是牠們的本質只有一個：所有這些國家歸根結底必然是資產階級專政。由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自然不免有極豐富而極複雜的政治形式，可是牠們的本質也必定只有一個，就是：無產階級專政。

第三章 國家與革命 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底經

驗 馬克思底分析

一 公社社員底企圖底英勇精神何在？

大家都知道，「巴黎公社」以前幾個月，一八七〇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的工人們，向他們證明推翻政府的企圖，是失望的蠢動。但是當一八七一年三月，最後的決戰已逼到工人們頭上來，使他們不得不出而應戰，而且暴動已成爲事實的時候，雖然當時有種種不利的朕兆，然而，馬克思却以極大的熱忱來慶祝了無產階級的革命。馬克思並不固守迂儒的非難，對於「不及時的」運動的非難，如臭名昭著的俄國的馬克思主義叛徒普列漢諾夫一樣；普氏在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寫了一些鼓勵工農奮鬥的文字，可是到了一九〇五年十二月以後，他却大喊自由主義的呼聲；

「本來不應動用武器」。

然而馬克思不僅因「衝天」(馬克思底話)的「巴黎公社」社員們底英勇精神而大喜；而且他認為這次羣衆的革命運動(雖然沒有達到目的)，是有偉大意義的歷史經驗，是世界無產階級革命底相當的前進，是較之幾百條鋼領和議論尤爲重要的實際步驟。分析這個經驗，從這個經驗中得到策略底教訓，在這個經驗底基礎上來重新審查自己的理論，這些便是馬克思自己所認定的任務。

馬克思認為對於共產黨宣言必須做的唯一的「修改」，他已經根據「巴黎公社」社員底革命經驗而實行做到了。

在共產黨宣言德文新版上最後的一篇序言，由兩位著者簽名的序言，是一八七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作的。在這篇序言中兩位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產黨宣言底綱領，「有些地方現在已經陳舊了。」他們又說：

「……特別是「巴黎公社」證明了「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現成的國家機器，而運用牠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單括號中的詞句，是從馬克思著的法國內戰一書中摘引出來的。

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把「巴黎公社」底一個基本的主要的教訓看得異常重要，而把牠作為對於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重要的修改。

非常令人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恰恰這個重要的修改，被機會主義者曲解了，而共產黨宣言底讀者，即使沒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也有十分之九不明瞭這個修改底意思。我們以後要特闢一章，對於這種曲解更詳細地加以討論。現在我們所要指出的，就是對於我們上面所摘引的馬克思底名言之流行的庸俗的「了解」，在於認為：似乎馬克思在這裏着重遲緩發展底觀念，而與奪取政權對立起來，諸如此類等等。

實際上正是相反。馬克思底意思就在於：工人階級應當破壞並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而不僅限於簡單地奪取這個機器。

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日，就是說，正在「巴黎公社」的時候，馬克思寫給庫格曼的一封信裏說：

「……如果你讀到我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一書最後一章，你就可以看見，我認為法國

革命以後的企圖，是在於：並不是把官僚和軍事的機器從一手轉交他手，如今日以前一樣，而是要破毀牠（馬克思底着重點；在原文上有 *zerstören* 一字），而歐洲大陸上任何一個真正的民衆革命之先決條件，正是如此。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底企圖，也恰恰就在這裏』（見：*Neue Zeit* 第二十卷第一期第七〇九頁，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號）。（馬克思給庫格曼的信，俄文至少有兩版，其中一版是由我校訂並由我作序的。）。

『破毀官僚和軍事的國家機器』這幾個字，已經把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對國家的任務問題之主要的教訓，簡明地表白出來了。現在盛行一時的考茨基主義在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解釋』中所完全忘却了的，並且公開曲解了的，也正是這個教訓！

至於馬克思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裏所提及的話，我們已經在上面把牠完全摘引出來了。

在上述的馬克思底議論中，有兩點是特別要提出來講的。第一、牠的結論只限

於歐洲大陸。這在一八七一年的時候自然是很明白的，那時英國還是純粹資本主義國家底模範，而沒有軍國主義，就大體講來，也沒有官僚制。因此，馬克思便把英國除外，就因為在當時英國的革命，甚至於民衆的革命，即使沒有破壞『現成的國家機器』這一個先決條件，也有實現的可能。

現在是一九一七年，是第一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時代，馬克思所說的那個除外已經不適用了。世界上最大而最後的那二個無軍國主義和無官僚主義的盎格羅撒克遜『自由』底代表者——英國和美國——已完全捲入全歐的污穢的血坑中去了，捲入駕馭一切和壓服一切的軍國官僚制度底血坑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國和美國、『一切真正民衆革命底先決條件』，便是破壞和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之間這些國家已經準備了像『歐洲』一樣的一般帝國主義的完備機器）。

第二、馬克思說，破壞官僚和軍閥的國家機器是『一切真正民衆革命之先決條件』，這個含有極深刻意義的指示是值得特別注意的。『民衆』革命這個概念，在

馬克思底嘴裏說出來，似乎有點奇怪，而俄國的自號爲馬克思主義者的普列漢諾夫派和孟塞維克，——這些司徒威底信徒們，對於馬克思這樣的術語，也許認爲是一種『語病』。他們把馬克思主義變爲這樣簡陋的自由主義的曲解，以爲除了資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革命之對立以外，其他什麼都沒有的，而且他們對於這種對立的了解是絕無生氣的。

如果舉二十世紀幾個革命做例子，那末無論葡萄牙和土耳其的革命，當然也要承認其爲資產階級的革命。可是這兩個革命都不是『民衆的』革命，因爲在這兩次革命中，最大多數民衆都沒有積極而獨立地奮鬥，也沒有提出牠們自己的政治和經濟的要求。反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的俄國資產階級革命，雖然沒有獲得像葡萄牙和土耳其的革命有時所得的那般『燦爛的』成績，可是毫無疑義的，牠却是一個『真正民衆的』革命；因爲民衆，大多數民衆，在重重壓迫和剝削之下的最深的社會『下層』民衆，都獨立地起來了，他們用自己的要求，用自己的企圖，在已破壞了的舊社會底廢址上按自己的利益而建設新社會的企圖，影響了革命底整個行程。

在一八七一年，歐洲大陸上無論在那一國內，無產階級都尚未成爲民衆底多數。把真正大多數的民衆捲入運動漩渦中的『民衆』革命，當時祇有把無產階級和農民包括在內才有可能。這兩個階級組成了當時的『民衆』。這兩個階級由於受『官僚軍閥的國家機器』底壓迫、踐踏、剝削而聯合起來了。搗毀這個機器，破壞這個機器，便是『民衆』的、民衆大多數的、工人和多數農民之真正利益，便是貧農和無產階級自由聯合底『先決條件』，要是沒有這個聯合，則民主制是不穩固的，社會主義的改造是不可能的。

大家都知道，『巴黎公社』雖然由於許多內部和外部的原因，沒有達到目的，可是牠爲自己開闢了走向這個聯合的道路。

因此，在說到『真正的民衆革命』的時候，馬克思是絲毫沒有忘却小資產階級底特性的（關於這些特性，他曾常常而且很多說及的），同時他嚴密地估計了一八七一年在歐洲大陸上多數國家中各階級間的實際對比關係。而在另一方面，他指出，『破壞』國家機器是工人和農民底利益所要求的，而這個共同的要求使他們聯

合起來，在他們面前提出一個消除『寄生蟲』而以某個新的東西來代替他的共同的任務。

但是到底拿什麼來代替牠呢？

二 用什麼來代替被打破了的國家機器呢？

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在一八四七年的共產黨宣言中，只給了一個十分抽象的回答；正確些說，他只指出了任務，而不是解決這些任務的方法。以『無產階級之組織成爲統治階級』，以『民主制之獲得』來代替牠，這便是共產黨宣言底回答。

這一個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組織應取什麼具體的形式，這個組織究竟如何與最完備和最澈底的『民主制之獲得』結合起來，對於這個問題，馬克思爲避免烏托邦計，便期待從羣衆運動底經驗中，去找出一個答案來。

馬克思在其法國內戰一書中把『巴黎公社』底經驗（不管牠怎樣少）加以十分精密的分析。現在我們把該書最重要的幾段摘錄出來：

在十九世紀，發端于中世紀的『集中的國家政權及其遍地存在的機關：常備軍、警察、官僚、僧侶、司法機關』，都達起來了。隨着勞資間的階級衝突底發展，『國家政權日益帶有以壓迫勞動為專務的社會政權底性質，帶有階級統治之機器底性質。表示階級鬥爭之相當進步的每一次革命之後，國家政權之純粹壓迫的性質，便日益公開地顯露出來了』。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四九年的革命以後，國家政權就成爲『資本進攻勞動的戰爭底全國武器』。而第二帝國，鞏固了這一個武器。

直接與帝國處于對抗地位的，便是『巴黎公社』。『牠是這樣的共和國之一定的形式』，『這種共和國，不僅要消滅階級統治之帝制的形式，並且要推翻階級統治的本身……』

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共和國底這個『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樣呢？『巴黎公社』曾經着手創造的國家，又是如何呢？

『……『巴黎公社』底第一個法令，便是廢除常備軍而代之以武裝的民衆……』

●法蘭西的『第二帝國』，即拿破崙底第三帝國，存在於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七一年。參看本集註釋●和註譯●。(編者)

這一個要求現在在一切自命爲社會主義政黨底黨綱中都有規定。但是牠們的黨綱有什麼價值，這從俄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底行動中表現得最明顯，實際上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二月二十七日）的革命之後，他們恰恰拒絕了實施這一個要求！

「巴黎公社」是依照普通選制由巴黎各區所選出來的城市代表所組織的。他們是完全負責的，並且隨時可以更換的。他們的大多數自然是工人，或被認爲是工人階級底代表……。」

「向來是國家政府底工具的警察，立刻被革除了牠的一切政治職務，而變爲公社底負責機關，隨時可以更換。……其他一切的行政機關底官吏，也是一樣……。從公社社員起，自上而下，一切爲社會服務的人員，只給以工人底工資。一切國家最高官吏之特權以及辦公費，現在都跟着這些官吏本身底消滅而同歸于盡……。把舊政府物質權力底武器——常備軍和警察既進行消滅之後，「公社」又即刻實行破壞精神上的壓迫底武器，即牧師底勢力……。司法官也失去其似是而非的獨立性，……他們今後應該公開地的選舉出

來，要成爲負責的。並且隨時可以更換的……。」

如此，「巴黎公社」用以代替被打破了的國家機器的，似乎「僅僅」是更完善的民主制；取消常備軍，一切官吏之完全選舉和罷免。但是事實上這「僅僅」是表示以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機關來代替舊機關的一種偉大的改變。這裏恰恰可以看到「由數量變到質量」底情形之一：民主制一經實現到一般所能實現的那樣最完美最澈底的時候，牠便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爲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由國家（等於壓迫某一階級的特殊力量）變爲已非原來的國家的一種東西。

壓倒資產階級及其反抗，這還是必要的。而對於「巴黎公社」，這尤其是必要的：「巴黎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便是沒有十分堅決的來做這件事。但是在這裏，壓迫機關就是大多數的民衆，而不像向來奴隸制、農奴制、和雇傭奴隸制之下的情形那樣，造成壓迫的機關的是民衆的少數。可是一經到了大多數民衆自己去壓倒他們的壓迫者的時候，壓迫底「特殊力量」已經沒有必要了！在這種意義上，國家便開始衰亡。大多數的民衆能代替享有特權的少數人（特權的官吏、常備軍底將

領)底特殊機關，自己直接執行一切職務；國家政權職務日益由全體民衆來執行，則這個國家政權底需要性便將日益減少。

在這種關係上，馬克思所着重說明的「公社」底辦法，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取消支給官吏的一切辦公費和一切金錢上的特權，把國家一切服務人員底薪俸，減低到和「工人底工資」相等。在這裏恰恰最明顯地表現出一個轉變——從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變為無產階級的民主制，從壓迫者的民主制變為被壓迫階級底民主制，從用以壓倒某一個階級的「特殊力量」的國家，變為用大多數民衆——工人和農民——底全體底力量，來壓倒壓迫者。而馬克思底教訓之被人忘却了的，也正是這特別明顯的一點——，在國家問題上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在通俗的書籍中（這樣的書籍，不可勝數）都沒有提及這一點。對於這一點，「通例」是不講的，正像人們對過去「幼年時代的浪漫」不講是一樣，像基督教徒達到了國教的地位的時候，便「忘記了」原始基督教之「純直」及其革命的民主精神是一樣。

減低國家高級官吏底薪俸，似乎是一種「簡單的」幼稚原始的民主主義之要

求。最新的機會主義底『創造者』之一，以前的社會民主派——培恩斯坦曾屢次重複卑鄙的資產階級的嘲笑口吻，來嘲笑『原始的』民主主義——。他同一切機會主義者和現在的考茨基主義者一樣，他完全不懂得，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非有相當地『回復』到『原始的』民主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如果不然，試問何以能進到使國家各種職權由大多數民衆和全體人民來執行呢？），第二，他完全不懂得，建築在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文化之基礎上的『原始民主主義』，與太古時代或資本主義以前時代的原始民主主義，並不是一樣的東西。資本主義的文化創造了大規模的生產、工廠、鐵路、郵政、電報等等，而在這個基礎上，舊的『國家政權』之大部分的職務，已大大地簡單化了，這些職務可以和登記、填表、檢驗之最簡單的手續一樣辦理了，這些職務，每個識字的人都很能夠勝任，執行這些職務，只要付以『工人底工資』，也就就可以了，在這些職務中之一切什麼特權的、『指揮的』黑幕，也就可以（而且應該）取消了。

一切官吏之完全選舉和隨時可以更換，降低他們的薪俸到普通『工人底工資』

一樣的程度，——這些是簡單的而且『不言而喻的』民主的辦法，這些與工人和大多數農民底利益完全相適合的，同時也就是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一條橋樑。這些辦法都是關於社會之國家的，純粹政治的改造，不過這些辦法，祇有與正在實行的或準備實行的『掠奪掠奪者』的步驟聯繫起來，就是說，祇有與生產資料之資本主義私有權轉變為社會的所有權的過渡聯繫起來，才能有其全部的意義。

馬克思說過：

『「巴黎公社」實現了一切資產階級革命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牠革除了國家的兩大支出——軍隊和官吏。』

農民也同小資產階級底其他各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僅只有很少數的人『高昇』、『做人』（在資產階級的意義上說），就是說，或者變成富人，資產者，或者升為有保證的，享特權的官吏。凡有農民存在的一切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在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裏都有農民存在的），絕對大多數的農民是受着政府的壓迫，他們渴望推翻這個政府，渴望『廉價的』政府。而能夠實現這個任務的，只有無產階級，且無

產階級在實現這個任務時，同時就對國家實行走向社會主義改造的一步。

三 代議制底消滅

馬克思說：

「巴黎公社」不是國會的，而是立法和行政同時兼任的一種工作團體……。」

「……從前每三年或六年一次去解決統治階級中何人應當在國會中去代表和鎮壓（*und zertreten*）民衆，現在不然，普選權對於組織在「公社」的民衆之作用是在爲自己企業尋找工人，監工，管賬員，這正像個人的選舉權爲單獨的企業主用以達到同一目的，是一樣的情形。」

馬克思對於代議制這一種特出的批評（在一八七一年寫的），由於現在社會國家主義和機會主義底統治，也被人「忘却」了。現在以總長和議員爲職業的人們，無產階級底叛徒們和「實利的」社會主義者，把一切對代議制的批評，都諉之於無政府主義者，並且根據這個極巧妙的理由宣佈一切對於代議制的批評，都是「無政

府主義』！在『先進』的代議制國家中，無產階級一看見謝德曼、達微特、李謹、山巴、倫諾德、亨德遜、萬德威爾、斯道寧、柏蘭廷、皮沙拉底等一類的『社會主義者』，便起一種厭惡的心理，所以逐漸同情於無政府工團主義（雖然牠是機會主義底同胞兄弟），這是絲毫不足為奇的。

但是，革命的辯證法對於馬克思決不是像普列漢諾夫、考茨基等所慣用的那種空洞的時髦話與響亮的高言一樣的。馬克思善於無情地與無政府主義決裂，因為無政府主義特別在革命形勢顯然沒有的時候，不會利用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底『豬欄』；可是同時，馬克思又善於對代議制加以一種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的批評。

每數年一次去解決統治階級中何人應當在國會中來摧殘和壓迫民衆——這便是資產階級的代議制之本質，不僅在國會制的立憲的君主國裏是這樣，即在最民主的共和國中也這樣。

但是，如果我們提到國家這個問題，如果我們把代議制看作是國家底機關之一，從無產階級在這一方面任務底觀點上來說，那末，跳出代議制的出路在那裏

呢？怎樣能夠不要代議制呢？

我們要再三反復地聲明：馬克思基於研究「巴黎公社」所得的教訓，完全被人們忘却了，故現代的「社會民主派」（應該讀作：現代社會主義底叛徒）除了無政府主義或反動派對代議制的批評而外，便完全不知道任何別的批評了。

跳出代議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表機關和廢除選舉制，而是在於把「清談館」式的代表機關，變為實際「工作的」團體。

「『公社』不應該是國會的，而應是立法和行政同時兼任的一種工作團體。」

「不是議會的而是工作的」機關——這是直接對準着現代社會民主黨議員們和國會「守房門的小狗們」說的！請看任何一個議會的國家，由美國至瑞士，由法國至英國、挪威等等：真正的國家大事是在後台辦理，而且由各行政部、事務處、參謀部執行的。而在國會裏，僅僅藉空談來達到愚弄「平民」的特殊目的而已。

這種事實是正確到這樣的程度，甚至在俄羅斯共和國裏，——在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裏，在他還未來得及建立真的國會以前，而代議制底一切這些罪惡都已經馬

上明白表示出了。腐敗的小資產階級英雄們如斯可比列夫、蔡雷特利、威爾諾夫和奧克仙蒂使之流，甚至於敢來把蘇維埃變成爲一種最腐敗的資產階級代議機關，使蘇維埃成爲清談館。『社會主義的』總長先生們，在蘇維埃裏面用種種空言和決議來愚弄輕信的農夫們。在政府裏面，有不斷的更換，一方面爲的要盡可能的依次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來享受這個『肉饅頭』，來多佔一些高貴的位置，另一方面爲的要『轉移』人民底『視線』。而『國家』大事，却都在事務處和參謀部中『辦理』了！

掌握政權的『社會革命』黨底機關報民事不久以前在一篇編輯部的社論中（以『大家』都以政治賈淫爲業的『好社會』中的人們之公開直爽性）曾經承認，甚至在屬於『社會主義者』（恕我用這個名詞！）的內閣各部中，所有官吏的機關實際上仍然是舊的機關，牠同從前一樣行使職權，十分『自由地』來阻撓革命的企圖！其實，即使沒有他們這一種承認，難道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之參加政府的實際歷史就不能證明這些事實了麼？這裏值得注意的，祇是這一點：在內閣界中與立憲

民主黨人並坐的威爾諾夫、路桑諾夫、孫齊諾夫以及民事報編輯部的諸位先生們把廉恥都完全喪盡了，所以他們就毫不客氣地來宣佈說（如談論閒事一樣），在「他們的」內閣各部中，萬事一皆如舊！用革命民主一類的話來欺騙一般鄉里愚民，用官僚事務室的担擱延宕來爲資本家謀「福利」——請看這就是「廉潔的」聯合政府底本質。

「巴黎公社」採用了新的制度，來代替資本主義社會底賣身的腐敗的代議制，在這種新的制度之下，判斷和討論底自由，就不是一種騙人的勾當；因爲代表們必須自己工作，必須自己執行他們自己的法律，必須自己來檢察實際生活所得的結果，而且還必須自己直接來對選舉者負責。代表機關此地還存在着，可是作爲一種特殊系統，作爲立法和行政底分工，以及作爲議員們之特權位置的這種代議制，已經沒有了。沒有代表機關，則民主制便無從設想，甚至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也無從設想；但是，如果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社會的批評不單是空言，如果推倒資產階級底統治的志向，是我們鄭重的真誠的志向，而不是爲籠絡工人們底投票的「選舉的」空

談，如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謝德曼、李謙、山巴和萬德威爾等輩所做的那種行爲一樣，那麼，我們可以而且應該不要代議制。

馬克思講到「巴黎公社」和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所需要的那種官吏底職責時，他拿這些官吏來與「其他一切雇主」所用的職員相比，就是說，與應用「工人、監工、和簿記」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底職員相比，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

馬克思絕對沒有一點烏托邦思想的痕跡，就是說他沒有虛構或幻想一個「新的社會」。他不是這樣的。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從前者轉到後者的過渡形式，作爲一個自然界和歷史的過程來研究。他利用無產階級羣衆運動底實際經驗，而竭力設法去從這經驗中取得實際的教訓。他從「巴黎公社」中去「學習」，正同所有過去偉大的革命思想家們毫不恐懼地去學習許多被壓迫階級偉大的革命運動底經驗一樣的；他從來不向他們講過一句迂儒「道義之言」（如像普列漢諾夫說：「本來不應動用武器」，或如蔡雷特利說：「一個階級應當自己約束自己。」）

要把官吏制度到處立刻澈底消滅，這是談不到的。這是一種烏托邦。但是一舉

而把舊的官吏機關打破，而立刻開始建設一個新的組織，使漸次能夠消滅一切官吏制度——這並不是一個烏托邦，這是「巴黎公社」底經驗，這是革命的無產階級之直接的當前的任務。

資本主義把「國家」行政任務簡單化了，牠給我們能夠推翻「指揮制」而把一切事務歸納為無產階級底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用全社會名義來僱傭「工人，監工，會計員」的組織。

我們不是空想家，我們絕不「夢想」如何把一切的行政機關和一切的從屬關係立刻廢除；這些都是由於對無產階級專政的任務缺乏了解而發生的一種無政府主義底夢想，這些夢想根本上與馬克思主義不相容的，而事實上祇是把社會主義革命延擱下去，一直延擱到人們變到另外一種人時為止。我們不是這樣，我們是要用現在的人們來從事於社會主義革命：現在的人們要是沒有從屬關係，沒有監督，沒有「監工和會計」，便什麼事都不能進行。

但是，對於一切被剝削者和勞動者底武裝先鋒隊——無產階級，是必須服從

的。國家官吏之特別的『指揮制』是可以並且必須——於二十四小時內——立刻用『監工和會計員』底簡單職務來代替牠，這些職務已經是一個普通市民底能力所能勝任的，並且給予『工人底工資』，也就可以完滿地執行了。

我們從資本主義已經建設起來的一切條件出發，去組織大規模的生產，我們工人自己依靠自己的經驗，建設起最嚴格的鐵的紀律，而用武裝工人底國家政權來維持牠；即此我們把國家官吏底職務歸納到只是執行我們的訓令的作用，他必須是負責的，可以更換的，而且是報酬微薄的『監工和會計員』（自然要用各種各樣的技術專家），——這是我們無產階級底任務，無產階級革命完成之後，可以而且必須從此開始。在大規模生產基礎上的這個開始，將自然而然地使所有的官吏制度漸趨於『泯滅』，使一個新的制度逐漸地創造出來，這是一個沒有括弧的制度，不似僱傭奴隸制的制度，在這個制度之下，監督和報告之不斷簡單化的職務，將由大家輪流去執行，然後將成爲習慣，最後將不成爲人們底特殊階層底特殊職務。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有一個聰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曾稱郵局爲社會主義經濟

底模型。這是很對的。現在的郵局是按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底方式組織起來的一種經濟。帝國主義正在逐漸地把所有的托辣斯變爲同一形式的組織。在那些工作過重而還挨着飢荒的『普通』工人們之上，這裏存在着同樣的資產階級的官僚制。但是社會的管理底機械，這裏已經預備好了。我們祇須去打倒資本家，用武裝工人的鐵手去壓服這些剝削者底反抗，去打破現代國家的官僚機關；——我們就有一個沒有『寄生蟲』而是高度技術設施的機械，這個機械可以由團結着的工人們親自來運用，同時雇用技師，監工，會計員，而以工人底工資相等的薪水付給他們一切人，如付給『國家』一切官吏們一樣。這是關於所有托辣斯的一個具體的，實際的，而且立即可以實現的任務，這個任務能夠解除對工人們的剝削，能夠把「巴黎公社」實際上已經開始的經驗（特別是在國家建設方面）實際地應用出來。

依照郵局的制度去組織我們的全部國民經濟，而要使所有的技師，監工，會計員以及一切官吏都不能得到超過『工人底工資』的薪金，並且要在武裝的無產階級監督和領導之下——這便是我們最近的目的。這樣的國家，和這樣的經濟基礎，才

是我們所必需的。這樣才能破壞代議制而保留着代表機關。這樣才能使勞動階級避免資產階級之強姦這些機關。

四 民族統一底組織

「——在「巴黎公社」沒有時間去往後發揮的那個全國組織短短的概論上，十分明顯地說：「公社」應該成爲甚至一個極小村落底政治形式」——而巴黎的「國民代表機關」應由各地的公社選舉出來。」

「——那時候中央政府所保留着的爲數不多而意義很重大的幾種職務，是不應該廢除的（如說應該的話，那是有意的欺騙），而應該轉交給公社的官吏——就是說嚴格負責的官吏——。」

「——民族底統一是不應該破壞的，反之，牠應該藉公社制度的方法組織起來。民族底統一應當成爲實際，其方法就是，消滅那自認爲是這個統一的體現者，但同時却欲離民族而獨立，且立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其實只是民族身體上的寄生贅疣而已——」

「任務是在於剷除舊政府權力底純粹壓迫機關，而其有用的職權，要從企圖站

在社會之上的政權方面，奪取過來，交給社會負責的公僕們。」

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對於馬克思這些話不了解——或者可以更正確些說不願意了解——到怎麼一種程度，這在培恩斯坦所著的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與社會民主黨底任務。一書中表現得最明白了。正是關於上面所引的一段馬克思的話，培恩斯坦這樣寫着：這個政綱——

「就其政治的內容說，在所有的重點上，十分類似蒲魯東的聯邦主義。●。不管「小資產者」蒲魯東（培恩斯坦把「小資產者」數字放在引號之內，在他的意思謂蒲氏爲小資產者是不相稱的。）和馬克思的不同之點有多少，可是在這幾點上，他們兩人的思想行程，是幾乎完全相同的」。 培恩斯坦接着又說，自然，市自治底重要現在正在增長着，但是「我覺得很懷疑，是否照馬克思和蒲魯東所想的那樣：民主制之第一個任務，是取消（Auflösung——原意爲：解散，融解）現代的國家，完全變更（Umwandlung——變革）現代國家的各種組織，就是說，由各省和各特別區的議會代表組織國民會議，而省和區的議會，本身則又由公社的代表組成，——這樣便把全國代表機關底舊方式完全消滅

了。……」〔培恩斯坦：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一八九九年德文版，第二三四和一二六頁〕。

把馬克思關於『消滅國家政權——寄生蟲』這一個見解來和蒲魯東底聯邦主義混爲一談，這真是無奇不有！但是，這並不是偶然的，因爲機會主義者的頭腦裏從來沒有想到馬克思在這裏並不是說以聯邦主義來反對集中制，而是說要破壞存在於所有資產階級國家裏的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機會主義者所能想到的，不外是『市自治』，這是他們在自己周圍，在小資產階級的庸人社會中和『改良主義的』沈滯環境中所能看得到的東西！至於無產階級革命，機會主義者簡直連想都不會去想牠了。

這是很可笑的。然而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關於培恩斯坦所說的這一點，從來沒有人起來爭論過。很多駁培恩斯坦的人，——特別是在俄國文壇中的普列漢諾夫和西歐文壇中的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後者從來沒有說過關於培恩斯坦這一個對於馬克思的曲解。

機會主義者的不會用革命頭腦去思索和不會對革命着想，已經達到了這樣的程度，甚至於把『聯邦主義』的大帽子戴到馬克思的頭上，並且把馬克思和無政府主義底開山祖蒲魯東混爲一談。而自願做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者和擁護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漢諾夫，對於這一點却不置一辭！這就是考茨基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所固有的對於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的不同點所持的最庸俗的見解底根源之一。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還要加以討論。

在上面所摘引的馬克思論「巴黎公社」經驗的一段文字裏，並沒有一點聯邦主義的痕跡。馬克思真正同意於蒲魯東的地方，機會主義者培恩斯坦完全沒有看見；而馬克思和蒲魯東之間的不同之點培恩斯坦却認爲相同之點。

馬克思和蒲魯東相同的地方，就在於他們都主張「破壞」現時的國家機器。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蒲魯東和巴枯寧都在內）這一種相同的見地，機會主義者和考茨基都不願意知道，這就是因爲在這一點上，他們都離開了馬克思主義。

馬克思和蒲魯東與巴枯寧的不同點，恰恰就在聯邦主義上面（至於無產階級專

政，那就不用說了），聯邦主義原則上是由無政府主義底小資產階級觀點所產生出來的。而馬克思是一個集中主義者。在上邊所摘引的一段議論中，他絲毫沒有離開集中主義。只有那些充滿了小資產階級對國家的『迷信』的人們，才能把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底消滅，誤認為集中主義底消滅！

但是，假使無產階級和貧農把國家的政權握在他們自己手裏，把他們自己完全自由地組織在公社之內，將所有公社的行動聯結一致，藉此向資本進攻，壓服資本家底反抗，把鐵路、工廠、土地、以及其他的私有財產交給全體國民，全體社會，難道還不是集中主義麼？這不是最澈底的民主集中主義麼？這不是無產階級的集中主義麼？

培恩斯坦連想都不能想到有自願的集中主義之可能，有由許多公社自願結合而為一民族之可能，和有由無產階級的公社自願的聯合起來，從事於破壞資產階級的統治和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之可能。培恩斯坦同一般的庸人一樣，他所能夠想像的，祇是一種由上而下的集中主義，只有官僚主義和軍閥主義才能強迫實行和維持

的一種集中主義。

馬克思好像預知他自己的見解有被曲解的可能，而故意着重地說，凡是非難「公社」要破壞民族統一和取消中央政權，這便是一種有意的欺騙。他故意用「組織民族統一」一句話，要把覺悟的、民主的、無產階級的集中主義，來與資產階級的、軍閥的、官僚的集中主義相對立。

但是，……不願意聽的人，比一切蠅子要壞些。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恰恰不願意聽國家政權底消滅，寄生蟲底消滅。

五 寄生蟲式的國家之消滅

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已經引用過馬克思的話了。現在我們再引他的話來補充一下。

馬克思說：

「——歷史上新的創設之普通所遭遇的命運，常是這樣：牠每每被人指為抄襲舊的社

會生活形式，又因那些新的機關多少有些與舊時的社會形式相類似，因此牠就甚至被人視為陳腐的社會生活形式。因此這個破壞（Break——打碎）現代國家政權的新的「公社」，也就被人看作是中世紀的公社底復活。……，看作是許多小國家底一個聯邦（孟德斯鳩，基郎特）——看作是古代用以反對過分的集中主義的鬥爭之放大的形式……。」

「公社的結構要把被寄食於社會而妨害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所併吞了的一切力量，都歸還給社會機體。即此一端，就已能將法國底復興，向前推進了！。」

「……公社的結構要使鄉村的生產者，受每一州區底主要城市底精神上的領導，並且從城市工人中間獲得代表他們利益的自然的代表。公社本身底存在當然包含着地方自治；但是這種自治已經不是用來對抗現時成為多餘物品的國家政權了。」

『消滅國家政權』，（牠是『寄生的贅瘤』），『剷除』牠，『破壞』牠；『國家政權現在成為多餘物了』，——這就是馬克思在估量和分析「巴黎公社」經驗時關於國家問題所用的詞句。

所有這些，是馬克思在將近半世紀以前所寫的，現在應該把牠們開掘出來應

用，使廣大的羣衆能夠認識未被曲解過的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從他所經過的最後一次大革命的觀察中所獲得的結論，恰恰在現在無產階級大革命時期已經正在到來的時候，被人們忘却了！

「……對於「巴黎公社」解釋之繁多，及其所表顯的利益底複雜，證明了「公社」是一個十二分伸曲自如的政治形式，可是一切舊時的政府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壓迫者的形式。「公社」之真正機密之處是在：牠實質上是工人階級底政府，是生產階級反對佔有階級的爭鬥底結果，最後牠是完成勞動階級經濟解放的公開的政治形式……。」

「要是沒有最後這個條件，則公社的結構便沒有實現的可能，而且是一個騙局。」

烏托邦主義者，從事於各種政治形式之「發明」，使社會主義社會的改造得在這些政治形式之下實現。無政府主義者，則對於任何政治形式的問題，都置之不理。現代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認為代議制的民主國家底資產階級的政治形式，是不可超越的界限；他們在這個「標本」之前祈禱，碰破了頭額，並且把每一個破壞這種政治形式的企圖，都稱為無政府主義。

馬克思從社會主義和政治爭鬥之全部歷史中得一結論說，國家是必然要消滅的，而國家消滅之過渡時期（從有國家到沒有國家的過渡時期）底政治形式，就是「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但馬克思並不去發明這個未來的政治形式。他祇限於確切地考察法國歷史，分析牠，以及他在一八五一年所得出的結論：情形正在發展到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

當無產階級羣衆運動爆發了的時候，雖然這個運動是失敗的，短期的，而且顯然是孱弱的，而馬克思却開始去研究，這種運動究竟發現了什麼政治形式。

「公社」是由無產階級革命「終究發現了」的形式，在這種形式之下，勞動底經濟解放是可以實現的。

「公社」是無產階級革命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的第一次企圖，並且是「終究發現了」的政治形式，這個政治形式是可以而且必須來代替已破壞的國家機器的。

我們在後面可以看到，俄國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在不同的環境之

中和各異的條件之下，繼續着「巴黎公社」底事業，並且證實馬克思那種天才的歷史的分析的正確。

第四章 恩格斯底補充說明（續上）

馬克思關於「公社」經驗底意義問題，曾給我們一個基本的觀念。恩格斯曾屢次提及這個問題，並解釋馬克思底分析和結論，且有時把這問題底另一方面發揮得更有力而明瞭，故我們不得不對於這些解釋，特別加以研究。

一 「住宅問題」

恩格斯在他關於住宅問題的著作（一八七二年出版）中，就已經估計到「公社」底經驗，他再三申說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很有趣味的，在這個具體的問題上，很明白地表示出：一方面，無產階級國家與現代國家，有許多類似之點，這些類似之點就使我們有所根據把這兩種都稱為國家；他方面，無產階級的國家又有一些不同之點，或者可以說牠是消滅國家的一個過渡。

「怎樣去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代的社會裏，解決這個問題是完全與其他任何社會問題一樣的：要藉需求和供給之逐漸的經濟上的均等方法來解決的；可是這種解決問題的方法，其自身不斷地在那裏產生新的問題：就是說牠並不能解決任何的問題。社會革命將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這一點不僅是要看時間和空間的情形而定，而且牠還與那些更深遠的問題相聯繫的，而這些問題當中最重要的一個，便是消滅城市與鄉村間的對抗性。我們既不願從事杜撰將來的社會結構底烏托邦制度，就用不着在這一點上浪費時間了。不過有一件事是確實無疑的，就是現在的大城市中住宅是很充足的，立即可以幫助實際上需要住宅的人，只要住宅應用得合理。但是很明顯的，要實現這一點，必須剝奪現在的房主，將他們的屋子讓那些沒有房子住的工人或現在住客過多的屋子裏的工人們搬進去住。無產階級一旦得了政權，這種以社會利益為基礎的辦法，立即就像現代國家之實行一切剝奪和佔據房屋一樣容易執行了。」（一八八七年德文版第二二頁）

這裏沒有提到國家政權形式底變遷，而只是講他的活動底內容。現在剝奪和佔領房子，也依現代國家底命令來實行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從形式上看來，也要

『命令』佔領住宅和剝奪房屋。但是很明顯的，舊的執行機關，與資產階級相勾結的官僚機關，對於施行無產階級國家底命令，簡直是不中用的。

『——在這裏必須指出，勞動民衆之真正奪取一切勞動工具及全部工業，是與蒲魯東派的『贖買』法完全相反的。在後一種辦法之下，單個工人變爲領有住宅，領有農民一片土地，以及勞動工具的私有者，但在前一種辦法之下，却是『勞動民衆』變爲一切房屋，工廠和勞動工具底集體的所有者了。這些房屋，工廠等等底使用權，至少在過渡時期，是難以給個人或私人團體而不徵收租金的。同樣的，取消土地私有權不一定要取消地租，不適用不同的形式將地租轉交給社會罷了。所以勞動民衆之實際上佔有一切勞動工具，並不使僱傭和租讓底保存因此而廢除。』（六九頁）

我們在下一章將討論這裏所提及的問題，就是關於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恩格斯說得很慎重，他說無產階級國家『至少在過渡時期』是『難以』分配房屋而不收租金的。把屬於全國國民的房屋租給各個家庭而課以一定的租金，則就須要徵收租金，須有某種監督，須有房屋分配的某種標準。凡此一切都要有某種國家形式，可

是這並不要特殊的軍事和官僚機關以及官吏特有的特權地位。至於過渡到可以免費出讓房屋的地步，這是與國家完全『衰亡』有連帶關係的。

恩格斯在講到白郎基主義者在「公社」後和在牠的經驗影響之下而站到馬克思主義底原立場上來的時候，曾順便把這個立場描寫成爲下列的一句話：

『……無產階級政治行動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是因爲這是達到取消階級和同時即取消國家底一種過渡。……』

那班愛好咬文嚼字的批評家，或是那班『殘殺馬克思主義』的資產階級份子，也許以爲在承認『取消國家』和否認上面所引反杜林論的那種無政府主義的公式之間，是有矛盾的。假使機會主義者把恩格斯也算作『無政府主義者』那是沒有什麼奇怪的，——現在社會國家主義者之誣國際主義者爲無政府主義，正在日益普遍起來。

國家隨着階級的取消而取消，——這是馬克思主義所常常告訴我們的。從反杜林論一書中關於『國家衰亡』的最著名的一段，其所斥責無政府主義者的不是簡單

地責斥他們主張取消國家，而是斥責他們宣傳以乎可以『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取消國家。

因爲今日盛行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完全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在消滅國家這個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的關係，所以我們回憶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是特別有益的。

二 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這次論戰是發生於一八三七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寄給意大利社會主義黨刊一些論文，以反對蒲魯東主義者、『自主派』或『反威權派』。這些論文的德文譯稿到一九一三年才在『*Neue Zeit*』* 上發表。

馬克思譏諷無政府主義者之否認政治行動，他說：

『……假使工人階級底政治鬥爭，採取革命的形式；假使工人們建立自己的革命的專

新時代，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機關報。(校者)

政以代替資產階級專政，那麼他們就犯了一種污辱原則的可怕的罪惡了，因為他們爲要滿足自己可憐的粗俗的日常需要，爲要撲滅資產階級底反抗起見，他們不放棄武器，亦不取消國家，而予國家以一種革命的過渡的形式……」（*News Paper*，一九一三至一九一四年，第一卷第四〇頁）。

這樣的「取消」國家是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中所竭力反對的！馬克思並不反對階級消滅國家也隨之而消滅的理論，或是階級取消國家也隨之而取消的理論，而只是反對那主張工人們要放棄使用武裝，放棄有組織的暴力，即是說放棄國家，因工人們要用國家來撲滅資產階級之反抗。

馬克思故意着重地指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家之「革命的過渡的形式」，以免人們把他與無政府主義鬥爭底真正意義加以曲解。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只是暫時的。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意見不同的地方，並不是在以取消國家爲目的一問題上。我們肯定地說，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暫時使用國家政權底武器、工具、手段，去反對剝削者；同樣爲要消滅階級，也必須暫時建立被壓迫階級底專政。馬克思選擇了一種

最銳利最明顯的問題底提法，來反對無政府主義者；推翻資本家底羈絆的工人們，是應該「放棄武器」，還是應該利用他來反對資本家以撲滅他們的反抗呢？假使一個階級有系統地來使用武器去反對別一個階級，那不是國家底「過渡形式」是什麼？

讓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自己問一問自己：在他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中，是不是這樣提出國家的問題？「第二國際」下的最多數的正式社會黨，是不是這樣提出這個問題？

恩格斯將同樣的意思發揮得更加詳盡而更加通俗。他首先深刻地指出蒲魯東主義者錯亂底思想，這般蒲魯東主義者自稱是「反威權主義者」，就是說反對一切威權，一切從屬以及一切權力。恩格斯說，試拿工廠、鐵路、海船來說吧，這些以運用機器和許多人有計劃合作為基礎的種種複雜技術事業，如果沒有某種從屬，沒有某種威權和權力，那末他們中任何一種都沒有動作的可能，這難道不明顯麼？

恩格斯說：

「假使我用這些論據來反對那最拚命的反威權主義者，那時他們只能給我以下的回答：『呵！這是對的，但是這裏所說的並不是我們所賦予我們的代表的威權，而是說某種委任。』這些人以爲變更了名詞，就可以改變某種事物了……」。

這樣恩格斯證明了：威權和自主都是相對的概念，牠們的運用範圍，是依着社會發展之不同的階段而變更的，而最荒謬的是把牠們看作絕對體；恩格斯又補充地說，機器應用和大規模生產底範圍，是不斷地在擴大起來；他在關於威權問題的一般談論之後，接着便講到國家的問題。

恩格斯寫道：

「……假使自主派僅僅說，將來的社會組織祇能在生產條件所劃定的範圍之內允許威權存在的話，那末我們或者就可以和他們把問題弄清楚了；但是他們對於一切使威權成爲必要的事實都閉着眼睛不看，却一味拚命地在字眼上爭論不休。」

「爲什麼那般反威權主義者不單單是爲反對政治的威權和反對國家而呼號呢？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一致承認，國家和與國家相隨而發生的政治威權，都要隨着將來社會革命的

結果而消滅的，就是說，社會職務失去其政治的性質，而變爲一種注意社會利益的簡單的管理職務了。但是，反威權主義者主張把政治的國家於一剎那間消滅下去；甚至主張在產生國家的社會關係尙未消滅之前，把牠消滅下去。他們認定社會革命的第一步行動就是消滅威權。」

「這些先生們曾經見過了一次革命沒有？毫無疑義的，革命是最有威權的東西。革命是一部分人民用刀鎗大炮，即用有非常威權的工具去強迫別一部份人民來履行他們自己的意志的一種行動。而勝利的政黨，必然不得不用武裝威嚇反動派的那種恐怖手段，以維持其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靠着人民武裝的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牠能維持到一日以上的時間嗎？反轉來說，我們因爲「巴黎公社」太少使用這種威權而責備牠，不是對嗎？由此可知，非威權主義者，或是不知他們自己所說的是些什麼，在這個場合中，他們僅僅自己投入了迷網；或是他們是知道自己所說的話，在這個場合中，他們是背叛了無產階級底事業。二者必居其一。無論怎樣，他們都是幫助着反動派的。」（第三九頁）

在這一段言論中間，已經講到了許多將在下一章中我們講國家衰亡時之政治與

經濟間的相互關係的時候，所要加以研究的問題。這些問題就是關於社會職務之由政治的而變為單純的管理職務的問題和關於『政治國家』的問題。後一名詞，是特別容易惹起誤會的，牠指出國家衰亡底過程：正在凋殘中的國家，在牠衰亡底某個階段上，可以名之為非政治的國家。

在恩格斯這一段言論中之最顯著的一點，也就是他用以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底提法。願做恩格斯底門徒的社會民主黨人，自一八七二年以來，與無政府派爭論已不下幾百萬次，但是他們並沒有做過如馬克思主義者所能夠並且必須做的爭論。無政府主義者關於取消國家的觀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所提的問題就是如此。無政府主義者正是不願意看到革命底產生和發展以及革命對於暴力、威權、政權、國家等的特殊任務。

現代社會民主黨人尋常對無政府主義的批評，僅僅是一種純粹的小資產階級庸俗口頭禪：『我們是承認國家的，而無政府主義者則否！』這樣的一種口頭禪自然是不可避免的會使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退避的。恩格斯的意見就完全不是這樣：他

着重地說，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底消滅，是社會主義革命底結果。隨後他就具體提出關於革命的問題，這個問題正是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所往往避去，而讓給無政府主義者去專門『解決』的問題。恩格斯很果斷地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公社」是不是應該更多地使用國家底革命政權，就是說，使用武裝的、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底政權呢？

現在佔優勢的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之具體的任務問題，平常不是僅僅用庸人底冗談來敷衍，便是至好用下面的一個遁辭來搪塞，說：『我們將來可以看到』。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有權來攻擊這種社會民主黨，說牠叛背了以革命精神去教育工人的責任。恩格斯利用最近這一次無產階級革命底經驗，正爲了要極具體地去研究：無產階級對於銀行與國家，應採取何種行動以及怎樣去採取這種行動。

三 給培培爾的信

在一八七五年三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恩格斯給培培爾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話，是要算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於國家問題的著作中，最出色的議論之一（如果不是最出色的議論的話）。我們要附帶地說明，就我們所知，這封信第一次是由培培爾刊印於他的言行錄（我的生活）第二冊中的，這部言行錄，刊行於一九一一年，就是說，是在這封信寫就及郵寄之後的第三十六年。

恩格斯在那封給培培爾的信中，批評了馬克思在致白拉克的有名的信中所亦會批評過的哥達綱領草案，而且他把國家問題特別提出來講，他這樣說：

「……自由人民國家變為自由國家了。從這個字的文法的意義上講，自由國家，就是對於自己的公民是自由的一個國家，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專制政府的國家。其實我們最好把這一切關於國家的空談丟開不提，尤其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因為從國家這個名詞的原來的字義上講，「公社」已經不是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每每拿『人民的國家』的說法來攻擊我們，使我們討厭極了，雖然馬克思反蒲魯東的著述中以及共產黨宣言中早已十分明顯地說過，國家是要隨着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之開創而自行解體（Sich auflöst）和消滅

的。因為國家不過是一種過渡的機關，在鬥爭中和革命中應當利用這個機關，以使用強力來壓服自己的敵人，所以說什麼『自由人民國家』，完全是無意識之談：在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牠並不是爲了自由而是爲要壓倒牠自己的敵人；到了真正能夠說到自由的時候，那時國家之爲國家已經是不能存在了。所以我們可以提議無論在何處都用「公社」（“Gemeinwesen”）這個好的德國古字來替代國家。這一個名詞，這個德國古字的意思與法文中的「公社」（Commune）是相同的。」（見德文原稿第三二二頁）

我們應該記着，這封信是關於黨綱的，而這個黨綱是被馬克思在他的一封信中所批評過的，這信僅在恩格斯那封信的幾個星期（馬克思的信是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寫的）^①以後，當時恩格斯與馬克思一同住在倫敦。因此，當他說『我們』，那是無疑的是恩格斯拿他自己和馬克思的名義，向德國工黨的首領提議將黨綱上的『國家』字樣取消而代之以『公社』字樣。

如果向那些爲機會主義者之方便而偽造馬克思主義的首領們提議在黨綱上做這樣的修改，那末他們將怎樣狂吠而叫喊着『無政府主義呵』！

讓他們狂吠罷，資產階級還要褒獎他們呢。

可是，我們還是要做我們的事。我們在審查我們的黨綱的時候，對於恩格斯與馬克思的忠告，是絕對應該注意到的，這樣我們才能接近真理，恢復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洗清一切對於牠的曲解，以便工人階級的解放爭鬥向着更正確的路線進行。

在布爾塞維克當中大概不會有一人反對恩格斯和馬克思底忠告的。困難或許只是在名詞上。在德文中有兩個字都解作『公社』，而恩格斯所採用的一個，並不是表示一個單獨的公社，而是表示全體公社之總和的一種公社底制度。在俄文中沒有這一個字，然而我們或者可以採用一個法文字“Commune”，雖則這個字也有牠的不適當處。

『從字眼的原意上講，公社已經不是國家了』，這是恩格斯最重要的理論上的斷言。看了上面的解說之後，對於這種斷言就可以完全了解了。當公社所要鎮壓的不是大多數人民，而只是少數人民（剝削者）的時候，公社就已經不成爲國家了；這時牠已經破壞了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全體人民已經自己登臺以代替一種特殊

的壓迫勢力了。凡此一切，都已經離開了國家底原意。要是「巴黎公社」已經鞏固了的話，那末國家底痕跡，就將在這種情形之下自行「泯滅」，公社也就用不着『廢除』國家機關了，因國家機關將隨着無事可做而停止自己職務。

『無政府主義者拿「人民國家」的話來攻擊我們』，恩格斯講這句話的時候，首先是指巴枯寧及其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人的攻擊。恩格斯認為這種攻擊的對的地方，祇是在於：因爲『人民國家』與『自由人民國家』是一樣的荒謬，一樣的離開社會主義。恩格斯努力要改正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之反對無政府主義者的鬥爭，使這種鬥爭真正合乎原則，並且把其中所有的機會主義者對國家的偏見掃除淨盡。可惜呀！恩格斯這封信在書櫃中隱藏了三十六年之久。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就是這封信發表之後，考茨基依然很頑固地繼續重複恩格斯曾經所警告過的那些錯誤。

培培爾於一八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覆信給恩格斯，說他『完全同意』恩格斯關於黨綱草案的批評，並說他指斥了李卜克內西的那種讓步態度（培培爾底言行錄，第二卷，德文版三〇四頁）。但是，拿培培爾底我們的目的是那本小冊子來看，我們

就可以看到其中對於國家問題有許多絕對錯誤的議論：

『應該把建築在階級統治基礎上的國家變為人民的國家。』（“Unsere Ziele” 德文版，第一四頁，一八八六年出版）

這是刊印在培培爾那本小冊子第九版中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這樣堅決繼續着機會主義者關於國家的議論，是不足為奇的，尤其是當恩格斯底革命的理解被藏匿了，而一切生活環境又長久使人們『忘記了』革命的時候。

四 愛福特綱領草案底批評

在討論馬克思主義底國家學說時，對於一八九一年六月二十九日恩格斯寫給考茨基的那個愛福特綱領草案的批評（這個綱領草案的批評是過了十年之久才在“*ne Zeit*”上發表的），是不可忽略的，因為這個批評主要的就是對社會民主黨在國家結構問題上的機會主義觀念而發的批評。

我們要順便指出，恩格斯關於經濟問題，又有一個非常寶貴的指示，這一個指

示表現着恩格斯何等用心、何等深思地研究最近資本主義之種種變態，因此他又多麼能夠在某種程度以內預言我們所處的帝國主義時代底任務。這個指示，是關於綱領草案中所用的『沒有計劃』(Planlosigkeit)等字樣來說明資本主義的特質的，恩格斯說：

『……假使我們從股份公司觀察到統治並壟斷許多整個工業部門的託辣斯時，那末我們就可以看到這裏不但私人的生產停止了，而且沒有計劃的現象也消滅了。』(見“*Neue Zeit*”第十年，卷一，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第八頁)

這裏已經有了對最近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理論上的估計最主要的一點，就是說資本主義已變為壟斷的資本主義了。資本主義這幾個字我們必須加上着重點，因為最普遍的一種錯誤，就是資產階級改良派的觀點，他們以為壟斷的資本主義，或國家壟斷的資本主義，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了，已經可以稱爲『國家社會主義』或其他同類的東西了。完全計劃化，當然託辣斯是從來不曾有過，現在也沒有，而且也不會有的。但是資本大王既然預先計算國內甚至國際範圍內的生產規模底大小，既然

他們有計劃地來調節生產，那末託辣斯是有計劃的，可是我們終究還是生存在資本主義之下，雖然是在資本主義的一個新階段之下，可是毫無疑義，究竟還是在資本主義之下。這種資本主義之『接近』社會主義，在無產階級真正的代表看來，應該看作是社會主義革命之接近、容易、可以實現和迫切底論據，而並不是像一般改良主義者所做的一樣，用這種接近來作為容忍否定社會主義革命，容忍讚美資本主義的論據。

但是我們要回轉來講國家問題。此地恩格斯曾經給了三個非常有價值的指示：第一，關於共和國的問題；第二，關於民族問題與國家結構之間的關係；第三，關於地方自治。

至於講到共和國的問題，那是恩格斯拿來做他的愛福特綱領草案批評底重心的。要是我們記得當時愛福特綱領在國際社會民主黨中有怎樣的作用以及他怎樣成為整個「第二國際」底模範，那末我們可以毫不誇大地說，恩格斯在這裏批評了整個「第二國際」底機會主義。恩格斯說：

『草案底政治要求有一個很大的缺點。應該說到的東西，其中都沒有說到。』（恩格斯底着重點）

其次恩格斯指明，德國的憲法僅僅是一八五〇年那部最反動憲法底抄本，德國國會(Reichstag)，正像李卜克內西所說的，不過是『專制政體底假面具』，而以固定日耳曼各小國的存在及日耳曼各小國聯邦州憲法爲基礎，想來實行把『所有勞動工具變爲公共財產』，這是一種『顯然的荒謬』。

恩格斯接着說，『提及這個問題是危險的』因爲他深知在德國要把共和國的要求公開地載在綱領中是不可能的。但是恩格斯還不以這種使『每人』都滿意的明顯的理由爲已足。他又接着說：

『但是無論如何，事情總是應該進行的。這事的必要到了怎樣的程度，已經被現在大部分社會民主黨的機關報所廣佈的 (airreissende) 機會主義表明出來了。有些人恐怖那些反社會主義者的法令。底復活，或是回想起當這個法令施行期間所發表的那些不及時的宣言，於是就希望我黨承認德國發現的法制是足以和平地實現牠的一切要求』

的。……」

恩格斯把「德國社會民主黨」害怕非常法令之復活這個主要的事實提在第一位，而且毫不冒昧地名之爲機會主義。他申言說，正因德國缺乏共和國與自由，所以『和平』道路的幻想簡直是完全荒謬的。恩格斯十分小心地使自己不致掣肘。他承認在共和國或極自由的國家裏，『可以想像』（僅僅是『想像』！）和平的發展到社會主義，但是對於德國，他重複說：

「……在德國，政府幾乎是有無上權力的，國會和其他的代表機關都沒有實權，——在德國認爲有這種可能（沒有這種承認的任何的必要）這無異於從專制政體那裏摘去了牠的無花果葉，而自己又去掩蓋牠的裸體。……」

德國社會民主黨中極大多數的正式首領們，把恩格斯這些指示『置之高閣』，真正成了他們專制政體底掩護者。

「……這樣的政策，其結局只是把黨引到不正確的道路上去。他們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問題置諸前列，而把那最緊急的具體問題遮蔽起來，這些具體問題在一旦發生大的事變

和政治危機的時候，將自己會提到議事日程上去的。這樣一來，牠的必然的結果，就是在緊急關頭，黨突然束手無策，關於緊急問題，黨內便莫名其妙和沒有一致，因為這些問題從來預先沒有討論過……。

「這種爲着目前一時的利益而忘却了重大根本的問題，這種貪圖一時的成敗，這種不預計未來的結果，而只顧着爲這種成功的爭鬥，這種爲着現在而犧牲將來的運動，或者統統都是因爲「誠實」的動機的緣故。但這是機會主義，而且現在依然還是機會主義，而「誠實」的機會主義，也許比其他一切機會主義都要危險……」

「這裏有一點是絕對無疑的，就是我們的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之下，才能取得統治。民主共和國，即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也是特殊的形式，這一點法國大革命已經表現出來了……。」

恩格斯在這裏特別明顯地反復說明一個基本觀念，這個觀念貫徹於馬克思一切著作中，這就是民主共和國是進到無產階級專政的最近便的途徑。因爲，這樣的共和國不但不絲毫消滅資本底統治，以及對民衆的壓迫和階級爭鬥，而且必然會使這

個鬥爭更發展、更擴大、更公開、更尖銳，而被壓迫羣衆的根本利益得以滿足的可能性一旦發生，則這種可能性，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以及由無產階級領導這些羣衆之下，才必然實現出來。對於整個的「第二國際」，這也成爲馬克思主義中的『被遺忘了的話』，而這種遺忘，在俄國一九一七年革命的頭半年中，孟塞維克黨底歷史是表現得異常明顯的。

關於民衆底民族成分和聯邦共和國問題，恩格斯這樣說：

『應該用什麼來替代現在的德意志呢？』（他有反動的君主憲法，還有同樣反動的許多小國家底分立，這個分立是足以鞏固和助長『普魯士主義』而不能使牠們在德意志中鑄合而爲一國）『據我的意見，無產階級只能利用一種整個而不分立的共和國的形式。在今日美國廣大的境域上，整個的說來，聯邦共和國還是必需的；可是雖然這樣，牠在東部的省分內已經成爲一種障礙了。在英國，聯邦共和國要成爲一種進步的現象，因爲在英國的兩個海島上，居住着四種民族，而牠的國會雖只有一個，可是有三種立法系體同時存在着。在小小的瑞士，聯邦共和國已經很久很久就成爲一個障礙物了；而牠之所以尚能容於瑞

士，只是因爲瑞士甘爲歐洲國家系統中之純粹消極的一分子之故。如果在德國而實施瑞士式的那種聯邦制度，那就要成爲一個很大的退步。聯盟國家與完全統一的國家，有二點區別，就是：每一個加入聯盟的單獨的國家，都有牠自己的民事和刑事的特殊立法，有牠自己的特殊司法制度；其次，又有與國民議院並肩而存的由各個國家代表組成的議院，在這個議院中每一個國家不管其大小，都可以投票的。』在德國，聯盟的國家是達到完全統一的國家的一個過渡，我們不要使一八六六年和一八七〇年的『由上而下的革命』●●往後倒退，我們應該用『山下而上的運動』來補充牠。』

恩格斯對國家底形式問題，不但毫不冷淡，而且還非常細心而盡力地恰恰去分析過渡形式，以便依照每一種情形之歷史的具體特點來確定，某種過渡形式是由什麼過渡到什麼的一種過渡。

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從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革命底觀點，堅持民主集中主義，堅持統一而不分離的共和國。他認爲聯邦共和國，若非發展上的一個例外和障礙，便是由君主國過到集中的共和國的一個過渡，牠在某些特殊條件之下，是一個

「進步」。而這些條件之一，就是民族問題。

恩格斯和馬克思一樣，雖然無情的批評了小國家底反動性和在一定的具體場合中利用民族問題來掩蔽這種反動性的那種行動，可是他無論何處都沒有絲毫忽視民族問題的傾向——這種傾向，是荷蘭和波蘭的馬克思主義者在極正當的反對「自己」小國家底小資產階級狹隘的民族主義的爭鬥中所常犯的。

甚至在英國，牠有地理條件，牠有統一的語言，以及數世紀以來的歷史，似乎已經把牠所包含的各個單獨小區域底民族問題「解決了」，——即在這裏，恩格斯估計到明顯的事實，認定民族問題還沒有解決，因此他承認聯邦共和國也是一個「進步」。自然，這裏絕對沒有拒絕對於聯邦共和國之缺點的批評，也沒有拒絕爲實現統一的集中的民主共和國而作的最堅決的宣傳和鬥爭。

但是恩格斯對於民主集中主義的了解，絕不如那些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家（無政府主義者也在內）應用這個概念一樣，把牠看成是一種官僚主義的意見。恩格斯認爲集中主義絕不是要把廣大的地方自治除外；在各個區域和「公社」

自動地堅持國家底統一的情形之下，這種地方自治能無條件的把一切官僚主義和一切自上而下的『命令主義』都消除。

當恩格斯發揮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問題的政綱觀點時，他這樣說：

『……這樣說來，是統一的共和國，但這不是指現在的法蘭西共和國而言；法蘭西共和國並非別的，只是一七九八年所建立的一個沒有皇帝的帝國而已（四）。從一七九二年到一七九八年，法國的每一個省份和每一個鄉里都享有美國式的完全自治權；而這也是我們所應該有的。應該怎樣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樣可以沒有官僚制而行事，關於這些，美國和法蘭西第一共和國已經指示和證明給我們看了，現在加拿大，澳洲和其他英國的殖民地也指示給我們看。這樣的省份的（特別區的）和鄉里的自治，是要比瑞士的聯邦制自由得多，雖然，在瑞士的聯邦制之下，單個小國對於整個的聯邦國家是獨立的，但是，牠對於縣和鄉里的關係也是獨立的。單個小國的政府任命縣的地方督軍和地方長官，這是那些講英語的國家中所絕對沒有的的一種現象，而在我們的國家中，這種現象將來必定要完全廢除，同時要廢除普魯士的 Landrate 和 Regierungsräte]（就是由上任命的那般特任官、督

軍、省長等等)。根據這點，恩格斯關於各黨綱中自治問題的一條，提議這樣寫法：『各省各縣各鄉完全自治，經過依普選法所選出的官吏來管理，完全取消國家所任命的一切地方和各省的政權。』

在克倫斯基和其他『社會主義的』內閣政府所封閉的真理報上（第六十八號，一九一七年六月十日「五月二十八日」出版），我已經指出，關於這一點（自然遠不止這一點），俄國所謂革命的所謂民主派底所謂社會主義的代表們，都已經無恥地離開了民主主義了。不用說，這批與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勾結而成立『聯合』政府的人們，對於這個指示，當然是掩耳不聞的。

還有一點是極端重要值得指出的，就是恩格斯拿出事實，舉了最確切的實例，來駁斥那種非常普遍的、尤其是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間非常普遍的偏見：以為聯邦共和國必然要比集中的共和國更自由些。這是錯誤的。恩格斯所舉關於一七九二到一七九八年法蘭西集中的共和國和瑞士聯邦共和國的事實，已足以推翻這種偏見了。真正的民主集中的共和國所給予的自由較之聯邦共和國是要大些，換句話說，

歷史上所知道的最大量的地方的、特別區等等的自由，要算是集中共和國，而不是聯邦共和國。

在我們的黨底宣傳和鼓動中，無論過去或現在，對於這種事實，以及一般關於聯邦共和國與集中共和國和地方自治的整個問題，都沒有充分注意。

五 一八九一年馬克思爲「法蘭西內戰」而作的序言

恩格斯在法蘭西內戰第三版上所作的序言中（這篇序言是一八九一年三月十八日作的，最初在Neue Zeit雜誌上發表過），除了關於對國家的態度有連繫的問題，作了許多有興趣的附帶的指示之外，他關於「公社」問題底教訓又做了一個極顯著的撮要的。被「公社」以後二十年來的經驗所加深，而且是特別用來攻擊那些盛行於德國的『對於國家的迷信』，可以很真確地稱爲馬克思主義對於國家問題的最後的說話了。

恩格斯說：

「法國每次革命之後，工人都武裝起來了；因此，對於掌握國家政權的資產者，第一個先決問題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裝。因此，在每一次工人得勝的革命之後，就有新的鬥爭，其結果是工人失敗。……」

這是資產階級革命經驗之總結，這個總結既極簡短又極明瞭。問題底實質——同時在國家問題中亦然（被壓迫階級有沒有武裝？）——在這裏說得非常切要中肯。正是關於這個實質，無論那些被資產階級的思想所影響的大學教授也好，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也好，都是默不作聲的。在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中，有位孟塞維克「所謂馬克思主義者」蔡雷特利，曾很光榮的（加文亞克式的光榮）洩漏了資產階級革命底這個秘密。蔡雷特利在六月二十二日（九日）的「歷史的」演說中，曾經洩漏了資產階級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裝的決心，他並認這個決定是他自己的，而且一般地是「國家」十二分需要的！

蔡雷特利於六月二十二日（九日）這次歷史的演說，當然是每一個一九一七年革命歷史家所可引來作為一種最好的證據，來證明蔡雷特利先生所領導的孟塞維克

與社會革命黨人底聯盟，如何跑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以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

恩格斯另一個與國家問題有關係的附帶的指示，便是宗教問題。大家都知道「德國社會民主黨」因牠之腐敗和日益機會主義化，對於那有名的公式，漸漸走入了一種庸人的曲解，這個公式就是：「宣佈宗教爲一種私事。」依照他們這種解釋，這個公式好像是說，即使對於革命的無產階級底政黨，宗教問題也是一種私事了！恩格斯對於這種完全背叛無產階級革命政綱的行爲，曾經加以反抗；他在一八九一年只是看到了他自己黨內的機會主義底最微細的萌芽，因此他的語氣是十分謹慎的：

「在「公社」中參加會議的，差不多祇有工人或被人公認的工人代表，因此牠的決議都顯然帶有純粹無產階級的性質。或者這些決議所規定的一些改良，曾被共和派資產階級由於卑鄙怯懦而摒棄，但是這些改良却構成工人階級自由活動之必要的基礎。對於國家而言，宗教僅僅是一種私事——這個原則底實現就是如此。或者「公社」所發佈的決議，是直接有利於工人階級的，並且一部份是深深地破壞舊社會制度的……。」

恩格斯有意地在『對於國家而言』這幾個字上加着重點，這對於德國機會主義是一個中肯的當頭棒喝；因為牠公然宣稱過，對黨而言，宗教是一種私事，因此把革命的無產階級底黨降到最平凡的『自由思想的』小資產階級底水平線上去了；這種小資產階級準備承認非信教的狀態，但是却又拒絕對麻醉人民的宗教鴉片作黨派性的鬥爭。

「德國社會民主黨」之未來的歷史家，在研究牠在一九一四年可恥破產的根本原因的時候，在這個問題上，能找到很多有興趣的材料；從黨的思想上的領袖考茨基論文中大開門戶讓機會主義進來的曖昧的言論起，以至於一九一三年黨對「Los-von-kirche-Bewegung」（與教堂分立的運動）為止。

但是現在我們來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二十年後如何給予奮鬥的無產階級做出「公社」教訓底總結。

請看恩格斯提在第一位的是那些教訓：

「……恰恰是以前的集中政府底那種壓迫政權——軍隊、政治警察、官僚，都是拿破

崙在一七八九年所手創而爲以後每個新政府所利用來作爲反對自己敵人的最如意的工具——恰恰是這種政權，本應該像在巴黎一樣，在法國到處都要覆傾的。

「公社」不能不承認，一旦工人階級得到統治，就不能再去使用舊的國家機器；工人階級爲要避免再失去剛才得到的統治計，第一、不能不剷除那至今反對工人階級的一切舊的壓迫機關；第二、就該保證自己，提防牠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們，宣告他們一切人，沒有任何例外，都是隨時可以撤換的。……」

恩格斯再三鄭重說明，不僅在君主國，就是在民主共和國裏，國家依然是國家，就是說，牠仍保留着牠那根本的特質：把官吏、「社會公僕」、國家的機關，變爲社會底統治者。

「……爲避免使國家和國家機關，從社會底公僕變爲社會底主人起見——這種現象在一向所有的國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採用了兩種正確的辦法。第一，牠把所有行政、司法和教育的職位，統統都委任那些照普選制選舉出來的人們充任，同時施行按選舉者底決議隨時可以撤消被選舉者的職位之權。第二，牠給予那些官吏的薪金，不分職位

上下，都與其他工人所領取的工資相等。「公社」付過的最高薪金是六千佛郎。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可靠的障礙物以防止那些獵取官職和野心鑽營的人們，即使「公社」沒有對代議機關的議員們頒佈絕對服從的命令，也己能防止那些野心鑽營的人了。」

恩格斯這裏講到這樣一個有趣味的界限，在這個界限上澈底的民主主義一方面變為社會主義，而他方面牠要求社會主義。因為要消滅國家，必須把國家機關底職務，變為監督和登記這樣簡單的手續，使大多數人民都能擔任，然後全體人民都能夠擔任。再則，爲了要完全免除官吏中的貪污現象，必須使那有「名譽」而無利可圖的國家服務中的職任，不能成爲跳到銀行或股份公司中得到大批收入的職位之方法——如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中所常常有的弊病。

但是恩格斯沒有犯着比方有些馬克思主義者關於民族自決權問題所犯的那種錯

名義上這約等於二千四百盧布，而按現在的行市價格計算，約等於九千盧布。有些布爾塞維克攝
 購在市議會中，薪水爲九千盧布，而不提議施行整個國家的最高薪金爲六千盧布（這個數目是充
 足的），這是不可容許的。

誤^①，他們以爲民族自決權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之下却是不要的。像這樣似乎很聰敏而實際上完全錯誤的論調，對於隨便那個民主制度（對官吏支付微薄的薪金這一點也在內）都是可以適用的；因爲徹底的民主制在資本主義之下是不可能的，而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切民主制都要消滅的。

這是一種詭辯論，正像舊時的笑話一樣：如果一個人的頭髮少了一根的話，那末他是否要變成禿頭？

發展民主制到底，研究這種發展底形式，拿實際來試驗這些形式等等，所有這些都是社會革命爭鬥中的基本任務之一。若民主制是一件單獨的東西，那末沒有一個民主制能夠產生社會主義，但是在實際生活中，民主制從來不會『單獨』起來的，而一定是『總合』的，牠也要影響經濟，助成經濟底改造，同時牠自己又受經濟發展底影響等等。這就是活的歷史底辯證律。

恩格斯繼續說：

「……舊的國家政權底這個爆裂(Sprengung)和以新的真正民主的政權來代替牠，在

法蘭西內戰第三章中已經很詳細地描寫過了。但是關於這個代替，這裏還有幾點須要簡單地再加以說明，因為正在德國對於國家之迷信，已經從哲學方面轉移到資產階級甚至於很多工人之一般的意識中去了。依照哲學家底學說，國家就是『觀念底實現』，或者，如果用哲學的語氣來講，國家便是上帝在地上的統治。國家是永久真理和正義所由實現或應當實現的場所。因此就產生了一種對於國家以及一切與國家有關係的東西之無上的崇拜，這種崇拜很容易穩固起來，因為人們從小就慣於想像以為整個社會公共事業與利益的處置和保護，除了過去的方法，就是說，除了經過國家及其位高祿厚的官吏來辦理外，便沒有別的方法。人們以為假使他們不去迷信世襲的君主政體而成爲民主共和國底信徒，已經是做出非常有力的進步了。可是在實際上，國家，無非是一個階級壓迫別一階級的壓榨機，這一點在民主共和國是絲毫不弱於君主國的。在最好的情形之下，國家是無產階級在牠爲階級統治而爭鬥得到勝利之後，所承受下來的一個禍根。得到了勝利的無產階級正和「公社」一樣，不能不立即斬截這個禍根之極惡劣的方面，直到那在自由的社會條件之下培養出來的新起的一代人，能够把國家一切無用之物拋到垃圾堆中去的時候爲止。

恩格斯曾經警告過德國人，要他們在以共和國去代替君主制時，不要忘記社會

主義對於一切國家問題之基本原則。他的警告現在好像是特別對蔡雷特利和威爾諾夫那般先生們的一個直接的教訓，因為他們在其『聯合』政府的實際行動中表示他們對於國家的迷信和無上的崇拜！

還有兩點要指出來的：（一）、假使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國之下，國家之成爲『一個階級壓迫別個階級的壓榨機』，『是絲毫不弱君主的』，那末，這並不是說，壓迫的形式對於無產階級是不相干的，如像無政府主義者所『教訓』的一樣。更廣大、更自由、更公開的階級壓迫和階級鬥爭的形式，能夠大大地幫助無產階級來作消滅一切階級的鬥爭。

（二）、爲什麼只有新起的一代人能夠完全拋棄國家底一切無用之物——這個問題是與民主制之破除問題相連繫的，下面我們就要講到這個問題。

六 恩格斯論民主制之破除

當恩格斯在說到『社會民主派』這個名詞在科學上不正確的時候，他曾連帶講

到民主制之破除這一點。

他在一八七〇年代，關於各項問題，主要地是關於『國際的』內容作了各篇論文，在這個文集底序言中（這個序言是在一八九四年一月三日，就是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作成的），他說，在他所有的論文裏面，他都用『共產主義者』這個名詞，而不用『社會民主派』，因為當時法國的蒲魯東派和德國的拉沙爾派，都自號為社會民主派了。

恩格斯繼續說：

『……馬克思和我一樣，都認為用這樣有伸縮性的名詞，來特別表明我們的觀點，是絕對不可能的。到了現在，情形不是這樣了，這個名詞（『社會民主派』）或者可以勉強過得去（Mag Passieren），雖然牠對我們的黨，仍舊不確切的（Unpassend 不適當的），雖然因為黨的經濟綱領不僅是一般的社會主義的，而且是真正共產主義的，黨的最終政治目的，是在破除一切國家亦即破除一切民主制，但是真正的政黨底名稱（恩格斯加的着重點），絕不會完全與此黨相適合的：黨是在發展起來，而名稱依然照舊。』

辯證學家恩格斯直到他臨終之日依舊是忠實於辯證法的。他說，馬克思和我曾有一個很好的科學上切當的黨名，但是那時沒有一個真正的黨，就是說，沒有一個廣大的無產階級的黨。現在（十九世紀末葉），我們已經有了一個真正的黨，但是牠的名稱在科學上是不正確的。不要緊，『可以過得去』，只要黨發展起來，只要牠的科學上不正確的名稱，不要對牠掩蓋起來，並且不要障礙牠向着正確方向發展！

也許談諧家會照恩格斯那種論調，引來安慰我們布爾塞維克：我們有一個真正的黨，牠很順利地發展着；即使像『布爾塞維克』這樣的一個無意義而又醜陋的名稱，除了表示一九〇三年「不律塞爾、倫敦代表大會」*上我們得到了大多數這一個全屬偶然的事實以外，絕對沒有其他意思的名稱，也『可以過得去』……或許現在因為一九一七年七八月間我們的黨被共和黨人和『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黨

即「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此次大會始則舉行於不律塞爾，然後遷倫敦，在這次會議上分裂為「多數」與「少數」，即後來的「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校者）

人所通緝，遂使『布爾塞維克』這個名稱非常普遍非常光榮了，這種通緝，又表示了我們的黨在牠真正的发展上完成了歷史上的極大的進步，現在就是我自己也許要遲疑不決，不敢去重提我在四月間變更黨的名稱的提議了。或許我要向同志們做一個『妥協』的提議：把我們的黨稱為共產黨，同時把『布爾塞維克』這個名詞置諸括弧中……。

但是黨底名稱問題，遠不及革命的無產階級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那樣重要。

平常在國家問題的議論中，人們往往犯着恩格斯在這裏所警告而我們已經在上面順便提及的那個錯誤，就是說，人們每每忘記國家底消滅也就是民主制底消滅，國家底衰亡也就是民主制底衰亡。

初次一看，這種論斷，似乎是十分離奇而不可了解的。甚至於有些人也許要發生這樣的恐懼：我們是不是坐待一種社會制度底到來，以便不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因為民主制，本來就是承認這種原則的制度。

不，民主制和少數服從多數，並不是相等的東西。民主制是承認少數服從多數

的一種國家，就是說一個階級對另一階級，一部份人民對別一部份人民有系統的應用暴力的一種組織。

我們最後的目的，就是消滅國家，就是說，消滅一切有組織的有系統的暴力，壓迫一般人們的暴力。我們並不坐待那不遵守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的社會制度底到來。但是我們趨向於社會主義，我們深信社會主義是要進化到共產主義的，到了那個時候，所有壓迫一般人們的暴力的需要，一個人服從別個人以及一部份人民服從別一部份人民的一切需要，都將隨之而消滅；因為人們將不需要任何暴力和任何壓迫，而能習以為常地遵守社會生活之基本條件了。

爲要着重說明這個習慣底原素，恩格斯講到那新起的一代人「牠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之下培養出來的，牠能夠完全拋棄國家底一切無用之物」——這裏所謂國家是指任何的國家，民主共和制的國家也在內。

爲要講明這一點，我們必須研究國家衰亡底經濟基礎。

第五章 國家衰亡之經濟基礎

這個問題在馬克思所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給白拉克的信，此信只在一八九一年刊登於 *Neue Zeit.*），並翻成俄文出版單行本）中講得最爲詳盡。這本出色著作中批評拉沙爾主義的辯論之部，遮蔽了論述的一部，就是：共產主義之發展與國家之衰亡兩者間的關係底分析。

一 馬克思對於本問題的提法

把馬克思一八七五年五月五日致白拉克的信，拿來與上述的恩格斯在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致培培爾的信，作一表面上的比較，似乎馬克思帶有「國家派」的成分，要比恩格斯更多，兩人對於國家的見解，顯然有很大的差別。

恩格斯向培培爾提議拋去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在政綱中完全廢去國家的字

樣，而以『公社』代之；他甚至又宣佈說『公社』實際上已經不是『國家』一字原意上的國家了。馬克思則不然，他曾經甚至講過『將來共產主義社會底國家』，就是說，似乎他承認甚至在共產主義之下，國家也是必需的。

但是這樣的見解是根本錯誤的。如果更深刻地研究下去，便知道馬、恩兩氏對於國家及其衰亡之見解是絕對一致的，而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說法，恰恰是指正在衰亡的國家而說的。

很明顯的，將來『衰亡』底日期的規定，是無從說起的，尤其是因為牠顯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表面上的差異，是由於他們所研究的題目不同和探討底目的有所區別而發生的。恩格斯底任務，在於把普通對於國家的流行的偏見（拉沙爾也是一樣同意的）之全部荒謬性，明顯地、激烈地、大書特書地表示給培培爾看。至於馬克思則不過是順便提及這個問題，而主要的是側重在另一題目：共產主義社會之發展。

馬克思底全部理論，是以最徹底、最完整、最精密、而又最富有內容的形式，

來把發展論應用於現代資本主義。這樣，他便自然要把這個理論應用到資本主義底將近的破產和未來共產主義底未來的發展上去的。

試問根據什麼材料可以提出未來共產主義之未來的發展問題呢？

可根據的，就是共產主義從資本主義之內產生出來，牠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牠是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社會力量之動作底結果。馬克思絕對沒有要創造一個烏托邦和憑空揣想一件不可推測的東西的那種企圖。他的研究共產主義的問題，正像自然科學家研究一種新的生物形態底發展問題一樣，既然我們知道一物底來源，又知道此物變化的一定的方向。

馬克思最初便把哥達綱領中關於國家與社會的相互關係問題中的糊塗觀念，先行掃除乾淨，他說：

「……現代的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牠存在於一切文明國家中，牠是離開中世紀制度而多少自由的，牠依着每一國家歷史發展之特殊的條件而多少有所不同，牠多少是已經發展了的。反之，『現代的國家』則跟着每一國界之不同而變化的。牠在普魯士、德意志

帝國與牠在瑞士是完全不同的。牠在美國與英國也完全不一樣。所以「現代的國家」實在是一種虛構。

「不管各個文明國家底各種不同的國家形式如何分歧，可是牠們却有一點是共同的——牠們都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多少發展了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底基礎之上。所以牠們具有某幾個共同的重要的特徵。在這點意義上，可以說「現代的國家」，以別於現在國家根基——資產階級的社會——消滅時之將來。」

「其次問題就是這樣：在共產主義社會中，國家取怎樣的一種形式呢？換一句話說，到共產社會的時候，還有哪些與現代國家職能相似的社會職能遺留着呢？這個問題只能用科學方法來答覆，無論幾百幾千次的把「人民」與「國家」幾個字去連接起來，而對於這個問題底解決，終究是毫無幫助的。……」

這樣馬克思譏笑了一切關於「人民國家」的空話，同時就給了本問題底提法，並且似乎對人警告說，爲要得到這個問題底科學的答覆，祇能依據確當的科學材料。

這裏首先要指出由整個的發展論、整個的一般的科學所已經完全確定了的結論（這一點是爲烏托邦主義者所忘記，而且現在又爲畏懼社會主義革命的現代機會主義者所忘記的）就是：從資本主義轉到共產主義，歷史上必要有一個特殊的過渡階段。

二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

馬克思繼續着說：

「……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從前者轉到後者的革命的轉變時期。同時又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也是同這個時期相符合的，而這個時期底國家，除了無產階級底革命的專政之外，便沒有任何別的國家。」

這個結論是馬克思根據無產階級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作用底分析，根據這個社會發展底事實，以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利益矛盾的不調和性而獲得的。

從前問題是這樣提法的：無產階級爲要得到自己的解放，牠必須推翻資產階

級，奪取政權，並且建立起牠自己革命的專政。

可是現在這個問題底提法已經多少有些不同了：從發展到共產主義的資本主義社會進到共產主義的社會的過渡，如果不經過一個『政治的過渡時期』是完全不能的，而這個時期底國家，也祇有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

可是這個專政對於民主的關係，到底是怎樣呢？

我們知道，共產黨宣言是把二種概念並列地提出來：『無產階級變為統治階級』和『獲得民主』。根據一切上面所說的話，我們可以更正確地斷定，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中，民主制是怎樣變化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在資本主義社會最順利發展底條件之下，我們可以看見在民主共和國之下有一個多少完備的民主制。但是這個民主制是常常受着資本主義剝削之狹窄的範圍所限制的，因此實際上牠常常祇是爲着少數人、爲着有產階級、爲着富有者的民主制。資本主義社會裏的自由，每每與古代希臘共和國裏的自由大概相像的：自由只是奴隸主底自由。現代的僱傭奴隸，由於資本主義的剝削條件之

故，被貧乏和窮困壓榨到了這樣的一種程度，以致他們『不暇過問民主制』，『不暇過問政治』；在平常的和平的事變潮流中，大多數人民是被排除於社會政治生活之外的。

這種論斷之正確，證實得最爲明顯的，也許要算德國的實例了，正因爲在這個國家裏，立憲的合法性已經存在得很久，已經很穩固地存在幾半世紀（一八七一至一九一四）了；在這個時期當中，社會民主黨爲『利用合法性』而做的工作比其他各國都多，爲把大批的工人組織成爲一個政黨所能做到的事，也是世界上任何地方所沒有的。

那末要問，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德國有政治覺悟和能有政治活動的僱傭奴隸之最大的比例有多少呢？一千五百萬僱傭奴隸中間，有一百萬是社會民主黨黨員——在這一千五百萬人當中，有三百萬人是組織在工會中的*！

爲極少數人所有的民主制，爲富有者所有的民主制，——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

* 根據一九一七年的統計。（編者）

底民主制。若是更接近地來看資本主義民主制的結構，那末無論何時何地，無論在選舉權的『小事』（似乎是小事）當中（居住資格，婦女除外等等），無論在代表機關的技術中，無論在關於集會權的實際障礙中（公共建築物都不是爲『窮人』用的！），以及在每日報章之純粹資產階級的組織中等等，我們都可以看出層層的限制，而且是對民主制的層層限制。這種對於窮人的限制、例外、除外以及障礙，看來似乎不關重要，——尤其是在那般自己從來不曉得有什麼貧乏也從來沒有同被壓迫階級底羣衆生活接觸過的一般人底心目中（這種人在資產階級的政治家和政論家中，如果不佔百分之九十九，至少也要佔十分之九），看得不關重要，但是總算起來，這些限制都要將窮人摒出於政治之外，使他們不能積極參加民主制。

馬克思把資本主義民主制這個本質很好地抓住了。當他分析「巴黎公社」底經驗時曾說：給被壓迫者數年一次去決定壓迫階級中誰將到國會裏去代表他們，壓迫他們！

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必然是偏狹的，暗中排斥窮人的，因此牠是完全虛偽的，欺

騙的。但是從這個民主制進到『逐漸擴大的民主制』，這一種進展，決不是像一般自由派的教授先生們和小資產階級的機會主義者所想像的那樣簡單、直捷和平穩的。決不如此，過渡到共產主義的那種進展，是要經過無產階級專政的，而且非此決不能成功，因為要打破剝削者資本家的抵抗，沒有其他的人，也沒有其他的方法。

無產階級專政——就是組織被壓迫者先鋒隊爲統治階級以鎮服壓迫者——不能僅僅擴大民主制就算了事。除了大大地擴大民主制——第一次成了貧民的民主制，民衆的民主制，而非富人的民主制——之外，無產階級專政應該對於壓迫者，剝削者，資本家的自由，加以許多剝奪。我們爲要使人類從僱傭奴隸之下解放出來，我們必須壓倒這般人，我們必須用武力打破他們的反抗，凡是要用鎮壓，用暴力的地方，便沒有自由和民主，這是很明顯的。

讀者還記得，恩格斯在他給培培爾的信中曾很顯著地講明了這一點，他說：

『無產階級需要國家不是爲着自由，而是爲要壓倒自己的敵人；到可以講自由的時

候，就不會有國家了。」

對廣大的民衆實行民主制而以暴力鎮服民衆底剝削者和壓迫者，就是說把他們摒棄於民主制之外，——這便是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過渡到時期中的民主制的變態。

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中，當資本家的反抗已經澈底地打破了，資本家也完全消滅了，階級也不復存在了（就是說，社會底組成份子在其對社會的生產資料的關係上不復有差別了），只有那時，『國家才泯沒，而可以講自由』。只有那時真正完全的民主制才有可能，才能夠實現，並且沒有任何的例外。而且只有那時，民主就開始衰亡，其原因很簡單，就是人們已經從資本主義的奴隸制，從資本主義剝削的無數慘酷，野蠻，荒謬，卑鄙行爲中解放出來了；人們將逐漸慣於遵守社會生活的基本規則，數百年來人所熟知的，數千年來一切文件上所重複載明的規則：不要暴力，不要強制，不要服從，不要名爲國家的強迫的特殊機關，也能遵守這些規則了。

『國家衰亡』這句話，是用得很適當的，因為牠既能表明過程之逐漸性，又能表明過程的自然性。惟有習慣，才能夠而且無疑義地能夠產生這樣的結果。因為如果沒有剝削，如果沒有引起憤恨、反抗、暴動和造成鎮壓之必要的東西，人們很容易習慣遵守自己共同生活所必需的規則。這種情形，我們在我們的週圍，已經看見過不知幾百萬次了。

所以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我們看到一種殘缺的、醜陋的、假冒的民主制，只爲着富人的，爲着少數人的。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的無產階級專政，第一次把民主制給民衆，給大多數民衆，同時對少數人、對剝削者，實行必要的鎮壓。唯有在共產主義，才能實現真正完善的民主制，但是牠越完善，便越快成爲無用的東西，而自然地衰亡下去。

換句話說：在資本主義之下，存在着與國家原意相符合的一種國家，就是說一階級鎮壓別一階級，少數人壓制多數人的一個特殊機器。很明顯的，要完成這樣的一種有系統地以少數剝削者壓迫多數被剝削者的事業，就須要一種極端兇惡和殘酷

的壓迫，就要汪洋的血海，經過這種血海，人類遂陷於奴隸制、農奴制，和僱傭勞動制的境遇。

再則，在資本主義進到共產主義的過渡中，鎮壓還是必需的，但這已經是多數被剝削者加於少數剝削者的一種鎮壓。一副特殊的鎮壓器具和一個特殊的壓迫機關——『國家』——還是必要的；但這已經是一種過渡的國家，和原意上的國家是迥然不同的，因為以大多數過去的僱傭奴隸去鎮壓少數的剝削者，是一件比較容易和比較簡單而順乎自然的事情，其中的流血也必然比較從前鎮服奴隸，農奴和僱傭奴隸的暴動時，要大大地減少，人類所受的損失將大大地減輕。這種事情與民主制之普及於極大多數民衆完全符合，且民主制普及之廣泛，使施行鎮壓的特殊機器之需要，也開始消失。不消說，剝削者沒有一種極複雜的機器以執行這個任務，就不能鎮壓民衆，但是民衆要鎮壓剝削者，只要用種很簡單『機器』，或者差不多不要什麼『機器』，不要什麼特殊的機關，只要簡單的用羣衆武裝的組織（例如工兵代表蘇維埃，我們預先在這裏指出）就夠了。

最後，只有共產主義，使國家完全不需要，因為那時沒有人需要可以壓制——這裏所謂『沒有人』是指階級而言的，是指那向某部分人民所作的有系統的鬥爭而言的。我們不是烏托邦主義者，我們絕對不否認個人底過分行動之可能與必然，亦不否認有制止此種行動的必要。但是，第一、爲着這一點，絕對用不到特殊的鎮壓機器，特殊的機關，武裝的民衆將自己負此責任。這種責任，好像在現社會中一羣文明人，去和解毆打者和禁止強姦婦女那一類的行動一樣的輕易和簡單。第二，我們知道，破壞社會生活規則的那一種過分的行動，其主要的社會原因，是由於剝削民衆，民衆陷於飢寒貧困所致，且這個主要原因除掉，過分行動也就必然會開始『衰亡』的。其速率和程度如何，我們雖不得而知，但牠之終歸於衰亡，是我們所知道的。這種過分行動一衰亡，國家亦即隨之而衰亡。

關於將來共產主義社會之低級和高級階級（程度，段落）間的區別上，現在可以確定的地方，馬克思不陷入烏托邦，可是同時却有更進一步的確定。

三 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

在哥達綱領批評中，馬克思很詳盡地駁斥了拉沙爾的觀念，後者以爲在社會主義之下工人可以獲得『不打折扣的』或『全部的勞動生產品』。馬克思指明從全社會底全部社會勞動中，必需一部分作爲後備基金，擴大生產的基金，補償已『損壞』了的機器等等，然後再從消費品中，取出一筆爲管理經費，學校，醫院，長老院等等等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沙爾那樣應用含糊不明的，籠統的語句（全部勞動生產品歸之工人），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社會應該怎樣經營事業，有一個很嚴正的估計。馬克思對沒有資本主義的那種社會底生活條件，作具體的分析；他說：

『我們這裏』（在分析工黨底綱時）『所要討論的，並不是一個已經在牠自己基礎之上發展了的共產主義社會，而是一個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出來的共產主義社會，因此這個社會在經濟，道德和知識各方面，都還保留着舊社會（牠是從這個舊社會底胎胞中

產下來的)底痕跡。」

這個共產主義社會——剛剛從資本主義胎胞中產下來而各方面還保留着舊社會痕跡的共產主義社會——馬克思就稱牠為共產主義社會之「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

生產資料已經不是個人的私有財產，而是屬於全體社會了。每一個社會組員做某一部分社會必需的工作，就從社會領得一個證書，證明他已經做了若干的工作。根據這個證書，他就得從公共的消費品貯藏所中去領得一定量的生產品。除去應該歸入社會基金的一部分勞動之外，每一個工人給社會多少，他就從社會獲得多少。

這樣，似乎什麼都「平等」了。

但是當拉沙爾觀察這樣的社會制度(即一般所稱的「社會主義」，而馬克思稱牠為共產主義之第一階段)時，說這是「公平的分配」，這是「每人享有獲得同等勞動生產品的同等權利」，那末，拉沙爾是錯誤的，且馬克思解釋他這個錯誤說：

「我們在這裏確實是有「平等權利」；但是這還是資產階級式的權利，牠像別的權利

一樣，是以不平等爲前提的。一切權利都是用一度量施行於事實上各不相同與各不相等的各種人們身上；因此「平等權利」就是平等的破壞，亦就是不公平。」

實際上，每一個人既經盡了像別人一樣多的社會勞動，他就可以獲得社會生產（除了上面所說應作基金的一部分之外）之相等的一份。

雖然如此，各個人之間還是不平的：一個人強些，另一個人弱些：一個是結婚了的，另一個人還沒結婚；一個人兒女多些，另一個人兒女少些，諸如此類等等。

馬克思做的結論就是：

「……在平等的勞動之下，也就是說在消費品公共貯藏所中領取平等的部份之下，實際上一個人所獲得的多於另一個人的，一個人能够比另一個人富些等等……爲要避免這種現象，權利就應當不是平等的，而應當是不平等的了。……」

所以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中，還不能實現公道與平等；財富的差別依然存在，且這種差別是不公平的，但是人剝削人已經是不可能了，因爲那時要把生產資料，——工廠，機器，土地等等奪來據爲私有資產是不可能的。馬克思打破了拉沙

爾那種小資產階級性的關於一般的『平等』與『公道』的混淆不明的空話，他同時便指出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行程，這個社會首先不能不消滅的，只是生產資料操在私人手中的這個『不公平』。而這些生產資料還不能夠立刻消滅後來的不公平，即是『按工作』（而不是按需要）來分配消費品所構成的不公平。

庸俗的經濟學家——資產階級的教授們在內，『我們的』杜幹*也在內——常常譴責社會主義者，說他們忘記人們間的不平等，和『空想』消滅這個不平等。我們現在看見，這樣的譴責，只是證明資產階級思想家之極無智識。

馬克思不僅十二分確切地估量到人們間不可免的不平等，而且還認定僅僅把生產資料轉變為全體社會的公產（就是所講的『社會主義』），還是不能夠除去分配底缺點和『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底不平等，這種權利還是繼續統治的。因為生產還是『按工作』來分配。

馬克思又繼續說：

* 即杜幹·巴耶諾夫斯基——校者。

『但是這些缺點，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中，在牠經過了長久的分娩的苦痛之後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下來的階段中是必不可免的。權利不能超過經濟的結構和經濟結構所決定的社會文化的發展。……』

因此，在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中（普通稱爲社會主義），『資產階級式的權利』並沒有完全消滅，所消滅的只是一部分，只限於已經達到的經濟改革範圍內的部分，也就是說，只是對生產資料的關係而言的。『資產階級式的權利』承認生產資料是個人的私產，社會主義把牠們變爲社會的公產。在這一點上，而且只有在這一點上，『資產階級式的權利』是不復存在了的。

但是資產階級式的權利之其他部分，依然是存在的，牠現在成爲社會各份子間生產品分配和勞動分配的調節者（決定者）。『誰不做工，誰就不應有飯吃』，這個社會主義的原則已經實現了；『等量勞動可以獲得等量的生產品』，這個社會主義的原則也已經實現了。然而，這還不是共產主義，且這還沒有消滅給不同的人們之不等量（實際上的不等量）勞動以等量生產品的資產階級式的權利。

馬克思說這是一個『缺點』，但是這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中是不可免的；因爲，要不陷於烏托邦主義，我們就不能以爲推倒了資本主義之後，人們就立刻會知道爲社會勞動而不需要任何權利底標準，而且，資本主義底消滅，並沒有立刻造成這種變遷底經濟前提。

然而，那時除了『資產階級式的權利』標準之外，便沒別種標準。所以在這樣的情形中，國家還是必需的，這種國家保持着生產資料之公有，保持着勞動底平等和生產品分配底平等。

到了既沒有資本家，又沒有階級，因此對任何一個階級的壓迫也不可能的時候，國家也就衰亡下去。

但是國家還沒有全部死亡，因爲那時還保存着決斷實際上不平等的『資產階級式的權利』，要國家完全衰亡必須有完整的共產主義。

四 共產主義社會底高級階段

馬克思接着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底高級階段上，在強迫着人去服從分工的那種強迫情形消滅後，同時，勞心和勞力之間的差別也就隨之而消滅；那時勞動將不成爲僅僅是生活之方法，而他本身將成爲生活之第一需要；那時的生產力將隨着各個人在各方面的發展而增高，一切社會財富來源，也將急流似地湧現出來——只有到了這個時候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底狹隘眼界，才能完全破除，而社會也才能在牠的旗幟上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現在我們才可以看出恩格斯說話的完全的正確；他曾絕不容情地嘲罵把『自由』與『國家』等字樣聯在一塊的荒謬。在國家還存在着的時候，是不會有自由的。一旦有了自由，國家就不會存在了。

國家完全死亡之經濟基礎，爲高度發展的共產主義，在這種發展之下，勞心與勞力之間的對抗性將消滅，因此將消滅現代社會不平等底最重要的根源之一，這一個根源，不能僅僅靠生產資料之轉爲公產，不能僅僅靠剝奪資本家，立刻就可消除

的。

這種剝奪，給生產力有極大的發展之可能。我們看見現在資本主義已經是怎樣阻礙着這種發展，以及在現在所已經達到的技術基礎之上可以怎麼快地把這個發展推往前進，故我們得十二分自信地說，剝奪資本家，必然會使人類社會底生產力得到極大的發展。但是這個發展底前進的速度如何，何時牠能夠達到打破分工，打破勞心與勞力之間的矛盾，以及何時能夠達到使勞動變爲『生活的第一需要』——這些我們是不知道，而且是不能知道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的，只是關於國家之必然的衰亡，特別着重說到這個過程底久長性，以及這個過程之依靠於共產主義高級發展之速度；至於衰亡底時期問題，或衰亡之具體的形式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因爲解決這些問題的材料現在還沒有。

當社會實現了『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的時候，就是說，當人們已經慣於遵守社會生活之基本規則，而他們的勞動生產率發展得很大，以至他們都自願地盡其所能來工作的時候、國家才會完全衰亡。『資產階級式的權利之狹隘眼界』逼

得人們像希洛克。一樣去斤斤計較什麼我不要在他人多做半小時的工作，我不要比他人少得報酬——這樣的狹隘眼界，到那時將完全消除了。社會對於那分配給每一個人員生產品數量底標準，在那時已經沒有必要，各人皆得『按其所需』而自由地取之於社會。

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容易說這樣的一種社會秩序爲『純粹的烏托邦』，且譏笑社會主義者約許各人有權向社會取得任何數量的香菌，汽車，鋼琴等等，而對各個公民底勞動，沒有任何的監督。卽在今日，大多數資產階級的『學者』，還是應用着這樣的譏笑來應付問題，但是這樣他們只是暴露了他們的愚昧和他們對資本主義之貪圖利己的擁護而已。

他們之所以愚昧，是因爲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從來也沒有想到『約許』共產主義發展之高級階段的到來，不過偉大的社會主義者預知牠要到來，可是這個階段所需要的，不是現在的勞動生產率，不是現在的庸人，因這種庸人如波美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會學生一樣，能夠『徒然』揮霍社會財富的積貯，和提出不能執行的要

求。

在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沒有達到以前，社會主義者要求由社會和國家方面來最嚴格地監督勞動量和消費量；不過這個監督必須從剝奪資本家，從工人監督資本家開始，而且這個監督不該由官僚的國家、而應由武裝工人的國家來施行。

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和他們的走卒如：蔡雷特利，威爾諾夫以及他們的伙伴們等等）對資本主義之企圖利己的辯護，就是在他們把關於遙遠的將來的爭辯與談論來代替目前政治上的緊要和急不容緩的問題：剝奪資本家，把全體公民變為一個巨大『新迪卡』——整個的國家——的工作者和職員，使這個新迪卡的全部工作都隸屬於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國家。

當博學的教授和跟着他走的庸人，以及那班蔡雷特利和威爾諾夫先生說什麼『無理的烏托邦』，說『布爾塞維克無根據的允許』，說『社會主義施行的不可能』等話的時候，他們所指的實質上是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至於共產主義的『施行』不但沒有人允許過，而且想都沒有人想過，因為『施行』共產主義一般地是不可能

的。

這裏我們已經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間科學上的區別問題，對於這個問題，恩格斯在我們上面所引他論及『社會民主派』這個命名的不確當的議論中，已經提到過。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與高級階段之間的政治上的區別，將來大概是很大的，可是在目前資本主義之下來加重注意這種區別，實在是很可笑的，而把這個區別，看作頭等重要的問題，也許只有少數無政府主義者能夠辦到（如果在克魯泡特金、格拉佛、柯爾業利遜以及無政府主義底其他『明星』他們學『普列漢諾夫的樣式』，變為社會國家主義者之後或照一個尙保有良心和誠實的無政府主義者革氏的說法，他們變為『無政府掘壕隊員』之後，在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沒有受到一點教訓的話）。

但是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間之科學的區別是很明顯的。一般所稱的社會主義，馬克思名之為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生產資料變為公產、那末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此處也是可以通用的，不過我們不要忘記、這並不是完全的共

產主義。馬克思底解釋之偉大的意義是即在此處，他也是一貫地應用唯物的辯證法，發展論，把共產主義看成是一種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東西。馬克思絕不用咬文嚼字的空想和『虛構的』定義和許多無意義的字面上的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他只是對於那可以稱爲共產主義在經濟成熟上的階段的東西加以分析。

在第一階段或第一時期中，共產主義還不能達到經濟上的完全成熟，亦不能完全脫離資本主義底一切習俗和痕跡。因此我們看到，在共產主義底第一階段中仍保留着『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底狹隘眼界』那種有趣的現象。在對消費品底分配上，資產階級式的權利，亦自然必以資產階級式的國家爲前提，因爲如果沒有一個能夠強迫人去遵守權利標準的機關，則權利便等於零。

這樣，在共產主義之下，在某個時期以內，不僅是資產階級式的權利存在着，甚至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式的國家，也還保留着！

在一般人看來，這似乎是荒謬之談，或者祇是一種辯證法的玩弄聰明！凡是絕

對不用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之異常深刻的內容的人們，常常這樣來歸罪馬克思主義。

但是實際上舊物底殘餘遺留在新物之內的事實無論自然界或社會中，到處的實際生活都指示給我們看了。馬克思並不是隨意把片塊的資產階級式的權利挪入到共產主義中去；他只不過指出在一個從資本主義底胎胞中所產下來的社會裏政治上和經濟上所必不可免的事實罷了。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而爲自己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制是有極偉大的意義的。但是民主制却決不是一個不可超越的界限；牠祇是從封建制度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發展過程中的階段之一。

民主制的意思就是平等。如果我們從消滅階級的意義上去正確的了解平等，則無產階級爲平等和平等的口號而鬥爭，有何等重大意義，是明顯的。但是民主制的意思，祇是形式上的平等。所以在社會全體人員對於生產資料領有的平等獲得了之後，也就是說在勞動平等和工資平等獲得了之後，在人類的面前，必然立刻會

發生一個從形式上的平等到實際上不平等的更進一步的問題，也就是說發生一個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問題。要經過怎樣的階段，應該用那些實際方法，人類才能夠達到這一個最高的目的——這些我們是不知道，而且也不能夠知道的。但有一點至關重要的，就是我們應該說明平常資產階級對於社會主義的無限止的撒謊，在他們看來，似乎社會主義是一種無生命的，殞死了的，萬古不變的東西。殊不知事實上却只有在社會主義時代，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各方面才開始發生迅速的、真正的、確實是羣衆的前進，在這前進運動中，起初有大多數人民，繼則全體人民都來參加。

民主制是國家底形式——是國家的各種形態之一。因此，同一般的國家一樣，民主制也是對於人們的一種有組織，有系統的強力底使用。這是一方面。可是另一方面，民主制是在形式上承認一切公民的平等，承認一切公民都有平等的權利來決定國家的建設和管理。而這一點又與下面的情形有連帶關係的：在民主制發展底某個階段上，牠使革命的階級——無產階級團結起來，以反抗資本主義，而且使牠能

夠去破壞和打碎，並且掃除一切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就算牠是共和政體的）；常備軍，警察，和官僚；而代之以更民主的機關；可是這依然是國家機關，不過牠是武裝的工人羣衆，這些羣衆由此過渡到爲全體人民參加的民警。

此地是『數量變爲質量』的；民主制發展到了這樣的階段時，牠就跳出了資產階級社會底圈套，而開始牠社會主義的改造。假使真正全體人民都來參加國家的管理，那末資本主義便不能支持下去了。而資本主義底發展又造成使真正『全體人民』都能參加國家管理的先決條件。屬於這些先決條件的，是已經在許多最先進資本主義國中實現了的『人人皆識字』；其次由巨大的複雜的和已經社會化的機關，郵政，鐵路，大工廠，大商業銀行等等所造成的千百萬工人之『有訓練和有紀律』。

在這些經濟的先決條件之下，就完全有可能立刻在二十四小時以內，推翻資本家和官僚，而用武裝工人或武裝全民來代替他們從事於監督生產和分配，計算勞動和生產品（不要把監督和計算的問題與受過科學教育的工程師，農業學家等人員的問題混爲一談；這些先生們今天受資本家底支配而工作，可是明天他們將受武裝人

的支配而更好地工作)。

計算和監督，——這是爲「佈置」和使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得正確動作所必需的主要辦法。在這裏一切公民都變成國家——武裝工人——底僱員了。一切公民都變成一個全民的、國家的「新迪卡」底僱員和工人了。全部事情就在使他們都做平等的工作，正確地遵守工作底標準，而得到同等的報酬。計算和監督這種事情，已經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達到了絕端簡單化的地步，簡直變成了檢查、登記和發出接收異常簡單的手續，這種工作只要識字和懂得加減乘除的人，都能夠擔任的。

當大多數人民到處起來親自實行這種計算並監督資本家（那時他們已經變爲服務人員了）和知識分子先生們（這些先生們還保留着資本主義的習氣）的時候，那時這種監督就真正成爲普遍的，一般的和全民的了，那時誰也逃不掉這種監督了，

當國家大部分的職務，都簡單化爲由工人自己來幹這種計算和監督的時候，國家就不成爲「政治的國家」，那時「社會職務就由政治職務變爲簡單的管理職務了。」（參閱本書第四章第二節，關於與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人們將『無所隱避』了。

整個的社會將成爲一個辦事處和一個工廠，大家都同等勞動，獲得同等工資。但是這個『工廠』的紀律，無產階級在征服了資本家和推翻了剝削者之後要擴充到全社會去的紀律，不是我們的理想，也不是我們的最後的目的，牠只是爲要到澈底肅清社會上一切資本主義剝削底卑鄙與醜惡，和爲繼續向前進展所必需的一個階段而已。

當社會全體人員，或大部分的社會人員，自己學得了管理國家，自己把這個事務操在自己掌握之中，已經『佈置了』對於極少數的資本家的監督，對於願意擁護資本主義的惡習的先生們的監督，和對於被資本主義深深惡化了的工人們的監督的時候，——從那時候起，對於任何的管理的需要，就開始消失了。民主制愈是完備，則牠變成廢物的日子便愈近。由武裝工人所組織的『國家』以及『從國家的原義上講已經不是國家』的『國家』，愈是民主化，則一切的國家的開始衰亡也愈是迅速。

因為當大家都學得管理，而且實際上將自動地管理社會生產，自動地實行監督那般寄生蟲，公子們，驅徒們，以及與這些相類似的『資本主義習俗底擁護者』的時候，——那時要違背這種全民的計算和監督，就必然變成異常困難，變成最罕見的例外了，這種違背必然會引起很快和很嚴厲的處罰（因為武裝的工人都是從事實際生活的人，而不是感情用事的知識分子；他大概不讓任何人與自己開玩笑），這樣，使人們遵守社會生活底簡單的基本規則的必要，也將很快就成爲一種習慣了。

到了那時候，便將大開門戶，從共產主義社會底第一階段過渡到他的高級階段，而國家也就隨着完全衰亡下去。

第六章 機會主義者之糟踏馬克思主義

國家對於社會革命和社會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同一般的革命問題一樣，是「第二國際」（一八八九到一九一四年）最著名的理論家和政治家所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機會主義逐漸長大的過程中，使「第二國際」在一九一四年陷於破產的過程中，最顯著的事件就是：他們即使在直接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時候，還是竭力來躲避牠，或者不注意牠。

整個的看來，我們可以說，把無產階級革命與國家的關係問題避開不談，對於機會主義者自然是有利的，而且還培養了機會主義——可是其結果就造成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完完全全糟踏了馬克思主義。

爲對這個可憐的過程加以說明（縱使是很簡單的說明）計，我們就拿馬克思主義最有名的理論家普列漢諾夫和考茨基來說一說吧。

一 普列漢諾夫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普列漢諾夫在一八九四年曾經爲了討論無政府主義對社會主義的關係問題，特別著了一本德文的小冊子，命名爲無政府主義與社會主義。

當時普列漢諾夫以狡滑態度來發揮這個題目，把反對無政府主義的爭鬥中最迫切最及時和政治上最重要的一點，即革命對於國家的關係和一般的國家問題，完全置之不理。他的小冊子分成兩部分：一是歷史的文藝的部份，其中包含着許多關於斯蒂納、蒲魯東等底思想史的有價值的材料；二是庸俗的部份，其中包含着鄙陋的議論，說無政府主義者與強盜並無區別。

這裏事實的聯系，是對於普列漢諾夫在俄國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時期中整個行動最珍奇、最特出的：在一九〇五至一年一七年，普列漢諾夫正是表示了自己是個半幻想家，半庸俗學者，在政治上是跟着資產階級底尾巴後面跑的。

我們已經看見，馬克思和恩格斯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中，曾最詳盡地說明了

他們對於革命與國家的關係的見解。當一八九一年馬克思著的哥達綱領批評一書出版時，恩格斯曾寫道：

『我們（即馬克思和恩格斯）那時正在同巴枯寧以及跟着他跑的無政府主義者，作最猛烈的戰爭——那時距「第一國際」底海牙世界大會還不到二年。』

無政府主義者曾經企圖把「巴黎公社」宣稱爲他們『自己的公社』，當作證實他們學說的實例，而且他們完全不懂「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對此等教訓底分析。對於那些具體的政治問題：是否要去破壞舊的國家和機器和用什麼來代替牠？——無政府主義簡直沒有給一個甚至於大概接近於真理的解答。

但是談到『無政府主義和社會主義』，而把整個的國家問題丟開不講，並將馬克思主義在「公社」前後之全部的發展，都置而不問，那就不可避免地要墮入機會主義的深坑中去。因爲，機會主義正是最要求完全不提我們剛才所指出的兩個問題。這已經是機會主義底勝利了。

二 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的論戰

考茨基底著作之翻成俄文的譯本，自然比任何別國文字都要豐富得多。難怪有些德國社會民主黨人說過笑話，說在俄國讀考茨基著作的人，要比在德國多些。（這裏我們可以附帶說一說，就是這句笑話比說這笑話的人們所疑怪的可更含有很深刻的歷史意義：一九〇五年俄國的工人異常有力地、亙古未聞地要求世界最優良的社會民主黨底著作，因此在俄國，這些著作的翻譯和出版底數量之多，誠為其他各國所不及，這樣就把更先進的鄰國底豐富的經驗移植到我們無產階級運動底新的領土中來了）。

除了對於馬克思主義之通俗的解釋以外，考茨基與機會主義者及他們的首領培恩斯坦的論戰，使他在俄國特別出名。然而有一件事實差不多沒有人知道，假使我們要明白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的最大危機時期中，考茨基怎樣墮入了最可恥的迷途和替社會國家主義辯護，那末我們對於這個事實是不能放過的。這個事實就

是，當考茨基起來反對法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米萊蘭和壽列斯）和德國最著名的機會主義代表（培恩斯坦）之前，他已經表現了非常大的動搖。一九〇一至一九〇二年在斯都德牙爾出版的馬克思主義的曙光雜誌，擁護革命的無產階級的見解的雜誌，曾不得已與考茨基爭辯，而宣佈他在一九〇〇年巴黎國際社會主義大會上所提的決議案是『橡皮性的』，因為這個決議案對於機會主義者的態度是曖昧的柔和的並且調和的。還有一些用德文出版的考茨基底信札，也足以證明他在起來攻擊培恩斯坦之前，他是表示了同樣的動搖。

然而還有一個含有莫大意義的情形，就是在我們現在研究考茨基之最近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叛變底歷史時，我們便可以看到，在他與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中，在他的問題提法中，在他的解釋問題的方法中，他恰恰對於國家問題有系統地傾向於機會主義。

試拿考茨基攻擊機會主義的一部大著作，即他著的培恩斯坦和社會民主黨的政綱一書來看吧。考茨基詳細地駁斥培恩斯坦。但請看最特出的地方是什麼。

培恩斯坦在他的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一書中，指斥馬克思主義爲『白朗基主義』（自此以後，俄國自由資產者和機會主義者數千百次重複這種指斥，來攻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代表——布爾塞維克）。而且，培恩斯坦特別注重於馬克思著的法國內戰，竭力想把馬克思對於「巴黎公社」教訓的觀點，去與蒲魯東的觀點混而爲一（我們已經知道，他這種企圖是完全沒有成功的）。培恩斯坦會特別注意馬克思在一八七二年共產黨宣言序言中所特別着重說明的一個結論；這個結論說：

『工人階級不能簡單把現成的國家機器拿在自己手中而運用牠去達到自己的目的。』

培恩斯坦很『喜歡』這句箴言，所以他在自己著作中把牠至少重複三次，可是把牠完全曲解了，把牠變成了機會主義的見解。

我們已經知道，馬克思所要說的就是，工人階級應該破壞、打碎、炸燬（*depre-*
gnere 恩格斯所應用的字眼）整個的國家機器。可是在培恩斯坦看來，以爲馬克思是用這句話來警告工人階級，要反對在奪得政權時的過分的革命性。

對馬克思思想之再愚弄再醜陋的曲解，連想也想不到了！

試問考茨基在他對培恩斯坦主義的最詳盡的辯駁中，曾取怎樣的態度呢？

他不去分析機會主義在這一點上對於馬克思主義之曲解底全部深奧之處。他引用了上面所摘引的恩格斯給馬克思著的法國內戰所作的序言中的一段，就說，依照馬克思底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但是一般的講來，牠是能夠掌握這個機器的——考茨基所說的話就盡於此了。至於馬克思從一八五二年就把『破壞』國家機器作為無產階級革命之任務，而培恩斯坦把與馬克思底思想直接相反的東西去戴到馬克思頭上——關於這一切，考茨基却不置一辭。

其結果是這樣：馬克思主義與機會主義之間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底任務問題之最重要的差別，就被考茨基抹煞了！

考茨基『反對』培恩斯坦時寫道：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底解決，我們可以完全泰然自若地待諸來日。』（見德文版第一

這並不是反對培恩斯坦的論戰，而是實質上向他讓步，是向機會主義投降；因為機會主義者現在所要求的，除了把一切關於無產階級革命之任務的根本問題『完全泰然自若地待諸來日』之外，並不要別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一年，在四十年過程中，教誨無產階級，說牠應該打破國家機器，可是考茨基在一八九九年目睹了機會主義者在這一點上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他使用欺詐的手段，拿破壞國家機器的具體形式問題，去代替要不要破壞這個機器的問題，而以『不可辯駁的』（和沒有結果的）庸俗的真理，說具體的形式，我們不能預先知道，作為護符，以救自己！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們倆對於無產階級政黨準備工人階級來幹革命的這個任務所持的態度之間，有一條鴻溝。

我們拿考茨基比較成熟的著作來看，這部著作大部分也是用來駁斥機會主義底錯誤的。這就是他那命名為社會革命的小冊子。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中，拿『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統治』的問題，作為他特選的題目。他在這裏說了許多極有

價值的語；但是恰恰把國家問題忽略了。在該小冊子內，著者到處都說到奪取國家政權，却並不繼續發揮這點，這就是說，他選擇的措詞，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因為他承認奪取政權可不破壞國家機器。馬克思一八七二年在共產黨宣言底綱領上曾經宣佈爲『陳腐』的東西，到了一九〇二年恰恰被考茨基所復興起來了。

在該小冊子中，又有特別一節發揮『社會革命之武器與形式』。在這一節當中，他講到羣衆的政治罷工，講到國內戰爭，講到『現代強大國家勢力之工具如官僚和軍隊』等，但是關於『巴黎公社』已經給予工人的教訓，他却一字不提。很明顯的，恩格斯反對『尊崇』國家，而警告人們，——特別是警告德國社會主義者，這並不是沒有根據的。

考茨基提出這樣的意見，勝利的無產階級『將實現民主的綱領』；他又敘述這個綱領底條目。可是一八七一年對於以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這一問題，有了什麼新的貢獻，他却不置一辭。考茨基說些這樣『昂然』動聽的茶餘飯後之談來了事：

『很明顯的，在現在的制度之下，我們是不能得到統治的。革命本身是需要一個長期的極深刻的鬥爭，這個鬥爭已經能夠改變我們現在的政治和社會的結構。』

毫無疑義的，這個『很明顯的』真理，和馬吃麥子，窩瓦河流入裏海一樣，同是『很明顯的』。所可惜的，只是他拿空洞而浮誇的，什麼『極深刻的』鬥爭一類的話，來把對於革命的無產階級最緊要的問題忽略過去了；這個問題就是：對於國家和民主制的關係上，與過去那些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同的無產階級革命底『深刻之處』，究竟在什麼地方表現出來。

忽略了這個問題，考茨基事實上對於這最重要的一點，就實行向機會主義讓步了，同時在口頭上却揚言對機會主義者宣戰，又着重指出『革命思想』底意義（如果怕拿革命底具體教訓去向工人宣傳，那末這個『思想』是否很有價值呢？）；或者又說『首先是革命的唯心主義』，或者宣稱，現在英國工人『差不多與小資產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寫道：

『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可以並肩地存在着形式十分不同的企圖：有官僚的（??）、工會的、合作社的，以及私人的企業……』。『舉例來說，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的組織是不行的——鐵路就是這樣。這裏民主的組織可以採取這樣的一種形式：工人們選舉代表，由這些代表來組織類似國會的機關，而這個國會性質的機關就規定工作條例和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其他企業，有的可以交工會辦理，有的可以根據合作社的原則設立起來。』（見一九〇三年日內瓦出版的俄文譯本第一四八及一一五頁）

這種議論是錯誤的，牠比之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七十年代拿「巴黎公社」底教訓的例所說明了的，是要退後一步。

假使『官僚的』組織是必要的話，那末從這個觀點來說，鐵路和大的機器工業底一切企業、任何工廠、大的商號、以及大的資本主義的農業企業之間，都沒有絲毫區別。在一切這些企業中，技術需要極嚴格的紀律，極大的準確性，以執行分配每人的那部份工作，不然就有機器或生產品遭受損壞或整個企業爲之停頓的危險。在一切這些企業中，工人們當然要『選舉代表』，由這些代表來組織類似國會的機

關」。

但是一切的關鍵就在這裏：這個所謂『類似國會的機關』，却不是資產階級國會機關那種意義的國會。一切的關鍵是在於：這個所謂『類似國會的機關』，却不是僅僅『規定條例和監察官僚機關底行政』，像考茨基所想像的一樣，他這種思想是沒有超出資產階級代議制底範圍之外的。在社會主義的社會裏，由工人代表組成的『類似國會的機關』，當然要規定條例和監察『機關底行政』，可是這個機關却不是『官僚的』。工人們奪取了政權之後，就要破壞舊的官僚機關，要根本毀滅牠，澈底剷除牠，而以這些工人們和職員們組織起來的新的機關來代替牠；爲防止這些人變爲官僚主義者起見，必須立即採取相當的辦法；這些辦法已經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得很詳盡了的：（一）他們不僅是被選舉的，而且無論何時都可以更換；（二）他們的薪水不能高於工人底工資；（三）要很快的過渡到使大家都來執行監督和管理底職務，使大家都暫時變成『官僚』，因此使無論何人也不能成爲『官僚』了。

考茨基完全沒有去思索馬克思底說話：

『「巴黎公社」並不是國會的，而是工作的團體，牠同時又是立法兼行政的機關。』

考茨基完全不懂得把民主制（不是爲着民衆的）和官僚制（反民衆的）聯成一氣的資產階級的代議制與無產階級民主制之間的區別；無產階級的民主制要立即採取辦法來澈底地剷除官僚制，而且能夠把這種辦法應用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滅爲止，直到爲着民衆的民主制完全實現爲止。

考茨基在這裏又暴露了他的對國家的『尊崇』，對官僚主義的『迷信』。

現在我們進而研究考茨基最後和最優的一部攻擊機會主義的著作，就是他那本到政權之路的小冊子（好像還沒有俄文版，因爲牠是一九〇九年，在俄國反動勢力最猖獗的時候出版的）。這本小冊子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因爲該書並不是論到一般的革命綱領問題，像一八九九年攻擊培恩斯坦的那本小冊子一樣，不是說到無定期的社會革命底任務的，像一九〇二年的社會革命那本小冊子一樣；而是講到具體的條件，這些條件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革命底紀元』正在到來。

考茨基肯定地指出一般的階級矛盾底劇烈和在這方面而特別大的作用的帝國主義。在西歐「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七一年的革命時期」之後，在東方開始着同樣的自一九〇五年起的時期。世界大戰來得異常之快。「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什麼時機未到

的革命的時代了。」「我們已經進到革命的時代了。」「革命的紀元正在開始。」這些言論是十分明顯的。考茨基這本小冊子應作爲一個尺度，來測量帝國主義大戰以前「德國社會民主黨」答應了作什麼，而到了戰爭爆發的時候，牠（考茨基本人也在內）却怎樣不符前言的一落千丈了。

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內寫着：

『由現在的情勢可以發生這樣的一種危險：就是我們（即「德國社會民主黨」）很容易被人視爲更溫和的——而實際上我們却沒有這樣溫和的。』

但是實際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却表現得比人所感覺到的還要更溫和些，更機會主義些！

還有更特出的一點，就是雖然他有這些肯定的言論，說革命紀元已經到來，但

是，他在那本自稱為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裏，却又完全避開了國家問題。

把這些對於規避問題、緘默、掩飾都總結起來，其結果便必然是完全跑到機會主義方面去。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就要說到。

以考茨基為代表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好像這樣說過：我保持着革命觀念（一八九九年）；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底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一九〇二年）；我承認新的革命紀元之到來（一九〇九）；但是一旦提到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任務問題的時候，我畢竟是要違背馬克思還在一八五二年已經說過的話而向後倒退的（一九一二年）。

在考茨基同班業苦克的論戰裏，他恰恰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

三 考茨基與班業苦克的論戰

班業苦克出來反對考茨基，他是「急進左派」底代表之一，這一派中曾有盧森

堡、拉狄克等，他們堅持革命策略，大家確信考茨基是在毫無原則地在馬克思主義和機會主義之間動搖着，是在跑到『中立派』底立場上去。這個見解之正確已經被歐洲大戰所證明了。在大戰期中，『中立派』（人家稱牠為馬克思主義的派別，這是不對的）或『考茨基主義』派，已經表明出牠本身全部可憎的卑鄙。

班業苦克在他論及國家問題的羣衆行動與革命這篇論文（一九一二年新時代第三十卷第二號）裏面，斷定考茨基底立場是『消極的急進主義』底立場，是『不活動的等待底理論』。

『考茨基不願看見革命底過程。』（六一六頁）

這樣的提出問題，班業苦克就談到了我們所注意的那個問題：即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問題。

他說：

『無產階級鬥爭，不是單單爲了國家政權而反對資產階級的鬥爭，而是反對國家政權的鬥爭……。無產階級革命底內容，就是用無產階級力量底武器去消滅國家力量底武器，

和排擠（原文爲 *persecution* 解散）這些武器……只有在國家組織完全毀滅（這是鬥爭底最後結果）之後，爭鬥方能終止。多數人的組織底超絕處，就在於牠能消滅少數人的統治組織。」（五四八頁）

班業苦克用以表示自己的意思的措詞，有很大的缺點，但是他的意思却是很明顯的。試看考茨基怎樣去反駁他，這倒是一件有趣味的事。

考茨基說：

「直到現在，社會民主黨人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對峙，是在前者要奪取國家政權，而後者却要破裂這個政權。班業苦克却想兩者兼而有之。」（七二二頁）

假設班業苦克底解說欠明晰性和具體性（他論文中的別種缺點，不關乎這一個題目的，此地不談），那末考茨基恰恰把班業苦克所指出的原則的題旨找着了；可是對於根本的原則問題，考茨基完全放棄了馬克思主義底立場，而完全跑到機會主義方面去了。他對於社會民主黨人和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所下的定義是完全錯誤的，馬克思主義完全被他曲解了和糟蹋了。

馬克思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之間的區別是在於：（一）馬克思主義者以完全消滅國家爲自己的目的，他們承認，只有在社會革命消滅了階級之後，這個目的才可實現；而消滅階級又是促成國家衰亡的社會主義之建立底結果；無政府主義要在二十四小時內把國家完全消滅，他們不懂得實現這樣的消滅的條件。（二）馬克思主義者認爲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之後，就必須根本破壞舊的國家機器，而代以新的「巴黎公社」式的由武裝工人底組織所構成的機器；而無政府主義者主張破壞國家機器，但是，他們完全不懂得，無產階級用甚麼去代替牠和無產階級將怎樣去利用革命的政權；無政府主義者甚至否認革命的無產階級之利用國家政權和否認無產階級底革命專政。（三）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利用現代的國家，來準備無產階級去革命；無政府主義者否認這一點。

在這個爭論中，代表馬克思主義的，恰恰是班業苦克，而不是考茨基；因爲正是馬克思曾經教訓過我們，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奪取政權，把舊的國家機關轉入新的人底手中，而應當破壞、打碎這個機關，而代以新的機關。

考茨基離開馬克思主義，而走向機會主義者方面去，因為照他的意思說，恰恰破壞國家機關這一層，是完全沒有的，而破壞國家機器正是機會主義者所完全不能接受的，且考茨基替機會主義者作了一條逃路，是把『奪取』解釋為僅僅大多數的一種獲得。

為掩飾其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計，考茨基便表示他的淵博，而『引證』一段馬克思底話來搪塞。馬克思在一八五〇年曾經說過：『國家政權手裏應有嚴格的集中力量』之必要；考茨基就堂皇正大地問道：『班業苦克不是要破壞『集中主義』麼？』

這不過是一套把戲而已，這也和培恩斯坦把馬克思主義對集中主義的觀點曲解為聯邦主義的觀點，並把他的觀點拿來與蒲魯東主義對聯邦主義的觀點混為一談是一樣的。

考茨基所用的『引證』，是與本題毫無關係的。無論新的或舊的國家機器，都有集中主義的可能。如果工人們自願地把他們的武裝力量集合起來，這就是集中主

義，可是他是建築在『完全破壞』國家的集中機關——常備軍、警察、和官僚——之上的。考茨基在此處所表現的行爲是騙子式的行爲。他把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巴黎公社」的最著名的議論，置之不理，而却拿出文不對題的引句來。

考茨基接着又說：

「——也許班業吉克要取消官吏底國家的職務吧？但是在我們的黨的和工會的組織內，沒有官吏尙且不行，何況在國家的行政機關內，我們政綱不是要求消滅官吏，而是要求官吏民選。——」『現在我們所談的，並不是關於在「將來國家」中，行政機關要採取怎樣的形式，而是關於在我們奪得政權以前（着重點是考茨基加的），我們的政治鬥爭是不是要消滅（原文爲 *abolish* 意即解散）國家政權。內閣中有那一部及其官吏是應當廢除的？』於是他列舉教育部，司法部，財政部，陸軍部等等。『不，現在的內閣中沒有一部可以被我們反對政府的政治鬥爭所取消的……。爲避免誤解計，我再重說一遍：現在所說的不是關於勝利的社會民主黨對於「將來的國家」主張採取何種的形式，而是關於我們的在野黨怎樣去改變現在的國家。』（七二五頁）

這是顯然的欺騙。班業苦克所提出的恰恰是革命問題。這在他的論文底題目上以及我們上面所引用他的一段文字當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來。可是考茨基跳到『在野黨』的問題上，他恰恰就以機會主義的觀點來代替革命的觀點了。照他的說法，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現在我們是在野黨，至於奪取政權以後的事情，我們再來特別談論。革命就化爲烏有了！這恰恰就是機會主義者所要求的。

我們所說的，不是『在野黨』，也不是一般的政治鬥爭，而正是說革命。革命就在於無產階級破壞『行政機關』以及整個的國家機關，而代以一個新的由武裝工人所構成的機關。考茨基表示他對『內閣各部』的『尊崇』，但是試問我們爲甚麼不可用在全權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之下的各種專門人才委員會，去代替『內閣各部』呢？

問題底本質，並不在於『內閣各部』存在不存在，要不要『專門家委員會』，或其他的機關；這些是完全不重要的。問題底本質就在於，是否要保存舊的國家機器（牠與資產階級千頭萬緒地聯繫着，而且是極端腐敗的守舊的），抑或要破壞牠

而代之以新的機器。革命不應當是新的階級用舊的國家機器而施行指揮，實行管理，而應當是新的階級打破這個機器，而用新的機器，來施行指揮，實行管理，這是馬克思主義底基本觀念，而考茨基把牠隱藏起來，或者他完全沒有了解牠。

他所提出的關於官吏問題，顯然證實他並不懂得「巴黎公社」底教訓和馬克思底學說。

「即在我們的黨的和工會的組織內，沒有官吏尙且不行……」

在資本主義之下，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我們非有官吏不行。無產階級受資本主義底壓迫，勞動羣衆被資本主義所奴役。在資本主義之下，因僱傭奴隸制，和民衆之貧乏困苦底全部環境，使民主主義成爲狹窄的、殘缺的、變相的。因此，而且僅僅因此，在我們的政治組織和工會組織內，職員們都被資本主義環境所腐化（或者說得更正確些，有一種被腐化的趨勢），以及表現一種變爲官僚主義者的趨勢，就是說變爲脫離羣衆而站在羣衆之上的特權者的趨勢。

官僚主義底實質，就在這裏，在資本家沒有被剝奪和資產階級沒有被推倒以

前，甚至於無產階級的職員之相當的『官僚主義化』也是不能免的。

從考茨基的說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既然有選舉的職員，那末即在社會主義之下，也有官吏，同時官僚制亦一樣的存在。這恰恰是錯誤的。馬克思恰拿「巴黎公社」做例子，而指示出，在社會主義之下，職員不是『官僚』，也不是『官吏』了，所以不是的緣故，因為除施行選舉以外，還有隨時可以實行罷免權，而且還把他們的薪水與中等工人底工資相等，而且還以『工作的，即是立法兼行政的機關』去代替國會機關。

在實質上，考茨基攻擊班業苦克的一切論據，尤其是考茨基底特別巧妙的理由，說在我們的黨的和工會的組織內沒有官吏尙且不行，這一些完全表現出考茨基把培恩斯坦反對一般馬克思主義的老『理由』來重述一回罷了。培恩斯坦在他所著的叛徒著作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中，反對『原始的』民主制底觀念，反對他所謂『空想的民主制』：反對絕對服從的命令、無報酬的職員、無力的中央代表機關等等。爲要證明這種『原始的』民主制之不中用，培恩斯坦就借威伯所解釋的英國職工會

底經驗來作根據。他說，職工會在其七十年的『充分自由』的發展中（德文版一三七頁）相信了原始的民主制恰恰是不中用的，遂代以與官僚制混合的普通的代議制了。

其實英國工聯會並不是在『充分自由』中發展，而是在充分的資本主義的奴隸制中發展的，在這種制度之下，自然對於盛行一時的惡意、暴力、欺詐以及排斥窮人使其不能參加『高級』行政機關等等的行爲，非有種種的讓步『不行』。在社會主義之下，許多『原始的』民主制底成分，是必然要復活起來的；因爲，民衆在文明社會歷史裏第一次起來，不但能夠獨立地參加投票和選舉，而且還能獨立地參加日常的管理。在社會主義之下，一切人都將輪流來管理，而且他們將很快地習慣於誰也不去管理。

具有天才的、批評的分析頭腦的馬克思，在「巴黎公社」底實際辦法中看見了有一個轉變，這一點是機會主義者所害怕的和不愿意承認的，因爲他們畏首畏尾或由於不愿意與資產階級堅決地脫離關係；這一點是無政府主義者不愿意看見的，或

者由於躁急的緣故，或者由於一般不懂得社會大變動底條件的緣故。『我們不應該想去破壞舊的國家機器，因為假使沒有內閣各部和官吏，我們怎麼樣呢』——這是機會主義者底議論；機會主義者貫徹了庸人主義，實際上不但不相信革命與革命底創造，而且還死怕革命（如俄國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害怕革命一樣）。

『我們祇想去破壞舊的國家機器就夠了，而無須去領略過去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的教訓，無須去分析用甚麼和怎樣去代替那破壞了的東西』，——這是無政府主義者底議論（當然此處是指最好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不是那些跟着克魯泡特金先生之流去步資產階級後塵的無政府主義者）；所以無政府主義者底策略便變成了失望底策略，而絕不是從事於解決具體任務的革命工作底策略，這種革命工作是無情的勇敢的同時又注意到羣衆運動底實際條件的。

馬克思教我們要避免這兩種錯誤，教我們極勇敢地去破壞一切舊的國家機器，同時又教我們具體提出問題：『巴黎公社』在數星期間，開始創造一個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實行上面所提到的辦法，以實現廣大的民主主義，剷除官僚主

義。我們將效法公社社員底革命勇氣，我們將在他們的實際辦法中看見他們對於具體、迫切而立時可以實現的辦法之指出，那時我們按這樣的方法前進，我們便能達到完全消滅官僚主義。

這種消滅之可能性是有保證的，因為社會主義縮短工作時間，提高羣衆到新生活中，使大多數人民所處的條件大家得能（無一例外）執行『國家的職務』，而這就使一切國家都要完全衰亡下去。

考茨基說：

『羣衆罷工底任務，無論何時都不在破壞國家政權，而只是在促成政府對於某種問題的讓步，或用一個歡迎（*entgegenkommende*）無產階級的政府去代替仇視無產階級的政府……可是無論如何，在無論何種條件之下，這』（無產階級之戰勝仇視政府）『不能引起國家政權底破壞，而只能引起國家政權內部勢力比重底變動（*Verschiebung*）……在這裏我們政治鬥爭底目的，仍和從前一樣，就是用取得國會裏大多數的方法來奪取政權，並使國會變成政府主人翁。』（七二六，七二七，七三二頁）

不通過
政權

這已經是最純粹最鄙陋的機會主義了，已經是口頭上承認革命、行動上放棄革命了。考茨基底思想不外乎要一個『歡迎無產階級的政府』——這比較一八四七年當共產黨宣言宣稱『無產階級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時候要倒退一步，而走向庸人主義方面去。

考茨基要實現其所愛好的主張與謝得曼、普列漢諾夫和萬德威爾一流人『統一』，因爲這班人都是贊成爭取一個『歡迎無產階級』的政府的。

但是我們是要和這班違背社會主義的叛徒分裂，而爲毀壞全部舊的國家機器而奮鬥的，務使武裝的無產階級本身，變成政府。這是『兩個極大的異點』。

考茨基將同李謹、達微特、普列漢諾夫、波特列索夫、蔡雷特和威爾諾夫這般好伙伴們結合，因爲這般人全是主張爭取『國家政權內部勢力比重底變動』，爭取『獲得國會中的大多數和爭取支配政府的全權國會』；他們這樣一種極可寶貴的目的，正是完全適合於機會主義者的而且完全不超出資產階級國會的共和國底範圍之外的。

但是我們要和機會主義者分裂；整個的覺悟的無產階級，就會同我們一致奮鬥，這個鬥爭不是爲着『勢力比重底變動』，而是爲着推翻資產階級，爲着破壞資產階級的代議制，爲着『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國，或工兵代表蘇維埃共和國，爲着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

在國際社會主義中，還有些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別，例如德國的社會主義月刊派（李謹、達微特、可爾白等，以及瑞典挪威的斯道甯和勃朗亭）、法國和比利時的壽列斯派和萬德威爾，在意大利黨內的都拉底、特列佛斯和其他右派代表們，在英國有費邊派和『獨立黨人』（名爲『獨立工黨』其實是一向依靠自由派的），以及其他類似的派別。這般先生們，在議會工作裏和黨底刊物上有很大的作用，而且常有統治的作用，他們公然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實行公開的機會主義。在這般先生們看來，無產階級專政是與民主相『矛盾』的！在實質上他們是和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沒有多大區別。

我們根據這種情形，就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第二國際」極大多數正式的代表們，已經完全墮入了機會主義的泥坑中。「巴黎公社」底經驗，不但被他們忘記，並且被他們曲解了。他們不但沒有給工人們一個鼓勵，說現在快要到這樣的時候，那時候工人們應當起來破壞舊的國家機器，而用新的來代替牠，這樣使工人們底政治統治變為社會之社會主義的改造底基礎；而他們却教導羣衆以相反的東西，並且把「奪取政權」看作這樣，致替機會主義留下千百條後路。

當國家因帝國主義的比賽而擴大軍事機關，成為吞食千百萬人民生命的軍事怪物，以解決德國或英國，這個或那個財政資本來統治世界的爭論的時候，在這個時候，對於無產階級革命和國家的關係問題之曲解和緘默，是不能不起一種重大作用的。

初版書後

這本小冊子是在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間寫好的。我當時還預備好了第七章底題目：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但是除了題目之外，因為被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之前的政治危機所『妨礙』，我簡直一行字也未來得及寫。對於這種『妨礙』，只能表示快活。但是本章書（論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底經驗）底出版也許要延擱得很久；不過與其作文章來論『革命底經驗』，不如實地去做『革命底經驗』更爲快活，更爲有益。

著者：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三號（十一月三十號）於彼得格勒，一九一七年八月至九月作，一九一八年印成單行本。

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

●●

序 言

考茨基著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本小冊子，不久以前在維也納出版了（Wien, 1918, Ignaz Brand共六三頁），這本小冊子是爲各國忠實的社會主義者大家所老早說及的「第二國際」最充分最可恥的破產之極明顯的例證。現在，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在許多國家中，已實際地擺在議事日程上了。因此對於考茨基之叛徒的詭辯說，及其完全離開馬克思主義的言論，必須加以分析。

但是首先應當着重地指出，當歐戰一開始的時期，本書作者已經屢次指出考茨基之離開馬克思主義了。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六年間在國外出版的社會民主黨人與共產主義者上，曾有許多篇文章論到這一點。這些文章，曾由彼得格勒蘇維埃搜集刊印，定名爲反潮流（一九一八年出版於彼得格勒共五五〇頁），著者即爲我和季諾維夫。一九一五年作者又有小冊子出版於日內瓦，當時曾譯成德、法文，我在

這本小冊子上關於「考茨基主義」是這樣寫的：

「考茨基是『第二國際』中最有聲譽的人物，他是表示出如何在口頭上承認馬克思主義，實際上却把馬克思主義變為『司徒威主義』或『勃連唐諾主義』」（就是說，變為承認無產階級之不革命的「階級」爭鬥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學說，表現這種學說特別明顯的，即為俄國的著作家司徒威與德國的經濟學家勃連唐諾）『之最標本的最明顯的例證』。這證諸普列漢諾夫^①。也是如此。他們以明顯的詭辯說，抹煞馬克思主義之革命的活潑的精神；他們在馬克思主義當中，除了革命的鬥爭手段，對於這些手段之鼓吹和準備，以及恰恰在這一方向上去教育羣衆之外，其他什麼都可以承認。考茨基無原則地『調和』社會國家主義底基本思想，——在此次戰爭中承認保護祖國，同時向左派作外交式的裝腔做勢的讓步，如在戰爭借款案的表決時表示懷疑，與口頭上表示其反對黨的態度等等。在一九〇九年考茨基曾有專著出版，論及革命時期之日漸到來，論及革命與戰爭之關係^②；一九一二年，考茨

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一八五至二二三頁，社會主義與戰爭的小冊子（編者）。

基曾署名於巴塞爾宣言，說應當利用行將到來的戰爭，以進行革命；然而現在他對社會國家主義，無處不加以辯護和粉飾，並且同普列漢諾夫一樣，甘心與資產階級攜手，來譏笑種種革命思想與直接革命爭鬥底一切步驟。

工人階級如不與此種叛徒行為、無氣節行為、對於機會主義之諂媚、對於馬克思主義之空前的理論上的污蔑，作無情的戰爭，那末牠就不能實現全世界革命的目的。考茨基主義，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第二國際」底矛盾之社會的產物，是口頭上忠信馬克思主義和實際上服從機會主義的結果」（見季諾維夫與列寧合著的社會主義與戰爭的第一三至一四頁，一九一五年出版於日內瓦）。

再則，我在一九一六年著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底最新階段（一九一七年出版於彼得格勒）一書中，曾詳細說到考茨基在理論上對於帝國主義的一切議論之錯誤。我曾引了考茨基對於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

* 見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二〇三頁。（編者）

* 見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八卷（編者）。

「帝國主義是高度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底產物。其實質就在於：各個工業資本主義的民族，企圖日多一日的佔取或克服一切農業的（着重點是考茨基加上的）區域，而不管那裏所住的是何種民族。」

我已經指出了，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定義，其目的在於抹煞帝國主義底最深刻的矛盾，以及同機會主義調和。我那時對於帝國主義所下的定義，是這樣：「帝國主義是發展到某一階段的資本主義，在這個階段中，壟斷與財政資本已獲得統治地位，資本輸出已有重大意義，國際託辣斯已開始瓜分世界，各最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對於全球幅員已分割完竣。」我曾經證明考茨基對於帝國主義的批評，甚至還不及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批評。

最後我在一九一七年八、九月間，即俄國無產階級革命（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俄歷十月二十五日）前夕，我著有國家與革命。馬克思主義底國家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務一書。（一九一八年春出版於彼得格勒），在這書第六章論機

*見本卷第一頁至一八三頁。（校者）

會主義者之糟踏馬克思主義中，我也曾特別注意到考茨基，說明考茨基對於馬克思學說之全部曲解，使馬克思主義變為機會主義，「他在口頭上承認革命，實際上却離開了革命」。

總之，考茨基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小冊子中理論上的基本錯誤，就是他對於馬克思底國家學說的機會主義的曲解，這種曲解我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已經很詳細地指出來了。

這幾句卷頭語，我認為是必要的，因為這幾句卷頭語可以證明：在布爾塞維克還沒有奪取政權以前，在考茨基還沒有責備布爾塞維克之奪取政權以前，我老早就已經公開地稱考茨基為叛徒了。

考茨基怎樣把馬克思變成庸俗的自由主義者

考茨基在他小冊子中所論及的基本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底根本內容問題，即無產階級專政問題。這個問題，對於世界各國，尤其是對於先進各國，尤其是對於

參戰各國，尤其是在目前，有極重大的意義。我們可以不誇張地說，這是一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之最主要的問題。因此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有仔細研究之必要。

考茨基這樣的提出問題說：

『這種社會主義派別（就是說，布爾塞維克與非布爾塞維克）之對抗，就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方法：民主的方法與專政的方法之對抗。』（第三頁）

這裏我們有一點應該順便說及的，就是考茨基所以稱俄國的非布爾塞維克，即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爲社會主義者的緣故，是因爲他只問其名稱，而不問其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爭鬥中所佔的實際地位。這是馬克思主義之何等巧妙的了解和應用啊！但關於這一點，以後還要詳說。

現在我們要拿主要的問題來談，即：考茨基關於『民主方法與專政方法』之『根本相反』這個偉大的發明。問題底中心就在這裏。而考茨基底小冊子之全部內容，也就在這裏。理論上如此糊塗的，離開馬克思主義又若是其遠的考茨基，較諸培恩斯坦，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就是無產階級國家對資產階級國家的關係問題，無產階級民主制對資產階級民主制的關係問題。這似乎像青天白日一樣的明顯了吧。然而考茨基正像專門背誦歷史教科書的中學教員一樣，很固執地把背對着二十世紀，而面對着十八世紀，好幾百次在他的文章中異常無聊地咀嚼着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制對君主專制與中世紀制的關係的舊說！

這正像在大夢中咀嚼樹皮一般！

這簡直是莫名其妙！考茨基拚命地這樣設想，似乎有人宣傳『蔑視民主制』（第一一頁）等等，他的企圖，祇能引起人們的微笑而已。考茨基要用這些可笑的話來抹煞並混淆問題，因為他以自由主義的態度來提出問題，說關於一般的民主制問題，而不是關於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問題，他甚至逃避這個確定的階級的概念，而拚命講什麼『在社會主義以前的』民主制。在該小冊子上，幾乎有三分之一的篇幅（六十三頁中佔了二十頁）都被這個空談家底空論所佔據了，這種空論，當然是資產階級所樂聞的，因為他替資產階級的民主制粉飾，而抹煞無產階級革命的問題。

然而考茨基小冊子上的題名，畢竟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學說底精粹是在這裏，這是誰都知道的。考茨基在文不對題的空講一陣之後，也得引用一些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話。

試看『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如何做這件事，這簡直是滑稽劇！聽啊：

『這個見解』（即考茨基認為蔑視民主制的見解）『的根據，祇是馬克思底一個字。』考氏在小冊子的第二十頁上曾一字不差的這樣說法。在第六十頁上，他甚至這樣說：（布爾塞維克）『湊巧想到了馬克思在一八七五年曾經在一封信上……一次使用過的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小小的字』（原文上一點也不差是這樣講的——des Wörtchens）。

試看馬克思底這『一個小小的字』：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中間，有一個由前者轉到後者的革命轉變時期。適合於這個時期的，為政治的過渡時期，在這個時期的國家，除了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外，便不能有其他的國家。』

第一，說馬克思這個著名的議論，總結他的一切革命學說的議論，爲「一個字」，或甚至是「一個小小的字」，——這簡直是污辱馬克思主義，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我們不應該忘記，考茨基是一個熟讀馬克思著作的人，按考茨基底一切著作而論，在他的書櫃中或他的腦袋中，藏有無數的木箱，其中將馬克思所有一切作品，都分成條目，易於引證的。考茨基不能不知道，馬克思也好，恩格斯也好，在通信中也好，在著作中也好，他們論及無產階級專政，說過許多次，尤其在「巴黎公社」前後。考氏不能不知道「無產階級專政」一公式，祇是無產階級「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任務之歷史上更具體的和科學上更確切的說明，關於這種任務，無論馬克思或是恩格斯，都根據於一八四八年革命底經驗、尤其是一八七一年革命底經驗，從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九一年的四十年過程中所時時說到的。

馬克思主義中的博學者考茨基如此離奇地曲解馬克思主義，其故何在呢？如果說到這種現象底哲學基礎，那末問題是歸結到以折衷論與詭辯說來代替辯證法。考茨基就是這種代替底大專家。如果就政治與實際的觀點來說，那末這是對於機會主

義者，歸根結底即對於資產階級的一種効忠。歐戰開始後，考氏在這種藝術方面，急轉直下地變為嘴上的馬克思主義者，實際上的資產階級底走狗了。

當你們去研究考茨基如何巧妙地去『解釋』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小小的字』的時候，你們一定會更相信這一點。聽呵：

『可惜馬克思沒有更詳細地指示出，他如何了解這種專政。』（這完全是叛徒欺人之談，因為馬克思與恩格斯恰恰有過許多最詳細的指示，不過馬克思主義中博學者考茨基有意忽視罷了。）『……按字義來講，專政二字就是毀滅民主的意思。自然，就此二字的底主義來講，又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個人獨裁底意思。獨裁與君主專制的區別，就是前者不是一種經常的國家機關，而是一種極端底過渡方法。

所以『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名詞，自然不是個人專政，而是指一階級專政，從此可以知道馬克思所用的專政這名詞，並不是指該字底本意而言的。

他在這裏所說的並不是管理底形式，而是凡在無產階級奪得了政權的地方，必然要發生的狀態。馬克思在這裏不是以專政為管理底形式，這話從他對於英、美可以用和平的方

法，即民主的方法，來實現過渡的這個見解中，已經可以證明。」（第二十頁）

我們有意把考茨基底這個議論完全引用出來，使讀者能夠明顯地看出「理論家」考茨基所用的方法是什麼。

考茨基想先從專政「二字」底定義來着手研究這問題。

好吧。研究問題得用任何方法，這是每個人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然而我們要把研究問題的誠意的與不誠意的態度，分別出來。誰想用一定方法認真去研究問題，他就必須說出自己對於這「二字」的定義。那時候，問題就會提得清楚而直爽。這一點，考茨基是沒有做的。他說：

「按字義來講，專政二字，就是毀滅民主的意思。」

第一，這不是一個定義。如果考茨基不願意對於專政的概念下一個定義，那末他爲什麼又採取這樣的方法來研究問題呢？

第二，這顯然是不正確的。自由主義者，自然只會講到一般的「民主」。馬克思主義者絕對不能忘記提出「爲那一個階級？」的問題。誰都知道——就是「歷史

家」考茨基也知道——，例如古代奴隸底暴動或有力的騷動，立刻就表現出古代國家之實質：這個國家，是奴隸主底專政。在奴隸主人中，對於他們，這個專政有沒有毀滅了民主呢？誰都知道，是沒有的。

「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說了絕無意識和顛倒是非的話，因為他「忘掉了」階級鬥爭……。

要使考茨基所持的自由主義的說謊的論斷變為馬克思主義的，與合於真理的論斷，那就必須這樣說：專政不一定就是說要毀滅實現此專政以統治其他階級的那個階級底民主，但牠一定要毀滅（或極重要的限制，這也就是毀滅形式之一）因實現專政而受到統治或遭到反對的那個階級底民主。

但是，不論這個論斷怎樣真確，然而牠沒有下一個專政底定義。

現在我們來研究考茨基以下的話：

「……自然，就此二字底本義來講，又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個人獨裁底意思。」

考茨基正如用鼻子偶然嗅東嗅西的盲目小狗一樣，突然碰到了一種真確的思想

（就是說，專政是一種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但他畢竟沒有下一個專政底定義；此外他又說專政就是一個人底權力，這簡直是歷史的謊話。這在文法上也是不正確的，因為無論一小部分人，無論寡頭政治，無論一個階級等等，都可以實行專政的。

此外，考茨基又說到專政與君主專制的區域，雖然他的解說很不正確，但我們也不去研究牠了，因為這同我們所要研究的問題，完全沒有關係。考茨基把他的臉由二十世紀轉向十八世紀，由十八世紀轉向太古時代的這個嗜好，是誰都知道的，我們希望德國的無產階級一達到專政之後，就會估計到考茨基這種底嗜好，使他去充當古代歷史底中學教員吧。以君主專制的推論，來避免無產階級專政底定義，不是極端的蠢動，便是非常拙笨的欺詐。

總之，我們看見決心來談專政的考茨基，講了許多顯然不對的話，而未下任何的定義。不必依靠他的聰敏的才能，他可依賴於他的記憶，從他的「書箱」中找出馬克思關於專政所講的一切話。這樣他便能得到下面一個定義，或本質上同下面的

說法相符的定義：

專政是直接依賴於暴力，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革命的無產階級專政，是用無產階級底暴力來獲得並維持以鎮壓資產階級的政權，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權。

這是一個簡單的真理，對於每個覺悟的工人（是羣衆底代表，而不是被資本家所收買的庸人的混蛋東西——各國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就是這種東西——之上等階層底代表）如像青天白日一樣的明顯的真理，對於爲求自己解決而奮鬥的被剝削者底每個代表異常清楚的真理，對於每個馬克思主義者不成問題的真理，都須從最大的學者考茨基先生處「用戰爭手段奪回來」。這是什麼緣故呢？這是由於效忠於資產階級而成了可鄙的阿諛者的「第二國際」領袖們之奴才精神有以致之的。

考茨基始則玩了一番幻術，居然胡說道，「專政」二字底原意即指個人專政而言，茲後——即根據這種幻術——說馬克思之所謂階級專政不是含有該字底原意的（即專政不是指革命的暴力，而是指「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之下和平的獲得大多

數」)。

他說應當把「狀態」與「管理底形式」加以區別。這種異常深思的區別，正像我們把一個不會推論的人之愚蠢「狀態」與其愚蠢「形式」加以區別一樣！

考茨基需要把專政解爲「統治底狀態」(這是他在原文第二十一頁上一字不差的說話)，因爲這樣革命的暴力就化爲烏有，暴力的革命也化爲烏有了。「統治底狀態」，就是一種狀態，在那種狀態之下，可有……「民主制」下的任何大多數人。用這一套欺詐的幻術，革命就安全無事地化爲烏有了。

但是詐術實在太笨拙了，牠也救不了考茨基。專政是一階級需要對於另一階級加以革命的暴力底「狀態」，這是叛徒們所不高興的「但却是誰都不能隱藏起來的」。「狀態」與「管理形式」的區別的不通之論，是顯而易見的。在這裏講到管理形式，是三倍愚蠢的，因爲雖三尺童子也知道，君主國與共和國是不同的管理形式。我們要指示給考茨基先生看，這兩種管理形式同資本主義之下的其他一切過渡的「管理形式」一樣，不過是資產階級國家——就是說資產階級專政——之各種不

同的形式罷了。

最後，說到管理形式，不但是愚蠢地、並且是粗魯地偽造馬克思底意思，因為馬克思在這裏說得最明顯不過的是國家底形式或種類，而不是管理底形式。

——無產階級革命，如不用暴力破毀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代以新的機器，是不可能的，而此種新的機器，據恩格斯的話來說：「已非此字原意上的國家了。」

一切這些，考茨基都必須加以掩飾與說謊，因為這是他的叛徒的立場所使然的。

試看他用些什麼可憐的遁詢。

遁詢一：

「至於馬克思這裏不是指管理底形式，這從他認為英、美可有和平的變革^①，就是說用民主的方法的變革這一點可以證明……。」

這裏絕對談不到什麼管理底形式，因為有些君主國並非資產階級國家之標本的東西，例如牠們沒有常備軍，但也有些共和國，是資產階級國家之標本東西，例

如，牠們具有常備軍與官僚制。這是大家所知道的歷史的與政治的事實，考茨基是無法作假的。

若是考茨基肯認真地誠意地討論問題，他就會問一問自己：有沒有關於革命而無例外的歷史定律呢？那時的回答便是：不，這樣的定律是沒有的。這樣的定律祇是指標本式的現象而言，如像馬克思有一次所說的「理想的」資本主義，即是指中庸的、平常的、標本式的資本主義而言一樣。

其次，在前世紀七十年代，在我們現在所說的這一點上，有使英、美成爲例外的原因否？凡稍爲認識歷史問題方面的科學底要求的人，都顯然知道這個問題是必然要提出的。不提出這個問題，就是假造科學，就是玩弄詭辯說。但一提出這個問題，便不能懷疑下而這個回答：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即是反對資產階級的暴力；這個暴力之所以必要，特別是因爲常備軍與官僚制存在的緣故，關於這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曾屢次極詳細地說明過了（尤其是在法國內戰及其序言上）。但是，當馬克思講這話的時候，正在英美，正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些機關恰恰是沒有存

在的（而現在這些機關在英、美也存在着）。

考茨基爲要遮掩他的叛變行爲，所以一舉一動都要騙人！

但請看他在那裏如何突然暴露了他的破綻。他說：「和平地」，就是說，用民主的方法！

在下專政底定義時，考茨基曾用全力想隱藏專政這個概念底根本記號，即革命的暴力，使讀者看不到。現在真相暴露了；問題原來是在於和平變革與暴力變革二者之對立。

問題底中心，就在這裏。考茨基所以需要一切的近詞、強辯、假造，爲的是要丟開暴力革命，掩蓋他的逃避這種革命，掩蓋他過渡到自由主義工人政策方面去，就是說過渡到資產階級方面去。問題底中心，就在這裏。

『歷史家』考茨基這樣無恥地假造歷史，以致忘掉基本的東西：在壟斷前期的資本主義（十九世紀七十年代，正是這種資本主義底極盛時期），由於他的經濟的根本屬性，在英國與美國，特別標本式地表現出來的屬性，所以牠顯然是比較最愛

好和平與最愛好自由的。但是帝國主義，就是說，在二十世紀才完全成熟的壟斷資本主義，也由於牠的經濟的根本屬性，所以牠最不愛好和平與最愛好自由，而最尚武力，並且到處都發展牠。在判斷和平的變革或暴力的變革，究竟有怎樣標本的或可靠的程度時，『不注意』這一點，那就無異是墮落為資產階級底下流無恥的奴僕。

通詞二：『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牠是由全民投票，而沒有剝奪資產階級底選舉權，即用『民主的』方法選舉出來的。於是考茨基就大書特書地說：

『……在馬克思看來』（或者根據馬克思底意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種狀態，

這個狀態是從純粹的民主制中必然產生出來的，如若無產階級佔大多數的話。』（Der Arbeiterwiegendem Proletariat 第111頁）

考茨基這種論據，如此可笑，的確使人真正感覺到 *embarras des richesses*（駁不勝駁的困難）。第一，大家都知道，資產階級底俊秀份子、大本營、上層份子，都從巴黎逃亡到凡爾賽去了。在凡爾賽還有『社會主義者』魯易勃郎，這又表

示出，考茨基所說的似乎在「巴黎公社」中參加了社會主義底『一切派別』的話，完全是造謠。試想在巴黎的居民中，分成兩個戰鬥的營壘，其中的一方面集中了一切奮鬥的與政治上積極的資產階級，還說這是『全民投票』的『純粹的民主』，豈不可笑？

第二，「巴黎公社」同凡爾賽作了鬥爭，這鬥爭是法國底工人政府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的鬥爭。請問當巴黎決定了法蘭西底運命時，這裏有什麼『純粹的民主』與『全民投票』可言呢？當馬克思認為「巴黎公社」沒有奪取屬於全法蘭西的銀行，這是「公社」底錯誤時，馬克思是以『純粹的民主』之原則與實際為出發點嗎？

幸而考茨基著書立說的地方，是警察禁止人們『成羣結隊地』發笑的國家，不然考茨基真會被人笑死。

第三，我想不揣冒昧地來使熟讀馬克思與恩格斯著作的考茨基先生回想到恩格斯從『純粹的民主』……的觀念對於「巴黎公社」所作的下列估計：

『這些先生們』（反威權主義者●●）『曾經見過了一次革命沒有？毫無疑義的，革

命是最有威權的東西。革命是一部分人民用刀槍大炮，即用非常有威權的工具，去強迫別一部分人民來履行他們自己的意志的一種行動。而勝利的政黨必然不得不用武裝威嚇反動派的那種恐怖手段，以維持其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靠着人民武裝的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牠能維持到一日以上的時間嗎？反轉來說，我們因為「巴黎公社」太少使用這種威權而責備牠，豈不很對嗎？」

請你們看『純粹的民主』吧！恩格斯如何嘲笑這位在階級社會中一般的講『純粹的民主』的卑鄙的小資產者、『社會民主派』（就四十年代這在法國的意義）●●，與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這字在全歐洲的意義而言）呵！

夠了，列舉考茨基所說的一切無稽之談，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在他的每一字句中間都充滿了叛變行為之無限的深淵。

馬克思與恩格斯十分詳盡地分析了「巴黎公社」，指出了牠的功績，就是毀壞和打碎『現成的國家機器』的嘗試。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這個結論如此重要，至他們在一八七二年，只有拿這個更正●●去補充共產黨宣言之『陳舊的』（有些部份）

綱領。馬克思與恩格斯指出「巴黎公社」曾實行消滅軍隊與官僚制，實行消滅代議制，實行破壞「寄生的贅瘤——國家」等等，而聰明的考茨基，藏了寢帽，重復自由主義的大學教授們所說過千百遍的話——關於「純粹的民主」的童話。

盧森堡於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說過，「德國社會民主黨」現在是一個死屍，真對！

遁詞三：

「如若我們說專政是管理底形式，那我們就不能說階級專政。因為我們已經說過了，階級只能統治，而不能管理……」。能管理的，祇有「組織」或「政黨」。

「糊塗顧問」先生，你弄錯了，你真錯得太厲害了！說專政是「管理底形式」便簡直是胡說。馬克思所說的，不是管理底形式，而是國家底形式或種類。這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馬嘴不對牛頭。說階級不能管理，這也是完全不對的；這種胡說，祇有那除了資產階級國會什麼也看不到、除了「統治的政黨」什麼也不注意到的「犯國會症的癡人」，才會說出來。歐洲任何一國，都可把統治階級之管理國家

的例子（如像中世紀的地主們之管理一樣，雖是他們沒有充分的組織性，指示給考茨基看。

結論：考茨基簡直最空前地曲解了無產階級專政底概念，把馬克思變成了庸俗的自由主義者，這就是說，考茨基自己已經墮落到了自由主義者的地步，而空談什麼「純粹的民主」的無恥的話，掩飾並抹煞資產階級民主之階級內容，最遠地離開被壓迫階級方面的革命的暴力了。當考茨基這樣「解釋」「無產階級革命的專政」底概念，把被壓迫階級加於壓迫階級的革命的暴力化爲烏有時，他在拿自由主義者的態度來曲解馬克思的事業上，取得了全世界第一位。叛徒培恩斯坦同叛徒考茨基比較起來，簡直是一隻小狗了。

資產階級的與無產階級的民主

被考茨基所攪得亂七八糟的問題，實際上是這樣的。

如若不嘲弄常識和歷史，那就很明顯，在各階級存在的時候，決不能談到「純

粹的民主』，祇能說階級的民主。（附帶地說一說『純粹的民主』不但是表示出不懂階級爭鬥和不懂國家底本質的不通之論，而且是一再而三的空談，因為在共產主義社會中民主將變為習慣，而歸於衰亡，但永遠不會有『純粹的』民主。）

『純粹的民主』，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義者底謊話。歷史上有代替封建制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與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制。

如果考茨基盈篇累牘地『證明』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較之中世紀的制度是進步的，又說無產階級在反對資產階級的爭鬥中必須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那末這正好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義的空談。這不但在文明的德國，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國，也是不易之理。考茨基像煞有介事地說起衛德靈格，說起巴拉圭的耶穌派，並說到很多別的東西，這無異在工人們面前玩弄手術，以便不談到現在的，即資本主義的民主之資產階級的實質。

考茨基在馬克思主義中間，僅取其對於自由主義者，對於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東西（對中世紀制度的批評，資本主義一般的和特別是資本主義的民主制之進步的

歷史作用），而拋棄、蒙蔽、抹煞馬克思主義中對於資產階級不能接受的東西（爲了消滅資產階級而反對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底革命的暴力）。所以，不論考茨基主觀的信仰怎樣，他的客觀的地位，必然使他變成爲資產階級底走狗。

較之中世紀制度有偉大的歷史的進步作用之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永遠是、而且在資本主義之下不能不是，狹窄的、殘缺的、虛偽的、假仁假義的、對於富者爲天堂，對於貧者、對於被剝削者爲陷穽，爲欺騙的那種民主制。正是這個真理，爲馬克思主義學說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的真理，是『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所不了解的。正是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考茨基不用科學的批判去指點出那些使一切資產階級的民主變爲富者底民主的條件，反而一味獻媚於資產階級。

我們起初要使學問淵博的考茨基先生記起那些爲他所可恥地『忘却的』（爲了資產階級底便利而忘却的）馬克思與恩格斯理論上的主張，然後再來加以最通俗的說明。

不但古代的和封建時代的，而且：

『現代的代表制的國家，是資本剝削僱傭勞動的工具。』（見恩格斯論國家的著作）

『因為國家不過是一種過渡的機關，在爭鬥中，在革命中，必須利用這個機關，以使用暴力來壓倒自己的敵人，所以說什麼自由的人民的國家，完全是無意識之談；在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牠需要國家並不是爲了自由，而是爲了要壓倒自己的敵人，等到能夠說自由的時候，那時國家之爲國家已將不復存在了』（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恩格斯給培培爾的信）。『國家不是別的，是一階級壓倒另一階級的機器，這種壓迫，在民主共和國中並不比君主國少』（恩格斯爲馬克思底法國內戰而作的序言）。『普選制爲無產階級成熟底指標。牠在現代國家中不能再給更多的東西，也永不會再多給什麼東西』（見恩格斯論國家的著作）。

這個論點底第一段，爲資產階級所能接受的，考茨基先生非常乾燥無味地加以咀嚼。至於我們加上着重點，爲資產階級所不能接受的第二段，叛徒考茨基就默不作聲了！

「公社不是國會的，而是立法和行政同時兼任的一種工作團體……。普選制不是爲着在三年或與六年之內決定統治階級中那個人應當在國會中去代表和鎮壓民衆（*verdrängen*）而是曾用來爲組織於「公社」中的民衆服務，用來爲「公社」的企業選擇必需的工人，管理員，簿記員，正像僱主利用他個人的選舉權來達到這目的一樣」（見馬克思底法國內戰）。

這些爲學問淵博的考茨基先生所深知的論點中的每一點，都會打他的臉，暴露出他的叛變行爲。在考茨基底全部小冊子中對於這些真理，絲毫的了解也沒有。他的小冊子底全部內容，簡直是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誣蔑！

試看現代國家底基本法律，試看對這些國家的管理，試看集會自由或出版自由，試看「公民在法律前一律平等」——那你就會知道到處都爲一切誠實的與覺悟的工人所熟知的資產階級民主之虛偽性。世界上無論那一個國家，就是最民主的國家也好，在牠的憲法上總有漏洞或句解，以保證資產階級「在破壞秩序時」——實際上就是在被壓迫階級「破壞」自己的奴隸狀態和企圖不像奴隸那樣去行動時，

有調動軍隊來鎮壓工人與施行軍事戒嚴等等的可能。考茨基無恥地粉飾資產階級的民主，而對於如像美國或瑞士最民主的與最帶有共和派色彩的資產者之反對罷工工人的行動，則默而不言。

唔，聰明的與有學問的考茨基，關於這一點，則保持沉默！他不了解，有學問的政治行動家，關於這一點沉默不言，就是表示他的卑鄙。他寧願將童話，如像說民主就是『保護少數』這類東西講給工人們聽。這當然很奇怪，但這是事實。在耶穌降生後第一九一八年秋天，在世界帝國主義大屠殺第五年，在一切『民主世界』中虐殺國際主義者少數。（就是那些不像倫諾德和郎格輩，不像謝德曼與考茨基輩，不像亨德孫與韋伯等輩那樣無恥叛變社會主義的人們）的第五年，有學問的考茨基先生却拿甜蜜的，甜蜜的聲音歌唱着『保護少數』。誰願意知道這一點，就回去讀考茨基底小冊子第十五頁。在同書第十六頁，這位有學問的先生又把美國十八世紀的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故事說給你聽！

唔，學識淵博！唔，資產階級底高尙的奴僕！唔，匍匐於資本家跟前，舐他們

的靴子的文明樣子！如若我是克魯伯，或是謝德曼，或是克里孟梭，或是倫諾德，那我就要用百萬黃金來報酬考茨基，用郁大*底接吻來賞賜他，在工人前面稱贊他，介紹與考茨基一樣『尊貴的』人們，保持『社會主義底統一』。著書立說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談英國十八世紀的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故事，宣傳民主就是『保護少數』，而對於在『民主』共和國的美國之摧殘國際主義者，則默而不言，難道這不是資產階級底走狗嗎？

學識淵博的考茨基先生『忘記了』（大概是偶然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即：資產階級民主派底統治的政黨，只把『保護少數』給別的資產階級的政黨，至於在一切嚴重的、深刻的、根本的問題中，無產階級所得到的，不是『保護少數』而是軍事的戒嚴或摧殘。民主制愈是發達，則在任何危及於資產階級的深刻的政治分歧之下，摧殘與內戰愈是接近。資產階級民主底這個『規律』，學識淵博的考茨基先生在法蘭西共和國的法萊夫斯事件中，在民主共和國美利堅對於黑人與國際主

郁大是猶太人的姓氏，喻即叛徒之意。（校者）

義者所施行的刑法中，在民主的英吉利對於愛爾蘭與烏爾斯脫的實例中，一九一七年四月在俄羅斯民主共和國對布爾塞維克的壓迫與摧殘中，都可以看到。我故意的不但舉出戰時的例子，而且舉出戰前平時的例子。甜蜜的考茨基先生，對於二十世紀的這些事實，閉眼不看，但同時他却告訴工人們以非常新鮮的，非常有趣的，非常特別的，最可注意的，異常重要的關於十八世紀英國自由黨與保守黨的故

事。

拿資產階級的國會來說吧。能不能說學識淵博的考茨基從來不曾聽到過民主制愈是發展，則交易所與銀行家愈能使資產階級的國會服從自己嗎？從這裏不能得出結論，說我們不應該利用資產階級的代議制（布爾塞維克之利用代議制比世界上任何政黨更有成效，因為在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四年內，我們在第四國會中獲得了全部工人的選民）。但從這裏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祇有自由派如像考茨基一樣，才會忘却資產階級代議制之歷史的限制性與有條件性。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內，被壓迫羣衆，到處可以碰到在資本家底『民主』所高唱的形式上的平等，與使無

產者變爲僱傭奴隸的成千成萬的事實上的限制和排斥這兩者間的刺目的矛盾。正是這種矛盾使羣衆看到了資本主義底腐敗、欺騙、與虛偽。正是這種矛盾，被社會主義底宣傳家與鼓動家在羣衆面前不斷的揭穿，爲的要準備這些羣衆去革命！然而當革命底新紀元已經開始時，考茨基就轉過身來將背對着革命，而且開始讚美垂死的資產階級民主制之妙處。

無產階級的民主（牠的形式之一卽爲蘇維埃政權），使恰恰爲絕對大多數民衆、爲被剝削者與勞動者的民主，能得到世界上向來所沒有見過的發展與擴張。如像考茨基那樣，寫了整本關於民主的書（其中有兩頁說到專政，有數十頁說到『純粹的民主』），而竟沒有注意到這一點，這就是等於用自由主義的方法，把問題完全曲解了。

拿對外政策來說吧。無論那一個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國家內，對外政策都是不公開的。到處是欺騙羣衆，在民主的法國，瑞士，美國，英國，這個欺騙比別的国家還要百倍的擴大，百倍的巧妙。蘇維埃政權用革命的方法撕裂了對外政策中之

秘密黑幕。考茨基對於這一點沒有注意到，他對於這一點默而不言，雖在掠奪的戰爭與『瓜分勢力範圍』（即強盜資本家之瓜分世界）的秘密訂約之時代，這有絕大的意義，因為和平問題，幾千百萬人底生死問題，都是以此為轉移的。

拿國家底組織來看吧。考茨基抓住了一些『小事情』直至『非直接的』選舉（在蘇維埃憲法內），而問題的本質，他却沒有看到。國家機關——國家機器之階級的本體，他是沒有注意到的。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之下，資本家用幾千百種詭計（『純粹的』民主愈是發達，則這種詭計愈是巧妙，愈是有效力），來排除羣衆，使其不得參加管理，不得享受集會自由與出版自由等等。蘇維埃政權是世界上第一個（嚴格說來是第二個，因為「巴黎公社」已開始這樣做）吸引羣衆，即被剝削的羣衆，來參加管理。勞苦羣衆之參加資產階級的國會（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之下，國會從來沒有解決最嚴重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是交易所銀行）為幾千百種牆垣所阻隔着，所以工人們都顯然知道而且感覺到，都看到而且接觸到，資產階級的國會，是別人的機關，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是敵人階級、剝削者的少數

人底機關。

蘇維埃是勞苦羣衆與被剝削羣衆自己的直接的組織，牠使他們容易有盡量地自己建立國家，自己管理國家的可能。恰恰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底先鋒隊——城市無產階級，在這種情形之下得有一種優勢，就是牠被各大企業極好地聯合起來了：牠最容易舉行選舉與注意選舉。蘇維埃組織，自然而然地，使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容易聯合在牠們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週圍。舊的資產階級的機關——官僚制度富人特權、資產階級教育、交通等等底特權（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愈是發達，這些事實上的特權，其花樣也愈多）——所有這些，在蘇維埃組織下都消滅了。出版自由不再是虛偽的了，因為印刷所與紙張都從資產階級那裏拿來了。對於最好的建築、宮室、別墅、地主的住宅，也是如此。蘇維埃政權把成千成萬這類最好的房屋一下子從資產階級那裏拿來了，這樣使羣衆底集會自由權，增加了千萬倍的『民主化』，因為沒有這個自由，則民主不過是欺人之談。對於非地方的蘇維埃之非直接的選舉，使蘇維埃代表大會更爲便利，使在生活沸騰，而需要有很快地召回自己的

地方代表和派遣代表到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上去的可能的時期，全部機關對於工農更加便宜，更加活動，更加接近於他們。

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比任何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要更其民主到一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要更加民主到一百萬倍。

不看到這一點的，不是資產階級底自覺的奴僕，便是政治生命已經完全死亡的、受了骯髒的資產階級的書籍所蒙蔽而看不到活潑生活的、充滿了資產階級民主的成見的、和藉此便在客觀上把自己變成了資產階級走狗的那種人。

不注意到這一點的，祇有那些不能從被壓迫階級底觀點去提出問題的人。

試問在全世界上，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國家中，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國家，其中等的、廣大的工人，中等的、廣大的僱農，或鄉村的一般半無產者（即被壓迫羣衆底代表、民衆最大多數底代表）如像在蘇維埃俄羅斯一樣，享有在最優良的大廈內開會的這種自由，享有最大的印刷所與最好的紙張底貯藏所，以表示他們的思想，擁護他們的利益的這種自由，享有提出恰恰本階級的人去管理國家，去「建

設「國家的這種自由？」

考茨基先生要在任何一國內略知世界大事的工人與僱農中找到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發生懷疑的，恐怕千分之一也得不到吧，而且這種設想，簡直是可笑。當全世界工人們從資產階級的報紙中聽到了一些承認真理的消息，他們在本能上就同情於蘇維埃共和國，因為他們認定牠是無產階級的民主制，爲着貧人的民主制，而不是爲着富人的民主制（任何的甚至最好的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實際上就是爲着富人的民主制）。

管理我們的（并且「組織」我們的國家的），是資產階級的官吏，資產階級的議員，資產階級的法官。這是簡單的、明顯的、無庸爭辯的真理，這是在一切資產階級國家（最民主的國家也在內）裏面被壓迫階級中無數百萬的人們，從自己生活的經驗中所知道的，每日所感覺到和接觸到的真理。

而在俄國，官僚的機關已經完全打破，絲毫不剩了，把一切舊的法官也完全趕走了，資產階級的國會也驅逐了，而建立了恰恰爲工人與農民所更加容易接近的代

表機關，他們的蘇維埃代替了官吏，或他們的蘇維埃駕馭了官吏，他們的蘇維埃變成了法官選舉者。就是這一件事實已足以使一切被壓迫階級承認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比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還要民主到千百萬倍。

考茨基簡直不了解一切工人所都了解而明白的真理，因為他『忘記了』提出這個問題：爲着哪一個階級的民主？他從『純粹的』（即是，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民主底觀點去推論。他的論據正像沙士比亞戲劇中的希洛克：『一磅肉』，其他什麼也不管。一切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沒有民主。

我們必須對學者考茨基、『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考茨基，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之間，是否能有平等呢？

在討論「第二國際」思想上的領袖底著作時，要提出這樣的問題來，這是非常離奇的，這是不可思議的。但是『一不做二不休』。既然要論到考茨基——就必須對這位學者說明，爲什麼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被剝削者與剝削者之間是否能有平等

考茨基這樣推論道：

(一)『剝削者常常在民衆中祇佔最少數。』(考茨基底小冊子第十四頁)

這是無庸爭辯的真理。拿這真理爲出發點，應該怎樣推論呢？可以依照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觀點來推論，那時就應該拿被剝削者和剝削者的關係爲基礎。也可以依照自由主義，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觀點來推論，那時，就應該拿多數人對少數人的關係爲基礎。

如若依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說：剝削者必然要把國家（我們所說的是民主制，即國家底形式之一）變成他本階級統治底工具，剝削者對於被剝削者的統治的工具。所以在統治着大多數被剝削者的剝削者還存在的時候，民主國家必然要變爲剝削者底民主制。被剝削者的國家，應當同這種國家根本不相同的，牠應該是被剝削者底民主制，是對於剝削者的鎮壓，而這個階級之受到鎮壓，就是

表示這個階級沒有平等，就是把牠逐出於「民主」之外。

如若依照自由主義的觀點來推論，那就應該說：多數決定，少數服從。不服從者受處罰。再沒有別的。什麼一般國家底階級性，部份地「純粹的民主」底階級性，都用不到去推論；這同問題沒有什麼關係，因為多數是多數，少數是少數。一磅肉就是一磅肉，再沒有別的。

考茨基恰恰是這樣推論的：

(三) 『爲什麼無產階級底統治要採取而且必然要採取同民主不能並存的形式呢？』
(三一頁)

接着就是詳細地、冗長地、引證了馬克思底話以及「巴黎公社」底選舉票數，來說明無產階級方面有大多數。結論：

『這樣強固地根基於民衆的制度，毫沒有理由去損害民主。當人家用暴力來壓倒民主的時候，牠有時不能不用暴力。對於暴力的回答，也祇有暴力。但知道自己後面有民衆的制度，其應用武力，祇是爲了保護民主，而不是爲了消滅民主。如若牠想消滅自己的最可

靠的基礎——有力的道德權威之深刻的泉源，普選制，那牠簡直是自殺吧。」（二二頁）

你們看：被剝削者與剝削者的關係，在考茨基的論據中已經化爲烏有了。剩下來，祇有一般的多數，一般的少數，一般的民主，我們所熟知的『純粹的民主』。你們要知道，這些話是指巴黎公社而說的呢！爲明瞭起見，我們就引用馬克思與恩格斯因「巴黎公社」而說的關於專政的話：

馬克思說：

「……如若工人們建立起自己的革命的專政以代替資產階級專政……毀滅資產階級底抵抗……那工人們就把國家當作革命的與過渡的形式……。」

恩格斯說：（在革命中）

「……勝利的政黨必然要用武裝威嚇反動派的那種恐怖手段，以維持其統治。要是「巴黎公社」不靠着人民武裝的威權來反對資產階級，牠能維持到一日以上的時間嗎？反轉來說，我們因爲「巴黎公社」太少使用這種威權而資備牠，豈不很對嗎？——」

恩格斯說：

『因爲國家不過是過渡的機關，在爭鬥中，在革命中必須利用這個機關，以使用暴力來壓倒自己的敵人，所以說什麼自由的人民的國家，完全是無意識之談；在無產階級還需要國家的時候，那牠需要國家並不是爲了自由，而是爲了要壓倒他的敵人，等到能夠說自由的時候，那時國家之爲國家，已將不復存在了……。』

考茨基同馬克思與恩格斯有天淵之別，如自由主義者同無產階級革命者的差別一樣。考茨基所說的純粹的民主與單純的『民主』，不過是『自由人民的國家』的別名，就是純粹的無意識之談。考茨基帶着最大的學者底埋頭窗案的傻子態度，或十歲女孩子底幼稚的樣子，問道：如若已經有了大多數，那還要專政幹什麼？但馬

克思與恩格斯解釋道：

——爲的要打破資產階級底抵抗。

——爲的要威嚇反動者。

——爲的要維持武裝民衆底威權以反對資產階級。

——爲的要使無產階級能夠利用暴力去鎮壓牠的敵人。

這些解釋是考茨基所不了解的。眩惑於民主之『純潔』，看不到民主之資產階級性的考茨基，『澈底地』主張，以為多數既然是多數，就用不到『打破』少數底『抵抗』，用不到『暴力鎮壓』少數——只要在牠破壞民主的時候，去鎮壓就得了。眩惑於民主之『純潔』的考茨基，突然犯了一切資產階級的民主派所常常犯的小錯誤：即他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資本主義之下，這是最虛偽的平等）看做是事實上的平等——小事情呵！

剝削者是不能同被剝削者平等的。

這個真理，雖對於考茨基是很不願意聽的，然而牠是社會主義底最重要的內容。

另一個真理：在沒有完全消滅一階級剝削另一階級的一切可能時，真正的，實際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在首都的暴動成功或是軍隊叛變時，可以一下就把剝削者打倒。然而除了完全稀有的與特別的情形之外，剝削者是不能一下就消滅的。要一下剝奪大國家底一切

地主與一切資本家是不可能的。而且祇是法律上或政治上的剝奪，還沒有解決問題，因為需要事實上來掃除地主與資本家，事實上用另一種的、工人的管理工廠與田莊，來代替地主與資本家。在子孫代代享有教育、富裕生活與習慣的剝削者，與大半即在最先進的和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也是被蒙蔽的、黑暗的、無知的、嚇怕的、分散的被剝削者中間，是不能有平等的。剝削者在政變之後很長久的時期內，必然還保持有許多很大的事實上的優勢：他們手裏還有錢（立刻消滅錢是不可能的），還有一些，往往還有很多的動產，組織與管理底聯繫、習慣、管理底一切『秘密』（習慣、方法、工具、可能）之熟悉，還有較高的教育，以及對於高等技術人材（依照資產階級而生活的而思想的），還有對於軍事上非常大的熟練（這非常重要）諸如此類等等。

如果剝削者僅僅在一個國家內被打倒了（這當然是標本式的現象，因為在許多國家內同時產生革命是罕見的情形），那末，他們還是強於被剝削者的，因為剝削者底國際的聯繫非常之大。至於一部份被剝削者或一部份最沒有知識的中農、手工

業者等羣衆能跟剝削者走——這在過去的一切革命（「巴黎公社」也在內，因為在最有學問的考茨基所『忘却』了的，凡爾賽軍隊中也曾有過無產者）已經指明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以為在一切深入的和嚴重的革命中，單是拿多數同少數的關係就可解決問題，這簡直是絕大的愚蠢，是庸俗的自由主義者底最笨的成見，是欺騙羣衆，使羣衆看不到明顯的歷史真理。這個歷史的真理是說，一切深入的革命中的定規，是剝削者長久的、堅持的、拚命的抵抗，因為他們比起被剝削者來，在多年當中還保持着很大的事實上的優勢。剝削者在沒有利用他們的優勢做最後的，拚命的一次戰鬥或多次戰鬥以前，是決不會（不像甜蜜的傻子考茨基之甜蜜的幻想一樣）服從被剝削者多數底決議的。

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是一整個的歷史時代。在這時代沒有終結以前，剝削者必然還保存有復辟的希望，而這種希望就會變成復辟的企圖。在第一次嚴重的失敗之後，被推倒的剝削者——沒有料到自己會被推倒的、不相信這個推倒的、想也不想到這個推倒而畢竟被推倒的剝削者，必然要用十二分的力量，瘋狂般

的熱烈，增高百倍的仇恨，爲恢復被奪去的『天堂』，爲他們從前生活得那樣好而現在被那些『平民混蛋』弄到破產與貧困（或做『簡單』勞動……）的家屬，而作死戰。並且在剝削者資本家的後面，又有小資產階級底廣大羣衆，關於後者世界各國幾十年的歷史經驗，已經證明出，他們是動搖不定的，他們今天跟了無產階級走，明天就會因政變的困難而恐懼，因工人第一次失敗，或半失敗而慌張、發瘋、悲傷、東奔西撞、從這一營壘跑到那一營壘……如像俄國的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一樣。

在這種情形之下，在決死的嚴厲的戰爭時代，當歷史提出數百年數千年特權之生存死亡問題的時候，說什麼多數與少數，什麼純粹的民主，什麼專政之不需要，什麼剝削者與被剝削者間的平等！非天下之大愚，天下之大庸人，安足以至此！

但是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一四年，比較『和平的』資本主義這幾十年，在傾向於機會主義的社會主義政黨內，推積了庸俗氣慨，狹隘胸襟，叛變行爲……之腥穢。

讀者大概注意到了，考茨基在上面摘引的他的書中的一段話裏面，說到侵害普選制的話（在這裏，我們附帶說一下：考茨基稱普選制是有力的道德威權之深刻的泉源，而恩格斯在論同一「巴黎公社」和論同一專政問題的時候，却說的是武裝民衆用以反對資產階級的威權，庸人與革命者對於『威權』……的見解的不同，於此可見一斑）。

我們應該注意到，褫奪剝削者底選舉權問題，是純粹俄國的問題，而不是一般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如果考茨基不戴假面具，而把他的小冊子標題爲：反布爾塞維克，那時這個名稱，就會符合小冊子底內容了，那時考茨基就有權直接說到選舉權了。但考茨基首先想拿『理論家』的資格來做文章。他題稱他的小冊子爲：一般的無產階級專政。他祇在他的小冊的第二部，從第五節開始，才特別說到蘇維埃與俄羅斯。在該書第一部中（即我引證他的話的一部）却說的是一般的民主與專政。考茨基既然講到普選制，他就把自己暴露出爲反布爾塞維克的論戰者，絲毫理論的氣味都沒有了。因爲理論，就是說關於民主與專政之一般的（而不是某個特殊國家

的)階級基礎的議論，應該講的不是如像選舉制那樣的特殊問題，而是一般的問題：在推倒剝削者，以及拿被剝削者底國家來代替剝削者的國家的歷史時期，保持那爲着富者與剝削者的民主制是否可能？

理論家這樣，而且祇能這樣提出問題。

我們知道「巴黎公社」底實例，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創造者底關於牠的一切議論。根據這種材料，我已經在我的國家與革命那本小冊子上。(十月革命前作的)分析了民主與專政的問題。關於選舉底限制，我一句話也沒有說過。現在應該說，選舉權底限制問題是專政底某一特殊國家的問題，而不是一般的問題。講到選舉權底限制問題，就應該研究俄國革命底特別條件，牠的發展底特別道路。這一點在以後的敘述中是要做到的。但如若預先担保，說歐洲將來的無產階級革命(全部或大部分)必定要限制資產階級底選舉權，那就不免錯誤了。這也許要這樣。在大戰之後，有了俄國革命的經驗之後，這大概是要這樣的，但這不是爲實現專政所必需

的，這不是專政底邏輯概念之必要的記號，這不是專政底歷史的與階級的概念之必要的條件。

專政之必要的記號，必需的條件，就是用暴力壓倒剝削者這個階級，因此，也就是破壞『純粹的民主』，就是說，破壞對於這個階級的平等與自由。

理論上可以這樣而且祇能這樣提出問題。考茨基沒有這樣提出問題，這就證明出，他不是以理論家的資格，而是以機會主義者與資產階級底阿諛者的資格，來反對布爾塞維克。

在那些國家，在某種資本主義底那些民族的特點上，將應用（完全地或大半地）某種對於剝削者的民主的限制與破壞，這是某種資本主義、某種革命之民族的特點的問題。在理論上，問題不是這樣，而是：無產階級專政，不破壞對於剝削者階級的民主制，是否可能？

考茨基恰恰把這一個在理論上唯一重要的問題丟開了。考茨基除了關於本問題的話以及我在上面引用的話之外，他把馬克思與恩格斯一切的話都引用到了。

考茨基講盡一切，講盡一切爲自由主義者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所可採納的話，不出於他們的思想範圍之外的話，除了主要的，除了這樣的話：不打破資產階級底反抗，不用暴力壓倒自己的敵人，無產階級就不能勝利，凡有『暴力的鎮壓』的地方，就沒有『自由』，當然就沒有民主。

這是考茨基所不了解的。

*

現在我們來講俄國革命底經驗，以及蘇維埃與立憲會議之間的那種分歧，這種分歧的結果是解散立憲會議與褫奪資產階級底選舉權。

蘇維埃不能變爲國家的組織嗎

蘇維埃，這就是俄國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如若著述無產階級專政的著作的馬克思主義者理論家，真正研究這種現象（不像考茨基那樣重複小資產階級的悲號，反對專政，附和孟塞維克的曲調），那末這樣的理論家就要先下專政底一般的定義，

然後再來研究牠的特別的民族的形式，——蘇維埃，把蘇維埃當作無產階級專政底形式之一來批評。

當然，在考茨基用自由派的見解來『改造』馬克思底專政學說之後，對於他再不能有什麼好的希望。但我們要考察一下，考茨基如何來研究什麼是蘇維埃這個問題，他如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是十分有趣的事情。

他回憶到一九〇五年蘇維埃的產生^①。時寫道：蘇維埃造成了這樣一種：

『無產階級的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是一切組織中最廣泛包容的（umfassendste），因為牠把一切僱傭工人都包括起來了。』（三十一頁）

在一九〇五年，蘇維埃不過是地方的團體，到一九一七年，牠們變成了全俄的聯合。

考茨基繼續說：

『現在，蘇維埃的組織，已經有偉大的和光榮的歷史。牠的未來的歷史一定更要偉大，而且不祇限於俄國。到處可以看到，要反抗在經濟上與政治上擁有雄厚勢力的財政資

本，無產階級之經濟的政治的爭鬥底舊方法，是不夠的』（原文爲 *Verabsagen*；這個德文字比『不夠』二字的意思稍強，而比『無力』二字的意思稍弱）。『這些舊方法是不能拒絕的，在平常的時候，牠們還是必要的。但是有時在牠們的前面發生了那些爲牠們所不能執行的任務，這些任務祇有在工人階級集中一切政治的與經濟的力量工具的時候，才能完成。』（三二頁）

接着他說到羣衆的罷工，談到『工會底官僚』也同工會有同樣的必要，

但『牠不宜於領導那些日益成爲時代特徵的強有力的羣衆的戰鬥……』

考茨基得出結論說：

『……這樣說來，蘇維埃的組織，是近代最重要的現象之一。在我們所將要碰到的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最後決鬥的時候，蘇維埃將有絕大的意義。』

『但是對於蘇維埃我們可否再要求更多的東西呢？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據俄歷卽爲十月革命）後，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共同在俄國工人代表蘇維埃中間佔到多數的布爾塞維克，在解散了立憲會議之後，要將向來爲一階級底爭鬥組織的蘇維埃，變成國家的組

織。他們毀滅了俄國民衆在三月革命（據俄國歷即二月革命）中所獲得的民主。因爲這個緣故，布爾塞維克也不再稱自己爲社會民主黨人，而自稱爲共產黨人了。（三三三頁，考茨基加的着重點）。

知道俄國孟塞維克的著作的人，立刻就會看到考茨基如何奴隸般的抄襲了馬爾託夫，阿雪洛德與斯坦的言論呵。所以說他『奴隸般』的，因爲考茨基簡直可笑地曲解事實去適應孟塞維克的成見。考茨基簡直未想到去問一問他的通訊員，如柏林的斯坦，斯託阿爾姆的阿雪洛德，關於布爾塞維克改名爲共產黨人以及關於國家組織的蘇維埃底意義問題，究竟是在什麼時候提出的。如若考茨基得到了這種簡單的考據，那他就不會寫這段令人可笑的話，因爲這兩個問題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即遠在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前，已爲布爾塞維克所提出，例如在我的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四日）的提綱中，已說到這些問題（至於在一九一八年一月十八日（五日）解散立憲會議，那更不必說了）。

* 見本版列寧選集第十卷。（校者）

但我所完全引出的考茨基底議論，就是關於蘇維埃的全部問題底關鍵。關鍵就在：蘇維埃應否企圖變為國家的組織（布爾塞維克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已提出「一切政權歸蘇維埃」的口號），同年同月在布爾塞維克底代表會議上，布爾塞維克聲稱：「他們不以資產階級的共和國為滿足，他們要求「巴黎公社」式的，或蘇維埃式的（工農共和國）——或是蘇維埃不應該有這種企圖，不應該將政權奪取在自己手裏，不應該變為國家的組織，而應該保留為「階級」底「爭鬥的組織」（如像馬爾託夫所說的，他說這話的目的，想用清潔的願望來好好地遮蓋一個事實，就是在孟塞維克領導之下時，蘇維埃曾為資產階級支配工人的工具）。

考茨基奴隸般的重複了馬爾託夫的話，截取了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理論上的

* 參看本版列寧選集第十卷內的論文：論目前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論兩個政權，在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校者）

** 參看本版列寧選集第十卷，在一九一七年五月七日（四月二十四日）俄國社會民主黨全俄四月代表會議上關於時局的報告。（編者）

爭論的片斷，且毫無批評地，毫無意義地將這些片斷的議論移植到一般理論的，一般歐洲的基礎上去，結果弄成這樣糟糕的事情，使每個俄國覺悟的工人，如果他知道了上述考茨基底議論，一定會大笑一場。

歐洲的工人（除了極少數的根深蒂固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外），如若我們向他們說明事情的真相，那一定會同樣的大笑考茨基吧。

考茨基損害了馬爾託夫，因為他把馬爾託夫的錯誤很明顯的變成了不通之論。試看考茨基底論據所得到的結論吧。

蘇維埃是包括一切僱用的工人。反對財政資本，用無產階級經濟的與政治的舊的鬥爭方法是不夠的。蘇維埃不僅在俄國將有偉大的作用。牠們在歐洲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偉大決鬥中，將有絕大的作用。這就是考茨基所說的。

好極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決鬥』不是要解決那一階級將獲得國家政權的問題嗎？

胡說。豈有此理！

在『決鬥』中，包容一切僱傭工人的組織，不應該變為國家的組織！
那末，什麼叫做國家呢？

國家不是別的，就是一階級壓倒另一階級的機器。

這樣，被壓迫的階級，在現社會中一切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底先鋒隊，應認去做『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決鬥』，但不應該去動搖那為資本所用以壓迫勞動的機關——不應該破壞這機關——不應該利用自己那範圍廣大的組織來鎮壓剝削者！

考茨基先生，好極了，好極了！『我們』承認階級鬥爭，如像一切自由派承認的那樣，就是說，不要推倒資產階級……。

這就是考茨基同馬克思主義、同社會主義的完全分離變成很明顯的地方。這實際上就是跑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因為資產階級除了被他所壓迫的階級底組織變成國家的組織之外，其餘一切都是可以容許的。這裏考茨基已經不能將他調和一切的，以及用空話來了結一切深刻矛盾中的立場拯救出來了。

或者考茨基完全拒絕國家的政權轉到工人階級手裏來，或是他允許工人階級把

舊的、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拿在自己手裏，但無論如何不許牠破壞、打碎這機器，拿新的無產階級的機器來代替牠。不論是這樣或是那樣來『解釋』與『說明』考茨基底議論，而考茨基之脫離馬克思主義與投降資產階級，總是一樣明顯的。

馬克思還在共產黨宣言中，說到勝利的工人階級需要何種國家時曾寫道：

『國家就是組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

現在居然有一個自以爲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人起來說，人人都組織起來而同資本做『決鬥』的無產階級，不應該將自己的階級的組織變爲國家的組織。這就是一八九一年恩格斯所說的『對於國家的迷信』，這種迷信『在德國成了資產階級一般的意識，而且甚至浸入了很多工人的頭腦中』，——這就是考茨基所表示的正是這種迷信。我們的庸人『同意』說，工人們，你們爭鬥呢！（這當然也是資產者所『同意』的，因爲不論怎樣工人總是要爭鬥的，資產者所想的，只是怎樣來挫折他們的劍鋒而已）——鬥爭吧，但是你們不要勝利呵！不要破壞資產階級底國家機器，不要以無產階級的『國家組織』去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組織』！

誰真是同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說國家不是別的，就是一階級鎮壓別一階級的機器，誰曾經對於這種真理作過一番思索的，那他決不會說出這種荒唐的話，說能夠戰勝財政資本的無產階級的組織不應該變為國家組織。小資產者底態度正是在這一點上表現出來了，因為在他看來，國家『總是』一種什麼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東西。事實上爲什麼應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同不但統治無產階級而且統治全體人民、全體小資產階級、全體農民的資本，實行決鬥，而不應許無產階級，『一個階級』，變他自己的組織爲國家的機關呢？因爲小資產者懼怕階級鬥爭，不能把這個鬥爭幹到底，幹到最主要的地步。

考茨基簡直神經錯亂，把馬脚露出來了。你們看，他自己承認歐洲現在正走上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決鬥，說無產階級底經濟爭鬥與政治爭鬥之舊方法已經不夠用了。而這些方法恰恰就在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因此呢？……

考茨基怕再進一步去想，從這裏會得出什麼結論。

……因此，祇有反動派，工人階級底敵人，資產階級走狗，才能在現在去粉飾

資產階級的民主之美妙，空談什麼純粹的民主，而面對着死去的已往。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同中世紀制度比較，曾經是進步的，而且那時應該利用牠的。但現在，對於工人階級，牠已經不夠用了。現在不應該向後面看，而應該向前面看，應該拿無產階級的民主來代替資產階級的民主。如若無產階級革命底準備工作，無產階級隊伍底教養與形成，如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底範圍內是可能的（而且必要的），那末到了『決鬥』的時候，還把無產階級限制於這些範圍內，這就是變為無產階級的事業底變節者，就是變為叛徒。

考茨基陷入了特別可笑的地步，因為他重複了馬爾託夫底論據，而沒有注意到，馬爾託夫這個論據是依賴於為考茨基所沒有的另一個論據之上——馬爾託夫說（考茨基則跟了他說），俄國現在還沒有成熟到社會主義，從這裏自然得出這樣的結論：把蘇維埃從爭鬥的機關變為國家的組織，為時尚早（即：由孟塞維克領袖的幫助，把蘇維埃變成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支配工人的機關，那倒適當其時了）。

而考茨基却不能直爽地說，歐洲還沒有成熟到社會主義。在一九〇九年，當考

茨基還不是叛徒的時候，他寫道，現在懼怕過早的革命是不行的，誰因懼怕失敗而拒絕革命，誰就是叛徒。直接否認這句話，考茨基還沒有勇氣。結果，就得出了把小資產者底全部懦怯與愚蠢，十足地暴露出來的無意義之談：一方面，歐洲已成熟到了社會主義，並正走上勞動與資本之間的決戰；而另一方面，鬥爭的組織（即在鬥爭中建設起來的，發達起來的，鞏固起來的）——無產階級底組織，被壓迫者底先鋒隊、組織者、領袖之組織，却不能變成國家的組織！

蘇維埃之爲爭鬥的組織，是必要的，但不應該變爲國家的組織，這種思想，在實際的政治方面，比在理論方面更爲荒謬得多。就是在和平的時候，當革命形勢還沒有時候，工人同資本家的羣衆鬥爭，如羣衆罷工，就要引起兩方面的極大的憤激，引起非常熱烈的鬥爭，使資產階級常常借口說，牠要保持其爲『家主』的地位等等。但在革命的時候，當政治的生活沸騰的時候，這種包容一切工業部門底一切工人，以至一切兵士，一切勞動或與最貧苦的鄉村人民的組織，如蘇維埃，由於爭

鬥底過程，由於攻守底簡單『邏輯』，牠自己必然要進到直截痛快地提出問題。佔據中庸地位，『調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企圖，簡直是愚蠢，而且必定要遭到可憐的失敗：在俄國，馬爾託夫及其他孟塞維克之鼓吹已遭到如此失敗，在德國及其他各國，如若蘇維埃發展得稍為廣大，能聯合與鞏固起來，那末那種宣傳也必然要遭到同樣的失敗。對蘇維埃說：爭鬥呀，但不要把全部國家的政權拿在自己手裏，不要變為國家的組織，這就是宣傳階級合作和宣傳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社會和平』。如以為這種地位，在劇烈的鬥爭中間，除了可恥的破產之外，還有什麼別的結果，那是可笑的。騎牆的態度為考茨基底終身的運命。他裝腔做勢地說，他在理論上完全不同意機會主義者，實則他在一切重大問題（即一切與革命有關的問題）上，在實際行動上，是同意機會主義者的。

立憲會議與蘇維埃共和國

關於立憲會議與布爾塞維克解散立憲會議的問題，是考茨基全部小冊子底關

鍵，他常常說到這個問題。對於布爾塞維克如何『毀滅了民主』（見上而我們引用考茨基的話）的指摘，充滿了「第二國際」思想上的領袖全部作品。這問題的確是一個有趣的而且重要的問題，因為在這裏資產階級民主與無產階級民主底關係，已經實際地擺在革命面前了。我們現在來看，我們的『理論家馬克思主義者』如何觀察這個問題。

他引用了我所著的、並在一九一八年正月八日（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真理報上所發表的論立憲會議的提綱。這似乎是考茨基拿確實證據，以莊重態度來討論問題的最好的證明。但是，試看一下考茨基如何引用我的話。他並不說這些提綱共有十九條，他也沒有說在這些提綱中提出了有立憲會議的平常資產階級共和國與蘇維埃共和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以及關於立憲會議與無產階級專政在我們革命中分歧底歷史問題。所有這些，考茨基都不說，他祇簡單地對讀者說，『其中（在這些提綱中）最重要的有兩個』：一、社會革命黨的分裂雖在立憲會議選舉之

後，却在立憲會議召集之前（考茨基不說這是提綱第五條）；二、蘇維埃共和國較之立憲會議一般的是更高的民主的形式（考茨基不說這是提綱第三條）。

祇在提綱第三條上，考茨基才完全引用了其中的一段。即下列這一段：

『蘇維埃共和國不但爲民主制度底更高度的形式（同立憲會議下的平常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比較，即與最完善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比較），而且是能够保證最健全的。進到社會主義之過渡的唯一形式。』（考茨基在這裏落去了『平常的』三字，並且把提綱底第一句話：『對於由資產階級制度進到社會主義制度的過渡，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也省去了）

引用這幾句話之後，考茨基就冷嘲熱諷地說道：

考茨基好幾次引用了『最健全的』轉變這幾個字，大概，他想借此來譏笑人家。可是因爲他所用的方法是不中用的，所以在幾頁之後，他就造謠，以及虛偽地引用『健全的』轉變。當然，用這種方法把一切無意識的話，加到對手的身上是不難的。造謠也可以使他離開問題底本質：進到社會主義的最健全的過渡，祇有在貧農全體組織（蘇維埃）起來的時候，祇有在國家政權（無產階級的）底中央對這種組織與以幫助之下，才有可能。

「所可惜的只是這種結論，祇在立憲會議中佔了少數之後，才做出來。從前要求立憲會議的人，誰都沒有像列寧那樣熱烈。」

這是考茨基書上第三一頁中一字不差的話！

這是何等寶貴呵！祇有資產階級底奴僕，才會這樣的說謊，使讀者得到這種印像：似乎布爾塞維克關於國家更高形式的一切議論，都是在布爾塞維克在立憲會議中佔了少數之後所發生的幻想！這種下流無恥的說謊，祇能出之於已賣身於資產階級的無賴漢之口，或（這都是一樣的）祇能出之於相信阿雪洛德和隱瞞自己通訊員的那種無賴漢之口。

因為大家都知道，我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十七日（四日）回到俄國的第一天，即當衆宣讀了我的提綱。其中說到「巴黎公社」式的國家，對於資產階級的國會的共和國，所佔有的優勢。後來我在刊物上，如在我的論各政黨的小冊子上。（這小冊

* 見本版列寧選集第十卷，論目前革命中無產階級底任務。

* 見本版列寧選集第十卷，俄國各政黨與無產階級底任務。（編者）

子曾譯成英文，並於一九一八年正月登在美國紐約的報紙『Evening Post』* 上面。曾屢次說及這一點。此外在一九一七年五月初（四月末）布爾塞維克黨底代表會議曾通過了這樣的決議，說工農的共和國高於資產階級的國會制度的共和國，說我們的黨不能以後者為滿足，說黨綱也應有相當的改變。

自此之後，對於考茨基底攻擊，——他告訴德國的讀者，似乎我曾經很熱烈地要求過召集立憲會議，祇是到了布爾塞維克在立憲會議中佔了少數之後，我才『減少』立憲會議底名與榮譽，——對於這種攻擊如何去稱呼呢？怎樣能寬恕這種攻擊呢？難道是因為考茨基不知道事實麼？既然如此，那麼他為什麼要大發議論呢？那末為什麼他不老實地說，他所寫的文章是根據孟塞維克斯坦和阿雪洛德這批人的消息的呢？考茨基祇是想裝出客觀的態度來充當已經因失敗而抱怨孟塞維克的

* 晚報。（編者）

** 附帶地說：在考茨基底小冊子中，這種孟塞維克式的謊話，非常之多！這是憤怒的孟塞維克底小

冊子。

底奴僕而已。

但這不過是小花朵而已。果實尙在將來呢。

我們假定，考茨基不願意，或是不能夠（??）從他的通訊員那裏，得到布爾塞維克的決議案底譯文和關於他們是否滿意國會的民主共和國這個問題的聲明書底譯文。雖然這是很離奇的，可是，我甚至就這樣假定吧。但是關於我在一九一八年正月八日（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提綱，考茨基在他著作三十頁上公然提起。

這些提綱考茨基是完全知道的，或是他只知道斯坦、阿雪洛德等所譯給他的一部分呢？考茨基引用關於布爾塞維克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前是否覺悟到並曾否向民衆說過蘇維埃共和國高過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基本問題的第三條。但考茨基却不說起第二條。

第二條上說：

* 見本版第十一卷論立憲會議的提綱。（校者）

『提出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時，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從一九一七年革命的最初起，就曾屢次鄭重的說明過，蘇維埃共和國比之有立憲會議的平常資產階級共和國，是爲更高的民主主義底形式。』（着重點是我加的）

爲要把布爾塞維克看做沒有原則的人，看做『革命的機會主義者』（我不記得考茨基在他的著作中什麼地方在什麼情形之下用過這個術語），考茨基先生就把提綱上直接指出『屢次的』聲明這一點，在德國讀者面前隱藏起來了！

考茨基先生所用的細小的、可憐的與可鄙的方法，就是如此。這樣地就避開了理論問題。

說資產階級民主的國會的共和國比「巴黎公社」式的或蘇維埃式的共和國要低些，這是不是對的？這是問題底中心，而考茨基却避開不談。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時所說的一切話，考茨基都『忘却了』。他『忘却了』一八七五年三月二十八日恩格斯給培培爾的信，在該信中特別明顯而易解地重述了馬克思底思想：

「巴黎公社」已經不是國家這個字底原意上的國家了。」

你們看，這位「第二國際」最著名的理論家，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專書上，特別談論到曾經公開地和屢次地提出了比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高的國家形式問題的俄國時，却對於這一點默而不言。這在實際上與投降資產階級有什麼分別呢？

（我們附帶說一下：這裏考茨基也做俄國孟塞維克底尾巴。他們中間知道從馬克思與恩格斯底作品中引來的『一切引證』的人，正是車載斗量，然而無論那一個孟塞維克，自從一九一七年四月至一九一七年十月，再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至一九一八年十月，沒有一次去研究過「巴黎公社」式的國家問題。普列漢諾夫也不談這問題。大概是曾經不得不閉口不談。）

很明顯的，同那些自稱社會主義與馬克思主義者而實際上關於主要的問題，關於「巴黎公社」底國家的問題，跑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人，討論立憲會議底解散，這真是對牛彈琴。我只要在本書底附錄中把我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 完全登載出來，已經夠了。從這些提綱中間，讀者會看到，在一九一八年正月八日（一九一七

* 編者沒有把這個提綱編入本卷，而把他編在本版第十一卷內。（校者）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已經在理論上、歷史上與實際政治上都提出問題了。

如果理論家的考茨基已經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那末歷史家的考茨基也許會考察一下蘇維埃同志立憲會議鬥爭的問題吧。我們從考茨基很多著作中知道，他過去能夠做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家，他的這些著作，仍為無產階級底可貴的財產，雖是他最近變成了叛徒。但對於這一問題，歷史家的考茨基又離開真理，抹煞衆所共知的事實，變成了一個阿諛的奴才。他想把布爾塞維克看作沒有原則的人，所以他說起布爾塞維克在解散立憲會議以前，如何想軟化對立憲會議的衝突。這裏絲毫沒有什麼不好的事情，我們並不迴避什麼；我把我的提綱全部印出，其中說得再明顯沒有的是：列席立憲會議的動搖的小資產者先生們，你們或者同無產階級專政講和，或者我們『用革命的方法』來戰勝你們。（提綱十八及十九條）

真正革命的無產階級向來是如此對待，將來也永遠如此對待動搖的小資產階級。

考茨基對於立憲會議問題，是站在形式觀點上的。在我的提綱內很明顯地而且

屢次地說，革命底利益是高於立憲會議形式上的權利的（見提綱十六及十七條）。形式的民主觀點，也就是資產階級民主派底觀點，因為資產階級民主派不承認無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底利益高於其他的利益。歷史家考茨基也許不能不承認資產階級的國會是這個或那個階級底機關。但現在考茨基因為需要（爲了要實行離開革命這個仇恨的行爲）忘記馬克思主義，竟不提出俄國立憲會議是那個階級底機關的問題。考茨基不去分析具體的環境，他不願意觀察事實，他沒有一句話告訴德國讀者說，我的提綱，不但在理論上解釋到資產階級民主之狹隘性問題（提綱一至三），不但說到使一九一七年十月中旬各黨派名單與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的實際情形不相符合的具體條件（提綱四至六），而且說到一九一七年十二月階級鬥爭與國內戰爭底歷史（提綱七至五）。從這種具體的歷史中，我們得到了這樣的結論（提綱十）：『一切政權歸立憲會議』的口號，實際上已經變成立憲民主黨人與加列

* 加列金（一八六一至一九一八年）是一個將軍，歐戰底參加人。在十月革命以後，他發表宣言，不

承認「布爾塞維克政權」並宣佈頓河特別區爲獨立區，而實行與無產階級作鬥爭。（校者）

金*派及他們的附從者底口號了。

歷史家的考茨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歷史家的考茨基從來沒有聽到過，普選權有時產生出小資產階級的國會，有時產生反動的與反革命的國會。歷史家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從來沒有聽過，選舉底形式，民主底形式，是一件事，這個制度底階級內容又是一件事。關於立憲會議底階級內容問題，我已經在我的提綱中，提出而且解決了。也許我的解決是不對的。旁人對於我們的分析能夠加以馬克思主義的批評，是我們再願意沒有的。考茨基應不去說些似乎有什麼人阻礙批評布爾塞維主義的完全愚蠢之談（這在考茨基著作中很多），而應該從事於這樣的批評。可是問題就在於考茨基沒有作這種批評。他甚至沒有提出關於蘇維埃與立憲會議階級性的分析問題。所以同考茨基爭論或辯論，是沒有可能的，故祇有告訴讀者，為什麼考茨基這種人除了稱為叛徒外，沒有其他適當的名稱。

蘇維埃和立憲會議的分歧，有牠自己的歷史，對於這種歷史甚至就是不站在階級爭鬥觀點上的歷史家，也不能放過的。考茨基連對於這種實際的歷史，都不願意

論及。他向德國的讀者掩蓋大家都知道的事實（遮蓋這種事實的，現在只有懷惡意的孟塞維克）：蘇維埃就是在孟塞維克統治的時候，即在一九一七年二月末至十月，同『整個國家的』（資產階級的）機關，也都是分歧的。實際上，考茨基是站在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調和、協定與合作的觀點之上的；不論考茨基怎樣否認這一點，但這個觀點是他的全部小冊子所證實的事實。所謂不應該解散立憲會議，也就是說：不應該同資產階級鬥爭到底，不應該推倒資產階級，而應該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調和起來。

孟塞維克在一九一七年二月至十月間便做了這種不光榮的事情，而且絲毫沒有得到成就，為什麼考茨基對於這一點却默而不言呢？如若說調和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是可能的，那末，為什麼在孟塞維克統治下這種調和沒有成功，資產階級不管蘇維埃，且蘇維埃被（孟塞維克）稱爲『革命的民主』，而資產階級則被稱爲『有法定資格的份子』呢？

考茨基不使德國的讀者看到，正是孟塞維克在自己的統治『時代』（一九一七

年二月至十月）稱蘇維埃爲『革命的民主』，這樣他們就承認了蘇維埃高過於其他一切的制度。正因爲對於這種事實的遮蓋，所以在歷史家的考茨基看來，蘇維埃與資產階級的分歧，是沒有自己的歷史的，是因爲布爾塞維克底蠢動而忽然地、偶然地、無緣無故地發生的。而在實際上，正因爲孟塞維克底妥協政策，使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調和的企圖之半年多的（對於革命，這是很長的時間）經驗，使民衆相信了這些企圖之勞而無功，使無產階級離開孟塞維克了。

考茨基承認，蘇維埃是無產階級之很好的、有偉大前途的、鬥爭的組織。如果是這樣，那末考茨基底整個立場就會瓦解，如紙造的房子或如小資產階級的梦想（以爲沒有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劇烈的鬥爭，也可以過去）一樣。因爲一切革命是連續不斷的而且是拼命的鬥爭，無產階級是一切被壓迫者底先進的階級，是一切被壓迫者求自身解放的一切趨向之中心與焦點。蘇維埃——被壓迫羣衆底鬥爭機關——反映出與表現出這些羣衆底情緒與他們的觀點底變動，比其他任何的機關自然要快得多，完滿得多，和正確得多（這也就是蘇維埃的民主之所以成爲民主底高度

形式的原因之一)。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三日(二月二十八日)至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五日)這一個期間，蘇維埃召集了兩次俄國絕大多數民衆、一切工人與兵士、十分之七八的農民底全俄代表大會，而地方的，縣的，城市的，省的與特別區的許多代表大會，還不計算在內。在這個時期內，資產階級沒有能夠召集一次代表大多數民衆的機關(除了那個卑鄙的，驕橫的，使無產階級憤怒的『民主會議』之外)。。立憲會議反映出了同樣的民衆情緒，同樣的政治派別，如像第一次(六月的)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所反映出的一樣。在立憲會議召集(一九一八年五月)以前，舉行了第二次(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及第三次(一九一八年正月)蘇維埃代表大會，這兩次代表大會都十二分明顯地表示，羣衆是左傾了，革命化了，從孟塞維克及社會革命黨人方面走到布爾塞維克方面來了，這就是說，他們脫離了小資產階級的領導，拋棄了同資產階級妥協的幻想，走到爲推倒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革命爭鬥方面來了。

所以，祇是蘇維埃底外表的歷史就已經指出，立憲會議解散之必不可免及立憲會議之反動性，但考茨基還是堅固地保持着他的『口號』：讓革命死亡吧，讓資產階級去戰勝無產階級吧！只要『純粹的民主』發榮滋長就好了！*Fiat iustitia, pe-reat mundus*”

請看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在俄國革命史上的簡單的總結：

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	代表人數	布爾塞維克所佔人數	布爾塞維克所佔的百分額
第一次（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六日〔三日〕）	七九〇	一〇三	一三
第二次（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念五日〕）	六七五	三四三	五一
第三次（一九一八年正月二十三日〔十日〕）	七一〇	四三四	六一
第四次（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日）	一、二三三	七九五	六四
第五次（一九一八年七月四日）	一、一六四	七七三	六六

只要看看這些統計，就會了解，何以擁護立憲會議，或者說（如像考茨基之

* 拉丁語，意即：『不管世界沈淪，司法萬歲！』（編者）

流)布爾塞維克沒有大多數民衆爲後盾的話，祇能引起我們發笑而已。

蘇維埃的憲法

我已經說過，褫奪資產階級的選舉權，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之定要的必要的記號。遠在十一月(十月)以前，俄國布爾塞維克早已提出了這種專政的口號，並沒有預先說到褫奪剝削者的選舉權。專政底這個組成部份之產生，並不是由什麼政黨底『預定計劃』，而是在鬥爭過程中自然生長出來的。當然歷史家的考茨基沒有注意到這一點。他不了解，還在孟塞維克(同資產階級妥協的人)在蘇維埃中佔統治地位時，資產階級自己已經同蘇維埃分立，抵制牠，和牠對立，用種種陰謀來反對牠。蘇維埃底產生，並沒有根據任何憲法，存在了一年以上(一九一七年春至一九一八年夏)也並沒有任何憲法。資產階級之拼命反對被壓迫者之獨立的與萬能的(因爲包含一切的)組織。資產階級之大胆的、自私自利的、骯髒的反蘇維埃的爭鬥，最後，資產階級(從立憲民主黨直到右派的社會革命黨，從米留可夫直到克倫

斯基)之參加郭尼洛夫叛亂——凡此一切，準備了從蘇維埃中正式排除資產階級的規定。

考茨基聽見過郭尼洛夫叛亂，但是他竟儼然鄙視歷史的事實與經過，以及決定專政形式的鬥爭形式；實際上，既然講的是『純粹的』民主，何必要這些事實呢？考茨基關於反對褫奪資產階級選舉權的『批評』，帶有一種……甜蜜的天真爛漫的特點，這如若出之於三歲小兒，那到不免令人可愛，但出之於大家還公認為不惡的人，那就不免令人憎惡了。

『……如若資本家在普選制之下，得到了很小的少數，那他們就會安於他們自己的運命了……』(三三三頁)。

好極了，你以為對不對呢？聰明的考茨基多次在歷史中看到了，並且從實際生活的觀察中，顯然知道那些顧慮到大多數被壓迫者底意志的資本家與地主。聰明的考茨基牢固地站在『在野黨』底觀點上，即站在國會內部鬥爭底觀點上。他的確這樣寫着：『在野黨』(三四頁及其他許多地方)。

哦，學問淵博的歷史家與政治家！你不妨知道吧，『在野黨』是一種和平的並且祇是國會爭鬥底概念，就是說，合於非革命形勢的概念，合於沒有革命時的觀念。在革命中，所要對付的是國內戰爭中無情的敵人，——任何懼怕這種戰爭的，如考茨基那樣懼怕這種戰爭的小資產階級之反動的號泣，都不能變更這類事實的。當資產階級冒犯一切罪惡時（凡爾賽派及他們同俾斯麥勾結的例子），對於一切不以戈果爾書中的彼特魯什卡底態度去研究歷史的人，都有相當的意義吧），當資產階級號召其他國家底幫助並同牠們合謀反對革命時，才來觀察無情的國內戰爭底問題，這真是笑話。革命的無產階級，像『糊塗顧問』考茨基那樣，那時便應該戴上睡帽，把組織都多夫，克拉斯諾夫和捷克等反革命暴動的，以及千百萬金交付怠工者的資產階級，看做是合法的『在野黨』。哦，何等深奧的思想呵！

考茨基所發生興趣的，只是事情之形式的法律的方面，所以讀他關於蘇維埃憲法的議論時，自然而然令人記起培培爾底話：『法律家是澈頭澈尾的反動者。』

考茨基說：

『實際上，僅僅使資本家沒有權利是不行的。在法律方面講來，什麼叫做資本家？有產者嗎？就是在經濟那樣進步的無產階級數量很多的國家中，如德國，蘇維埃共和國底成立，也許還要使很大的羣衆成爲政治上沒有權利吧。譬如在一九〇七年的德意志帝國內，在三大生產部門——農業、工業、商業——中謀生的人及他們的家屬，歸於僱傭工人與職員的部分，約三千五百萬人，歸於自立的部分，有一千七百萬。這樣一來，黨在僱傭工人中間，很可以成爲多數，但在全體人民中，則還是少數。』（三三頁）

這就是考茨基底議論底標本之一。但難道這不是資產者底反革命的號泣嗎？考茨基先生，你很知道，不使用僱傭勞動的俄國大多數農民，並沒有褫奪權利，爲什麼你的一切『自立的人』算做沒有權利呢？難道這不是造謠說謊嗎？

爲什麼你這學問淵博的經濟學家，不摘引你所十分知道、而且在一九〇七年德國統計中已有的關於農業中各部分經濟採用僱傭勞動的數目字呢？你爲什麼不把這些統計，可以說明多少剝削者和剝削者如何在『農業主』總數中佔很少數的德國統

計，給你的小冊子的讀者，德國的工人看呢？

因為你的叛徒性，已經把你變成了資產階級底阿諛者的緣故。

請看吧，資本家是一個不確定的法律上的概念，而考茨基却在好幾頁行文上，攻擊蘇維埃憲法底『專橫』。這位『莊嚴的學者』容許英國的資產階級，在數世紀內去製出和規定新的（對中世紀而言）資產階級的憲法，而這位奴僕科學底代表，却不給我們俄國的工人與農民以任何時期。他要求我們在幾個月中間制定無微不至的憲法……。

……『專橫！』試想一下，這種責難，暴露着何等深刻的在資產階級前面的最骯髒的奴僕性，最癡呆的笨拙。當資本主義國家內的十足資產階級的與大部分為反動的律師們，在幾百年內，或數十年內，制出無微不至的規則，寫下幾千百本用以約束工人、束縛貧人的手脚，對民衆中任何簡單的勞動者放下無數的障礙物的法律與其解釋的時候，——哦，那時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者與考茨基先生却看不到『專橫』——這裏是『秩序』與『合法』——這裏一切，都是想得好好的，寫得好好的，如

何去『壓榨』貧人。這裏是成千累萬的資產階級的律師與官僚（關於他們，考茨基一般地默而不言，也許是正因為馬克思很重視破壞官僚機器的意義的緣故……）

——他們能把法律解釋得使工人與中農永遠不會跳過這種法律的鐵網。這不是資產階級底『專橫』，這不是自私自利的，仇恨的，吮吸民脂民膏的剝削者底專政。完全不是。這是『純粹的民主』，一天比一天地變成更其純粹的民主。

當勞動者與被剝削階級，因帝國主義的戰爭使他們同他們國外兄弟們隔絕，第一次在歷史上創造了他們自己的蘇維埃，號召了被資產階級所壓迫，所剝削，所愚弄的那些羣衆起來幹政治的建設，且已經自己開始創造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在鬥爭底炎熱中，在國內戰爭底火燄中，開始製定關於沒有剝削者的國家底基本原則，——在這樣的時候，資產階級一切混蛋，一切喋血的強盜，以及他們的謳歌者考茨基，却來呼號『專橫』！的確的，這些無知之徒，工人與農民，這種『庶民』，那裏能解釋他們自己的法律呢？他們，這些簡單的勞動者，沒有學問豐富的律師、沒有資產階級的著作家、沒有考茨基那種人、以及聰明的老官僚底忠告，那裏能得到

正義底感覺呢？

考茨基先生引用我在一九一八年四月二十九日的演說中的話：

『……羣衆自己決定選舉底程序與時期……』。於是『純粹的民主派』考茨基就推論

道：

『……所以，問題大概是這樣的，每個選舉者底會議，都可以依照牠自己的意見去決定選舉底程序。專橫與躲避無產階級內部不便利的反對份子的可能，於是就達到了最高點。』（三七頁）

哼，這些話同資本家所僱傭的官吏看見罷工時羣衆壓迫『願意做工的』勤勉工人而大呼特呼的，有什麼區別呢？爲什麼在『純粹』的資產階級民主內，官僚資產階級的決定選舉程序，就不是專橫呢？爲什麼起來同幾百年來的剝削者爭鬥的羣衆，在這個殊死的爭鬥中所教導所鍛鍊的羣衆對於正義的感覺，比那些在資產階級的成見中教養出來的少數的官僚、知識份子、與律師，要低些呢？

*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第四七一至四九八頁，關於蘇維埃政權底當前任務的報告。（編者）

考茨基，是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你們不要懷疑這位最可尊敬的家長，這位最純潔的公民之誠實性。他是工人勝利與無產階級革命之最熱烈的與最堅信的擁護者。他祇希望這些戴着睡帽的可愛的知識份子的小資產者與庸人，在羣衆運動以前，在他們同剝削者作殊死鬥爭以前和絕對不要國內戰爭，而首先制定革命發展底溫和的與純潔的章程……。

最有學問的偽君子考茨基憤填胸地對德國的工人們說道，在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從蘇維埃中開除出右派社會革命黨與孟塞維克底代表。於是爲尊貴的怒火所燃燒着的偽君子考茨基寫道：

「這種辦法不是反對犯了某些錯誤而應受到懲戒的某些個人……。蘇維埃共和國底憲法沒有一個字說到蘇維埃代表底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這裏從蘇維埃中間開除的，不是某些個人，而是某些政黨。」（第三七頁）

不錯，這的確是一件可怕的事，這簡直離開了純粹的民主，而革命的偽君子考茨基正是依照這種民主底規律來幹革命的。原來，我們俄國的布爾塞維克，最初

却應該允許沙維可夫這批人，李伯爾與唐恩及波特列索夫（『積極份子』之流）以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然後制定刑法來說明，參加捷克斯拉夫人反革命戰爭，或在烏克蘭與格魯西亞同德帝國主義者聯合反對本國工人，是應受『懲戒』的，僅僅然後，依據這些刑法，依照『純粹的民主』，我們才有權力從蘇維埃中間開除『某些個人』。這裏很明顯的，經過沙維可夫、波特列索夫、李伯爾與唐恩，或因他們的鼓動之助，而從英法資本家手裏得到金錢的捷克斯拉夫人，及因烏克蘭與梯夫里司孟塞維克底幫助而從德國人那裏得到槍械的克拉斯諾夫輩，在我們還沒有準備好正確的刑法的時候，他們將安安靜靜坐着不動，而且像最純粹的民主派一樣只限於做『在野派』的活動了……。

蘇維埃的憲法擬奪『凡以取得利潤爲目的而僱用勞動』的人們底選舉權，這也引起了考茨基同樣大的義憤。考茨基說：

『家庭的工作者或有一個學徒的小僱主？其生活和感覺可以完全像無產階級一樣，而他們却没有選舉權。』（第三六頁）

這是如何離開了『純粹的民主』！何等的不公平！一直到現在，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曾認為，而且千百件事實都證實了：小僱主是僱傭工人底最沒有良心的與最無情的剝削者，但偽君子考茨基所說的，當然不是小僱主階級（誰想出了階級鬥爭這個有害的理論？），而是某些個人，那些『生活和感覺完全如無產階級那樣』的剝削者。人們認為早已死亡的著名的『節儉的阿格尼斯』，又在考茨基底筆鋒之下再生了。這位節儉的阿格尼斯，是幾十年以前，『純粹的』民主派資產者李赫特所想出來的，而且也是他所散佈於德國刊物中的。他曾預言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在沒收剝削者底資本之後的不幸的情形，他假裝忠厚的樣子問道，在法律的意義上什麼叫做資本家？他舉了被可惡的『無產階級專政者』剝奪了最後一文錢的，節儉的貧窮的女縫工（『節儉的阿格尼斯』）為例。曾經有一個時候，整個的『德國社會民主黨』，譏笑了純粹民主派李赫特底這個『節儉的阿格尼斯』。但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時培培爾還活着，他那時曾公開而直爽地說，我們黨內存在着許多民族自由主義者；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那時考茨基還不是一個叛徒。

現在『節儉的阿格尼斯』在『有一個學徒的，其生活和感覺完全如無產階級那樣的小僱主』身上復活了。可惡的布爾塞維克，壓制他，剝奪他的選舉權。當然，『一切選舉大會』，像考茨基所說的那樣，在蘇維埃共和國內，可以應許同這一工廠有關係的貧苦的工匠進來，如若這個工匠，在例外的情形之下，不是剝削者，如果他在實際上『其生活和感覺完全如無產階級一樣』。但難道可以信任簡單工人底不規則的不按章程而行動的（呀，何等可怕！）工廠大會有人生底知識，有正義底感覺嗎？與其冒險使工人有污辱節儉的阿格尼斯』和『其生活和感覺完全如無產階級一樣的工匠』的可能，那不如把選舉權給與一切剝削者，一切僱用工人的僱主，難道這還不明顯嗎？

讓那些受資產階級與社會國家主義者所歡迎的可鄙的叛徒混蛋，去誹謗我們那取消剝削者選舉權的蘇維埃的憲法吧。這是很好的，因為這是加速與加深歐洲革

命工人同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倫諾德輩與朗格輩，亨德遜輩與麥克唐納爾輩，同老的領袖與老的社會主義叛徒間的分裂的。

被壓迫階級底羣衆，革命無產者中的覺悟的與忠實的領袖，將贊成我們。只要使這些無產者與這些羣衆認識我們蘇維埃的憲法，他們那時立刻就會說：這就是真正我們的人，這就是真正的工黨，真正的工人政府。因為這個政府不用改良的空談來欺騙工人，如像一切上述的領袖們那樣欺騙了我們的，牠真正同剝削者鬥爭，真正實行革命，實際上爲了工人底完全解放而鬥爭。

如若在蘇維埃一年的『實際工作』之後，剝削者的選舉權被蘇維埃所剝奪，這就是說，這些蘇維埃真是被壓迫民衆底組織，而不是賣身於資產階級的社會帝國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底組織。如若這些蘇維埃取消了剝削者底選舉權，這就是說，蘇維埃不是同資本家妥協的小資產階級的機關，不是國會的空談（考茨基輩的，朗格輩的與麥克唐納爾輩的）底機關，而是同剝削者做決鬥的真正革命無產階級底機關。

我有一位住在柏林的消息靈通的同志，最近（今天——十月三十日）寫了一封信給我，說道：『考茨基底小冊子這裏幾乎無人知道。』我想勸告駐德國與瑞士的蘇俄公使不吝惜千金，購買該書幾千本，把牠贈送給覺悟的工人，使他們把這個『歐洲的』（讀作：帝國主義的與改良主義的）、早已變為『死屍』的社會民主黨送到污溝中去！

考茨基先生在他的著作末尾（六十一頁與六十三頁）辛酸地哭泣着，因為『新的理論』（他這樣稱布爾塞維主義，而懼怕接近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於「巴黎公社」的分析）『甚至在老的民主國如瑞士，也找到同情者』。

『如若德國的社會民主黨人會接受這個理論』，對於考茨基是『不能了解』

* 我剛才讀了佛蘭克報（一九一八年十月二十二號第二九三期）底社論，這篇社論歡天喜地的轉述考茨基底小冊子。交易所主人底報紙是滿意的。當然！我有一位同志自柏林寫信給我說，謝德曼底報紙前進報在專論上聲稱，他對於考茨基底每一行說話都可以簽字的。恭喜！恭喜！

的。

不，其實這是很容易了解的，因為經過了戰爭底嚴重教訓之後，革命的羣衆已經討厭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了。

考茨基寫道，『我們』向來是主張民主的，而現在我們自己忽然拒絕牠！

『我們』，社會民主黨底機會主義者，向來是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這一點高爾倍一般人早已說過。考茨基是知道這一點的，他以為他可以使讀者看不到他之『回到』培恩斯坦輩與高爾倍輩之『懷抱中』的明顯的事實，這真是枉然。

『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把『純粹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看做神聖。大家知道，在一九〇三年普列漢諾夫還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在他可憐的跑到俄國謝德曼底立場上去以前）的時候，他在黨的通過黨綱的代表大會上說道，在革命中，無產階級在必要時，可以剝奪資本家底選舉權，可以解散任何國會，如若這國會是反革命的。正是這種觀點是唯一地合於馬克思主義的，這在前面由我所引用的馬克思與恩格斯底話中，大家都可以看到的，這當然是從馬克思主義

底一切基礎中發生出來的。

『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從來沒有像各國考茨基主義者一樣，歡喜向民衆說過那些恭維資產階級，崇拜資產階級代議制，抹煞現代民主底資產階級性，而祇要求擴大牠與澈底完成牠的話。

『我們』對資產階級說過：『你們，剝削者與假君子，嘴內說民主，同時你們一舉一動都放下無數的障礙物以阻止被剝削羣衆去參加政治。我們就利用你們的話，爲了這些羣衆底利益要求擴大你們的資產階級的民主，爲的要準備羣衆來幹革命以推倒你們這些剝削者。如若你們，剝削者，想抵抗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我們就毫不留情地鎮壓你們，使你們沒有任何權利，而且我們還不給你們麵包，因爲在我們無產階級共和國中，剝削者將是沒有權利的，他們將得不到水火，因爲我們是真正的，不是謝德曼式的，也不是考茨基式的社會主義者。』

這就是『我們』，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已經說過了的和將來要說的話，這就是被壓迫羣衆要贊成我們，同我們在一起，而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將落到叛徒們底泥

溝中去的原因。

什麼叫做國際主義

考茨基最自信地認為自己是國際主義者，號稱自己為國際主義者。牠宣佈謝德曼輩為『政府的社會主義者』。但當考茨基擁護孟塞維克時（他並沒有直接說他是同他們聯合的，但他完全實行他們的見解），已經很明顯地表現出他的『國際主義』究竟是那一類的東西了。既然考茨基不是單獨一個人，而是在「第二國際」底環境中必然產生的一種派別（法國的朗格，意大利的都拉底，瑞士的諾勃斯與格里姆，格拉貝爾與寧恩，英國的麥克唐納爾等）底代表，所以我們來研究一下考茨基底『國際主義』，當然是很有意義的。

考茨基着重指出：孟塞維克也參加過齊美瓦德會議（無疑地是一張文憑，……）但這是一張已經陳腐的文憑，他陳述他所同意的孟塞維克底觀點如下：

『……孟塞維克會想要達到總議和。他們會想要各交戰國都能採納不割地，不賠款的

口號。按這個觀點，在這一點沒有達到以前，俄國的軍隊應該時刻備戰。而布爾塞維克則曾要求立刻無條件地議和，如在必要時，他們決定單獨媾和，他們企圖用暴力來強迫達到這個和議，來加強本來就已經很厲害的軍隊瓦解。」（第二七頁）

據考茨基的意見，布爾塞維克不應該奪取政權，而應該以立憲會議為滿足。

可見考茨基與孟塞維克底國際主義是這樣：向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政府要求改良，但是在一切交戰國還沒有採納不割地與不賠款的口號之前，要繼續擁護這種政府，繼續擁護牠所進行的戰爭。這種觀點，都拉底也好，考茨基主義者（哈薩等）也好，朗格之流也好，都已經屢次表示過了，他們說他們是主張『保護祖國』的。

在理論上說來，這是完全不會把自己從社會國家主義者分別開來，這簡直是在保護祖國問題上的十足的糊塗。在政治上說來，這是用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來代替國際主義，這是跑到改良主義方面，拋棄革命。

從無產階級觀點上看來，承認『保護祖國』，就是替現在的戰爭辯護，就是承認牠的合法性。但既然戰爭仍是帝國主義的戰爭（不論在君主國之下，或在共和國

之下，不論現在敵人的軍隊在我國內或在他國內，那末承認保護祖國，實際上就是擁護帝國主義的強盜的資產階級，就是對於社會主義的完全叛變。在俄國，就是在克倫斯基時代，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時代，戰爭還是帝國主義的戰爭，因為進行這戰爭的，是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而戰爭是『政策底繼續』）；從前的沙皇同英法資本家所訂立的關於瓜分世界與掠奪異國的秘密條約，即為戰爭之帝國主義性底特別明顯的表現。

孟塞維克卑鄙地欺騙了民衆，稱這類戰爭為守禦的或革命的戰爭，而考茨基的贊揚孟塞維克底政策，就是贊揚欺騙民衆，贊揚小資產者愚弄工人們並使工人們緊受帝國主義者底束縛以替資本效勞。考茨基實行着標本的、小資產階級的、庸人的政策，他幻想着（並以荒謬的思想去鼓勵羣衆），以為口號底提出就會改變事情。資產階級民主底全部歷史，都是揭破這種幻想的：爲了欺騙民衆，資產階級民主派已常常提出了而且永遠會提出任何的『口號』來。但問題是在審查他們是否誠實，是在拿行動同言論比較，是在不以唯心的與吹牛皮的說話爲滿足，而要尋找階

級的實在性。要帝國主義戰爭不成爲帝國主義戰爭，並不是在吹牛大家或空談家，或小資產者與庸人提出甜蜜的『口號』來的時候可以辦到的，而祇是在舉行帝國主義戰爭的、以及與這種戰爭有無數經濟上的線索聯繫着的那個階級，實際上被推倒的時候才可辦到，僅在真正的革命的階級，即無產階級起來代替牠而掌握政權的時候才可辦到。不然，要跳出帝國主義的戰爭——同樣要跳出帝國主義的掠奪的和議——是不可能的。

考茨基贊成孟塞維克底對外政策，宣佈這個政策爲國際主義的與齊美瓦德派的政策，這樣一來，他就：第一，表露出齊美瓦德的機會主義的多數之全部腐敗性（難怪，我們，齊美瓦德左派，同這樣的多數立即分開了！）；第二，——這是最重要的——考茨基從無產階級底立場轉到小資產階級底立場上，從革命立場轉到改良主義的立場上。

無產階級爲用革命的方法推倒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而鬥爭，小資產階級則爲用改良主義的方法去『完善』帝國主義，爲適應牠和受牠管轄而鬥爭。當考茨基還是馬

克思主義者的時候，比如在一九〇九年，當他著到政權之路的時候，他所堅持了的，恰恰是因戰爭而革命不可免的思想，他說過革命時代之行將到來。一九一二年巴爾賽的宣言，公開而確定地說到無產階級革命與英德兩大集團間帝國主義戰爭的連帶關係，而這種戰爭正在一九一四年爆發了。當一九一八年因戰爭而革命開始了的時候，考茨基不去說明這些革命的必然性，不去澈底的思索革命的策略與準備革命的方法和手段，却稱孟塞維克改良主義的策略為國際主義。難道這不是叛變麼？

考茨基稱贊孟塞維克，因為他們曾主張保持軍隊之備戰。他責備布爾塞維克，因為他們加強了本來就已經很厲害的『軍隊瓦解』。這就是稱贊改良主義和稱贊對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服從，責備革命與離開革命。因為在克倫斯基之下保持備戰，就無異是（而且曾經是）保持軍隊之受資產階級的指揮（雖是共和黨人的指揮）。大家都知道——而且事變底經過已經證實了——這個共和國的軍隊保持了郭尼洛夫的精神，因為，保留了郭尼洛夫的指揮官。資產階級的軍官不能不是郭尼洛夫式

的，不能不跑到帝國主義方面去的，不能不用武力來鎮壓無產階級的。把帝國主義戰爭底一切基礎，把資產階級專政底一切基礎，照舊保持起來，祇是修補細則，粉飾聞事（『改良』）——這就是孟塞維克的策略在實際上的意義。

反之，任何一個偉大的革命，不使軍隊『瓦解』，無論過去和現在，都是不會的。因為軍隊是保護舊制度的最可靠的工具，是資產階級的紀律、以及擁護資本統治、保持並教育勞動者奴隸般的恭順與服從資本的最有力量的——一個柱石。反革命絕對不會容忍而且也不能容忍武裝的工人同軍隊同時存在的。恩格斯說過，在法國，每次革命之後，工人們是武裝着的：

『所以，對於得到了國家政權的資產者，解除工人的武裝是第一條金科玉律。』

武裝的工人曾為新的軍隊底萌芽，曾為新的社會制度之有組織的核心。破壞這個核心，不使牠發展——這是資產階級底第一條金科玉律。一切勝利的革命底第一條金科玉律——馬克思與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說過——是：破壞舊軍隊，解散舊軍隊，用新軍隊來代替牠。要起來統治的新的社會階級，要是不完全破壞舊的軍隊

（即反動的或簡直怯懦的小資產者所狂號不休的所謂『破壞組織』；要是不經過沒有任何軍隊的最困難的，最痛苦的時期（法蘭西大革命曾經過這樣最痛苦的時期）●●；要是不逐漸地在艱難的國內戰爭中間，創造新的階級之新的軍隊、新的紀律、新的軍事組織，——那是從來不能達到而且現在也不能達到這個統治與鞏固這個統治的。歷史家考茨基從前懂了一點。叛徒的考茨基却忘記了這一點。

如果考茨基稱贊孟塞維克在俄國革命中的策略，那末他有什麼權力來稱謝德曼輩為『政府的社會主義者』呢？擁護克倫斯基，加入他的內閣的孟塞維克，也是同樣的政府的社會主義者。只要考茨基提出關於舉行帝國主義戰爭的統治階級的問題，他就絕對逃不掉這個結論。然而考茨基却不去提出關於統治階級的問題（這是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提出的問題），因為一提出這個問題就會揭破叛徒底面目。

德國的考茨基主義者，法國的朗格主義者，意大利的都拉底一流人，他們的議論是這樣的：社會主義須要民族底平等與自由，民族底自決，所以當人們向我們國家進攻，或敵人的軍隊侵入我們的國土時，社會主義者有權而且應該起來擁護故

鄉。但是從理論方面說來，這種議論，不是完全污辱社會主義，便是騙人的遁辭，而在實際政治方面說來，這種議論，同那些不能考慮戰爭底社會性與階級性和不知道革命政黨在反動戰爭時的任務的十足愚人底議論，沒有什麼分別。

社會主義反對加於民族的暴力，這是無庸爭辯的。可是社會主義是一般地反對加於人們的暴力。然而，除了基督教無政府主義與託爾斯泰主義^{●●}之外，誰也不會從此得出結論，說社會主義反對革命的暴力。可是，只說一般的『暴力』，不分析那區別反動的與革命的暴力的條件，這是離開革命的庸人，或簡直等於用詭辯來自欺欺人。

關於對民族使用暴力的問題也是如此。一切戰爭都是對於民族使用暴力，但這不妨社會主義者去贊成革命的戰爭。擺在社會主義者（如若他不是叛徒）前面的基本問題，就是戰爭底階級性。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底兩個集團之間爲了瓜分世界，爲了瓜分贓物，爲了掠奪與征服弱小民族而起的戰爭。一九一二年巴塞爾宣言就是這樣估計戰爭的，而且這種估計已爲事

實所證實了。誰離開這種對於戰爭的觀點，誰就不是社會主義者。

如若威廉治下的德國人，或克里孟梭治下的法國人說道，假如敵人侵入我們的國土，社會主義者的我，就可以而且應該起來保護故鄉，那末這種議論不是社會主義者的，不是國際主義者的，不是革命無產階級的，而是庸俗的民族主義者的。因為在這個議論中，並沒有工人反對資本階級的革命的爭鬥，並沒有從世界資產階級與世界無產階級底觀點來估計整個的戰爭，這就是並沒有國際主義，而所有的是可憐的狹隘的民族主義。我的國家被人侵凌，其他一切我都不管——這就是這種議論底結論，也就是牠的庸俗民族主義的狹隘性。這正像對某個人被人家使用暴力，有人起來說：社會主義是反對暴力的，所以我與其坐在監獄內，不如去賣階級。

法人、德人、或意人說：社會主義是反對對民族使用暴力的，所以當敵人侵入我國時，我是要起來保護的，——這種人，是出賣社會主義與國際主義的。因為這種人所看到的祇是自己的『國家』，他把『自己的』……『資產階級』，看做高於一切的東西，他毫不想及使戰爭變為帝國主義的、使他的資產階級變為帝國主義掠

奪鎖鏈中之一環的那種國際聯繫。

一切庸人和一切愚人所持的議論，正像考茨基主義者、朗格主義者、都拉底等等這些叛徒們所持的議論一樣，這就是：敵人在我們的國內，其餘一切我都不管。

社會主義者、革命的無產者、國際主義者所持的議論，是不同的：戰爭底性質（是反動的或是革命的），不是以誰進攻和「敵人」在誰的國家內來決定的，而是要看那一階級進行戰爭，這戰爭所繼續的那一種政策來決定的。如若這個戰爭是反動的帝國主義的戰爭，就是說，為帝國主義的、暴力的、掠奪的、反動資產階級底

* 社會國家主義者（謝德曼費、倫諾德費、亨德遜費、剛比爾斯費等等）在大戰時拒絕一切關於「國際」的言論。他們認為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就是社會主義底……「變節者」。他們贊成本國資產階級底侵略政策。社會和平主義者（就是說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實際上的庸俗和平主義者）表示一切「國際主義的」感覺，起來反對吞併政策等等，但是實際上繼續擁護自己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社會國家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之間的差別，是不重要的，其差別如口出惡言的資本家與口出甘言的資本家之間的差別一樣。

兩個世界集團所進行的戰爭，那末一切資產階級（就是小國的也在內）都變成爲掠奪底參加人，而我的任務，革命無產階級代表者底任務，是在準備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因爲這是跳出世界戰爭底慘狀之唯一的救星。我的議論不應該從『自己的』國家底觀點出發（因爲這是民族主義的小資產者的議論，這種小資產者，不知道他是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手中的玩具），而應該從我之參加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之準備、宣傳、與推進的觀點出發。

這就是國際主義，這就是國際主義者、革命的工人、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底任務。這就是叛徒考茨基所『忘記了』的粗淺的道理。但當考茨基從贊許小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俄國的孟塞維克，法國的朗格主義者，意大利的都拉底，德國的哈薩之流）底策略，轉到批評布爾塞維克底策略時，他的叛變行爲就更其明顯了。請看他的批評吧：

『布爾塞維克的革命，是建築於這樣的假定之上的：這革命將爲全歐洲革命底出發點；俄國勇敢的發起，將推動全歐洲底無產者興奮起來。』

『在這種假定之下，俄國的單獨議和將採取何種形式，他將以何種艱難困苦與土地的損失（原文爲 *Verstümmelungen*，意即：粉身碎骨）給與俄國的人民，如何來解樹民族自決，當然可以置之不問。那時俄國是否能夠自衛，亦可不問。照這種觀點看來，歐洲的革命是俄國革命之最好的保衛，歐洲的革命將給與舊日俄羅斯領土上的各民族以完全的真正的自決。

『在歐洲產生社會主義與鞏固社會主義的歐洲革命，也應該成爲消除那些阻礙經濟落後的俄國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的障礙物的工具。

『所有這些都說得很通的，都很有根據的，只要是容許下面這個基本的假定：即俄國的革命必然要引起歐洲的革命。但是，如若歐洲革命不發生，那又怎麼辦呢？

『直到現在，這種假定還沒有證實。於是人們現在責備歐洲的無產者，說他們拋棄了與出賣了俄國的革命，這簡直是無的放矢，因爲歐洲無產階級底行動誰能負責呢？』（二八頁）。

此外考茨基還再三再四地說，馬克思、恩格斯、培培爾關於他們所期待的革命底到來，也曾經不止一次的發生過錯誤，但他們從來沒有建築他們的策略於『定

期』的革命底期待上（二九頁），而布爾塞維克却『事事都以全歐革命爲靠山』。我們有意摘錄這樣冗長的一段，爲的要明白地告訴讀者，考茨基如何『精巧地』假造馬克思主義，用卑鄙的與反動的庸俗的觀點來代替馬克思主義。

第一、把明顯的愚蠢歸之於他的對手，然後再來否認牠，這是不大聰明的人底方法。如若布爾塞維克建築他們的策略於有定期的其他各國的革命的期待上，這當然是愚蠢的。但布爾塞維克黨並沒有做過這樣愚蠢的事情；在我給美國工人的一封信（一九一八年八月二十日）¹我曾經直截了當地避去這種愚蠢，我說，我們打算到美國的革命，但並沒有說到一定的時期。在我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左派共產主義者』爭論的時候（一九一八年一月至三月²），我曾經不止一次地發揮了同樣

* 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一七六至一八九頁。（編者）

¹ 參看列寧選集第十三卷，一九一八年三月七號和八號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報告和結論；又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一九一八年三月十四號和十五號關於簽訂和平條約的報告與結論（三八八至四〇九頁）；以

及論革命的高潮（二六一至二六九頁）和奇聞怪事（二九六至三〇三頁）這兩篇文章。（編者）

的意見。考茨基玩了一套小小的……很小的把戲，他對於布爾塞維主義的批評就是建築在這種把戲上的。考茨基把計算到多少切近的，但不是有定期的歐洲革命的策略，與計算到有定期的歐洲革命的策略，混爲一談了。這是小小的一個騙局，真是很小的！

第二種策略是愚蠢的東西。第一種策略是馬克思主義者、一切革命的無產者、與國際主義者所應有的，因爲祇有牠才是馬克思主義地、正確地、估計到歐洲各國因戰爭而發生的客觀狀況，祇有牠才能符合無產階級底國際的任務。

考茨基拿革命家布爾塞維克可以犯而沒有犯了的錯誤的小問題，來代替關於一般革命策略底基礎的大問題，這樣他已很巧妙地離開一般的革命策略了！

政治上的叛徒考茨基，在理論上竟不能提出關於革命策略底客觀的先決條件問題。

這裏我們已經說到第二點了。

第二、如若革命形勢的存在的時候，計算到歐洲的革命，是馬克思主義者所

應做的事。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底策略，在有革命形勢時與沒有革命形勢時，是不會一樣的，這是馬克思主義底初步真理。

如若考茨基提出這個爲馬克思主義者所應有的問題，那他就會看到，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必然是反對他的。在戰前很久的時候，一切馬克思主義者、一切社會主義者都曾同意；歐洲的戰爭將造成革命形勢。當考茨基還不是叛徒的時候，無論一九〇二年（社會革命），無論在一九〇九年（到政權之路）都明顯而確定地承認了這一點。用全體「第二國際」的名義發出的巴塞爾宣言也承認了這一點：無怪全世界社會國家主義者與考茨基主義者（「中派」，即動搖於革命者與機會主義者中間的人們），其懼怕巴塞爾宣言上關於這一點的聲明，如烈火一樣！

可見歐洲革命形勢底期待，不是布爾塞維克底熱情，而是一切馬克思主義者底公意。如若考茨基用這類的話，說布爾塞維克「向來相信了暴力與意志底萬能」，來避免這個無疑的真理，那末這恰恰就是空話，是用以遮蓋自己的躲避和可恥地躲避提出關於革命形勢問題的。

再者，實際上革命形勢，到底來了沒有？這問題是考茨基所不能提出的。經濟的事實可以回答這個問題：到處爲戰爭所造成的飢荒與破產，這就是革命形勢。政治的事實也可以回答這個問題：一九一五年起，在各國裏面已經顯然暴露了陳舊的、腐敗的社會主義黨底分裂過程，無產階級羣衆離開社會國家主義的領袖，而左傾到革命的思想與情緒，以及革命的領袖的過程。

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當考茨基寫他的小冊子時，看不到這些事實的，祇有懼怕革命叛變革命的人。現在呢，在一九一八年十月末，在歐洲許多國家的革命，已經在每一個人的眼前很迅速地發展着。希望人家還是像從前一樣稱他爲馬克思主義者的『革命家』考茨基，竟是這樣的一個近視的庸人（正像一八四八年爲馬克思所譏笑的庸人），看不到日漸到來的革命！

於是我們又要說到第三點了。

第三、在歐洲已有革命形勢的條件之下，革命策略底特點是怎樣呢？變成了叛徒的考茨基怕提出這個爲馬克思主義者所應提的問題。考茨基所持的議論正像標本

式的庸人俗子或無知的農民一樣：『全歐洲的革命』來了沒有？如若已經來了，那末他也準備着做一個革命者！但我們可以說，那時一切的混蛋（如像現在那些有時混入得了勝利的布爾塞維克內的混賬王八蛋一樣），都將宣佈自己是革命者了！

如若沒有到來，那時考茨基就要離開革命！考茨基簡直一點也不懂得這樣的真理：革命者的馬克思主義者，同庸人俗子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他能夠向蒙昧的羣衆宣傳成熟着的革命之必然性，證明出牠的不可避免，說明出牠對於民衆的利益，準備無產階級、一切勞動羣衆與被剝削民衆去幹這個革命。

考茨基把無意義的話歸之於布爾塞維克，似乎他們計算到歐洲的革命將在一定期內到來，所以事事都以牠做靠山。這種無意義的話，正是反對考茨基自己的，因為他正是這樣想：如若歐洲革命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五日到來的話，那末布爾塞維克底策略就對了！（考茨基恰恰是指出這個日子，因為這是他著小冊子的日期）而在八月五日之後，經過幾個星期已經顯然可以看出，歐洲許多國家內的革命正在到來，於是考茨基底一切叛徒性，他的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假造，一切他的不能以革

命精神去推論與甚至不能以革命精神提出問題，都全部暴露出來了！

考茨基寫道：人們責備歐洲的無產者爲叛變，這簡直是無的放矢。

考茨基先生你錯了！你試拿鏡子照一下，你就會看到，這責備的矢，是向什麼人放的。考茨基裝做天真爛漫的樣子，似乎他不知道誰說出這種責備，這種責備有什麼意思。實際上，考茨基很知道，這種責備是德國的『左派』、斯巴達派。李卜克內西及其朋友們過去和現在所提的。這種責備表示一種明確的認識：當德國的無產階級撲滅芬蘭、烏克蘭、蘭多維亞、愛沙尼亞時，牠就叛變了俄國的（與世界的）革命。這責備所首先和主要要反對的，不是那些常被鎮壓的羣衆，而是那些像謝德曼與考茨基輩的領袖們，因爲他們不執行羣衆中的革命的鼓動、革命的宣傳、與革命的工作等義務，以反對羣衆底遲鈍守舊性，因爲他們的行動實際上違反了被壓迫階級底羣衆中所常常蘊蓄着的革命的本能與志向。謝德曼輩直截了當地、愚蠢地、驕縱地、大部份是自私自利地出賣了無產階級，跑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考茨基主義者與朗格主義者所做的事也是一個樣子的，不過他們動搖着，不堅決，

胆小地左顧右盼，看看在這一時期誰是強有力的。考茨基在戰時的一切著作都是消滅革命精神的，而不是鼓勵與發展這個精神。

考茨基竟不了解，關於歐洲的無產者出賣了俄國革命的『責備』，有何種偉大的理論的意義，何種更廣大的宣傳與鼓動的意義，這樣的「不了解簡直會成爲德國正統社會民主黨『中派』領袖庸愚化底歷史紀念碑了！考茨基不了解，這種『責備』在德意志『帝國』檢查刊物的條件之下，乃是沒有出賣社會主義的德國社會主義者，李卜克內西及其朋友們唯一的可以表示自己的號召的方式，號召德國工人起來打倒謝德曼輩與考茨基輩，丟去這類的『領袖們』，從他們的愚魯的與下流的鼓動之下解放出來，違反他們，不理他們，越過他們而起來革命，而參加革命！

考茨基不了解這一點。他怎樣能了解布爾塞維克底策略呢？我們能否希望一個離開一般革命的人，來計較與估量在一種最『困難』的情形中的革命發展的條件呢？

布爾塞維克底策略，是正確的策略，是唯一國際主義的策略，因爲他不根據於

怯懦的恐懼世界革命，不根據於小資產階級式的『不信任』世界革命，不根據於那祇保護『自己』祖國（自己的資產階級底祖國）而『鄙視』其餘一切的、狹義的、民族主義的願望，而是根據於對歐洲革命形勢之正確的（這在戰爭以前，在社會國家主義者與社會和平主義者變節以前，為大家所公認的）估量之上的。這個策略是唯一國際主義的策略，因為牠實行了一國內所能實現的最高限度，為的要發展、擁護、及覺醒一切其他各國的革命。這種策略已為很大的成功所證實，因為布爾塞維克主義（這並不是因為俄國布爾塞維克底功勞，而因為民衆到處對於事實上是革命的策略表示最深刻的同情）變成了世界的布爾塞維主義，貢獻出了具體地實際上同社會國家主義與社會和平主義不相同的思想、理論、黨綱、策略。布爾塞維主義把謝德曼與考茨基輩、倫諾德與朗格輩，亨德遜與麥克唐納輩底陳舊的腐敗的「國際」完全推倒了，這些人在夢想『統一』和復活死屍，他們將互相傾軋。布爾塞維主義創造了「第三國際」底思想上與策略上的基礎，這個「國際」是真正無產階級的與共產主義的，牠估計到和平時代底勝利，同時又估計到已經開始了的革命時代底

經驗。

布爾塞維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底思想，在全世界上通俗化起來，把這幾個字起初從拉丁文，譯成俄文，然後譯成世界各國的文字，且拿蘇維埃政權底實例來指示出：甚至落後國家中，甚至最少經驗、最少教育、與最少組織習慣的工人與貧農，在整年之內，在極大的困難中，在同剝削者（被全世界底資產階級所擁護的剝削者）的鬥爭中，能夠保持勞動者底政權，造成比世界上所有一切民主更高更廣的民主，開始實際地實現社會主義的數千百萬工農底創造性。

布爾塞維主義實際上如此有力地幫助了歐美無產階級革命底發展，這是任何一個底任何一個政黨迄今所不能幫助的。當全世界底工人，日益明顯地看到，謝德曼與考茨基之流底策略，並不能從帝國主義的戰爭中以及從帝國主義資產階級之僱用奴隸中解放出來，日益明顯地看到，這種策略是不能為世界各國底榜樣的時候，——在這時候，在全世界無產階級者羣衆，日益明顯地看到，布爾塞維主義指出了從戰爭中與帝國主義底慘狀中救出來的正確道路，日益明顯地看到，布爾塞維主義是

足·爲·大·家·的·榜·樣·的。

大家都眼見到，不但在全歐洲，就是全世界的無產階級革命也在成熟起來，俄國無產階級底勝利，幫助了牠、加速了牠，擁護了牠。一切這些對於社會主義之完全勝利還不夠麼？當然不夠。一個國家不能做許多的東西。但這一個國家，因為有蘇維埃政權，已經做了很多的東西，甚至如果世界帝國主義假定用德國帝國主義與英法帝國主義的協定的方法明天就壓倒了俄國蘇維埃政權——甚至就在這種最壞的情形之下，布爾塞維克的策略，對於社會主義，也貢獻了莫大的益處，對於不可征服的世界革命底發展也有極大的幫助。

冒名「經濟的分析」而爲資產階級効勞

我在前而已經說過，考茨基底書名，如果要名副其實，那末不應稱做無產階級專政，而應稱做附和資產階級對於布爾塞維克的攻擊。

孟塞維克關於俄國革命底資產階級性的舊「理論」，就是說，孟塞維克舊日對

於馬克思主義的曲解（在一九〇五年被考茨基所駁倒的。●——），現在又被這個理論家重新恢復起來了。無論這問題對於俄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乾燥無味，但我們却不能不來說一說牠。

俄國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在一九〇五年前俄國一切馬克思主義者都是這樣說的。以自由主義來代替馬克思主義的孟塞維克，由此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所以，無產階級不能超出於資產階級所容忍的範圍，應該採取同資產階級協定的政策。布爾塞維克那時就說，這是自由資產階級的理論。資產階級企圖照資產階級的方式，用改良主義的方法，而不用革命的方法來改造國家，盡可能地保持君主政體與地主的土地佔有制等等。無產階級應該不讓資產階級以改良主義來「約束」自己，而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幹到底。布爾塞維克曾把資產階級革命時的階級的力量對比，歸納成這樣的一個公式：無產階級聯合農民，使自由資產階級中立，將君主政體、中世紀制、地主的土地佔有制破壞到底。

無產階級同一般的農民聯合，是革命底資產階級性的表現，因為一般的農民都

是佔在商品生產底地位上的小生產者。此外，布爾塞維克那時又補充說：無產階級聯合一切半無產階級（一切被剝削者與勞動者），使中農中立，推倒資產階級。這就是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同的社會主義革命之所在（見一九〇五年我著的兩個策略，牠重載於十二年來的文集中，此文集於一九〇七年出版於彼得堡）。

考茨基在一九〇五年，因孟塞維克普列漢諾夫之質問，曾間接參加過這種爭論，而他的回答實際上是反對普列漢諾夫的。這件事，那時曾引起布爾塞維克刊物特別的譏笑。現在考茨基對於那時的爭論竟一字不提（怕別人拿他自己的話來揭破他！），以致使德國的讀者沒有法子了解問題底真相。考茨基先生於一九一八年不能告訴德國工人：在一九〇五年，他如何主張工人同農民聯合，而不同資產階級聯合，并在何種條件之下，他擁護了這種聯合，爲了這個聯合，他提出了何種綱領。

開倒車的考茨基，現在冒名「經濟的分析」，用「歷史唯物論」的驕傲的話，來擁護工人之服從資產階級，借用孟塞維克馬斯洛夫底話，來咀嚼孟塞維克底陳腐

的自由派的觀點；同時，他用這些引證來證明關於俄國是落後的——新的意見，而從這種新意見上得出的結論都是舊的，說在資產階級革命之下不應比資產階級跑得更遠——這完全違反馬克思與恩格斯在比較一七八九到一七九三年的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與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所說的話●●。

在研究者茨基底「經濟的分析」之主要「論據」與主要內容之前，我們要指出，他的起頭的話就表示出作者思想非常糊塗或淺薄輕率。我們的「理論家」說：

「一直到現在，俄國底經濟基礎是農業，而且正是小農的生產。他們佔全體人口五分之四，或竟至六分之五。」（四五頁）

第一、親愛的理論家，你曾經想過沒有，在這大批的小生產者中間，能有多少剝削者呢？當然，不過總數十分之一，至於城市中，他們的數量就更小了；因為那裏大生產更加發展。就是取最高的數目字吧，假定五分之一的小生產者是失去了選舉權的剝削者。那你就可以看到，第五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百分之六十六的布爾塞維克，是代表了大多數民衆的。此外還要補充的，就是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中間

常有一大部分人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就是說，在原則上全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是擁護蘇維埃政權的，而當一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於一九一八年七月起來幹冒險的暴動時，那麼另一部分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就由過去的一個政黨分裂出來而組成了兩個新的政黨——「人民共產黨」與「革命共產黨」^{⑩⑪}。（在這兩個新黨內，有許多著名的左派的社會革命黨人，他們曾經由舊黨提出來擔任最重要的國家的職位，如第一黨有查克思，第二黨有考里加也夫）。所以考茨基自己就推翻了——無意中——似乎贊成布爾塞維克的是人民底少數的那種可笑的說法。

第二、親愛的理論家，你曾經想過沒有，小農生產者必然地要動搖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這為歐洲一切最新歷史所證實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考茨基恰把牠『忘記了』，因為這真理會把所重複的孟塞維克的理論打得粉碎！如果考茨基不『忘記』這理論，那他就不會否認在小農生產者佔優勢的國內，有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吧。

現在來研究我們的理論家底『經濟的分析』之主要的內容。

考茨基說，蘇維埃政權是一種專政，這是不成問題的。

『但這是無產階級專政麼？』（第三四頁）

『據蘇維埃的憲法，農民佔有參加立法與管理之權的人民底大多數。那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如果是澈底施行的，如若一般說來一個階級是能够直接實現專政的（實際上只有政黨可以實現），那末這不過是農民專政吧。』（第三五頁）

良善的考茨基，非常滿意於如此深刻、如此聰明的議論，他就這樣譏諷道：

『這樣說來，似乎社會主義之最健全的實現，只有把牠交給農民手中的時候才有保證吧。』（三五頁）

我們的理論家從半自由主義的馬斯洛夫方面，引用了許多非常深奧的話，很詳盡地證明，說農民爲自己的利益着想，願意麵包的價格高與城市人工資之低廉等等的思想。附帶說一說，這種新思想對於戰後時期之真正新的現象愈少注意，則牠敘述得愈是乾燥無味；這些現象比方就是：農民出賣麵包時，他所需要的，不是金錢而是商品，農民所缺乏的，是無論用多少錢都得不到足數的工具。關於這一

點，以後我們還要特別講到的。

可見考茨基公然責備布爾塞維克黨，責備無產階級底政黨，說牠把專政，把社會主義實行底事業，交給了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手裏。好吧，考茨基先生！據你的高明的意見，無產階級的政黨對於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應該取何種態度呢？

關於這一點，我們的理論家，記到了『出口如銀，絨口如金』的俗話，覺得還是絨口的好。但考茨基在下面的議論中，却露了自己的馬脚：

『在蘇維埃共和國開始的時候，農民蘇維埃^①曾經是全體農民組織。現在這個共和國宣稱，蘇維埃為無產者與貧農底組織。在蘇維埃中富農失去了選舉權。此地貧農被認為是「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社會主義土地改良之經常的與大批的產物。』（第四八頁）

何等厲害的諷刺啊！在俄國，這種諷刺從任何資產者方面都可以聽到：他們都幸災樂禍地譏諷說，蘇維埃共和國公開承認貧農底存在。他們譏笑社會主義。這是他們的權利。但是，『社會主義者』來譏笑這個事實：在四年大破壞的戰爭之後，我們國內有貧農底存在，而且在很長的時期內他們還將存在，——這種『社會主義

者』只有在大批叛變底環境中才能產生出來。

請再聽吧：

『……蘇維埃共和國干涉富農與貧農間的關係，但牠却不是用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法。為要滿足市民對於麵包的需要，把武裝工人底隊伍派到鄉村中去，以奪取富農底剩餘麵包。這麵包底一部份交給城市居民，另一部份則分給貧農。』（第四八頁）

很明顯的，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想到這種辦法會擴張到大城市的近郊以外（這種辦法已擴張到全國），所以異常憤激。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帶着庸人底無匹的、異常動人的冷淡（或癡呆）態度，說道：

『……這些辦法（剝奪富農的麵包）把紊亂不安與國內戰爭底新原素放到生產過程中去了……』（放到『生產過程』中去的國內戰爭，這真是一種超然的現象啊！）『……要恢復生產過程底健康，則安定與安全是十分需要的。』（四九頁）

對啊！對啊！講到那些私藏剩餘麵包，破壞麵包壟斷的法律，使城市居民發生飢荒的剝削者與麵包投機買賣者之安定與安全，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

考茨基，當然是值得歎息與流淚的。考茨基、亨利偉伯（維也納）、朗格（巴黎）與麥克唐納爾（倫敦）之流，都異口同聲地喊道，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我們都主張無產階級革命，但是……但是不要破壞麵包投機買賣者底安定與安全啊！我們聽『馬克思主義的』援引『生產過程』，來遮蓋這種對於資本家的卑鄙醜態的効勞……。如若這是馬克思主義，那末什麼是叫做對資產階級表示卑躬屈節呢？

請看我們的理論家所說的是什麼。他責備布爾塞維克，說他們把農民專政當做無產階級專政。但同時他又責備我們，說我們把國內戰爭帶到鄉村中去（我們以為這是我們的功績），說我們派遣武裝工人隊到鄉間去，以公開宣稱實行『無產階級與貧農底專政』，幫助貧農、剝削富農與投機商人所隱藏的剩餘麵包（隱藏剩餘麵包是違反麵包壟斷的法律的）。

一方面，我們的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主張純粹的民主，主張革命的階級，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底領袖，應該服從大多數人民（剝削者也在內）。另一方面，他

又反對我們而說明革命底資產階級性之必不可免，他以為革命之所以帶有資產階級性的緣故，是因為全部農民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社會關係底基礎上的，而同時他又自命為擁護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觀點！

這不是『經濟的分析』，這是一筆超等的糊塗賬。這不是馬克思主義，這是自由主義學說底片斷與向資產階級與富農表示卑躬屈節的鼓吹。

被考茨基所攪得亂七八糟的問題，布爾塞維克在一九〇五年就已經完全說明了。不錯，在我們同全體農民一起的時候，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性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十分明白地認識了，我們從一九〇五年起，說了何止千百遍，我們從沒有企圖跳過歷史行程底這個必要的階段，也從來沒有企圖用命令來取消牠。考茨基想在這方面來『揭破』我們，這不過揭破他自己的觀點底紛亂，揭示他的懼怕回憶他在一九〇五年當他還不是叛徒時所寫的東西。

但是在一九一七年，從四月起，遠在我們奪取政權的十月革命之前，我們公開地說過，並向民衆解釋過：現在革命不能停止在這個階段上了，因為我們的國家已

經前進了，資本主義已經向前發展了，破壞已達到空前的程度了，這破壞要求（不論誰願意與否）進一步的走向社會主義。因為不如此，便不能前進，不如此不能救出被戰爭所疲憊的國家，不如此便不能減輕勞動者與被剝削者底痛苦。

實際的情形，正像我們所曾說過的一樣。革命底經過證實了我們的議論是正確的。起初我們同全體農民反對君主政體，反對地主，反對中世紀制（因此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然後我們同貧農、同半無產階級、同一切被剝削者，反對資本主義，連鄉村的富翁、富農、投機者也在反對之內，因此革命便成了社會主義的革命。想把人工的萬里長城，置於這兩種革命之間，或以其他的方法來隔絕這兩種革命，不以無產階級準備的程度及牠同鄉村貧農聯合的程度來分別這兩者，那簡直是馬克思主義之最大的曲解與庸俗化，是用自由主義來代替了馬克思主義。那就是用假學者的援引資產階級比中世紀制是進步這一點，來暗中對資產階級作反動的袒護，而反對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

將工農羣衆聯合與引進到政治生活中去的蘇維埃，是最接近於『人民』的（即

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所說的真正人民革命的意思)……，是羣衆政治的和階級的成熟之發展與增長的最正確的晴雨計，而牠之所以爲民主主義之更高的形式和狀態，也就是因爲這個緣故。蘇維埃的憲法，不是依照什麼『計劃』寫下來的，不是在書房內定下來的，也不是資產階級的法律家所強制勞苦羣衆的東西。不，這憲法是在階級鬥爭發展底過程中，是依階級矛盾成熟底程度，而成長起來的。考茨基不能不承認的那些事實，正是證明了這一點。

起初蘇維埃聯合了全體農民。正因貧農之不覺悟、落後、無智識，才把領導交給了富農、有錢人、資本家，小資產階級與智識份子手裏。這就是小資產階級、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統治的時候（說前者和後者爲社會主義者，只有考茨基那樣的傻瓜或叛徒才會這樣做）。小資產階級必然、必不可免地要動搖於資產階級專政（克倫斯基、郭尼洛夫、沙維科夫）與無產階級專政之間，因爲小資產階級由於牠的經濟地位之根本屬性，不能幹什麼獨立的行動。要附帶說一說當考茨基分析俄國的革命時，利用『民主』之法律的形式概念（資產階級用以遮蓋牠的統治與欺騙

羣衆的)作爲了事而忘記了『民主』實際上有時是表現資產階級專政，有時是表現服從這專政的小資產階級之無力的改良主義等等，這樣考茨基就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照考茨基說來，在資本主義國內，曾有資產階級的政黨，曾有領導無產階級大多數、領導無產階級羣衆的黨(布爾塞維克)，而並沒有小資產階級的黨！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並沒有階級的根源——小資產階級的根源！

小資產階級——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底動搖，教育了羣衆，使他們的最大多數、一切『下層羣衆』、一切無產階級者與半無產者離開了這些『領袖』。

在蘇維埃中間(在十月革命前的彼得堡與莫斯科)，布爾塞維克佔了優勢，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內部的分裂，也加強了。

勝利的布爾塞維主義的革命，就是動搖底終結，就是君主政體與地主的土地佔有制底完全破壞(在十月革命以前這還沒有破壞)。資產階級的革命，被我們幹到底了。全體農民都跟了我們走。他們對於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的對抗，一時還不能表現出來。蘇維埃聯合了全體農民。農民內部的階級分化還沒有成熟，還沒有顯然

表現出來。

這個過程在一九一八年夏天與秋天發展起來了。捷克斯拉夫人的反革命的暴動提醒了富農。俄國發生了富農暴動底風潮。貧農不是從書本上，不是從報紙上，而是從生活中知道了他們的利益同富農、有錢人、鄉村資產階級底利益，是不能調和的。「社會革命黨左派」同一切小資產階級政黨一樣，反映出了羣衆底動搖，且恰恰在一九一八年夏天，牠們就分裂了：一部份同捷克斯拉夫人聯合（在莫斯科起暴動，當時普羅相奪取了——一小時——電報局，通告全俄以布爾塞維克已被推倒的消息）。後來有反捷克斯拉夫人的軍隊總司令謨拉維夫之叛變等等；一部份（上面已經講過的）還是同布爾塞維克在一起。

城市中食品需要底緊張，日益嚴厲地提出了麵包壟斷的問題（理論家考茨基在他的經濟分析中，在他重複十年前馬斯洛夫所說過的話底分析中，「忘記了」麵包壟斷！）。

舊的、地主的與資產階級的、甚至民主共和國，把實際上操在資產階級手裏

的武裝隊派到鄉村中去。這是考茨基先生所不知道的！他不以為這是『資產階級專政』——上帝保佑！這是『純粹的民主』，尤其是，如若這種行爲爲資產階級的國會所批准了的時候！關於阿克仙蒂夫與馬斯洛夫聯同克倫斯基和蔡雷特利等孟塞維克與社會革命黨人，於一九一七年夏天和秋天如何逮捕土地委員會底委員。●●關於這一點考茨基簡直『沒有聽到』，關於這一點簡直不置一詞！

全部問題就在：經過民主共和國而實現資產階級專政的資產階級國家，不能在人民的面前承認，說這國家是爲資產階級服務的，不能對人民說真話，不能不戴假面具。

而「巴黎公社」式的國家，蘇維埃的國家，直爽地和公開地對民衆說真話，聲稱牠是無產階級與貧農底專政，且正因爲牠說這種真話，所以把千百萬新的公民，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這些公民在任何共和國之下都是被壓制着的），且他們是由蘇維埃引進政治、引進民主、引進對國家的管理中去的。蘇維埃共和國把武裝的工人隊伍，尤其是最覺悟的工人，從都市派到鄉下去。這些工人把社會主義帶到了鄉

村中去，將貧農吸引到自己方面來，組織他們，教育他們，幫助他們去鎮壓資產階級底反抗。

明白情形與曾經到過鄉村的人都說，我們的鄉村只在一九一八年夏天和秋天才經過了『十月』（即無產階級的）『革命』。轉變來了。富農暴動底風潮，爲貧農底奮起，『貧農委員會』底發展所代替了。在軍隊內，工人出身的黨代表、軍官、軍長與師長增加起來了。正是考茨基爲七月恐慌（一九一八年）與資產階級底狂叫所嚇倒，而像『小公雞』一樣跟着資產階級跑，並著了整本充滿布爾塞維克必爲農民所推倒的信念的小冊子時，正在這個小傻瓜認爲因社會革命黨左派的退出而擁護布爾塞維克的人底範圍『縮小』（三十七頁）的時候，布爾塞維主義同情者之真正的範圍却十二分地擴大，因爲那時數千百萬從富農與鄉村資產階級底影響與約束之下解放出來的貧農，都興奮起來參加獨立的政治生活了。

我們失去了幾百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無骨格的知識份子與農民中的富農，而我們却得到了數百萬貧農底代表。

在各都市內無產階級革命一年之後，在窮鄉僻壤的無產階級革命，才在前者影響之下，并由於前者底幫助而開始了，這就最後地鞏固了蘇維埃政權與布爾塞維主義，最後地證明國內已沒有一種力量能夠反對布爾塞維主義了。

俄國無產階級同全體農民聯合完成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後，就最後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上去了，因為牠能夠分裂鄉村，把鄉村無產者與半無產者吸引到自己方面來，把他們統一起來，去反對富農與資產階級以及農民中的資產階級。

如果都市與大工業中心底布爾塞維主義的無產階級，不能把鄉村的貧農聯合於自己的周圍來反對富農，那時，就可證明俄國社會主義革命還沒有『成熟』，那麼，該時的農民就仍舊還是『整個的』，就是說，農民還是在富農、有錢人、資產階級底經濟的、政治的、與精神的領導之下，而革命還未超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底

* 在蘇維埃第六次代表大會上（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七日至九日），有表決權的代表為九六七人，

其中布爾塞維克為九五〇人，有發言權的代表為三五一人，其中布爾塞維克為三三五人。現共布爾塞維

克佔全數百分之九七。

範圍之外。（但是要附帶地說一說，即使按上而這種說法，還是沒有證明，無產階級不應奪取政權的，因為只有無產階級真正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幹到了底，只有無產階級認真地來推進了世界無產階級的革命，只有無產階級建立了蘇維埃國家、爲「巴黎公社」以後走向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二步）。

在另一方面，如若布爾塞維主義的無產階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與十一月，不能等待鄉村底階級分化，不能準備會實行這種分化，立刻就想『命令』國內戰爭或鄉村中『施行社會主義』，就想不同一般農民做臨時的聯合，不肯對中農做許多讓步等，——那麼，這就是白郎基主義式的曲解馬克思主義，那麼這就是少數人用自己的意志來強制多數人的企圖，那麼這就是理論的荒謬，這就是不了解：全體農民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在落後國內沒有許多的過渡，沒有許多過渡的階段，是不能從資產階級革命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

考茨基對於這個最重要的理論上的與政治上的問題，簡直是弄得一塌糊塗，實際行動上他只是做了資產階級之叫喊反對無產階級的奴僕。

對於另一個最有興趣最重要的問題，考茨基也是同樣的糊塗，這問題就是：在土地改造（這是最困難同時又是最重要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蘇維埃共和國底立法行動，在原則上，是否布置得正確，其次是否施行得適當呢？凡是只要知道最重要文件的西歐任何馬克思主義者，如若能給我們的政策以批評，那我們就對他感激不盡，因為這對於我們，對於全世界成熟着的革命，都有非常大的幫助。但考茨基却不來批評，只給了使馬克思主義變成自由主義的理論的紊亂，只給了在實際上反對布爾塞維克的一些空洞的、凶惡的、庸俗的攻擊，讓讀者自己去判斷吧。

『大土地佔有制是不能保持下去了。這因為革命的緣故。這馬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牠不能不交給農民了……』（考茨基先生，這是不對的：你把你所『明瞭的東西』來代替各階級對於這問題的態度；革命史證明了資產者同小資產者——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所組成的聯合政府，採取了保持大土地佔有制的政策。馬斯洛夫底法律與土地委員之被捕，特別證明了這一點。沒有無產階級專政『農民』就不能戰勝與資本案聯合了的地主）。

『……但是關於在何種形式之下應將土地交給農民的問題，還沒有一致的主張。那時各種的解決是都可能的——』（考茨基所最擔心的，就是『社會主義者』底『一致』，不論是誰自稱爲社會主義者都好。他忘記了，資本主義社會底各基本階級對這問題應有不同的解決。）『……從社會主義的觀點上看來，最合理的方法是將大企業收爲國有，然後交給向來在這些企業上做工的農民，由他們用合作社的形式來耕種大田莊。但這種解決法應先有這些在俄國所沒有的鄉村工人。還有一個解決方法，就是將大地產收歸國有，然後把牠分裂爲小塊，租給土地不足的農民。那時也許可以實現一些社會主義吧……』

考茨基總是用這樣的老公式來脫身了事：一方面，不能不認識，另一方面，應該承認。他把各種解決放在一起，毫不設想——唯一切實的，唯一馬克思主義的設想——在某種特殊的條件之下，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應該怎樣？俄國是有農業工人的，但是並不多，至於蘇維埃政權所提出的問題：如何使土地耕種轉變到公社的與合作社的形式，考茨基竟一字不提。然而最奇怪的就是，考茨基想把小塊土地的出租看作爲『一些社會主義的實現』。其實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口號，其中絲

毫也沒有『社會主義』。如若出租土地的『國家』，不是「巴黎公社」式的國家，而是國會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考茨基底經常的假定恰恰是這樣的），那麼出租小塊土地，簡直是一種標本的自由主義的改良。

關於蘇維埃政權之廢除了一切土地私有權，考茨基簡直默而不言。更糟的，就是摘引蘇維埃政權底命令時，竟把其中最重要的地方丟了，這是他的絕大的騙局。

考茨基說了『小生產趨向於生產資料之完全私有』，說立憲會議是能阻止分割土地的『唯一權威』（這種論斷在俄國只能引起大笑，因為大家都知道，工農認為有權力的只有蘇維埃，而立憲會議已變成了捷克斯拉夫人與地主底口號了）並且他繼續着說：

『蘇維埃政府頒布的第一批命令內，有一個命令規定：（一）不用任何代價即刻廢除地主土地私有權。（二）地主的田莊，以及一切皇家的、寺院的、教堂的土地，以及牠們所有一切工具及牲畜，田園與附屬物等等，都歸縣農民代表蘇維埃鄉鎮土地委員會管理，直至立憲會議解決土地問題為止。』

只摘引了這兩條，考茨基就下結論道：

『關於立憲會議的話，不過是死的條文。實際上各單個鄉鎮的農民可以任意處置土地。』（四七頁）

你們看，這就是考茨基之『批評』底標本！這就是最像一種騙局的『學者的』作品。他告訴德國的讀者說，布爾塞維克在土地私有權的方面投降了農民！說布爾塞維克讓農民個別地『各單個鄉鎮』去處置土地！

其實，考茨基所摘引的命令（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第一令，其中不止兩條，而有五條，此外還有八條『訓令』，在那裏寫着，這訓令『應作爲我們的指南』。

在命令的第二條說，一切田產交給『民衆』，必須制定『所有沒收的財產之正確的統計』，並要有『最嚴格的革命的保護』。而訓令中說『土地私有權永遠廢除』、『精耕的農莊』、『不受分割』，『一切被沒收的土地所屬工具與牲畜，依據牠們的

見列寧選集第十一卷，土地令。（校者）

大小與意義，無報酬地全歸國家或村社使用』，『一切土地歸為全民的地基』。

此外，與立憲會議解散同時並舉的（一九一八年正月十八日〔五日〕）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了現在已包括在蘇維埃共和國基本憲法中的『勞動與被剝削民衆底權利宣言』。在這宣言中第二節第一項中說『土地私有權一概廢除』，『一切模範田莊與農業企業，都宣布為國家的財產』。

可見，關於立憲會議的話，並沒有變為死的條文，因為其他的全民的代表機關，在農民的眼中看來更有權力的機關，已經自行解決了土地問題。

此外，於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九日（六日）公布了土地社會化的法律，牠再次批准一切土地私有權之廢除，把土地與全部私有的農具交給蘇維埃政權處理，而受聯邦的蘇維埃政權底監督，牠指出處理土地的任務如下：

『發展耕種業中的集體農莊，減少個人經濟，以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經濟；這種集體農莊，在勞動與生產品經濟化方面說來，都是更有利益。』（第十一頁，第五條）

這個法律施行平均土地使用制，而對於『誰有使用土地的權利』這個基本問題這樣回答：

『第二十節。在「俄羅斯蘇維埃聯邦共和國」內的地面上的各單個田產，爲了社會的需要，可以使用者如下：（甲）以文化教育爲目的而使用的：（一）爲蘇維埃政權機關（聯邦的、特別區的、省的、縣的、鎮的與鄉村的）所代表的國家。（二）社會的組織（在地方蘇維埃政權管理之下與牠允許的）。（乙）以經營農業爲目的而使用的：（三）農業公社。（四）農業合作社。（五）鄉村團體。（六）單獨的家庭與個人……』

讀者可以看到，考茨基完全曲解了事實，並且用絕對虛偽的方法去把俄國無產階級國家底土地政策與土地法告訴德國的讀者。

考茨基甚至不能提出理論上重要的基本的問題！

這些問題如下：

- （一）土地平均使用以及
- （二）土地國有，——第一種和第二種辦法對於一般的社會主義的關係，尤其

是對於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過渡的關係。

(三) 土地底共同耕種，為從小的散漫的農業達到大的社會的農業的一個過渡。在蘇維埃立法中，這個問題底提出，是否滿足了社會主義底要求呢？

關於第一個問題，我們首先必須確定以下兩件基本的事實：(甲) 布爾塞維克在估計一九〇五年的經驗時（如像我自己關於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問題的著作*），曾指出土地平均的使用的口號，有民主的進步的、民主的革命的意義，而且在一九一七年，在十月革命以前也很確定地說到這一點**。(乙) 施行土地社會化的法律時（這法律底『靈魂』為土地平均使用的口號）布爾塞維克十二分確定地聲明：這思想不是我們的，我們是不同意這種口號的；但我們以為我們有施行牠的責任，因為這是農民大多數的要求***。而勞動者大多數底思想與要求，應該由

* 見列寧選集第五卷，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第一六八頁至一六九頁。（校者）

** 見本版列寧選集第十一卷農民與工人一文。（編者）

他們自己去消除；這種要求是不能『廢除的』，也不能『跳過的』。我們布爾塞維克應該幫助農民去消除小資產階級的口號，更快地與更輕便地從這些口號走到社會主義的口號。

理論家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想用他的科學的分析來幫助工人的革命，就應該回答：第一、土地平均使用底思想是否有民主的革命的意義，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幹到底的意義？第二、布爾塞維克自己投票來通過（並十二分誠實地來遵守）關於土地平均使用的小資產階級的法律，這種行爲是否對的？

考茨基甚至不能看到，在理論方面，問題底關鍵在那裏！

考茨基要否認平均底思想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有進步的和革命的意義，那是任何時候也辦不到的。這種革命不能比此走得更遠。將這革命幹到澈底的時候，牠將更明顯的、更快的、更容易的在民衆前而暴露出資產階級民主底解決之不足，有

見列寧選集第十一卷，一九一七年十一月七日（十月二十六日）關於土地的報告以及工人與勞動的和被剝削的農民的聯合。（編者）

超出牠的範圍而走向社會主義之必要。

推倒了沙皇與地主的農民，脫離了地主和脫離了資產階級國會的共和國家的農民，夢想到平均，而世界上是沒有一種力量能阻止這些農民的。無產者對農民說：我們來幫助你們達到『理想的』資本主義，因為土地底平均使用，從小生產者底觀點上看來是資本主義底理想化，同時，我們給你們指出這種辦法之不足與轉到共同耕種土地之必要。

試看考茨基如何能否定無產階級對於農民鬥爭的這種領導之正確性，這是一件有趣的事！

考茨基却覺得還是離開這問題好……

此外，考茨基不使德國的讀者知道，蘇維埃政權在土地的法律上把直接優先權給了公社與合作社，把牠們放在第一位，這樣考茨基就欺騙了德國的讀者。

同農民一起澈底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同農民中最貧苦的、無產階級的與半無產階級的部份，一起前進到社會主義革命！這是布爾塞維克底政策，這也是唯一

的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考茨基簡直糊塗得很，一個問題也不能提出來！一方面，他不敢說在平均土地問題上無產階級應該同農民分離，因為他覺得這種分離是荒謬的（而且在一九〇五年，當考茨基還不是叛徒的時候，他曾爽直而明白地主張過工農聯合，為革命勝利底條件）。另一方面，他又很同情地摘引孟塞維克馬斯洛夫底自由民主主義的俗論，因馬斯洛夫『證明』從社會主義底觀點上看來，小資產階級的平等是烏託邦的與反動的，他不說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觀點上看來，這種為平等、為平均的鬥爭，是進步的與革命的。

考茨基的糊塗真是沒有止境的：請注意吧，他是堅持着（一九一八年）俄國革命之資產階級性的。他要求（一九一八年）不要越過這個界限！而這個考茨基又把小資產階級的改革，把小塊土地分給貧農（即近於平均的辦法）作為『一些社會主義』底成份（在資產階級革命中）！

誰會了解！

此外，考茨基又表演出他對於一定政黨之實際政策的估計，是庸俗無能的。他摘引孟塞維克馬斯洛夫底說話，不願意看到一九一七年孟塞維克黨底實際政策：當時該黨與地主和立憲民主黨人『聯合』，實際上主張自由主義的土地改良與同地主妥協（證據：土地委員之被捕與馬斯洛夫底法律草案）。

考茨基沒有看到，馬斯洛夫關於小資產階級的平等之烏託邦性與反動性的話，實際上是隱藏着不由農民起來革命推倒地主，而使農民同地主管妥協（即地主對於農民的愚弄）的孟塞維克政策。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考茨基！

只有布爾塞維克才嚴格地指出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區別：他們把前者幹到澈底時，他們即打開了轉到後者的門戶。這是唯一革命的與唯一馬克思主義的政策。

考茨基枉費精神地重復自由主義的腐朽的滑稽話：

『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小農從沒有在理論上說服底影響之下轉變到集體的

生產。」（五十頁）

這真是太聰明了！

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大國底小農都沒有受過無產階級國家底影響。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小農從沒有在無產階級國家政權之宣傳的、政治的、經濟的與軍事的擁護最貧農的條件之下，進到最貧農與富農間的公開的階級鬥爭，以至於他們間的國內戰爭。

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投機者與有錢人從沒有因戰爭，而如此發財，而農民羣衆如此破產。

考茨基重複老調，咀嚼陳舊的反吐出來的食物，他甚至害怕思索一下無產階級專政底新的任務。

親愛的考茨基，請問你，如若農民工具不夠以經營小生產，而無產階級國家就來幫助他們得到機器以爲集體的耕種土地之用，這是不是『理論上的說服』呢？

現在來講土地國有的問題吧。俄國的民粹派，一切左派的社會革命黨人也在

內，否認我們所施行的辦法是土地國有。他們在理論上是錯誤的。既然我們還留在商品生產與資本主義底範圍之內，那末土地私有權底廢除，就是土地國有。『社會化』這三個字不過是表演出轉到社會主義的趨向、願望、與準備而已。

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土地國有，應取什麼態度呢？

考茨基在這裏甚至也不能提出理論問題，或者（這更糟糕）他有意逃避這問題，雖是從俄國的出版物中顯然可以看出，考茨基很知道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之即關於土地國有，土地市有（將大地產交給地方自治機關）與土地分割的爭論。

考茨基說，將大地產交給國家，再將這些土地分成小塊租給缺乏土地的農民，就會實行『一些社會主義』底成份，這簡直是譏笑馬克思主義。我們已經說過，這裏絲毫社會主義也沒有。這還不夠；這裏且沒有幹到澈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考茨基真是遭到了大不幸，因為他信任了孟塞維克。由此發生了這樣的怪事：說我們的革命帶有資產階級性質的考茨基，責備布爾塞維克爲妄想走到社會主義的考茨基，自己在社會主義的假面具下提出自由主義的改良，不使這改良進行到在土

地佔有制上去完全肅清一切中世紀的殘餘！考茨基正像他的顧問孟塞維克一樣，不去擁護徹底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却來擁護懼怕革命的自由資產階級。

切實地說吧。爲什麼祇把大地產歸爲國家所有，而不把一切土地歸爲國家所有呢？因爲這樣，自由資產階級就能保持最多的舊東西（即最不徹底的革命），最容易復古。急進的資產階級，就是說把資產階級革命幹到徹底的資產階級，則提出土地國有底口號。

差不多在二十年前寫了一部關於土地問題的馬克思主義的傑作的考茨基，不能不知道馬克思底指示；土地國有正是資產階級底徹底的口號。考茨基不能不知道馬克思同羅白圖斯的論戰與他在剩餘價值論一書中的精當的說明，在該書內馬克思特別明顯地指出在資產階級民主的意義上土地國有之革命的意義。

孟塞維克馬斯洛夫（考茨基不適當地挑選他爲自己的顧問）曾否認俄國農民會贊成一切土地（農民的土地也在內）國有。在相當的程度內，馬斯洛夫這種觀點，

* 考茨基著的土地問題一書，出版於一八九八年。（校者）

同他的『巧妙』的理論（他重複那些批評馬克思的資產階級批評家底話），即否認絕對地租，承認『地力遞減』底『規律』（或『事實』，如馬斯洛夫所說的），有聯帶關係的。

實際上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已經表現出了，俄國的大多數農民，不論他是屬於村社的，或是不屬於村社的，都是贊成一切土地收歸國有的。一九一七年革命證實了這一點，在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裏之後，就把牠實行了。忠實於馬克思主義的布爾塞維克，從沒有企圖（不管考茨基毫無證據地這樣責備我們）『跳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布爾塞維克首先幫助了農民底資產階級民主的理論家中最革命，最急進與最接近於無產階級的份子，即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施行實際上就是土地國有的政策。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十月二十六日）起，即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革命底第一天起，俄國土地私有制即被廢除了。

這樣就造成了——從資本主義發展底觀點上看來——最完善的基礎（考茨基如不同馬克思斷絕關係，當然不能否認這一點），同時也造成了在過渡到社會主義的

意義上是最靈活的土地制度。從資產階級民主的觀點上看來，俄國革命的農民已經走到了盡頭；從這種觀點上看來，比土地國有，土地平均使用『再理想的』，『再急進的』已經是不可能的了。正是布爾塞維克，只有布爾塞維克，只因為無產階級革命底勝利，而幫助了農民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幹到澈底的勝利。且只因這種勝利，布爾塞維克才做到了最高限度，以幫助和加速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過渡。

從這一點上就可以看出，考茨基向讀者提出如何紛亂的思想；他責備布爾塞維克不了解革命底資產階級性，而自己却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不談土地國有，反以最革命的（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自由主義的土地改良，作為『一些社會主義』底成份！

這裏我們已說及我們在上而所提出的第三個問題了：俄國無產階級專政如何估計到土地底共同耕種之必要。考茨基在這裏又做個騙局：他祇引證了一個布爾塞維克說及轉變到土地之共同耕種的任務的『提綱』——摘引了這『提綱』內的一條之後，我們的『理論家』就洋洋得意地叫道：

「祇是把某種東西宣佈爲任務：可惜，任務並不因此而解決。俄國集體的農業，現在還祇能成一紙空文。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小農從沒有在理論上說服底基礎上轉到集體的生產。」（五〇頁）

無論什麼地方，無論什麼時候，從沒有像考茨基所墮落到的這種文字上的欺騙。他摘引『提綱』，而對於蘇維埃政權底法律則默而不言。他說到『理論上的說服』，而對於手裏握有工廠與商品的無產階級國家底政權，則默而不言！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在一八九八年土地問題一書上凡關於無產階級國家手裏所有的使小農漸漸轉變到社會主義的工具的問題所寫的話，在一九一八年被叛徒考茨基所忘記了。

當然的，由國家所維持的幾百個農業公社與蘇維埃農莊（即由國家出錢由工人合作社耕種的大農莊），是很不夠的。但考茨基之迴避這種事實，我們能夠稱牠爲『批評』麼？

在俄國爲無產階級專政所實行的土地國有，是最能保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敵

底完成的——甚至於就是在反革命勝利使國有退到分割的情形之下（關於這一點，我在論一九〇五年革命中馬克思主義者的土地綱領中已特別說及）。此外，土地國有給了無產階級國家有使農業轉到社會主義的最大的可能。

總結：考茨基在理論方面真是一團糟。完全離開了馬克思主義，而在實際行動方面，就是資產階級及其改良主義的奴僕。不消說，批評是很漂亮的！

考茨基之工業底『經濟分析』，是由下而一段絕妙的議論開場的：

在俄國有資本主義的大工業。在這基礎上能否建設社會主義的生產呢？

『如若社會主義是在於各工廠各礦山底工人把這些東西拿來當做自己的私產，在每個工廠中單獨地經營生產，那末我們也許可以這樣想吧。』（五二頁）

考茨基又說：

• 此地列寧是指他著的俄國社會民主黨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俄國第二次革命中土地綱領一書第

三章第八節，見本版列寧選集第二十卷。（校者）

「正在今天（八月五日），當我寫到這裏時，從莫斯科傳來列寧在八月二日的一個演說詞，其中據說列寧這樣講：「工人牢牢地把工廠拿在自己手裏，農民則不把土地還給地主」。『工廠歸工人，土地歸農民』這個口令，一直到現在不是社會民主黨的，而是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的口令。」（五二至五三頁）

我們完全摘引了這一段話，爲的要使從前尊敬考茨基的（爲了他的工作）俄國工人，自己看到逃亡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叛徒底伎倆。

祇要想一下：八月五日，俄國已頒佈了關於工廠國有的很多命令，而且沒有一個工廠是爲『工人底私產』，一切工廠，都成了共和國底財產，在這八月五日考茨基把我演說詞中的一句話明顯的加以曲解，使德國的讀者發生一個念頭，似乎在俄國工廠是交給單獨的工人的！這樣說了之後，考茨基在好幾十行內把工廠不能交給個別工人的話，拿來好像嚼反芻物一樣咀嚼得津津有味！

*一九一八年八月二日在布提爾區羣衆大會上的演說，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六九至一七〇

這不是批評，而是資本家歷用來空談工人革命的資產階級走狗之伎倆。工廠應該交給國家或是公社或是消費合作社——考茨基再三再四這樣說，並且，最後還加上一句話：

「俄國現在就是企圖走上這條道路……。」

現在且這是什麼意思？八月嗎？難道考茨基竟不能向他的斯坦、阿雪洛德與其他俄國資產階級的朋友們定譯一道關於工廠的命令嗎？

「……這種事情進到了多遠，現在還不知道。無論如何，蘇維埃共和國底這一方面對於我們是很有興趣的，但牠現在完全還在朦朧中。在命令中並沒有缺點……」（因此考茨基就不顧牠的內容，或不使牠們爲他的讀者所知道），「但關於這些命令底實施，還沒有可靠的消息。沒有各方面的、詳盡的、可靠的與迅速報告的統計，社會主義的生產是不可能的。蘇維埃共和國直到現在還不能做出這樣的統計。我們所知道的關於牠的經濟的實施的消息，極相矛盾，而且無從考證。這也是專政與消滅民主底結果之一。沒有出版與言論的自由……。」（五三頁）

看呵！歷史就是這樣寫的！從資本家與杜多夫派底『自由』出版物那裏，考茨基會得到關於轉到工人手裏的工廠的消息吧……。這個超階級的『莊嚴的學者』真是如何出色！有無數的事實證明工廠祇是轉交共和國，管理工廠的是蘇維埃政權機關——「國民經濟最高委員會」（其中山職工會選出的人佔多數），——這些事實，考茨基一件也不願意提起，他以囊中人底頑固態度，咬緊牙根說道：給我和平的民主——不要國內戰爭，不要專政——以及很好的統計（蘇維埃共和國已創立了統計局，並任用了俄國所有一切最好的統計學家，當然立刻要得到理想的統計是得不到的）。總而言之，考茨基所要求的，是不要革命、不要猛烈爭鬥、不要暴力的革命。這正像要求在罷工時工人與僱主雙方都不要怒潮般的狂熱一樣。試看這種『社會主義者』到底與庸俗的自由主義的官僚有什麼區別！

考茨基根據這類『實際材料』，即有意完全蔑視很多的事實，就得出『結論』說：

『很可懷疑的，俄國的無產階級，在蘇維埃共和國中的實際的獲得（不是命令），是

否能得到比牠從立憲會議那裏（其中同蘇維埃一樣，大多數也是社會主義者，雖然色彩不相同）所得到的更多。」（五八頁）

這豈不是珠寶嗎？我們希望考茨基底信徒，把這段話最廣泛地散佈到俄國工人中間去，因為考茨基關於他自己的政治上墮落的估計，再不能供給比這個更好的材料了。工人同志們，克倫斯基也是個『社會主義者』，不過『色彩不同』而已！歷史家考茨基祇拿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所『領有』的稱呼與名目為滿足。至於證明在克倫斯基時代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與孟塞維克曾擁護帝國主義的政策與資產階級之因戰爭投機搶劫的事實，考茨基則聽也不願意聽，至於立憲會議底大多數就是這些擁護帝國主義戰爭與資產階級專政的英雄們的事實，考茨基則很客氣地默而不言。這就叫做『經濟分析……！』

最後還要舉一個『經濟分析』底例子：

『……蘇維埃共和國在其存在了九個月之後，不去推廣普遍的幸福，而却是不得不去說明普遍的痛苦之由來。』（四一頁）

立憲民主黨人就是用這些議論來教訓我們的。在俄國資產階級底一切走狗都有這樣的議論：他們說，經過九個月之後，拿出普遍的幸福來吧！——即在四年破壞的戰爭之後，即在外國資本各方面幫助俄國資產階級底怠工與暴動的時候。考茨基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者之間實際上絲毫差別也沒有了。用『社會主義』做招牌的甜蜜的語，不過是重複俄國郭尼洛夫派，杜多夫派與克拉斯諾夫派所毫不粉飾的，直爽爽說出的話罷了。

上面這幾段，是我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寫的。同日晚上從德國得到關於正在開始的勝利的革命消息，說革命開始於基爾與其他北方的與沿海的各城市，那裏政權已轉到工兵代表蘇維埃手裏了，隨後發生於柏林，那裏政權也轉到蘇維埃手裏了。

因此，關於考茨基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這本小冊子的結論，也用不着寫了。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

附錄二 萬德威爾論國家的新書

我只在讀了考茨基底著作之後，才得認識萬德威爾所著的社會主義反對國家一書（一九一八年出版於巴黎）。這兩本書底比較，是不期然而然的。考茨基是「第一國際」（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一四年）底思想上的領袖，萬德威爾是牠的正式的代表，即「國際社會主義局」底主席。他們倆都代表「第二國際」之完全的崩潰，他們倆都「精巧地」出其老成精練的新聞記者底手腕，以馬克思主義的辭句，來掩飾這種崩潰，掩飾自己本身的破產，及其投降資產階級。前者特別明顯地表示出，他是德國機會主義中的標本人物；這種機會主義極其笨重，崇尚理論，愚蠢地假造馬克思主義，其所用的方法就是除去馬克思主義中為資產階級所不能接受的東西。後者是在拉丁族中——在相當程度內可以說：在西歐（就是說：處於德國西部的）——

在本冊第一版內，還附有論立憲會議的提綱（見中文版列寧選集第十一卷）。

（編者）

佔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中的標本人物；這種機會主義，較爲圓活，比較不笨重，更巧妙地假造馬克思主義，其所用的基本手段與前者相同。

他們倆都根本曲解馬克思底國家學說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可是萬德威爾多注重第一個問題，而考茨基則多注重第二個問題。他們倆都抹煞這兩個問題之間最密切的不可分離的聯繫。他們倆都是口頭上的革命者和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的叛徒，他們用盡一切氣力去辯駁以離開革命。他們倆都絲毫沒有那種貫徹於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切著作中的東西，沒有那種分別真正的社會主義和資產階級對社會主義的譏諷的東西，這就是說他們沒有說明革命任務以別於改良的任務，說明革命策略以別於改良主義的策略，說明無產階級在消滅僱傭奴隸制底系統、秩序或結構中的作用，以別於『大列強』內同資產階級瓜分一部份帝國主義的額外利潤和額外贓物的無產階級作用。

現在來講萬德威爾底幾個最重要的議論，來證實上面的估計。

萬德威爾，如考茨基一樣，非常熱懇地援引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他如考茨基

一樣，對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底一切說話，除了爲資產階級所完全不能接受的，以及分別革命者與改良主義者的話以外，都援引出來。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話，他說過不知多少，因爲這一點已經爲實際活動所列入純粹的國會範圍中去了。至於在「巴黎公社」之後，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爲有補充一部分已經陳舊了的共產黨宣言之必要，應當說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佔有現成的國家機器，而應當打碎這種機器，——所有這些他都一字不提！萬德威爾，如考茨基一樣（正像他們預先商量好了的）其所緘口無言的，恰恰就是無產階級經驗中最重要地方，恰恰就是分別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改良的地方。

萬德威爾，如考茨基一樣，其所以談到無產階級專政，爲的要離開這個專政。考茨基以愚蠢的假造手段來達到這個目的。萬德威爾所幹的勾當也是如此，不過他的手段要巧妙些。他在自己書中第四節，關於「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一節「B」項內，發揮「無產階級底集體專政」的問題，他「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底話（我重說一遍：他所拋棄的，正是最重要的地方，正是關於打碎舊的資產階級民主的國

家機器的地方），而且得出結論說：

「……在社會主義者中間，人們往往這樣去了解社會革命：第二個「巴黎公社」，這一次是勝利的，且不在一個地方勝利，而是在資本主義世界各個主要的中心點勝利。

這是一個假設；但這個假設現在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之處，因為此時已經看得很明顯，在戰後的時期，在許多國內，將有亙古未聞的階級衝突和社會震動。

不過如果「巴黎公社」底失敗——至於俄國革命底困難那不用說了，——可以證明什麼的話，那末，這恰恰是證明：當無產階級沒有充分準備起來利用那為事實所迫而可以落到牠的手裏的政權以先，要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第七十三頁）

按實質上說，再沒有別的了！

請看「第二國際」底這些領袖們和代表呵！在一九一二年，他們曾在巴塞爾宣言上簽過字，在該宣言上他們直接說到戰爭（而一九一四年所爆發的正是這種戰爭）與無產階級革命的聯繫，直接拿革命去威嚇人們。但當戰爭已經發生和革命已經造成了的時候，他們這些考茨基輩與萬德威爾輩，便開始辯駁以離開革命。他們

公然說：「巴黎公社」式的革命，只是一種不可思議的假設！這完全同考茨基關於蘇維埃在歐洲可能的作用的議論是一樣的。

殊不知一切有學識的自由派，恰恰有這樣的議論，因為這種自由派現在顯然同意說：第二個「巴黎公社」『不是不可思議的』，蘇維埃將有很大的作用等等。無產階級革命家與自由派不同的地方就在：他是個理論家，他恰恰要分析「巴黎公社」與蘇維埃之新的國家的意義。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巴黎公社」底經驗，對於這個問題有詳細的說明，而萬德威爾却把這些完全抹煞了。

馬克思主義者是個實行家，是個政治家，他應當說明，只有社會主義底叛徒，現在才可以拋棄下列的任務：說明無產階級革命（「巴黎公社」式的、蘇維埃式的、或假定還有什麼第三種形式的）之必要，解釋準備這種革命之必要，在羣衆中宣傳革命，推翻反對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偏見等等。

無論考茨基或萬德威爾都絕對不幹這類的工作，正因為他們自己是社會主義底叛徒，想在工人中間保持社會主義者與馬克思主義者底聲價的叛徒。

試看本問題之理論上的提法吧。

就在民主共和國裏，國家也不過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機器。考茨基知道這個真理，承認牠，贊成牠——但是……但是，他不理最根本的問題：當無產階級取得無產階級的國家時，牠應當鎮壓那一階級，爲甚麼和用什麼手段去鎮壓那個階級。

萬德威爾知道、承認、贊成、引證馬克思主義底這個原理（見他的書中第七十二頁），但是……他對於鎮壓剝削者底反抗的『可惡的』（在資本家先生們看來）問題，却一字不提！

萬德威爾，如考茨基一樣，完全不理這個『可惡的』問題。他們的叛徒性也就在這裏。

萬德威爾，如考茨基一樣，是用折衷論來代替辯證法的名手。一方面，不能不認識，他方面，應當承認。一方面，國家可以了解爲『民族底總和』（見李特別底字典——不消說這是學者的著作——萬德威爾書中第八十七頁），他方面，國家可

以了解爲『政府』（同書同頁）。萬德威爾抄襲這個學者的庸俗論調，稱贊他，把他和馬克思底說話放在一起。

萬德威爾說：

在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上說，『國家』二字與通常的用法不同。因爲這個緣故，便有『誤解』的可能。『馬克思和恩格斯所說的國家，這不是廣義的國家，不是當作管理機關，當作社會共同利益（Interets Generaux de la Societe）底代表的國家。這是政權的國家，威權機關的國家，一階級統治別階級的工具的國家。』（萬德威爾書中第七五至七六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到消滅國家只在第二種意義上……。「過於絕對的論斷，未免有不確切的危險。在建築於專屬一階級統治之上的資本家底國家，與以消滅階級爲目的的無產階級國家之間，有許多過渡的階段。」（第一五六頁）

請看，這就是萬德威爾底『姿式』，其與考茨基底姿式之間，只有一點點的差別，而在實質上是相同的。辯證法否定絕對真理，而說明正反更迭與歷史上危機底

意義。折衷派不願意『過於絕對的』論斷，爲的要貫徹其小資產者的庸人的希望：以『過渡的階段』去代替革命。

至於推倒資產階級、打破和破壞牠的國家機器的革命，恰恰就是資產階級統治機關的國家與無產階級統治機關的國家之間的過渡階段，——這一點考茨基和萬德威爾都默而不言。

至於資產階級專政應代以無產階級這一個階級底專政，在革命底『過渡階段』之後，跟着有一些無產階級國家之逐漸衰亡底『過渡階段』，——這一點考茨基和萬德威爾都將牠抹煞了。

他們的政治上的叛徒性也就在這裏。

在理論上，哲學上，以折衷論和詭辯說去代替辯證法，也就在這裏。辯證法是具體的和革命的，牠把由一個階級專政轉到另一個專政的『過渡』，與由民主的無產階級的國家轉到非國家（『國家底衰亡』）的『過渡』，分別出來。考茨基和萬德威爾底折衷論與詭辯說，爲迎合資產階級而抹煞階級鬥爭中的一切具體性與確切

性，同時把『過渡』底一般的概念提在前列，借此可以掩藏（目前十分之九的正式社會民主黨人，都掩藏在這裏）其脫離革命的行為！

萬德威爾是個折衷派和詭辯家，他比考茨基要巧妙些，精微些，因為他用『由狹義的國家轉到廣義的國家的過渡』這句說話，可以避免任何一切的革命問題，避免革命與改良之間的一切差別，甚至馬克思主義者與自由主義者之間的差別。因為試問那一個歐洲式的有學識的資產者要想否定這樣帶有『一般』意義的『一般的』『過渡階段』呢？

萬德威爾說：

「我同意蓋特底意見，非預先執行下列兩個條件，則不能公有生產資料和交換資料，這兩個條件就是：

（一）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的方法，使現在的國家——一個階級統治別個階級的機關，變為孟格爾所說的勞動底人民國家①。

（二）把威權機關的國家和管理機關的國家分開，或如聖西門所說的，把對人的行政

和對物的支配分開。」（第八十九頁）

萬德威爾把這段話加上着重點，特別指出這些論點底意義。殊不知這是清一色的折衷主義的一團糟，與馬克思主義完全分離！殊不知所謂『勞動底人民國家』，不過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國社會民主派借以自誇，而為恩格斯所鄙視為毫無意思的『自由的人民國家。』●●

『勞動底人民國家』一語，就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如俄國的左派社會革命黨人）所尊崇的一句話，——以非階級的概念去代替階級的概念的一句話。萬德威爾把無產階級（一個階級）取得國家政權與『人民』國家放在一起，而沒有看到這是一團糟。在考茨基底『純粹民主』中，也得出同樣的一團糟，同樣的對於階級的革命、階級的無產階級專政、階級的（無產階級的）國家之任務，表示反革命的庸人的忽視。

其次、只有在一切國家衰亡的時候，對人的行政才會無形消滅而讓位於對物的支配。萬德威爾拿這種比較久遠的將來去搪塞、蒙蔽明天的任務：推倒資產階級的

任務。

這種伎倆又是等於爲自由資產階級效勞，自由派同意談談，在不要對人的行政的時候，將有甚麼東西。爲何不作這樣無害的空想之談呢？而關於無產階級之鎮壓資產階級（反抗對牠所施的剝奪手段）底反抗，我們不談吧。資產階級利益需要這樣。

『社會主義反對國家』。這是萬德威爾對無產階級的叩頭。叩頭是不難的，一切『民主的』政治家都善於向自己的選民叩頭。但在『叩頭』底掩藏之下，實行反革命的無產階級的勾當。

萬德威爾詳細地轉述阿斯特羅斯基底話，說在現代資產階級民主底文明的、撫愛的、客氣的外觀之下，如何掩藏對於貧民之欺騙、壓迫、收買、造謠、說謊、排斥。但是，萬德威爾不從這裏做出結論來。至於資產階級的民主鎮壓勞動的與被剝削的羣衆，而無產階級的民主應當要鎮壓資產階級，——他也一字不提。考茨基和萬德威爾在這裏都是瞎子。背叛馬克思主義的這些小資產階級的叛徒們是跟着資

產階級走的，而資產階級之階級利益，要求他們避免這個問題，蒙蔽這個問題，或直接否定這種鎮壓之必要。

庸人的折衷主義反對馬克思主義，詭辯說反對辯證法，庸人的改良主義反對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萬德威爾底書所應有的標題。

論「民主」和專政：

論「民主」和專政

柏林的紅旗和奧國共產黨底機關報——維也納的警聲 (Weckruf)，送了幾期到莫斯科來；這幾期證明給我們看，擁護帝國主義者強盜戰爭的社會主義叛徒，所有這些謝德曼輩和愛伯特輩，奧夫斯特里茲輩和倫乃爾輩，都遇着德奧兩國革命無產者真正代表之應有的反抗。這兩個機關報，是「第三國際」發榮滋長之明證，我們熱烈地歡迎牠們。

現在，德奧兩國革命底主要問題，大概也就是這個問題：立憲會議呢，還是蘇維埃政權呢？已經破產的「第二國際」底代表，由謝德曼至考茨基，大家都贊成立憲會議，且稱自己的觀點，是擁護「民主」（考茨基甚至談到「純粹的民主」）而與專政相對抗的觀點。在剛才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出版的無產階級革命叛徒考茨基這本小冊子內，我已經詳細地分析了考茨基底見解。此地我想簡單地說明一個爭論

問題——這問題現在已經切實地擺在一切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內的議事日程上了，——之實質。

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之所以談到『純粹的民主』或一般的『民主』，爲的是要欺騙羣衆，掩蔽羣衆的耳目，使其看不見現代民主之資產階級性。讓資產階級繼續保持全部國家政權機關在自己手裏吧，讓寥寥無幾的剝削者繼續利用已往的、資產階級的、國家的機器吧！不消說，在此等條件之下所進行的選舉，資產階級是喜歡稱牠們爲『自由的』、『平等的』、『民主的』、『全民的』選舉的；因爲這些話可以用來蒙蔽真理，用來蒙蔽下面這件事實：生產資料私有權和政權仍舊屬於剝削者，所以對於被剝削者，就是說，對於絕對大多數的人民，談不到什麼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平等。掩蔽民衆的耳目，使其看不見現代的民主之資產階級性，形容現代民主是一般的民主或『純粹的民主』，這對於資產階級是有利的，而且是必要的；而謝德曼輩以及考茨基輩之重複這些話，他們在事實上就是放棄無產階級底觀點和跑到資產階級方面去。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最後一次聯名公佈共產黨宣言底序言時（事在一八七二年），他們認爲必須特別使工人們注意的地方，就是：無產階級不能簡單地佔有現成的（就是說，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而把牠運用起來以達到自己的目的；無產階級應當破壞這個機器、打碎這個機器。叛徒考茨基寫了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卷小冊子，他掩蔽了工人的耳目，使他們看不見這個最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的真理，他根本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因此很明顯的，謝德曼先生之流稱頌這本小冊子是完全應該的，這猶之乎資產階級走狗稱頌跑到資產階級方面去的人們一樣。

工人和勞動者，不僅被資本主義的僱傭奴隸制、而且被四年的搶劫戰爭，弄得飢寒交迫、傾家蕩產、精疲力竭，而資本家和投機商人，則繼續佔有自己掠奪得來的『私有權』和國家政權之『現成』機關，——在這個時候來談什麼純粹的民主一般的民主、平等、自由、全民，這無異於侮辱勞動者和被剝削者。

這無異於直接攻擊馬克思主義底基本真理；馬克思主義告訴工人說：你們應當利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與封建制比較起來是有很大大歷史進步意義的民主制，但

是，你們一刻不要忘記這個「民主」之資產階級性，牠的歷史的有條件性和限制性，不要『迷信』『國家』，不要忘記：國家不僅在君主國之下，就在最民主的共和國之下，也無非就是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機器。

資產階級不得不說假話，而稱（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是『全民的政權』或一般的民主，或純粹的民主；其實這個共和國，就是資產階級專政，就是剝削者之支配勞動羣衆的專政。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奧夫斯特里茲輩和倫乃爾輩（可惜現在他們以安得列爾爲助手），正在擁護這種謊言和假話。然而，馬克思主義者、共產主義者，則在揭破這種假話，並且對工人和勞動羣衆說出正直而公開的真話：民主共和國、立憲會議、全民選舉等等，事實上就是資產階級專政，要把勞動從資本底枷鎖中解放出來，除了以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之外，就沒有旁的道路。只有無產階級專政，能把人類從資本底壓迫中，從資產階級的民主——這個富人的民主之造謠、說謊、騙局中，解放出來，能夠規定窮人的民主，就是說，使民主底幸福實際上爲工人和貧農所享受；至於現在呢（甚至在最民主的——

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之下），這些民主底幸福，絕大多數的勞動者實際上是不能享受的。

試舉集會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例子來說吧。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奧夫斯特里茲輩和倫乃爾輩，使工人相信：在德奧兩國現在所舉行的立憲會議之選舉，是根據「民主原則的」。這是一句假話，因為在實際上，資本家、剝削者、地主、投機商人，擁有適宜於集會的十分之九的最好的建築物，擁有十分之九的紙料、印刷所等等。城市的工人、鄉村的僱農和日工，在實際上他們的民主已經被人剝削了，已經被這個「神聖的私有權」（這種私有權是為考茨基先生輩和倫乃爾先生輩所保衛的，可惜安得列爾也跑到他們方面去了）以及被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機關，即是資產階級的官吏，資產階級的法官等等所剝削了。在德意志「民主」（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內現在所謂「集會自由和出版自由」是一句假話和一副假面具，因為在實際上，這是富人購買和賄買言論機關的自由，富人用資產階級報紙的謊話這種麻醉去麻醉民衆的自由，富人把持地主的房屋、最好的建築物等等作為自己的「私有財產」的自由。

無產階級專政，把地主的房屋，最好的建築物、印刷所、紙料貯藏所，從資本家手裏奪取過來，以供勞動者來利用。

這就是以『一階級專政』來代替『全民的』『純粹的』『民主』——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奧夫斯特里茲輩和倫乃爾輩這樣喊着（和他們的國外的同黨者、剛勃斯輩、亨德遜輩、倫諾德輩、萬德威爾輩一流人同聲喊着）。

瞎說，——我們回答道。這是以無產階級專政，來代替事實上的資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底形式，虛偽地掩蔽着這個專政）。這是以窮人底民主，來代替富人底民主。這是以多數人、即勞動者底集會自由出版自由，來代替少數人、即剝削者底集會自由和出版自由。這將是民主之莫大的、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擴展，民主之變假爲真，人類之解脫資本束縛——那種損害和限制一切的、甚至最『民主的』和共和國的資產階級民主的資本束縛。這是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這種代替就是走上一般國家底衰亡之唯一道路。

爲什麼沒有一階級專政就不能達到這個目的呢？爲甚麼不能直接過渡到『純粹

的『民主呢？——資產階級的假朋友，或祇資產階級所愚弄了的小資產者和庸人們都這樣問道。

我們回答道：因為，在一切資本主義社會裏，能有左右一切的意義的，或是資產階級，或是無產階級，而小財主們必然還是動搖的、無力的、愚蠢的幻想家，幻想什麼『純粹的』、就是說，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民主。因為，要從一階級壓迫另一階級的社會中求出路，除了被壓迫階級專政外，便無他道。因為，只有無產階級纔能戰勝資產階級、推倒資產階級，因為無產階級是唯一的階級，牠被資本主義所團結和『訓練』，牠能夠吸引那些過小資產階級生活的勞動者底動搖羣衆，——吸引他們到自己方面來，或者至少使他們『中立起來』。因為，只有甘言巧語的小資產者和庸人們，才能幻想不要長久困難地鎮壓剝削者底反抗而可推翻資本底枷鎖，並以此等幻想來欺騙自己和欺騙工人。在德國和奧國，這個反抗現時還沒有公開地擴大起來，因為現時還沒有開始剝奪剝奪者。等到這些剝奪開始的時候，這個反抗一定是兇猛的、狂暴的。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奧夫斯特里茲輩，把這件事情

替自己和工人們掩蔽着，這樣也就是實行背叛無產階級底利益，在最緊急的關頭，從階級鬥爭和推翻資產階級底枷鎖的立場，過渡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妥協的立場上去。過渡到『社會和平』、或剝削者和被剝削者調和的立場上去。

馬克思說過：『革命就是歷史底火車頭』。革命迅速地教訓人們。德奧兩國城市底工人和鄉村底僱農，會迅速地明瞭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奧夫斯特里茲輩和倫乃爾輩之背叛社會主義的事業。無產階級會拋棄這些『社會叛徒』，口頭上的社會主義者和事實上的社會主義叛徒，如俄國無產階級之拋棄了這些小資產者和庸人們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一樣。無產階級會看見，——上述『領袖們』底統治愈充分，牠將看見得愈快，——只有以『巴黎公社』式的國家（關於這種國家馬克思說過許許多多的話，而謝德曼輩和考茨基輩却把馬克思曲解了和出賣了），或蘇維埃式的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不管這個國家是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也好，——才能開闢一條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可把人類從資本底枷鎖中戰爭中解救出來。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會上關於資產階級

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與報告

●
①

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會上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

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與報告●●

(一九一九年三月四日)

(一) 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之增長，曾使資產階級及其在工人組織中的走狗，拼命去找尋思想上和政治上的論據來擁護剝削者底統治。在這些論據中，曾特別提出了反對專政和擁護民主的論據。在資本主義的刊物上以及一九一九年二月在伯恩舉行的黃色「國際」底代表會議上，都異口同聲地重複這個論據，凡是不願意叛變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人，顯然看出這個論據是說謊的和虛偽的。

(二) 這個論據首先就運用『一般的民主』和『一般的專政』的概念，而不提出關於一定階級的問題。問題之如此提法，非階級的、或超階級的、似乎全民的提法，就是直接侮辱社會主義底基本學說，即階級鬥爭學說；跑到了資產階級方面去

的社會主義者，口頭上承認這種學說，而實際上却忘記這種學說。因為，無論在那一個資本主義的文明國內，沒有『一般的民主』，而只有資產階級的民主；問題不是說『一般的專政』，而是說被壓迫階級即無產階級對壓迫者和剝削者（即資產階級）所施行的專政，其目的就在於克服剝削者為爭取自己的統治而起的反抗。

（三）歷史告訴我們，如果不經過專政底時期，就是說，不經過奪取政權和暴力地鎮壓剝削者無時不起的最兇猛的、最狂烈的、不顧一切的反抗的時期，那末，無論那一個被壓迫階級，從來沒有得到統治，而且也不能得到統治。聲稱反對『一般的專政』和拼命擁護『一般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者，現在擁護着資產階級底統治；而在各先進國內，資產階級之奪得政權，是用了許多暴動、國內戰爭，暴力地鎮壓帝王、封建主、奴隸主、以及他們的復辟企圖之代價換得來的。世界各國底社會主義者，在他們的書籍中、小冊子中、他們的代表大會底決議案中、他們的鼓動的言論中，曾經千百萬次對民衆解釋了這些資產階級革命、這個資產階級專政之階級性。因此、現在借口『一般的民主』而擁護資產階級的民主之言論，以及現在空

喊『一般的專政』而大呼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之叫喊，這就是公然背叛社會主義、是實際上跑到資產階級方面而否認無產階級進行其無產階級革命的權利，是恰恰在全世界資產階級改良主義已經完全破產而戰爭已經造成了革命形勢的這個歷史關頭，去擁護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

(四)一切社會主義者說明了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的代議制之階級性，他們所表示了的意思，就是馬克思和恩格斯曾以最科學的確切性由下面的話所表示過的意思：最民主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無非就是資產階級鎮壓工人階級的，寥寥無幾的資本家鎮壓勞動羣衆的一副機器。現在大呼反對專政和贊成民主的人們中，沒有一個革命者、沒有一個馬克思主義者，過去不在工人面前宣誓過，說他承認社會主義底這個基本原理；可是現在呢，當革命的無產階級醞釀和運動起來破壞這個壓迫機器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社會主義底這些叛徒，却把事情看作這樣：似乎資產階級恩賜了勞動者以『純粹的民主』，似乎資產階級放棄了反抗，而願意服從勞動者底多數，似乎在民主共和國內無論過去或現在都沒有

任何資本之鎮壓勞動的國家機器。

(五)一切自命爲社會主義者的人們，在口頭上都是推尊「巴黎公社」的，因爲他們知道工人羣衆是熱烈地和誠懇地同情牠的；「巴黎公社」特別明顯地指出了資產階級代議制和資產階級民主制之歷史的有條件性及狹隘性，——這些制度，比中世紀的制度是要進步得多，但在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則必須根本地改變牠們。馬克思最正確估計了「公社」底歷史意義；正是牠在分析「公社」的時候，指出了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和代議制之剝削性，因爲被壓迫階級在幾年之內只有一次得有權來解決這個問題：有產階級底那一個代表將在國會內『代表和鎮壓』民衆。正是現在，當蘇維埃運動已普及於全世界，牠之繼續「巴黎公社」事業已爲有目共視的時候，社會主義底叛徒們却忘記了「公社」底具體經驗和具體教訓，而重複着舊的資產階級的廢話，說什麼『一般的民主』。「公社」曾經不是代議制的機關。

(六)其次，「巴黎公社」底意義又在於牠曾企圖根本打碎和破壞資產階級的國家機關——官僚的、司法的、軍事的、警察的機關，而以工人底自治的羣衆的組

織，不知有立法與行政之分的組織，來代替牠。現代一切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社會主義底叛徒違反真理，而稱之爲無產階級共和國的德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也在內），都保持着這個國家機關。這樣看來，高呼擁護『一般的民主』，其實就是擁護資產階級及其剝削的特權，這一點完全明白地再三證實了。

（七）『集會自由』可爲『純粹的民主』底要求之模範。凡是沒有離脫本階級的一切覺悟工人，立即可以明白，當剝削者實行反抗推倒他們而堅持着自己的特權的時候，允許剝削者有集會自由，這是荒謬絕倫的。當資產階級還是革命的時候，無論在一六四九年的英國、無論在一七九三年的法國，牠也沒有把『集會自由』給了招引外國軍隊和『集合起來』組織復辟企圖的保皇派和貴族們。如果現在的資產階級，老早已經變成反動勢力的資產階級，要求無產階級：使其預先替剝削者担保『集會自由』，而不管資本家如何實行反抗對他們的剝奪，那末，工人們對於資產階級底假仁假義，只有置之一笑而已。

他方面，工人們知道得很清楚，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集會自

由」也是一句空話，因為富人擁有一切最好的公共的和私人的建築物，同時有充分閒暇的時間來集會，並有資產階級的政權機關來保衛他們的集會。城市與鄉村底無產階級和小農，就是說，絕大多數人民，既無這些建築物，又無集會的時間，再無人來保衛他們的集會。現在問題就是這樣：『平等』，就是說，『純粹的民主』，是一個欺騙。要取得真正的平等，要在事實上實現勞動者底民主，首先應當把一切公共的和私人的奢侈的建築物，從剝削者手裏奪取過來，首先應當給勞動者有閒暇的時間，應當使武裝的工人們——而不是帶領着被蒙蔽的兵士的那班貴族們或資本家軍官們——來保衛他們的集會自由。

只有經過這種改造之後，才可以談集會自由，談平等，而不至於侮辱工人，侮辱勞動者、侮辱窮人。但是，担負這種改造的，除了勞動者底先鋒隊的無產階級，即推倒剝削者（資產階級）的無產階級之外，就沒有其他的人了。

（八）『出版自由』也是『純粹的民主』底主要口號之一。工人們又知道，而且世界各國底社會主義者已經千百萬遍地承認了，當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造紙廠

還被資本家把持着的時候，當資本底權力還統治着言論機關的時候——如美國那樣民主制和共和制愈發展，則這個權力在全世界表現得愈鮮明，愈厲害、愈無恥，——『出版自由』是一句騙人的話。要爲勞動者、爲工農取得真正的平等、取得實在的民主，首先就應當剝奪資本家之僱傭著作家、收買出版機關和賄買報館的可能性；但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推翻資本底羈絆、打倒剝削者、鎮壓他們的反抗。資本家向來把富人發財的自由，工人飢餓的自由，叫做自由。資本家現在又把富人賄買出版物的自由，利用財富以製造和假造所謂輿論的自由，叫做出版自由。『純粹的民主』底擁護人，在實際上又表現是富人統治羣衆教育工具的最醜惡的、賄賂制度底擁護人，是民衆底騙子；用些好聽的、漂亮的和非常虛偽的話，使民衆離開具體的歷史任務。把言論機關從資本底束縛中解放出來。共產主義者所要建設的制度，將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在這個制度之下，不會有因剝削他人而發財的可能性，不會有金錢勢力直接和間接支配言論機關的客觀的可能性，不會有妨害一切勞動者（或不論人數多少的勞動者底團體）平等享用社會的印刷所和社會的紙料

的障礙物。

(九)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底歷史，還在大戰以前已經告訴了我們，在資本主義之下，所謂『純粹的民主』實際上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者向來就說過，民主愈發展、愈『純粹』，則階級鬥爭越顯露、越厲害、越殘酷，而資本底壓迫和資產階級底專政，亦就表現得越『純粹』。在共和國的法蘭西所發生的特律虎斯案件，在自由民主共和國的美利堅資本家所武裝了的僱用軍隊之屠殺罷工者，——這些事實以及諸如此類的千百件事實，證明了資產階級枉費精神想去掩藏的那個真理，這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國內，實際上是統治着資產階級底恐怖和專政，每次當剝削者開始看到資本底權力搖動起來的時候，這種恐怖與專政便公開地表現出來。

(十)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帝國主義戰爭，甚至使落後的工人們也澈底看出了資產階級民主之本性：就是說，甚至在最自由的共和國內，資產階級民主就是資產階級專政。爲着充實德國或英國一部份大富翁之私囊起見，曾殺死了千百萬的人民，就在最自由的共和國內，也施行了資產階級底軍事專政。在『協約國』內，就

在戰敗德國以後，這個軍事專政還繼續存在着。正是戰爭最甚地揭開了勞動者底眼睛、撕去了資產階級民主之假面具，把戰時的和乘戰爭機會而作一切無限的投機和發財的事情，指示給民衆看。爲了『自由和平等』，資產階級進行了這次戰爭；爲了『自由和平等』，軍用品底供給者空前地大發其財。資產階級的自由、資產階級的平等，資產階級的民主之剝削性，現在已被澈底地揭破了，無論黃色的『伯恩國際』* 怎樣出力，也不能在羣衆面前掩蔽這個剝削性。

(一一) 在歐洲大陸上最發展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德國，由於帝國主義德國之失敗而產生的充分的共和的自由，開始幾個月就已指示給德國的工人和全世界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之真實的階級本質，究竟在什麼地方。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之被殺^①，是全世界歷史上重要的事件，這不僅因爲真正無產階級的「共產國際」底優秀份子和領袖遭兇而死了，而且因爲歐洲一個先進的國家——可以不事誇張地說：在世界範圍內一個先進的國家中——其階級本質，已經澈底地暴露出來

* 即指第二國際。(校者)。

了。如果在社會愛國派底政府之下，被捕的人們，就是說，被國家政權所監禁的人們，能夠被軍官和資本家打死而不受處分，那末，能夠發生這種慘案的民主共和國，就是資產階級專政。人們對於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之被殺表示憤激，但是他們不懂這個真理，這樣他們也就是暴露出自己不是愚昧無知，便是假仁假義。在世界最自由和最先進的共和國之一的德意志共和國裏面，所謂『自由』，就是不受處分地屠殺被捕的無產階級領袖的自由。當資本主義還保存着的時候，這不能不如此的，因為民主制底發展，不是減弱而是加劇階級鬥爭，由於戰爭及其結局之一切結果和影響，這階級鬥爭竟達到了沸點。

在整個文明世界中，現在都在驅逐布爾塞維克，通緝他們，把他們關在牢獄裏；如在最自由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之一——瑞士國內，就是這樣，又如美國亦在摧殘布爾塞維克等等。先進的、文明的、民主的、全副武裝的國家，害怕從落後的、飢寒的、破產的俄國——千百萬份資產階級的報紙稱牠為野蠻的、萬惡的、……俄國——出來的幾十個人，在牠們那裏屯留；這從『一般的民主』或『純粹的民主』

底觀點看來，簡直是可笑的。能夠產生這種絕大的矛盾的社會環境，其實就是資產階級專政，這是顯而易見的。

(一二)在此種情形之下，無產階級專政，不僅是完全正當的，是推翻剝削者及鎮壓其反抗的一種工具，而且又是對於整個勞動羣衆所必要的，是反對引起戰爭並在準備新戰爭的資產階級專政之唯一的保衛。

主要的，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當這個社會底基礎上所包藏着的階級鬥爭稍稍嚴重地尖銳起來的時候，除了資產階級專政或無產階級專政之外，不能有什麼中間的道路，——這就是『社會主義者』所不明瞭的地方，這就是他們的理論上的近視，他們之被資產階級的偏見所支配，他們之在政治上背叛無產階級的地方。關於什麼中間道路的一切幻想，都是小資產者之反動的悲傷情緒。各先進國內資產階級民主和工人運動一百多年來的發展底經驗，尤其是最近五年來的經驗，都可以證明這一點。整個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底全部內容，也可證明這一點；馬克思主義說明，在一切商品經濟之下資產階級專政之經濟上的必然性，而代替資產階級

的，除了資本主義發展本身所發展、繁殖、團結、鞏固起來的階級——即無產階級之外，就沒有旁的人了。

（一三）『社會主義者』之另一個理論上和政治上的錯誤，就在於不明瞭：在幾千年底過程中，從古代民主萌芽時期起，民主底形式，隨統治階級之更迭而必然要起變化。在希臘底古代共和國內，在中世紀底城市中，在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內，民主有各種不同的形式和各種不同的應用程度^①。誰要是認為人類歷史上最深刻的革命，世界上第一次由少數剝削者轉到多數被剝削者的政權過渡，能夠產生於舊有資產階級的國會的民主底舊有範圍內，而不要經過激烈的轉變，不要造成新的民主形式、不要造成那種含有應用民主的新條件的新機關等等，——誰要是這樣想，他就是最荒謬不過的了。

（一四）無產階級專政與其他各階級專政相似的地方，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和一切的專政一樣，是由鎮壓失掉政治統治的階級之暴力反抗的必要所引起的。無產階級專政與其他各階級專政——中世紀時代之地主專政，在一切文明的資本主義

國內之資產階級專政，——根本不同之點，就在於：地主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就是以暴力鎮壓大多數人民之反抗，即勞動者之反抗。反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以暴力鎮壓剝削者之反抗，就是說，極少數人民，即地主和資本家之反抗。

從這裏又可以看出，無產階級專政不僅必然要有民主底形式和機關之一般的改變，而且恰恰要有這樣的改變，使被資本主義所壓迫的人們，勞動階級，得能世所未見地擴大其對民主主義的事實上的享受。

而且，實際上已經規定了的那種無產階級專政形式，就是說，俄國的蘇維埃政權，德國的蘇維埃系統^①，英國的工廠代表委員會^②，以及其他各國中別種類似的蘇維埃機關，——所有這些，的確是爲着勞動階級，就是說，爲着大多數人民而實現這樣一種利用民主權利和自由的實在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就在最完善的和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裏面，也是從來沒有的，甚至與牠相近的，也沒有見過。

蘇維埃政權底實質就在於：羣衆的組織，即被資本主義所壓迫的那些階級，就

是說，工人階級和半無產階級（不剝削他人勞動而且經常出賣其一部勞動力的農民）底羣衆組織，是爲整個國家政權及整個國家機關之固定的和唯一的基礎。正是那些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內，按法律是享有平等權利而在事實上却被人家用千方百計地排擠、弄得不能參加政治生活、不能利用民主的權利和自由的羣衆，現在却經常地和一定地，而且左右一切地參加民主式的國家管理。

（一五）資產階級的民主隨時隨地都答應過，一切公民不分性別、宗教、種族、民族，一律平等，但是無論何地牠都沒有實現過，而且因爲資本主義底統治，也不能實現這一點；蘇維埃政權或無產階級專政，却把這個平等即刻充分地實現起來，因爲，能夠做到這一步的，只有工人底政權，不主張生產資料私有制和不主張爲瓜分和重分生產資料而鬥爭的工人底政權。

（一六）舊的，就是說，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和代議制，組織得正是要使勞動羣衆最不能參政行政機關。反之，蘇維埃政權，就是說，無產階級專政，組織得要使勞動羣衆能夠接近行政機關。在蘇維埃式的國家組織之下，立法權與行政權之結

合，以及以生產單位，如工廠、作坊，去代替地域制的選舉區，也是爲了這個目的。

(一七)軍隊之爲壓迫機關，不僅在君主國之下如此，就在一切資產階級民主國之下，甚至在最民主的資產階級共和國之下，亦是如此。只有蘇維埃政權，即從前被資本主義所壓迫的那些階級之固定的國家組織，才能破壞軍隊之服從資產階級的指揮，才能使無產階級與軍隊真正融合起來，才能真正實現武裝無產階級和解除資產階級底武裝，不如此，則社會主義底勝利便沒有可能。

(一八)蘇維埃式的國家組織，順應着無產階級，即被資本主義所弄得最集中和最開化的階級之領導作用。各被壓迫階級底一切革命和一切運動之經驗，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之經驗，教訓我們說，只有無產階級才能統一和引導勞動者與被剝削人民中散漫而落後的階層。

(一九)只有蘇維埃式的國家組織，才能真正地即刻破壞和澈底打碎舊的，即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和司法的機關；這種機關，在資本主義之下，甚至在最民主的

共和國裏面，也是保存着的，而且也必然要保存着，成爲對工人和勞動者實行民主主義最大的障礙。「巴黎公社」在打破這種機關的道路上走了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第一步，蘇維埃政權——走了第二步。

(二〇)消滅國家政權，就是一切社會主義者——馬克思也在內而且爲他們的首領——所定下的目的。非實現這個目的，則真實的民主，就是說，平等與自由，便無從實現。但是，實際上向這個目的發展的，只有蘇維埃的或無產階級的民主，因爲當其吸引勞動者底羣衆組織經常地和一定地去參加國家管理時，牠就即刻開始準備任何國家底完全衰亡。

(二一)集會於伯恩的社會主義者之完全破產，他們之完全不懂得新的，就是說，無產階級的民主，從下列的事實中表現得特別明顯。一九一九年二月十號，在伯恩舉行的黃色「國際」底國際代表會議會由伯蘭庭宣佈閉幕。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一號，在柏林，在該國際的參加人底報紙自由報（“Die Freiheit”）上，曾發表了「獨立」黨告無產階級的宣言。在這個宣言上，曾經承認德曼政府之資產階級

性，歸咎該政府蓄意取消蘇維埃，號稱蘇維埃為革命底擔負者和保持者，該宣言並提議把蘇維埃合法起來，給牠們以國家的權利，給牠們以取消立憲會議決議之權，而把問題提交全民公決。

這樣的提議，就是理論家——擁護民主而不懂民主底資產階級性的理論家——之思想上的完全破產。令人可笑的企圖，想把蘇維埃系統，即無產階級專政，和立憲會議，即資產階級專政，聯結起來的企圖，將黃色社會主義者和社會民主派之思想底貧困，他們的小資產者之政治上的反動性，他們對於新的無產階級的民主之不可遏抑而日益生長的力量所作的畏縮的讓步，澈底地揭破出來。

(二二) 伯恩黃色「國際」大會上的大多數人，曾反對布爾塞維主義，但因害怕工人階級，還不敢正式表決反對布爾塞維主義的決議案；他們反對布爾塞維主義，從階級觀點上看來，是正常的。正是這個大多數，與俄國的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以及德國的謝德曼輩，完全取一致行動。俄國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怨恨布爾塞維克之通緝他們，同時他們企圖掩飾這個事實：這些通緝辦法，是由

於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國內戰爭中擁護資產階級反對無產階級所引起的。同樣，謝德曼輩和他們的黨，也已經在德國證明了，他們在國內戰爭中也是擁護資產階級來反對工人的。

因此，伯恩黃色「國際」大會底大多數參加人，曾經表示要反對布爾塞維克，這完全是自然的。在這點上所表現的，不是擁護「純粹的民主」，而是人們底自衛，因為這些人知道和感覺，在國內戰爭中他們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來反對無產階級的。

所以，從階級觀點上看來，不能不承認黃色「國際」大會上大多數人底決定是正當的。無產階級應當不怕真理，直視真理，並且從這裏得出一切的政治結論。

同志們！對於最後兩條我想再補充幾句話。我覺得，那些要向我們做一個關於伯恩代表會議的報告的同志，會把這個問題更詳細地告訴我們。

在整個伯恩代表會議底過程中，連一字都沒有提到蘇維埃政權底意義。在

俄國，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已有兩年之久。一九一七年四月，在我們黨的代表會議上，我們已經在理論上和政治上提出了這個問題：『什麼叫做蘇維埃政權，牠的內容如何，牠的歷史意義何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差不多有兩年了，而在我們黨的代表大會上，我們將通過關於本問題的決議案。

柏林的自由報於二月十一號發表了告德國無產階級的宣言，在該宣言上署名的，不僅有德國獨立社會民主派底領袖們，而且還有獨立派黨團底全體委員。一九一八年八月，此等獨立派底最大的理論家——考茨基，寫了一本小冊子，名為無產階級專政，他在自己小冊子上說，他是贊成民主和蘇維埃機關的人，但是蘇維埃應當只有經濟的意義，而絕不是國家的組織。在十一月十一號和正月十二號的自由報上，考茨基重複着這些話。二月九號發表了希法亭底文章，他也是「第二國際」底最大而有聲價的理論家之一。他提議用法律、用國家的立法手段，把蘇維埃系統和國民會議聯結起來。這是二月九號的事。到二月十一號，獨立派全黨都通過了這個提議，而以宣言底形式發表出來。

不管國民會議已經存在着，甚至在『純粹的民主』已經實現了之後，在獨立社會民主派底最大的理論家已經聲明過，蘇維埃的組織不應當成爲國家的組織之後，不管所有這些——這些人又動搖起來了——這是證明這些先生們真正絲毫不懂新的運動及其鬥爭底條件。但是，這又證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引起這個動搖的，必有其條件，必有其原因——在這一切事件之後，在俄國這次幾及兩年的勝利的革命之後，人們向我們提出如伯恩代表會議所通過的那些決議案，而其中絲毫沒有提到蘇維埃及其意義的問題，而且到會的代表，無一人並無一字涉及這個問題，——此時我們有充分的權利可以斷言，所有這些先生們，其在社會主義者和理論家的資格上，據我們看來，已經死亡了。

但是同志們，在實際上，從政治底觀點上來看，這是證明羣衆中正在發生大的變化——因爲這些獨立派，向來在理論上和原則上是反對這些國家的組織的，現在他們忽然提出這樣的蠢東西，如國民會議和蘇維埃系統之『和平的』結合，就是說，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之結合。現在我們看見，在社會主義的和理論的

關係上，他們這些人是如何地破了產，而在羣衆中則發生何等大的變化。德國無產階級底落後羣衆，正在朝向我們走着，而且已經跑到我們這裏來了！因此，從理論的和社會主義的觀點看來，「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伯恩代表會議底優秀部份——之意義，完全等於零；可是，牠還有相當的意義，其意義就在於：這些動搖份子可爲無產階級落後部份底情緒之表現者。我們相信，這次代表會議之最大的歷史意義，也就在這裏。在我們的革命中，我們也遇到過這類的事情。俄國孟塞維克所經過的發展道路，恰恰和德國獨立派所經過的一樣。在開始的時候，當他們在蘇維埃中佔了多數的時候，他們曾贊成蘇維埃。只有在那時候，可以聽到這樣的呼聲：「蘇維埃萬歲！」，「擁護蘇維埃！」，「蘇維埃就是革命的民主！」可是，當我們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中得了多數的時候，他們便唱起另外的歌曲來了：蘇維埃不應當和立憲會議同時存在着；而各色各樣的孟塞維克的理論家，曾提出了幾乎如上述的提議相同的那些提議，比方：蘇維埃系統和立憲會議聯結起來，把蘇維埃包括於國家的組織中。這裏再次表示出：無產階級革命底總行程，在全世界上

都是一樣的。首先是蘇維埃之自發的成立，然後是牠們的普及和發展，再後是在實際上發生一個問題：蘇維埃呢，還是立憲會議，或國民會議，或資產階級代議制；在首領們中間發生了十分手慌腳亂的現象；最後，就是無產階級革命。但是，我認為在革命將近兩年之後，我們不應當這樣提出問題，而應當通過具體的決定，因為對於俄國，特別是對於大多數西歐國家，蘇維埃系統之普及，就是最重要的任務。

此地我想援引一個孟塞維克底決議案。我曾請求奧波連斯基同志把這個決議案譯成德文。他已答應翻譯這點，可惜他現在不在此地。因為我沒有該決議案底全文，所以我想憑自己的記憶把牠敘述出來。

從來沒有聽過布爾塞維主義的外國人，對於我們的爭論問題，很難表示自己的意見。凡布爾塞維克所斷定的話，孟塞維克都要起來辯駁，反過來也是這樣。當然，在鬥爭底時候，非如此不可，因此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孟塞維克底最後一次代表會議，通過了一個冗長的、詳細的決議案，該決議案在孟

塞維克的印刷工人報上完全登載過了。在該決議案上，孟塞維克自己簡括地敘述階級鬥爭和國內戰爭底歷史。在決議案上說道，他們責備自己黨內那些在烏克蘭、在南方、在克里米和格魯西和有產階級作聯合的集團，——他們又列舉這一切區域。孟塞維克黨內那些和有產階級聯合而反對了蘇維埃政權的集團，現在受了該決議案底責備，但最後一條却又責備到那些跑到共產主義者方面去的人們。從這裏可以看出：孟塞維克不能不承認，在他們黨內沒有一致，他們或者站在資產階級方面，或者站在無產階級方面。一大部份的孟塞維克已跑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了，並且在國內戰爭的時候反對了我們。當然，我們是要通緝孟塞維克的，而且當孟塞維克在戰爭中反對我們的紅軍和鎗斃我們的赤色指揮官的時候，我們甚至要鎗斃他們。我們會以無產階級底戰爭來對付資產階級底戰爭，——旁的出路是不能有的，所以，從政治觀點上看來，所有這些，僅僅是孟塞維克的假面具。歷史上莫名其妙的一回事，就是：在伯恩代表會議上，沒有正式宣佈為喪心病狂的人們，如何能夠受着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之委託說到布爾塞維克和他們的鬥爭，而不提及他們自己和

資產階級聯合來反對無產階級的鬥爭。

因為我們通緝他們，他們大家都殘酷地起來反對我們。這是對的。但是，他們在國內戰爭中參加了何種工作，他們却一字不提！我覺得，我應當要把他們的決議案底全文放在記錄上去，我希望外國的同志們，對於這個決議案加以注意，因為該決議案是一個歷史的文件，牠正確地提出問題，而且給予我們以最好的材料，來估計俄國『社會主義』各派間之爭論。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還存在着一個階級，即一時趨於這一方面、一時趨於另一方面的人們底階級；無論何時，無論在那一次革命中，都是這樣的；要使資本主義社會中，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構成兩個仇視的營壘的社會中，在這兩個階級之間，沒有居間的階層，這是絕對不可能的。此等動搖份子之存在是必不可免的，可惜這些份子，他們自己不知道他們在明天要站到那方面去作鬥爭的份子，還要很長久地存在着。

現在我想作一個具體的提議，這個提議就在於通過一個應當特別指出下列三點的決議案。

第一：對於西歐各國來的同志們，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在於對羣衆解釋蘇維埃系統之意義、重要與必要。在這個問題上，可以看到不充分的注意。雖然考茨基和希法亭這些理論家已經破產了，可是自由報上的最近幾篇論文畢竟證明出，他們正確地描寫了德國無產階級底落後部份之情緒。在俄國也有同樣的事情：在俄國革命後的起頭八個月當中，關於蘇維埃組織的問題，討論過很多很多，當時工人們不明白：新的系統在什麼地方，能否從蘇維埃造成國家機關。在我們的革命中，我們的前進，不是按着理論的步驟，而是按着實際的步驟的。例如，關於立憲會議的問題，在理論上我們以前沒有提出過而且也沒有說過：我們不承認立憲會議。只在後來，當蘇維埃的組織已普及於全國而且奪取了政權的時候，我們才決定了解散立憲會議。現在我們看見，在匈牙利和瑞士，問題提得更加尖銳些。一方面，我們從此可以堅決地相信，在西歐各國的革命之進展是要快些，而且將給我們以很大的勝利，——這是非常之好的。但在另一方面，這裏就有相當的危險，這就是：鬥爭得如此迅速，工人羣衆底覺悟將趕不上這樣的發展。對於有政治智識的廣大的德國工

人羣衆，蘇維埃系統底意義，現在還沒有明白，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充滿着國會代議制底精神和資產階級的偏見的。

第二：蘇維埃系統普及問題。當我們聽到蘇維埃底觀念如何迅速地普及於德國甚至英國的時候，在我們看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將要勝利之最重要的證據。只在短時間內可以阻止無產階級革命底行程。至於阿爾伯特和柏拉頓同志對我們說，在他們那裏，在鄉村中，在農業工人和小農中間，幾乎沒有蘇維埃，——這是另外一個問題。我在紅旗報（‘Die Rote Fahne’）上讀了一篇文章，牠反對農民蘇維埃而贊成僱農和鄉村貧民底蘇維埃，這是完全正確的。資產階級及其走狗們，如謝德曼輩，已經提出了農民蘇維埃的口號。但是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僱農和鄉村貧民底蘇維埃。可惜，從阿爾伯特和柏拉頓及其他同志底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到，除了匈牙利之外，對於鄉村中普及蘇維埃系統的工作做得非常之少。對於德國

*——就是說，在德國和瑞士。（編者）

*——紅旗報是共產黨的報紙，是現在「德國共產黨」底中央機關報。（編者）

無產階級達到可靠的勝利之尚有實際的和很大的危險，也許就在這裏。只有在不僅城市的工人，而且鄉村的無產者也組織起來的時候，同時他們不像過去一樣組織在職工會和合作社內，而是組織在蘇維埃內的時候，勝利才可算有了保證。在俄國，我們所以能夠容易地得了勝利，正因為一九一七年十月，我們和農民、和全體農民，作了一致行動。在這個意思上講，當時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的革命。我們無產階級政府底第一個步驟就在於；革命後第一天，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號（十月二十六號），我們的政府所公佈的法律^①，承認了全體農民底舊的要求，還在克倫斯基時代農民蘇維埃和農民大會所提出的要求。我們的力量也就在這裏，所以我們能夠這樣容易地取得絕對的多數。對於鄉村，我們的革命那時還是繼續其為資產階級的革命，只在後來，經過半年的工夫，我們就不能不在國家組織底範圍內，在鄉村中樹立階級鬥爭之基礎，在每個鄉村中成立貧民（半無產者）委員會^②，有系統地和鄉村資產階級作鬥爭。因為俄國落後的緣故，這都是必不可免的。在西歐、情形是會不同的，所以我們也應當着重指出：在適宜的，也許是新的形式之

下，蘇維埃系統之同時普及於鄉村居民中，是絕對必要的。

第三：我們應當說，凡在蘇維埃政權還沒有勝利的各國中，共產主義者要在蘇維埃中取得多數，這是主要的任務。昨天我們的決議案起草委員會已討論過這個問題。也許其他的同志對於這個問題還要發表意見，但是我想提議通過這三條，作為特殊的一個決議案。當然，我們不能呆板地規定發展底道路。在西歐許多國家內，革命會很快到來，這是很可能的；但是，我們以工人階級中有組織的一部份底資格，以黨底資格，抱定宗旨而且應當抱定宗旨，要在蘇維埃中得到多數。那時候，我們的勝利就有了保證，而無論什麼力量也不能阻難共產主義革命。不然，勝利不會這樣容易得到，而且不會長久的。因此，我想提議通過這三條作為特殊的決議案。

論專政問題底歷史：

論專政問題底歷史

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就是各資本主義國內現代工人運動之根本問題。要完全明瞭這個問題，就必須知道牠的歷史。在國際範圍內，關於一般革命專政、尤其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底歷史，是與革命社會主義底歷史，特別是與馬克思主義底歷史，正相符合的。其次——不消說，這是最重要的，——被壓迫和被剝削階級反對剝削者的一切革命底歷史，就是我們研究專政問題之最主要的材料和考據。任何革命階級，要得到勝利，牠就有專政之必要，誰不懂這個必要，誰就完全不懂革命底歷史，或完全不願意知道革命底歷史。

在俄國範圍內，如果拿理論來講，那末在一九〇二到一九〇三年由曙光和火星底編輯部所擬定的，或者正確些說，由普列漢諾夫所擬定的以及由這個編輯部所校訂的、更改的、批准的一俄國社會民主黨「黨綱」^①，有特殊的意義。在這個黨綱

中，無產階級專政問題，提得很明白而確鑿，並且恰恰與反對培恩斯坦、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聯繫起來。但是，有最重要的意義的，當然是革命底經驗，就是說，俄國一九〇五年底經驗。

一九〇五年最後三個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曾爲極有力的、廣泛的、羣衆的革命鬥爭底時期，這種鬥爭底兩個最有力的手段——羣衆政治罷工和武裝暴動——之結合底時期。我們要附帶地指出，還在一九〇五年五月中，布爾塞維克的代表大會——「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就已承認了，「組織無產階級用武裝暴動來和專制制度作直接鬥爭一個任務」，是「黨底最主要的和刻不容緩的任務之一」*，並且委託了全體黨的組織「去解釋羣衆政治罷工之作用，此等罷工，在暴動開始時和暴動底行程中，都能有重要的意義」。

當時武裝暴動曾與羣衆罷工——這是無產階級所特有的武器，——聯結起來，

* 參看列寧全集第七卷，第二五五頁，——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武裝暴動的決議草案（由列寧起草的），同時在該卷底附錄上，四三一至四三三頁，載有該決議案最後修正的原文。（編者）

這樣的發展高度和這樣的革命鬥爭力量，是全世界歷史上的空前所未有的。很明顯的，這個經驗，對於一切無產階級革命，是有世界的意義。因此，布爾塞維克會用全部注意力和熱烈態度，從政治方面和經濟方面去研究這個經驗。現在我要指出對每月的統計之分析，這些統計是關於一九〇五年底經濟罷工和政治罷工的，是關於這兩種罷工之聯繫底形式的，是關於罷工鬥爭當時那種前所未見的發展高度的；這個分析，我已在一九一〇年和一九一一年的教育雜誌上指出過，而且在當時國外的布爾塞維克的作品上也曾簡括地重複過。

羣衆罷工和武裝暴動，自然而然地把革命政權和專政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去了，因為這些鬥爭手段必不可免地產生了這些行動（首先在地方的範圍內）：驅逐舊的政權，無產階級和革命階級之奪取政權，驅逐地主，有時候奪取工廠，以及其他等等。上述這個時期中的羣衆的革命鬥爭，產生了世界史上所空前未見的這些組織，如工人代表蘇維埃，隨之而起的兵士代表蘇維埃，農民委員會以及諸如此類的組織。於是就有這麼一回事：現在引起全世界覺悟工人注意的那些基本問題（蘇

維埃政權和無產階級專政），已經在一九〇五年末切實地提出來了。如果革命的無產階級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底這樣著名的代表，如盧森堡即刻能夠重視這個實際經驗底意義，並且在會議上和刊物上發表言論，以批評的態度分析了這個經驗，那末，正式的社會民主黨和社會黨底絕大多數正式的代表，——改良主義者和未來的「考茨基主義者」「郎格主義者」，以及美國黑克維特底信徒等那樣的人都在內——却表現了完全不能了解這個經驗底意義和執行革命家底責任，就是說，着手研究和宣傳這個經驗底教訓。

在俄國，自從一九〇五年十二月的武裝暴動失敗之後，無論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即刻就把這個經驗做了一個總結。這個工作之所以特別加快的緣故，就是因為在一九〇六年四月舉行了斯托爾姆代表會議，所謂「俄國社會民主黨聯合代表大會」；在這次會議上，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都派了代表，而且形式上是統一起來了。對於這個代表大會的準備，這兩個黨派都曾非常努力地進行。在代表大會以前，在一九〇六年初，兩個黨派都公佈了牠們自己關於一切最重要的

問題的決議草案，這些草案，曾轉載於我這本關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聯合代表大會的報告（給彼得堡工人的信）的小冊子上，這本小冊子曾於一九〇六年出版於莫斯科（一一〇頁，其中幾乎有一半的篇幅是兩個黨派底決議草案以及代表大會最後通過的決議案）。這些草案，是為認識當時問題底提法之最主要的材料。

當時關於蘇維埃底意義之爭論，已經和專政的問題聯繫起來了。還在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以前，布爾塞維克就提出了專政的問題（請看我的小冊子：在民主革命中社會民主黨底兩個策略，一九〇五年出版於日內瓦，這本小冊子曾轉載於十二年來的文集中）。孟塞維克對於這個口號——「專政」——曾取否定的態度。布爾塞維克着重地指出過，工人代表蘇維埃實際上「就是革命政權底萌芽」——，布爾

* 這個報告見列寧全集第九卷，一七五至二二五頁，至於列寧此地所提到的決議草案，也編在第九卷內，布爾塞維克的草案，見三九至五〇頁和四五〇至四五二頁，孟塞維克的草案，見四五一至四五七頁。（編者）

見中文版列寧選集第五卷。（譯者）

塞維克的決議草案，曾一字不差的是這樣說的（報告第九五頁）。孟塞維克承認了蘇維埃底意義，贊成了『促進成立』蘇維埃等等，但是，他們不認為蘇維埃是革命政權之萌芽，一般地不談到這樣的或類似的『新革命政權』，直接否認專政這個口號。我們不難看出，在這個問題底提法中，已經含有一切現在我們和孟塞維克之間的意見分歧底萌芽。同時不難看出，孟塞維克（俄國的和非俄國的，如考茨基主義者、郎格主義者等等）表現了而且表現着，他們在本問題底提法中，是機會主義者或改良主義者，口頭上承認無產階級革命，實際上否認『革命』這個概念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東西。

還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前，在上述的兩個策略這本小冊子中，我已分析了孟塞維克底論據；孟塞維克曾責備我，說我『無形中把革命和專政這兩個概念暗地裏調換了』（十二年來，第四五九頁*）。我詳細地證明了，正是在這種責備中，孟塞維

* 見列寧全集第九卷，四四至四五頁。（編者）

見列寧全集第八卷，一一五頁。（編者）

克暴露出自己的機會主義，自己的本來的政治面目，而爲自由資產階級底附和者，爲無產階級內部自由資產階級底影響之傳導者。我說過，當革命成爲不可爭辯的力量時，甚至反對革命的人們，也開始『承認革命』，同時我曾指出（一九〇六年夏天）終究爲君主憲法派的俄國自由派，作爲例證。現在呢，一九二〇年的時候，可以補充地說，在德國和意大利的自由資產者，或者至少是他們中間最有智識的和最伶俐的人們，準備着『承認革命』。但是，當時俄國的自由派和孟塞維克、現在德國的和意大利的自由派——都拉底主義者、考茨基主義者之『承認』革命，同時又不肯承認某一階級（或某些階級）底專政，這恰恰就暴露出他們的改良主義，他們之完全不配做革命家。

因爲，當革命已經成了不可爭辯的力量時，當自由派也『承認』革命時，當統治階級不僅看到、而且感受到被壓迫羣衆之無可征服的勢力時，那時候，對於理論家以及對於政治上的實際指導者，全部問題都應歸結到對革命下一個確切的階級的定義。但是沒有『專政』這個概念，則不能給這確切的階級的定義。不準備專政，

就不能成爲實際上的革命家。不明瞭這個真理的在一九〇五年有孟塞維克，在一九二〇年有意大利的、德國的、法國的及其他的社會主義者，他們害怕「共產國際」底嚴格「條件」；因爲這些人能口頭上承認專政、而不能實際上準備專政。因此，這裏把我對於馬克思底見解的說明，詳細地重述一遍，不會不適當的；這個說明是我在一九〇五年發表來反對俄國的孟塞維克的，但對於一九二〇年西歐的孟塞維克也是有關係的（現在我不說出報紙及其他的名稱，而只簡單地指出事情是說到布爾塞維克還是說到孟塞維克）。

梅林格發表了一八四八年馬克思在新萊茵報上所登的論文，他在這些論文之後加上註釋說道：資產階級的作品曾經這樣責備新萊茵報，說牠似乎要求過『即刻施行專政，作爲實現民主之唯一手段』（馬克思遺著，第三卷，五十三頁）。從庸俗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來，專政的概念和民主的概念，是彼此抵觸的。資產者不懂階級鬥爭底理論，他在政治舞台上所能看見的，就是資產階級各小組各派別間的小的爭

● 即一九二〇年八月「共產國際」第二次世界大會所通過的「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件」。（譯者）

執，他認爲專政就是：一切自由和民主底保障之廢除、任意枉爲、濫用權力而唯專政者之個人利益是圖。在實質上，俄國的孟塞維克恰恰就持有這個庸俗資產階級的觀點，孟塞維克認爲布爾塞維克之所以偏愛『專政』的口號，因爲列寧『偏要嘗試幸福』（火星，第一〇三期，第三頁，第二欄）。爲要對孟塞維克解釋階級專政之不同於個人專政以及民主專政任務之不同於社會主義專政任務起見，把新萊茵報底見解研究一下，不是沒有益處的。

『在革命之後，——一八四八年九月十四號新萊茵報寫道，——一切臨時的國家都需要專政，而且需要強有力的專政。我們一開始就責備了堪普號仁（一八四八年三月十八號以後的內閣總理），說他不本專政的精神而奮鬥，說他沒有即刻擊破和沒有打倒舊機關底殘餘^①。所以，堪普號仁以立憲的幻想來催眠自己的時候，被打倒了的政黨（即反動政黨）就在官僚界和軍隊中鞏固了自己的地位，甚至敢實行在此地或彼地開始公開的鬥爭。』

梅林格說得很對：在這段話中，把新萊茵報論堪普號仁內閣的長篇文章中所發

揮過的議論，總括爲幾個論點。馬克思這段話倒底告訴我們些什麼呢？就是臨時革命政府應當以專政的精神而奮鬥（害怕而拒絕專政口號的孟塞維克，完全不能了解這個論點）；——這個專政底任務，就是消滅舊機關底殘餘（這恰恰就是「俄國社會民主黨（布爾塞維克）」第三次代表大會關於和反革命鬥爭的決議案上所明白指出的，而爲上述的孟塞維克底決議案上所刪除了的）。最後，第三點，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馬克思之打擊資產階級民主派，是因他們在革命和公開的國內戰爭時代抱了「立憲的幻想」。這句話底意思如何，從一八四八年六月六號新萊茵報底文章中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出。

「立憲的國民會議——馬克思寫過——首先應當是積極的、革命積極的會議。但佛蘭克福會議。則如小學生似地溫習代議制，而讓政府去行動。我們假定：這個學者的會議能够在成熟的討論之後制定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但假使德國政府在這個時候，

關於第三次代表大會與孟塞維克底這些決議案的詳細分析，可參看中文版列寧選集，第五卷，第

已把槍砲放在議事日程之上，那末，最好的議事日程和最好的憲法，還有什麼意思呢。」

『……專政這個口號底意思，就是如此。』

要解決民衆生活的偉大問題，只有實力。反動階級自己往往首先採用暴力、實行國內戰爭、『把槍砲放在議事日程之上』，如俄國的專制政府所做了的，以及從正月二十二號（九號）起隨時隨地有系統地和不屈不撓地繼續做的一樣。但是，既然有了這樣的局面，既然槍砲真正放在政治的議事日程之首位，既然暴動成了必要的和刻不容緩的任務，——那末，立憲的幻想和小學生式的溫習代議制，僅僅成爲掩蔽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工具，掩蔽資產階級如何『離開』的革命工具。那時候，真正革命的階級恰恰應當提出專政的口號。

一九〇五年十月革命以前，布爾塞維克關於專政的議論就是如此。

自有了這個革命底經驗以後，我曾經詳細地考察過關於專政的問題，而著了一本小冊子：立憲民主黨人底勝利和工黨底任務，一九〇六年出版於彼得堡（一九〇

見列寧全集第八卷，一一九五—二〇頁。（編者）

六年四月十號（三月二十八號）出版的。現在我把這本小冊子中一切最重要的議論援引出來，同時我要附帶地聲明，我把許多固有名字，簡單地改爲立憲民主黨人，或孟塞維克。一般地說，該小冊子是反對立憲民主黨人和部份地反對無黨的自由派、半立憲民主派、半孟塞維克的。但是，就事情底實質講來，關於專政所發揮的一切言論，恰恰是指孟塞維克而言的，因爲在這個問題上，孟塞維克處處都投向立憲民主黨人了。

當莫斯科的槍聲已經消沉的時候，當軍警專政舉行其狂烈的慶祝的時候，當軍事的刑法與大批的拷問已普及於全俄的時候，——正在這個時候，在立憲民主黨人底言論機關上，就發出了種種言論來反對自左而來的暴力，反對革命黨底罷工委員會。靠杜巴索夫底資助來出資科學的立憲民主派的大學教授們，竟弄到這樣的地步，他們把專政二字譯爲加強的保衛。『科學大家』爲要降低革命鬥爭，甚至曲解了他們在中學時代所學的拉丁語。專政就是（立憲民主派先生們，請你們永遠記着這一點！）不受限制的、依靠實力而不依靠

法律的政權。在國內戰爭時候，一切得了勝利的政權，只能是一種專政。但是，問題就在於：可有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少數警察對民衆的專政，也有大多數民衆對少數強迫、劫掠和竊奪民權的人們的專政。立憲民主派先生們，把專政這個科學概念，加以庸俗的曲解，在自右而來的最非法的最卑賤的暴力底橫行時代，他們大喊自左而來的暴力；這樣他們也就是顯然表現出：在劇烈的革命鬥爭中，『妥協者』底立場是怎樣的。在鬥爭劇烈的時候，『妥協者』便畏首畏尾地隱藏起來。在革命民衆得了勝利的時候（十月三十號〔十七號〕），『妥協者』便露其頭角，驕傲地粉飾着、囁雜地談論一切、而且喊到聲嘶力竭，說：這是『光榮的』政治罷工呵！在反革命得着勝利的時候，——『妥協者』就開始用假仁假義的勸導訓誨，來麻醉戰敗者。得了勝利的罷工，就是『光榮的』。遭了失敗的罷工，就是罪惡的、野蠻的、無意識的、無政府主義的。遭了失敗的暴動，就是神經錯亂、雜亂無章、野蠻行動、荒謬絕倫。總而言之，『妥協者』底政治良心和政治頭腦就在於：匍匐於強者之前以束縛鬥爭者底手足，時而妨礙此方，時而妨礙彼方，減弱鬥爭，麻醉爲自由而作殊死鬥爭的民衆之革命意識。

* 見列寧全集第九卷，九四至九五頁。（編者）

其次。引出我用以反對白朗克先生的關於專政問題的解釋，這是非常及時的。這位白朗克於一九〇六年在那個實際上是孟塞維克的，而形式上是非黨的報紙上，敘述了孟塞維克底見解，同時稱讚他們，說他們：

『抱定宗旨要使俄國的社會民主運動，走上以偉大的「德國社會民主黨」為領導的國際社會民主派所走的道路。』

換句話說，白朗克和立憲民主黨人一樣，他把『有理性的』孟塞維克，和布爾塞維克這些無理性的、非馬克思主義的、一味騷動的革命家對立起來，而把「德國社會民主黨」也當作是孟塞維克的黨。這都是國際社會自由主義派、愛國主義派等等之慣技，這班人在世界各國都稱揚改良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稱揚考茨基主義者、郎格主義者等，把他們看作是『有理性的』社會主義者，而與布爾塞維克底『無理性』對立起來。

在上述的小冊子中，我這樣回答了白朗克先生：

白朗克先生把俄國革命分成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約是一九〇五年底十月至十二月，

這是革命旋風時期；第二個時期就是現在這個時期；當然我們可以稱這個時期爲立憲民主黨人在選舉國會中得了勝利的時期，或者是——如果不怕說得太過火的話——立憲民主黨的國會時期。

談到這個時期的時候，白郎克先生說道，目前又進到了思想和理性底時期，因此可以回復到自覺的、有計劃的、有系統的活動。反之，白郎克先生把第一個時期形容爲理論與實際分歧的時期。一切社會民主黨的原則和觀念都消失了，「俄國社會民主黨」底創造者向來所鼓吹的策略也被忘掉了，社會民主黨的宇宙觀之基礎本身，甚至也被根本剷除了。

白郎克先生這個基本的論斷，是純粹帶有實際的性質的。馬克思主義底全部理論，與革命旋風時期底「實際」，已經分離了。

真正是這樣麼？馬克思主義理論之第一個主要的「基礎」是什麼呢？無產階級是現社會中唯一澈底革命的階級，因此牠在一切革命中也是先進的階級。試問革命旋風是否根本剷除了社會民主黨的宇宙觀底這個「基礎」呢？恰恰相反，旋風最好不過地證實了牠。正是無產階級，是這個時期底主要的、在最初幾乎是唯一的戰士。在資產階級革命中，純粹無產階級的鬥爭武器——羣衆的政治罷工——能够最大地、甚至在最發展的資本主義國

家裏面也是空前未見地，應用起來，這在世界歷史上幾乎是破天荒的事情。當立憲民主派先生們和白朗克輩號召參加「布里根國會」的時候，當立憲民主派的大學教授們號召學生安心念書的時候，就在這個時候，無產階級起來作了鬥爭，作了直接革命的鬥爭。無產階級用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鬥爭武器，替俄國奪取了全部的「憲法」（請容許我這樣說）^①，自那時起人們便把牠毀壞了、割去了、撕破了。一九〇五年十月無產階級所採用的那個策略上的鬥爭方法，即半年以前「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布爾塞維克第二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所說過的鬥爭方法；該決議案會特別注意到羣衆的政治罷工和暴動底結合之重要；——整個「革命旋風」時期，即一九〇五年最後三個月，其特點也就在這種結合上。這樣看來，俄國小資產階級底思想家最無恥地、最可惡地曲解了實際情形。他沒有指出一個事實，來證明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旋風」底實際經驗之分歧；他企圖抹煞這個旋風底基本特點，而這個特點却最好不過地證實了「一切社會民主黨的原則和觀念」——「社會民主黨宇宙觀底一切基礎」。

然而，白朗克先生所以發生這種離奇錯誤的意見，說「旋風」時期內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觀念，都已經消失了，其實在的原因是什麼呢？研究這個問題非常有趣；這種研

究可把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真面目再三再四地揭破出來。

從政治活動各種不同的手段底觀點來看，從民衆歷史創造底各種不同的方法底觀點來看，『革命旋風』時期和現在的、『立憲民主黨的』時期之主要區別，究竟在什麼地方呢？首先和主要的就在于：在『旋風』時期所採用的歷史創造底幾個特殊的方法，是爲政治生活底其他時期所不能採用的。這些方法中最重要方法如下：（一）民衆之『奪取』政治自由，——實現這個自由，不根據任何的法權和法律，也不受任何的限制（集會底自由，——至少在大學裏面有集會底自由——出版底自由、工會、代表大會之自由等等）；（二）造成新的革命政權機關，——工、兵、鐵路工人、農民代表蘇維埃，新的鄉村與城市的政權，以及其他等等。這些機關僅僅是由革命的民衆階層建立起來的，這些機關之建立，完全是用革命的方法，而超出一切法律與規範之外的；這些機關就是獨立的民衆的創造精神之產物，就是已經脫離或正在脫離舊的警察式的枷鎖的民衆底自動力之表現。最後，這些機關恰恰就是政權機關，雖然牠們還完全處于萌芽狀態、有了一切的自發性、無定形性、在成份上和職權上之散漫性。牠們的行動如政權一樣，比方牠們奪取了印刷所（在彼得堡），逮捕了妨礙革命民衆實現其權利的警察官（就在新政權機關最弱而舊政權

最強的彼得堡，也有過這些例子）。牠們的行動如政權一樣，牠們號召全體人民不要給錢與舊政府。牠們沒收了舊政府底金錢（在南方的鐵路罷工委員會），并把這些金錢用來滿足新的人民政府之需要，——不錯，這的確是新的人民政府底萌芽，或者可說是革命政府底萌芽。按其社會政治性而言，這是民衆中革命份子專政底萌芽，白郎克先生和啓才維特爾先生，你們覺得奇怪嗎？你們在這裏沒有看見『加強的保衛』（在資產者看來，『加強的保衛』即等于專政）嗎？我們已經對你們說過了，你們絲毫不懂專政這個科學的概念。現在我們替你們解釋這個概念，但是，首先我們要指出『革命旋風』時代底第三個行動『方法』：民衆應用暴力以對付民衆底強迫者。

上述的政權機關，就是專政底萌芽，因為這個政權不承認任何其他政權和任何的法律，不承認任何人所定的任何規範。不受限制的、超出法律之外的、依靠實力的（在該字最直接的意思上講）政權，——這就是專政。但是，這個新政權所依靠的和曾經企圖依靠的實力，不是小部份軍人所取得的槍械底實力，不是『警察署』底實力，不是金錢底實力，不是什麼過去已經存在的機關底實力。絕對不是的。無論槍砲也好、金錢也好、舊機關也好、新政權底新機關都是沒有的。牠們的實力（白郎克先生和啓才維特爾先生，你們

能否知道？）和舊權力底工具，沒有絲毫相同之點，和『加強的保衛』沒有絲毫相同之點，如果不是指民衆之加強保衛而使不受舊政權底警察機關和其他機關之壓迫的話。

這個實力所依靠的到底是什麼呢？牠依靠民衆。這就是這個新政權和過去一切舊政權機關之基本的區別。一爲少數人統治民衆、統治工農羣衆的政治機關。一爲民衆即工農羣衆、統治少數人、統治一小部份警察式的強迫者、統治一小部份特權的貴族與官僚的政權機關。這就是統治民衆的專政和革命民衆底專政之區別，白朗克先生和啓才維特爾先生，你們好好地記着這一點吧！少數人專政的舊政權，其所以能够保持得住，純粹是靠警察式的狡猾手段，純粹是靠排斥和擠除民衆、使其不能參政、不能監視政權。舊政權有系統地不信任羣衆，害怕光明、以欺騙手段保持其地位。絕大多數人專政的新政權，其所以能够保持得住和已經保持下去，純粹是靠廣大羣衆底信仰心，純粹是因爲牠能够最自由地、最廣泛地、最有力地吸引整個羣衆去參政的緣故。毫無掩飾、毫無秘密、毫無規條、毫無官僚文章。你是工人嗎？你願意把俄國從一小部份警察式的強迫者手裏解放出來而奮鬥嗎？你是我們的同志。請你即刻選出你的代表來，馬上選出來。你認爲怎樣方便，你就怎樣選舉好了，——我們很願意很高興接受他爲我們的工人代表蘇維埃、農民委員會、兵士代表

蘇維埃等等底全權委員。這就是對大家公開的政權，在羣衆面前公開的政權，羣衆得以接近的政權，直接由羣衆產生的政權，這就是民衆及其意志之公開而直接的機關。——新政權就是這樣，或者確切些說，新政權底萌芽就是這樣，因為舊政權之勝利，很早就摧殘了嬌嫩的筍芽。」

白朗克先生或啓才維特爾先生，你們也許要問，這裏何必要「專政」，何必要「暴力」呢？難道廣大的羣衆需要用暴力來反對小部份人嗎？難道數千萬和數萬萬的人都能夠成爲專政者來統治數千人、統治數萬人嗎？

發這問題的，往往就是第一次看到新的（他們認爲是新的）應用專政這個名詞的人們。這些人們所看慣了的，只有警察式的政權，只有警察式的專政。他們覺得很奇怪，能有不要一切警察的政權，能有非警察式的專政。你們說，千百萬人不需要暴力來反對數千人。你們錯誤了，你們所以錯誤，由於你們不在現象底發展中去觀察現象。你們忘記了，新政權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與舊政權并立、反對舊政權、和舊政權在鬥爭中產生出來，生長起來的。強迫者握有槍械和政權機關，不用暴力對付這些強迫者，便不能使民衆從強迫者下面脫救出來。

白朗克先生和啓才維特爾先生，試看下面這個簡單的小例子吧，那時你們就會領悟這個對於立憲民主派智力所不能了解的、對於立憲民主派的思想是『頭暈目眩的』妙處了。就以奧拉莫夫毆打和拷問斯皮里多諾娃●●來作例吧。假定在斯皮里多諾娃方面，有數十個和數百個手無寸鐵的人。在奧拉莫夫方面，有一小部份哥薩克兵。如果對斯皮里多諾娃的拷問，不在拷問室內舉行的時候，那末，民衆會怎樣幹呢？民衆會採用暴力來對付奧拉莫夫及其隨員。民衆也許要被奧拉莫夫所屠殺而犧牲幾個戰士，但是民衆之實力畢竟會解除奧拉莫夫和哥薩克兵底武裝，而且——這是很可能的——可在當地殺死他們幾個人（允許我稱他們爲人吧），而將其餘的人關在牢獄裏，使他們再不能肆其狂暴，并將他們遞交民衆法庭去裁判。

白朗克先生和啓才維特爾先生，你們看吧：當奧拉莫夫攜帶哥薩克兵而拷問斯皮里多諾娃時，這就是統治民衆的軍警專政。當革命的民衆（他們能夠和強迫者作鬥爭，他們不但能夠勸導、訓誡、嘆惜、非難、哀傷、悲痛，他們不是小資產階級那樣胸懷狹隘的、而是革命的民衆）採用暴力以對付奧拉莫夫和奧拉莫夫輩的時候，——這就是革命民衆底專政。其所以是專政的緣故，因爲這是民衆統治奧拉克夫輩的政權，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

的政權（小資產者也許要起來反對用暴力將斯皮里多諾娃從奧拉莫夫手裏奪過來，他會這樣說，這是不按『法律』的！你們是否有這樣的『法律』可以打死奧拉莫夫呢？小資產階級底有些思想家是否創造了不以暴力反抗禍害的理論呢？）。專政這個科學概念，不是別的，無非就是不受一切限制的、絕對不受任何法律、任何規則所束縛的、直接依靠暴力的、一個政權。『專政』這個概念，不是別的，就是這個意思，——立憲民主派先生們，好好地肥着吧。其次，在上述的例子中我們所看到的，恰恰是民衆底專政，因爲民衆，無組織的、『偶然』集合於該處的民衆，自己直接上台、自己處理法庭和懲罰手續，自己使用政權、創造新的革命法典。最後、這恰恰是革命民衆底專政。爲甚麼僅僅是革命民衆，而不是全體民衆呢？因爲，在那些經常地和最殘酷地受着奧拉莫夫輩那種壓迫的痛苦的全體民衆中，有軀體上受了蒙蔽的人們、受了恐嚇的人們、有精神上受了蒙蔽的人們，例如被不以暴力反抗禍害的理論所薰染的人們，或者不受理論所薰染，而簡單地爲偏見、習慣、常規所蒙蔽的人們，有抱冷靜態度的人們，即所謂庸人、小資產者，這些人更會拒絕作激烈的鬥爭、避免牠、或者甚至隱藏起來（我們不要參加鬥爭呵！）。所以實現專政的，不是全體民衆，而僅僅是革命的民衆；可是革命民衆絕不害怕全體民衆，而把自己的行動底原因

及其詳情公諸全體民衆，甚願吸引全體民衆，不僅去參加『管理』國家，而且去參加政權，去參加國家底建設。

這樣一來，我們在上面所舉的簡單例子，包含有『革命民衆專政』這個科學概念，以及『軍警專政』這個概念之一切元素。從這個簡單的、甚至有學識的立憲民主派的大學教授也能領會的例子，我們可以進而談到社會生活中更複雜的現象。

革命——在該字底狹義的、直接的意義上說——恰恰就是民衆生活中的這樣一個時期，就是對奧拉莫夫輩底壓迫百年來所積蓄的怨恨，已經表現在行動上，而不在口頭上了，且已經表現在千百萬民衆底行動上，而不在單個人物底行動上了。民衆正在覺醒起來，并且正在想從奧拉莫夫輩壓迫之下把自己解放出來。民衆可救出俄國生活中無數斯皮里多諾娃輩，使其不受奧拉莫夫輩之束縛，用暴力去對付奧拉莫夫輩，奪取政權以統治奧拉莫夫輩。這個鬥爭之發生，自然不像我們替大學教授啓才維特爾先生所舉的簡單化的例子那樣簡單，那樣『突然』，——這個鬥爭、民衆和奧拉莫夫輩之鬥爭、狹義上的、直接意義上的鬥爭，民衆之脫離奧拉莫夫輩的這個解放鬥爭，是延長至數月和數年之久的一種『革命旋風』。民衆之脫離奧拉莫夫輩的這個解放，也就是所謂俄國大革命底實在的內

容。如果從歷史創造底方法方面來觀察這個解放，那末牠之發生是在我們談到革命旋風時剛剛敘述過的那些形式中經過着的，這就是說：民衆之奪取政治自由，即是奧拉莫夫輩障礙了使其不能實現的那種自由；——民衆之建立新的、革命的政權、統治奧拉莫夫輩的政權、統治舊警察制強迫者的政權；——民衆之採用暴力去對付奧拉莫夫輩，以排斥這些兇狗——一切奧拉莫夫輩、都爾諾窩輩、杜巴索夫輩、米諾夫輩^①以及諸如此類的人，將其解除武裝，使其無害於人。

民衆採用這些不合法的、不規則的、無計劃的、和無系統的鬥爭手段，為奪取自由，建立新的、無人正式承認的、和革命的政權，採用暴力去對付民衆底壓迫者，——這是否好呢？是的，這是很好的。這是民衆為自由而鬥爭之最高表現。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當時俄國最好的人們底自由幻想却變成了切實際的事業，變成了民衆自身——而不是英雄個人——底事業。這猶之乎在我們所舉的例子中，羣衆把斯皮里多諾娃從奧拉莫夫手裏解放出來、暴力地解除奧拉莫夫的武裝、使其無害於人，一樣是好的。

但是，這裏我們就進到立憲民主派暗中的用意和居心之中心點。立憲民主派之所以成為庸人底思想家，就是因為他把有些庸人底觀點轉移於政治上、轉移於全民底解決上、

轉移於革命上；這些庸人，在我們所舉的奧拉莫夫之拷問斯皮里多諾娃的實例中，是要抑制衆人的，是要勸告他們不要違犯法律，不要着急去把握在代表合法政權殺人劊子手手裏的犧牲者解放出來的。當然，在我們所舉的實例中，這樣的庸人簡直是道德上的破產，而對於整個社會生活而言，庸人之道德上的破產，就是一種完全不是個人的，而是社會的特質，這種特質也許是由資產階級庸俗的法律學上根深蒂固的偏見所構成的①②。

在『旋風』時期，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都受了打擊，爲什麼白朗克先生認爲這是沒有證明的必要呢？因爲他把馬克思主義曲解爲勃連唐諾主義，他認爲民衆之奪取自由、建立革命政權、採用暴力——這些『原則』，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這樣的見解貫徹於白朗克先生底全篇論文中，不錯，具有這種見解的，不僅是一個白朗克，而且還有一切的立憲民主派，一切現在稱贊普列漢諾夫之愛慕立憲民主派的著作家、自由主義的和急進主義營壘中的著作家，直至普羅科波維赤、顧思科娃等等先生和女士們底無題雜誌③中的培恩斯坦主義者爲止。

現在我們來看，這種見解是怎樣產生的，而且爲什麼一定要產生。

這種見解，是由對於西歐社會民主黨之培恩斯坦主義的——，或者——更廣泛地說

——機會主義的一種了解所直接產生出來的。西歐『正統派』對於這個了解的錯誤，已經有系統地在各方面所揭破了，而這些錯誤現在又被人『暗中』、用其他的口吻，因其他的緣由，轉運到俄國來了。培恩斯坦主義者接受了并且接受着馬克思主義，而除去其直接革命的精神。他們不把國會的鬥爭，看作是一個特別適應於一定的歷史時期的鬥爭手段，而看作是主要的而且幾乎是唯一的鬥爭形式，使『暴力』、『爭奪』、『專政』成爲無用的鬥爭形式。白朗克先生輩以及其他頌揚普列漢諾夫的自由派，現在把這個對馬克思主義的卑鄙的、小資產階級的曲解，轉運到俄國來了。他們這樣同意這個曲解，竟認爲在革命旋風時期忘記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思想，甚至沒有證明之必要。

爲什麼一定要產生這種見解呢？因爲這種見解最深刻地適合小資產階級底階級地位和利益。『澄清的』資產階級社會底思想家，除了在『旋風』時代革命民衆所採用的、以及革命社會民主黨所同意和幫助採用的那些方法以外，是允許社會民主黨底一切鬥爭方法的。資產階級底利益需要無產階級參加反對專制制度的鬥爭，但是只要這樣的參加，不變爲無產階級和農民之居於領導地位，只要這樣的參加，不至於完全消滅舊的、君主專制農奴制的、以及警察式的政權機關。資產階級想保存這些機關，祇要牠們受其直接的監督，

——資產階級之所以需要此等機關，爲的是要反對無產階級，因爲此等機關之完全消滅，使無產階級極容易進行自己的無產階級的鬥爭。因此，資產階級這個階級底利益，需要君主國又需要上議院，需要反對革命民衆底專政。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說道，和專制制度作鬥爭吧，但是不要驚動舊的政權機關，這些機關是我所需要的。『本國會精神』去鬥爭吧，就是說，在我和君主制協定而允許給你的那些範圍內去鬥爭吧，經過組織去鬥爭吧，——但是不要像總罷工委員會^①，工兵代表蘇維埃等等，這樣的組織而要由我和君主制協定而頒佈的法律所承認的、限制的、對於資本沒有害處的組織。

從這裏可以知道，爲甚麼資產階級一談到『旋風時期』，就起輕視心、侮蔑心、怨恨心，仇視心，——談到由杜巴索夫輩所保衛的立憲制度時期^②，便歡天喜地、手舞足蹈，產生無限的小資產階級的愛慕……反動之心。這也就是立憲民主派之亙古不變的特質：想依靠民衆，同時又怕民衆底自動性。

同樣可以知道，爲甚麼資產階級之害怕『旋風』之復起比火猶甚，爲甚麼牠忽視和抹煞新的革命危機底原素，爲甚麼牠在民衆中擁護和散佈立憲的幻想。

現在我們完全明白了，爲什麼白朗克先生和類似他的人們公開說道：在『旋風』時

期，一切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和理想，都被忘掉了。白朗克先生——和一切小資產者一樣，——承認馬克思主義，而除去其革命精神，——承認社會民主派的鬥爭手段，而除去其最革命的和直接革命的手段。

白朗克先生對於『旋風』時期所抱的態度，極足以表示出資產階級之不懂無產階級運動，資產階級之害怕激烈堅決的鬥爭，資產階級之仇視急轉直下的，破壞舊機關的，用革命（在該字底直接意義上講）方法解決社會歷史問題之一切表現。白朗克先生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即刻暴露了自己一切的資產階級的狹隘性。他聽過和讀過，在旋風時期，社會民主黨人做了『錯誤』，——他就趕快做出結論，而且自信地、武斷地、無根據地說道，馬克思主義（他不懂馬克思主義爲何物！）底一切『原則』，都被忘掉了。關於這些『錯誤』我們可以說：在工人運動底發展中、在社會民主黨底發展中，難道有過這樣的時期，即沒有做過某種錯誤的時期嗎？難道有過這樣的時期，即沒有發展過某種右傾或左傾的時期嗎？難道德國社會民主黨國會鬥爭的時期——即全世界一切狹隘的資產者認爲不能超越其界限的時期——底歷史，沒有充滿了這些錯誤嗎？如果白朗克先生對於社會主義問題，不是一竅不通的人，那末，他很容易記到高爾白格，記到杜林，記到輪船補助金問題①。

，記到『少年派』^①，記到培恩斯坦主義，以及記到其他許許多多的東西。但是，白朗克先生認爲重要的，却不是研究社會民主黨底發展之實在的行程，而祇要降低無產階級的鬥爭力量，以便抬高自己的立憲民主黨之資產階級的貧乏性。

在實際上，如果我們從社會民主黨之離開其通常的、『經常的』道路的觀點來觀察問題，那末，我們可以看到，就在這個關係上，『革命旋風』時期所表示的社會民主黨內的團結和思想上的一致，和過去比較起來，是要多些，而不是少些。『旋風』時期底策略，沒有隔離，而是接近了社會民主黨底兩派。關於武裝暴動的問題，沒有了已往意見的分歧，而得到了見解底一致。兩派社會民主黨人，都在工人代表蘇維埃——萌芽的革命政權之特殊機關裏面做了工作，吸引了兵士、農民去參加蘇維埃，與各個小資產階級革命黨共同發印了革命宣言。實際問題上的團結行動，代替了革命以前的已往的爭論。革命浪潮之高漲，推開了意見分歧，迫得承認了作戰的策略，取消了國會問題，把暴動問題提到議事日程上去，在直接的最近將來的工作中使社會民主派和革命的資產階級民主派接近起來。在北方呼聲中，孟塞維克和布爾塞維克會共同號召罷工和暴動，號召工人不得到政權便不停止鬥爭。革命環境的自身提出了實際的口號。所爭論的，只涉及於事變估計中的詳細條

文：例如，開端報把工人代表蘇維埃看作是革命的自治機關，新生活則把牠們看作是聯合無產階級和革命民主派之革命政權萌芽機關。開端傾向於無產階級專政；新生活則站在工農民主專政的觀點上，但是，在歐洲任何社會黨底發展中之任何一個時期，難道沒有告訴我們社會民主黨內部這些以及類此的意見分歧嗎？

白朗克先生之所以顛倒是非，駭人聽聞地曲解已往的歷史，是因爲而且僅僅因爲，他是自滿的資產階級的卑鄙下賤之標本人物，在他看來，革命旋風時期，就是神經錯亂（『一切的原則都被忘掉』，『思想的本身和簡單的理性差不多也消失了』），而革命的失敗和小資產階級的『進步』（杜巴索夫輩所保衛着的）底時期，就是合理的、自覺的、有計劃的活動底時代。對於兩個時期（『旋風』時期和立憲民主派的時期）之比較的估計，曾貫徹於白朗克先生底全文。當人類歷史以火車頭底速度往前飛駛的時候，這就是『旋風』、『怒潮』、一切『原則和觀念』之『無形消滅』。當歷史以牛車底速度而徐徐運行的時候，這就是真正的理性和真正的計劃性。當民衆自身，以其一切幼稚的原始性，直爽的、魯鈍的決心，而開始創造歷史，馬上直接實現『原則和理論』的時候，資產者就感覺到混身戰慄，而大喊道：『理性置之腦後了』（小資產階級底英雄們！豈不是相反嗎？在

這個時候歷史上所看到的豈不是正是羣衆底理性，而不是個人底理性嗎？羣衆的理性豈不是正在那時候變成靈活的，實在的，而不是研究室的力量麼？。當羣衆底直接運動，受了槍炮，拷問，鞭打，失業，飢餓之打擊的時候，當仰給於杜巴索夫的金錢的大學教授式的科學家抬頭露角，開始用羣衆底名義爲民衆而辦理事務，而將他們的利益出賣和讓給少數特權者的時候，——此時在小資產階級底健將們看來，鎮靜的和平安的進步時代已經到了，『思想和理性底程序，已經到了。』資產者隨時隨地都不變他自己的主張：無論拿北斗星或我們的生活來看，無論拿司徒威或白朗克底著作去讀①，到處都是一樣，到處都是這個對於革命時期和改良主義時期的狹隘的，大學教授式的，腐儒的，官僚式的，毫無生氣的估計。前一時期是神經錯亂的時期，思想與理性無形消滅的時期。後一時期是『自覺的，有系統的活動』底時期。

不要誤會我的說話。不要說，我論及白朗克先生輩之偏愛這個或那個時期。問題并不在於偏愛上，——歷史時期之變更，不依我們主觀的偏愛爲轉移的。問題就在於：白朗克先生輩在對某個時期底本質（牠完全不以我們的偏愛或我們的同情爲轉移的）作分析的時候，無廉恥地曲解真理。問題就在於：正是革命的時期，和庸人的，立憲民主派的，改

良主義的進步時期比較起來，在歷史創造上是更廣泛些，更豐富些，更自覺些，更有計劃些，更有系統些，更勇敢些和更光明些。但是，白朗克先生輩却把問題看作相反。他們把貧乏性當作是歷史創造的豐富性。他們把受了打擊或受了鎮壓的羣衆之不活動，當作是官僚，資產者底活動中『系統性』之勝利。當『庶民』直接的政治活動代替了一切事務處的小官僚和自由主義者賣文爲生的下流作家研究法律草案的時候，當『庶民』簡單地，直接地，馬上破壞壓迫民衆的機關，奪取政權，取得那些被人認爲是屬於一切掠奪民衆的人的東西，總而言之，當千百萬困苦的人底思想和理性醒覺起來的時候，而且其醒覺不僅爲着讀死書，而且爲着活的事業，爲着人類的事業，爲着歷史的創造的時候，——在這個時候，他們就高呼什麼思想和理性之消滅了。

俄國一九〇五到一九〇六年關於專政的爭論就是如此。

德國的狄特曼輩、考茨基輩、克里斯賓輩、希法亭輩先生們，法國的郎格先生之流，意大利的都拉底先生及其朋友們，英國的麥克唐納爾輩和斯腦頓輩先生們等

見立憲民主派底勝利和工黨底任務一文，列寧全集第九卷，一一五至一二五頁。（編者）

等——他們關於專政的議論，在實質上完全如俄國一九〇五年的白朗克先生以及立憲民主派所持的議論一樣。他們不懂專政，不會準備專政，不能了解和實現專政。

一九二〇年 十月二十號。

註

釋

註釋

●列寧底國家與革命這部著作，曾於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以單行本初次出版，在以後的各年中，在蘇聯以及在外國曾大批地出版。

這部著作，說明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底主要問題：社會主義革命底基本問題，即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對一般國家的態度問題，尤其是對剝削者國家及資產階級國家的態度問題，破壞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並在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組織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

在這一部著作中，列寧把馬克思恩格斯關於國家及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從戰前和戰時第二國際公開的右派機會主義者、暗藏的機會主義者以及中派理論家的曲解中清洗出來，並根據馬克思恩格斯死後帝國主義時代國際無產階級底經驗，尤其是根據俄國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七年革命底經驗，發揮了馬克思恩格斯的這一部份學說。國家與革命一書底出世，在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和革命實際底發展史上，是一樁最重要的，造成一個時代的事

件。列寧這部著作，出版於俄國社會主義十月革命發生後的次日，牠說明並證實無產階級革命底道路，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國家的道路以及這個國家之發展道路；這部著作，對於吾黨之領導蘇聯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家建設，對於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共產黨及國際革命無產階級推翻資產階級和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始終是一部基本的，指南的著作。

在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爭取革命理論與革命實際的鬥爭史上，列寧底國家與革命一書，直接繼續了過去的鬥爭來反對右派機會主義者對於馬克斯主義的曲解（這是一方面，反對『左派』對馬克斯主義作無政府主義的曲解（這是另一方面）；這個鬥爭，還是由馬克思恩格斯自己所開始的，而列寧及布爾塞維克黨，在布爾塞維主義產生時就始終不倦的作了這個鬥爭。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鬥爭中鍛鍊出了自己的學說，這個鬥爭，一方面是反對自由主義，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拉沙爾主義等），另一方面是反對無政府主義（蒲魯東主義，巴枯寧主義等），反對『貧血的急進主義』（如恩格斯所說的）以及其他的所謂『左』派，這些『左』派不過是表現同一小資產階級狹隘性底另一方面，祇是用另外一種方

式來把資產階級的影響傳達給無產階級。

無政府主義派，曾妄想一舉而消滅資產階級國家，且隨着資產階級國家而消滅其他任何的國家，他們曾妄想一下子就消滅國家而建立無國家的社會。馬克思和恩格斯則恰恰相反，他們曾指明：如果執政的無產階級不是根據新的社會主義原則而比較長期地改造全社會，那末過渡到無國家的、共產主義的社會是不可能的。根據馬克思恩格斯底學說，正是爲着這個改造起見，無產階級就必須推翻資產階級，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在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的時期中建立自己的新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底國家。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鍛鍊出其關於國家及無產階級學說的時候，曾無情地打擊拉沙爾和拉沙爾派底改良主義的、機會主義的思想，這種思想就是：經過所謂「自由的人民國家」而過渡到社會主義，實際上就是經過普選制的資產階級國家而過渡到社會主義。馬克思和恩格斯也同樣無情地打擊了拉沙爾主義承繼者（馬克思恩格斯在世時就已形成的各西歐社會黨內的改良主義者）關於國家的機會主義理論，打擊了他們那種不懂並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觀點。馬克思和恩格斯死後隨着第二國際各社會黨內改良主義底發展，這種曲解革命馬克思主義和公開放棄革命馬克思主義的現象，到十九世紀末葉已經達到很廣的範圍，日

益普及於第二國際底理論家和行動家（培恩斯坦主義等）。這種現象，沒有遇到西歐第二國際考茨基之流的理論家們底必要反抗，這些理論家會自命爲馬克思恩格斯遺訓底擔負者，曾以馬克思主義擁護者底資格來反對修正主義者（培恩斯坦等），而在事實上，當他們批評修正主義者的時候，恰恰在馬克思主義底基本問題上——國家問題，暴力革命問題及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他們自己都犯了修正主義，好像列寧所指出的那樣（見本卷國家革命第六章），他們自己曾有系統地俗化和抽空了馬克思主義。第二國際內考茨基之流的理論家，佔了中派的立場（雖然大戰以前考茨基有過許多有價值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用俗化和抽空馬克思主義基本問題內容的方法，幫助了第二國際各社會黨內公開的機會主義。在大戰時期，他們自己同公開的機會主義者手攜手地把這些黨變成了替資產階級服務的社會國家主義黨，他們自己變成了暗藏着的、因此是最危險的社會國家主義者。然後他們就同過去的修正主義者一塊兒變成了反革命社會法西斯主義底理論家和領導者，而社會法西斯主義便是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反對世界革命、反對世界革命根據地、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國家——蘇聯——的一個主要柱石。

列寧所進行的反機會主義的鬥爭，一開始就是擁護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

鬥爭，並是爲在新條件下——帝國主義條件下發揮這個理論的鬥爭，是擁護暴力革命、擁護馬克思主義對剝削者國家所持態度、擁護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這個鬥爭，是在『俄國革命基本問題』：如黨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態度問題，工農聯合問題，無產階級領導問題，國會鬥爭和國會外的鬥爭問題，總罷工問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帝國主義問題，民族自決問題，被壓迫民族和殖民地解放運動問題，援助這個運動的政策問題等等』（斯大林）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個鬥爭曾有重大的國際意義，因爲『俄國革命會是（而且現在還是）世界革命底焦點』，因爲『俄國革命底基本問題同時會是（而且現在還是）世界革命底基本問題』（斯大林）。至於革命基本問題——國家問題及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這個全部的鬥爭中佔了何等重要的地位，這點可從列寧選集的前數卷中看得出來，尤其是從何謂人民之友、民粹主義底經濟內容及司徒威書中對牠的批評、做什麼、俄國社會民主黨民主革命中的兩個策略，俄國社會民主黨一九〇五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等等著作中，可以看得出來。這點也可從編入在本卷的列寧所著專政問題底歷史一文中看得出來。

列寧底鬥爭，主要的是反對右派機會主義，尤其是反對培恩斯坦派、馬丁諾夫派，普

列漢諸夫派及託洛斯基派在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上，在俄國經過工農革命民主專政而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上，曲解並俗化馬克思主義。同時這個鬥爭亦反對「左派」，特別是波蘭社會民主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內的「左派急進派」（盧森堡及其信徒）在這些問題上曲解馬克思主義。

在大戰年代，一部份俄國同志在國家問題上對於馬克思主義作了「左的」曲解，這部份人在其對於帝國主義問題及社會主義革命問題的觀點上曾接近於波蘭和德國的「左派急進派」。這就是布哈林、皮達可夫這一派人。他們用無政府主義觀點提出了國家問題。當他們以及波蘭和德國的「左派」急進派擁護他們在民族問題和殖民地問題上的無政府主義立場時，就暴露了這個錯誤。他們反對民族自決權的口號，並說在資本主義時代，這個口號對於無產階級黨是不適用的，在社會主義時代是多餘的；他們完全忘掉了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無產階級國家存在的時期；而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如果不承認和不實現民族自決權，就不能建設起來。布哈林同志在國家問題上十分明確地採取了這種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布哈林同志在一九一六年的青年國際雜誌上，用 *Nota-bene* 這個匿名出面寫了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曾認為馬克思主義者對國家的

態度與無政府主義者對國家的態度彼此相同。他說：馬克思主義者同無政府主義一樣在原則上仇視一切的國家，他們兩者都提出『炸燬』國家這個相同的任務。這樣一來，第一他就否認了馬克思主義的學說：無產階級必須在破壞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以後，在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時期中建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換句話說，就是他否認了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第二他就消滅了無政府主義者之『炸燬』資產階級國家與馬克思主義者之破壞這個國家，與馬克思主義者之『打破』『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間原則上的區別。就在那個時候，列寧在社會民主黨人彙刊第二期上，在青年國際一文中，對於布哈林同志在國家與革命問題上的這種無政府主義的立場給了一個打擊，並答應將來另作一文來說明這個問題。同時，列寧所領導的社會民主黨人彙刊底編輯部，曾拒絕登載布哈林同志關於帝國主義國家理論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布哈林同志也發表了自己的無政府主義觀點。列寧死後，布哈林同志就發表了這篇文章，把牠登在一九二五年的第一期革命與法權這個彙刊上面，並特別附上註釋，在這個註釋中說道：『讀者不難看出，我沒有犯過人家誣說我犯的那種錯誤，因為我曾明白看到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另一方面，從列寧底短評中可以看出，他這時候對於炸燬國家（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的論點曾持不正確的態度，因把

這個問題與無產階級專政衰亡的問題混雜起來。當列寧研究問題的時候，他關於炸燬的問題也得出了與我相同的結論。」

從這個註釋中十分明顯地可以看出：布哈林同志既責備列寧對「炸燬」國家的問題採取「不正確的」態度，既把自己放在列寧之上，可知在事實上，他在十月革命底經驗以後，在八年來的無產階級專政及蘇維埃無產階級國家建設的經驗以後，仍擁護自己的舊主張。他仍舊把無政府主義者之「炸燬」國家（自然是資產階級的國家）與馬克思主義者之「打破」「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兩者混為一談。

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九年四月中央全會上論聯共黨內的右傾的演說中，在說布哈林同志是一個理論家的時候，曾詳細估計布哈林同志在國家問題上的立場，並萬分清楚地指出：布哈林的立場與馬克思列寧對國家的態度，兩者完全不可調和。斯大林同志說過：「這裏的問題就是：照布哈林（及無政府主義者）底意思，工人們應該特別表明自己在原則上仇視一切國家，就是說也仇視過渡時期底國家，工人階級底國家。請你們去嘗試一下，告訴我們的工人聽吧：工人階級應該在原則上仇視無產階級專政，因為無產階級專政也是一種國家。布哈林在其青年國際雜誌上一篇文章中所站的立場，就是否認在從資本主

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中的國家。這裏，布哈林同志忽略了一樁「瑣事」，就是說他忽略了整個過渡時期，在這個過渡時期中，工人階級如果真想鎮壓資產階級和建設社會主義，牠就不能不有自己本身的國家。這是第一點。第二，說列寧同志當時在其批評中沒有講到「炸燬」「取消」一切國家的理論，這是不對的。列寧不懂講到了這個理論，而且從上面我所舉的幾段話裏可以看出，他還批評了這個理論，認為這是無政府主義的理論，並用推翻資產階級以後建立新國家——即無產階級專政國家——這個理論來與牠對立。最後，決不能把「炸燬」國家這個無政府主義理論與「打碎」「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個馬克思主義理論混為一談。有些同志企圖把這兩個不同的概念混為一談，認為這兩個概念表現同一的思想。但這是不對的。同志們，這完全是不對的。當列寧批評「炸燬」及「取消」一切國家這個無政府主義理論的時候，他正是以「打碎」資產階級國家機器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為出發點的。」（見斯大林論聯共黨內的右傾）

斯大林同志在估計上面所提及的布哈林同志那段註釋（一九二五年革命與法權彙刊上一篇文章底註釋）的時候，曾說過：「他（布哈林——編者註）曾這樣打算：從今以後，馬克思主義國家論底創造者，或至少是牠底指導者，應該不是列寧，而是布哈林同志了。」

直到最近，我們始終認爲自己是列寧主義者。而到現在，列寧也好，我們（列寧的學生）也好，原來都是布哈林派。同志們，這倒有些可笑。可是布哈林同志要大吹法螺，又有什麼辦法呢。」（見斯大林論聯共黨內的右傾第七十六頁）。

在這篇演說詞中，斯大林同志從列寧底馬克思主義與國家這本記錄簿上引了一大段話，由這段話，可知列寧曾認爲與布哈林同志對國家的無政府主義的觀點鬥爭是有重大意義的。在這本記錄簿上，列寧曾寫道：

我們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在現在和在無產階級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專政』）都利用國家——這兩點對於現在的實際工作是極重要的（這兩點布哈林却忘掉了！）。

我們與機會主義者不同的地方，就是我們了解下面這些更深刻『更永久』的真理：國家帶有『臨時』的性質，『空談』國家是有害的，無產階級專政不完全帶有國家的性質，國家與自由之間存在着矛盾，『公社』這個觀念（概念、名詞）比較國家這個觀念更爲確當，必須『打破』官僚軍事機器。還不應該忘記的就是：德國公開的機會主義者（培恩斯坦、考爾勃等人）直接否認無產階級專政，而正式的黨綱和考茨基則

間接加以否認，在日當的鼓動中不談到無產階級專政並容忍考爾勃之流的叛變行爲。

一九一六年八月曾對布哈林寫過：『讓你的國家觀成熟起來吧』。『可是他自己呢，却不讓牠成熟，就以“Notar bene”這個匿名出而而發表出來。他這樣做，結果沒有揭破考茨基派，而反用自己的錯誤幫助了他們！而按實講來，布哈林要比考茨基近於真理。』（列寧文存第十四卷馬克思主義與國家第二五六至二五九頁）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舊曆二月十七日）列寧給郭倫泰同志的信中，也談到這個問題，他寫道：『我正在準備一篇關於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態度的問題的文章（材料差不多已經準備好了）。我所作的結論，反對考茨基比反對布哈林還更厲害（我們已經讀過第六期青年國際雜誌和第二十一期社會民主黨彙刊上“Notar bene”的文章）。問題極端重要：布哈林要比考茨基好得多，可是布哈林底錯誤，可以葬送他這個反考茨基主義的『正當事業』。』（列寧文存第二卷第二八二至二八三頁）

這樣看來，布哈林同志在國家問題上的無政府主義立場及其對於機會主義的無政府主義批評，祇幫助了考茨基派俗化並抽空馬克思主義底內容，這樣也就是給了反考茨基主義的鬥爭以莫大的害處。

從上面所引的列寧致郭倫泰的信中的一段話裏可以看出：在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日（舊歷二月十七日）的時候，列寧關於『馬克思主義對國家態度問題』，即國家與革命這部著作底『材料差不多已經準備好了』。這種『材料』也就是上面所屢次提及的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與國家那本記錄簿。二月革命使列寧暫時停頓了最後整理這種『材料』的工作。祇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事變以後，當列寧因臨時政府下通緝令而避匿於拉士里夫車站附近茅屋裏面的時候，他才開始整頓他那準備好了的材料，開始是在茅屋內，後來是在赫爾森法斯。

在赫爾森法斯，他就寫成了這部在理論上政治上具有偉大意義的著作——國家與革命。

可是列寧還是不能完全寫完這部著作。寫到說明一九〇五年革命經驗和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經驗的那一章——第七章的時候就中斷了。繼續擴展的革命中斷了這個工作。

列寧打算以後再繼續這項工作，再分析俄國革命底經驗，作為國家與革命一書底第二部。可是革命鬥爭正非常緊張，他忙於解決其他更迫切的問題，所以來不及完成預定的計劃。

●資本家底強大的組合——托辣斯和新迪卡，是由財政資本（就是說，工業資本和銀行資本之融合）經過銀行而領導和指揮的，此等聯合機關底壟斷（就是說，資本主義經濟

中獨佔的或幾乎獨佔的統治），就是帝國主義底最重要的特點。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壟斷的資本主義，變成了國家的壟斷資本主義。我們應當把無產階級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國家中的國家資本主義分別清楚。在無產階級國家裏，國家資本主義是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例如私人向國家租借的企業、租借地），牠們由無產階級的政權來調節，而有利於無產階級。在資產階級國家裏，國家資本主義，或者是資本主義的企業，或者是整個的經濟部門（例如鐵路），牠操在資產階級國家手裏，換言之，即操在資產階級整個階級手裏，最後，或者是私人經濟的資本主義的工業、農業、商業、牠們由資產階級國家來調節，而有利於這個資產階級。在帝國主義戰爭時候，各交戰國底資產階級利益，需要這樣的對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分配之調節，使生產和分配受『保護祖國』『達到最後勝利的戰爭』之需要所支配，以達到每個參戰國底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所立定了的那些強搶的掠奪的目的。生產和分配之此種國家的調節，列寧在本文上即稱牠為『由壟斷資本主義變為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的過程。』

●德國大哲學家黑格爾，是個唯心主義者，他發揮了辯證法的學說。只有馬克思把他的辯證法變成了為唯物主義的辯證法，將他的辯證法『顛倒過來』，而與恩格斯共同創造

了辯證的唯物主義。黑格爾一般地是唯心主義者，而在他的國家學說上，仍舊是唯心主義者。按黑格爾底學說，道德是天赋與人們的。人們不能創造道德，而是不依人們為轉移的道德自身，寄託於人們底一般的意識中，而為特殊的道德規律。這個規律的自身，又是『絕對精神』、『絕對理性』（牠是構成整個宇宙底基礎）之表現，並且要求一切人們要絕對服從這個規律。國家就是這個道德規律底產物——牠的大成。按黑格爾底學說，不依賴人們而獨立存在的道德觀念，是具體地實現於國家中。因此，據黑格爾底意見，不能把國家看作個人、社會組織、或階級底利益之工具。

黑格爾的國家學說，和盧梭底資產階級學說相反，盧梭生於黑格爾之先，他把國家看作人與人間之『社會契約』底結果，而『社會契約』是表現個人意志底總和。盧梭底國家學說，固然是失了國家底階級觀，不把國家當作是階級統治底組織，但是他的學說，在當時畢竟是革命的，因為按照他的學說，國家是人們自身底創造，而且能由人們自身來改變的。然而，根據黑格爾底學說，這是不可能的；國家依賴着處於人們底影響之外的絕對精神、絕對理性，且為這個『絕對精神』底表示和顯現。

●法國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君主專制政體（路易十四、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

在法蘭西大革命（一七八九年）之前，是由封建轉為資產階級制度之過渡時期底國家。在封建社會範圍內發展了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經濟上和政治上一年強過一年。靠農奴制的剝削農民為生活的封建主（地主）本身，往往在財政上是依賴那鞏固起來的資產階級的。

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資產階級和封建階級（地主階級），處於彼此勢均力敵的地位。資產階級還沒有充分的力量把政權奪到自己手裏來，而經濟上已經減弱的封建主，又不能獨立統治起來。實際上仍舊是地主式的國家政權，不能不聽資產階級底強硬要求，並在相當的限度內滿足牠的要求，以保證自己封建主階級（地主）底利益。但同時國王只是在封建主中最大的封主，他依靠封建主而壓制資產階級，部份地，從資產階級手裏取得維持國家機關的經費；當國王要影響那些企圖限制國王行動的封建主時，他自己又依靠於資產階級。

君主專制政體底這種情形，給人一個外表的根據，去這樣推論：國家政權站在交戰各階級之上，牠之手與牠們的鬥爭，僅僅為調和牠們而已。可是事實上，君主專制政體會為崩潰的封建階級底國家。資產階級一經鞏固起來，牠就打倒君主專制政體，而建立自己的

階級國家（如一七八九年到一七九四年的法蘭西大革命就是）。

法蘭西第一帝國時代，就是拿破崙第一掌握政權的時候，牠在階級鬥爭中之相爭勢力底平衡，以及國家政權之表面上不依賴統治階級這個意義上，也是很特別的。法蘭西大革命始初（一七八九年）將政權分給資產階級，在革命繼續發展中（一七九三年到一七九四年），轉為革命小資產階級專政，而以雅可賓派為其代表者。資產階級推翻了這個專政，復得了政治統治，但是，城市小資產階級、城市貧民、以及工人階級（不錯，工人階級當時還是薄弱的）之不滿，繼續危害了這個統治底穩固性。當時應當掩蔽這個統治，而且還要這樣掩蔽，以保障鎮壓一切不滿的社會階層底反抗，同時要使這個不滿不至連累資產階級。為此之故，資產階級將政權委託與拿破崙第一，後者便成為法蘭西底皇帝。拿破崙帝國消滅了代議制，資產階級政治上的權利表面上似乎受了相當的限制，其實牠完全為着鞏固大資產階級——工商業和財政資產階級底地位而出力。牠使工人完全無權，而剝奪其組織之最後的權利。牠保障了農民在革命中所得到的土地，而作他們的私有財產，因此牠在受騙的農民羣衆中有很大的名望；在這些農民羣衆看來，他們在革命中所得到的利益，是與拿破崙底名字有連帶關係的，其實帝國所施行的政策，僅僅幫助了鄉村中日益發展的資

本主義的上層份子，帝國借助於這些上層份子而欺騙農民羣衆。這樣一來，拿破崙主義利用了國家政權以鎮壓不滿意資產階級制度的工人和城市小資產階級，並且鞏固大資產階級底經濟和政治地位。

第二帝國底拿破崙主義（從一八五一到一八七〇年的法皇拿破崙第三）產生於一八四八年革命之後。大致說來，牠是代表大的財政資產階級底利益的。在一八四八年革命時，已經長大了和強固了的法國工人階級，曾在巴黎實行企圖用暴動來奪取政權。這個企圖會沉沒於工人底鮮血中（一八四八年的六月事變）資產階級得了勝利了，但是，牠要鞏固自己的勝利，——如一七八九到一七九四年革命中之鞏固對雅可賓派的勝利一樣，——只有改變其統治底形式，以及再把政權委託與『皇帝』——即拿破崙第三（其詳情見本書註①），才有可能。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曾經說過：『當資產階級已經失掉管理民衆的能力，而工人階級還沒有獲得這個能力的時候，此時帝國是唯一可能的管理形式』（馬克思一八七一年法蘭西內戰）。

帝國取消了代議制，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政府不依賴資產階級，其實帝國是爲着鞏固資產階級對於工人階級的統治底利益。帝國與農民羣衆吊膀子，可是牠僅僅爲鄉村富農、

保皇派的資產階級所領導的富農謀利益而已。拿破崙主義用鼓惑爲護符，在表面上似乎爲各階級謀利益，其實牠僅爲着一個階級——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底上層份子而服務。

在德國歷史上，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這個時期，俾斯麥曾爲德國政府底元首，從政府之表面上不依賴交戰各階級這個觀點來看，這個時期也是很特別的。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德國資本主義底發展，已經開始迅速前進了。日益鞏固的工業資產階級，已經力圖要得到政權。依靠地主和代表地主利益的俾斯麥政府，曾想減弱資產階級底這個壓制。爲此之故，政府決定實行變更選舉權（所謂『自上而下的革命』）——盡量擴大選民底範圍，以減弱資產階級在立法機關中的地位。俾斯麥政府，且曾企圖用和工人運動底幾個領導者（拉沙爾）吊膀子的方法，來鞏固自己的地位，竭力鼓勵工人階級使其發生一種空想，以爲在地主底政治統治之下，有改善牠的地位的可能。這樣，政府就造成了非階級的政治底外表，力圖減弱工人運動，限制工業資產階級底地位，鞏固牠所代表的大地主底地位。

●恩格斯是指「德國社會民主黨」而言，當時該黨是國際工人運動之最強的隊伍。

●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以及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時候，法國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者路易·勃朗之作用，顯然是出賣勞動者底利益之一個異常顯著的例子。

一八四八年路易·勃朗曾爲資產階級臨時政府下的「爲工人而設的政府委員會」底主席。他的「活動」就在於：用一切方法企圖引誘工人離開爲政權而作的鬥爭，散佈一種幻想，說似乎資產階級政府可以保障他們的利益。路易·勃朗鼓吹用和平方法建立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共和國」，同時號召工人不要作革命鬥爭，而完全相信臨時政府中工人代表之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這樣他就保證了統治的資產階級有行動底自由。

及後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成立的時候，路易·勃朗與撲滅公社的梯也爾底政府，同處於凡爾賽。當資產階級實行摧殘革命的巴黎時，路易·勃朗鼓吹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底利益一致，這樣他就幫助了資產階級拿「法國全體人民」底名義去掩飾對「巴黎公社」社員的屠殺。

●列寧此處是指所謂「內閣主義」，就是說，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在社會主義者中間的一個思潮，這個思潮是擁護和實際上實行社會主義者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的主張的。首先實行這個思潮的，就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米萊蘭，一八九九年他藉口必須保護共和國

以防止保皇派的運動，遂與「巴黎公社」底有名劊子手卡利孚將軍一齊加入政府，任總長之職。

自從米萊蘭加入政府之後，在其他各國也有社會主義者加入資產階級政府的事實。在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西歐大多數社會主義的政黨，變成了社會國家主義的政黨了，而米萊蘭主義便風行一時。此時就是法國的社會主義者蓋德（他在一九〇〇年曾反對社會主義者之加入資產階級的內閣）本人也做了法國資產階級政府底總長。在現時，「社會主義者」（社會法西斯蒂）之加入資產階級政府，變成了一個系統，是為他們替資產階級反對革命的無產階級的鬥爭而服務的形式之一。

●法國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把政權交給了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共和派手裏。這次革命底特點，就在於，工人階級第一次在此革命中拿出自己本階級的要求而作了鬥爭。這指出了工人階級之異常的長大，並且替資產階級指示了對牠的統治有直接的危害。因此，自由資產階級底政府曾把懲治革命的工人階級，作為自己的基本的直接任務。在巴黎有名的六月屠殺中，資產階級實現了這個任務，此時工人階級底暴動，反對資產階級政府為奪取政權的暴動，已被鎮壓下去了。但是，在六月的屠殺之後，工人底不斷增長的騷擾告訴了資

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的制度之直接危害，並沒有消滅。因此，在六月屠殺之後，很容易將一切資產階級的政黨聯合成爲一個『秩序黨』，一個聯盟，以達到一個共同的利益：鎮壓工人運動和鞏固資產階級的制度。各色各樣資產階級受了工人階級暴動底恐嚇，尋找了建立鐵手般的政府——即『秩序』底組織者。同時資產階級在鄉村富農中，在願意維持資本主義秩序之堅固的富農中，找到了特別有力的支柱。受富農影響的多數農民，投票贊成了『強硬手段』。資產階級用鼓惑的方法，又把大部份城市小資產階級（怕工人革命之危及私有財產底消滅）奪到自己方面來了。在此等條件之下，資產階級最初能够用普選制以掩飾其反革命的設施，如此便造成了『全民意志』底外形。在短時間內，以大總統爲元首的國會的共和國，曾爲國家政權底形式，而拿破崙第一底姪子路易·波拿泊（即拿破崙第三），當時曾當選爲大總統。但是，這僅僅是建立君主國的第一步：爲摧殘工人階級、爲施行階級的恐怖起見，就必須使『鐵手』底政權大大地鞏固起來。資產階級底走狗，路易·波拿泊大總統，依靠軍隊。於一八五一年十二月二十號，得了資產階級本身的許可，完成了政變，驅散了立法會議，並且替自己鞏固了大總統的權柄，至十年之久。自從政變之後，在對工人階級施行公開的階級恐怖的條件之下，路易·波拿泊自號爲拿破崙

第三大帝。存在到一八七〇年九月的法蘭西第二帝國，這樣就成立了（關於第二帝國的詳情，可參看本卷註●）。

●法國路易十八和卡爾第十底合法帝制，存在於一八一五到一八三〇年。自從法國拿破崙第一顛覆之後，被十八世紀末的革命所驅出國境的貴族地主，得了歐洲各反動政府之助力，重新恢復了政權，同時又恢復了布爾蓬底舊王朝。這是白色恐怖時代，一七八九至一七九四年革命改造被消滅的時代。在復辟時期；合法帝制不能消滅革命之基本的社會經濟的改造——恢復鄉村中的農奴關係和城市中的行會制度。但是。這個帝制底政治，是受一七八九到一七九四年革命所推翻了的地主底利益所支配的（別的不提，只講一點：地主們曾得到了十萬萬佛郎的補償費，作為對他們在革命中的損失的賠償）。在某些條件之下，在這個時期，曾允許了資產階級底上層份子，牠的貴族，去參加政權。由上『恩賜的』憲法和對民族工業之保護，替合法帝制造成了對這些上層份子之幫助。但是，工業資本主義在法國得了大大的勝利，資產階級，及其上層份子，也鞏固起來了，牠自己能够奪取政權，並且對布爾蓬帝制立於反對的地位。農民之不可調和的仇恨地主，城市手工業者，和無產者之日益增長的痛苦，被資本主義所破壞的小資產階級之反對態度，最後，工業資

產階級和現存的政權間之衝突，——所有這些，告訴我們，爲甚麼到一八三〇年七月法國的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卡爾第十堅決地企圖取消甚至於憲法底外形，並想恢復爲一七九三年革命所殺了的路易十六時代底秩序。一八三〇年七月的革命，就是廣大羣衆對卡爾第十此種企圖之答覆。在七月的事變中，暴動的民衆在巴黎戰勝了政府的軍隊，卡爾第十逃走了，而「合法的帝制」遂讓位與資產階級的帝制了。

七月帝制，從一八三〇到一八四八年存在於法國。在這個資產階級的帝制中，佔了統治地位的，不過是資產階級底一派，資產階級底財政貴族，——「銀行家、交易所和鐵路大王，以及和他們聯合的一部分土地佔有者；煤礦、鐵礦和森林底領有者」（馬克思）。

「市儈大王」——路易·菲利波——奉着資本家意志而掌握了政權。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時民衆所已得的勝利被人奪去了，這因爲民衆之組織性底薄弱以及共和派資產階級之背叛的緣故。在七月帝制底時期，在法國完成了工業革命：在四十年代中，工廠和機器，在法國的工業中心已經鞏固了起來。大部份的農民都處於高利貸者底束縛之下。不久在工業資產階級和財政資產階級之間，發展了殘酷的鬥爭，以取得對工農羣衆之剝削的優越權。對於企業家必須有農民之大批的無產階級化，將他們從土地上驅逐出來；高利貸者和銀行

家幻想把農民束縛於他們一塊不足糊口的土地上。小資產階級不能參與政權，僅僅股富的私有者享受了選舉權。所有這些，發展了國內種種促進新革命成熟的矛盾。在這個時期中，無產階級有了特別大的意義；由於工廠工業之發展，七月帝制時期會爲工人運動增長底時期。至一八四七年國內的社會矛盾，已經充分成熟，而新的革命，也就成爲必不可免了。一八四八年二月，七月帝制底命運宣告終結了（參看本卷註八）。

●馬克思認爲政權之過渡到無產階級手裏，只有經過暴力命革，才有可能，這是一個通例；但是，在例外的情形之下，對於單個國家，他認爲有政權之和平地過渡到無產階級手中之可能。一八七四年他在海牙的演說中，曾指出英國和荷蘭就有這種可能性。恩格斯在自己的小冊子法德農民問題中也提到馬克思底話：『如能向所有這些匪徒去贖買出來，那對於無產階級是有利的。』就是說，從資產階級手中贖買土地、工廠、及其他的生產資料。不消說，所有這些假設，現在都已失了效力。

●培恩斯坦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名的領導者之一，還在一八九七年，他於「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理論雜誌「Neue Zeit」（新時代）上發表多篇論文，題爲社會主義底問題，在這些論文中，重新審查和「修正」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底基礎。培恩斯坦否定了資

本底集中化，階級矛盾底劇烈化，資本主義社會崩潰底必然性、社會主義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底必要性，同時他斷定說，用改良的方法，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和平地改造為社會主義的社會，資本主義可以和平地『生長』成爲社會主義。

一八九九年出版了培恩斯坦底書：社會主義底先決條件和社會民主黨底任務，該書是一切修正派之政綱——『聖經』。國際社會民主派中因培恩斯坦的議論，發生了極大的爭辯，結果分成兩派，一是正統派，即馬克思學說底澈底的信徒，二是修正派，其思想上的首領即培恩斯坦。當時考茨基是站在正統派方面的，但是他對於培恩斯坦的批評，恰恰在暴力革命和特別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上，也是機會主義的批評，是污辱馬克思學說的批評。關於這一點，列寧在本書第六章中已明白的分析了。

● 蒲魯東是無政府主義底鼻祖，他曾擁護個人的『勞動私產』。他認爲工人階級底解放就在於保證每個工人佔有生產工具和他的勞動底產品。蒲魯東和他的信徒認爲應當代替資本主義社會之將來的社會，就是小生產者私有主之協作聯合底社團。他們認定了，過渡到這個社會方法，就是向大私有者和平贖買生產資料。

蒲魯東主義者否認了以暴力剝奪大私產之必要，同時否認了無產階級之利用國家作爲

鎮壓剝削階級的工具之必要，否認了政治鬥爭之必要。馬克思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相反，他們認為，工人階級爲要得到解放，只有消滅階級及其基礎——私有財產；要達到這個目的，其方法就是無產階級之奪取國家政權，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剝奪資本家的私產和使之逐漸社會化，就是說，把一切的生產資料轉給整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手裏。馬克思主義是革命無產階級底理論，反之，蒲魯東主義無政府主義，就是固守私有財產以及僅僅不滿意大資本底統治之小資產階級底理論。

●●中世紀時代，在意大利和法蘭西，市民稱自己的享有自治權的城市社會團爲公社。有些地方，市民用直接征服封建主的手段而取得這個自治，有些地方則用收買的方法。

●●一八七五年五月五號馬克思給白拉克的一封有名的信，名爲哥達綱領批評，在該信中把一八七五年二月十四至十五號在哥達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德國社會主義工黨」底綱領，加以嚴格的批評。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德國社會主義者兩個派別——機會主義者拉沙爾派和馬克思主義者愛森拉赫派——聯合而爲「德國社會主義工黨」了。這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綱領，是拉沙爾派和愛森拉赫派之妥協，該綱領正式存在到一八九一年愛福特代表

大會爲止，在愛福特代表大會上曾通過新的綱領（愛福特綱領），該綱領又引起了恩格斯底批評。

●●反社會主義者的非常法令，在德國施行了十二年之久；從一八七八到一八九〇年。該法令之施行是以鎮壓日益發展和日益深入的工人運動爲目的的。該法褫奪了工人階級及其政黨之政治權利。警察機關得了禁止工會，禁止一切的結社和出版物之權。該法令又授權與警察，得禁止集會、禁止爲社會主義目的而收集會金等等。凡違犯這些禁令者，均被監禁於獄中。警察得有逐人出境之權，中央政府得有在單個城市和單個地方宣佈戒嚴之權。

但是，該法令不能打破德國的工人運動，不管一切的鎮壓，社會民主黨仍繼續生長着和鞏固着。可是，假使說，在鎮壓社會主義者的非常法令存在的條件之下，一方面，經過了十二年的鬥爭之後，社會民主黨是鞏固和生長了，那末，他方面，黨內許多領袖們走上了機會主義底道路，企圖在法律範圍內去提出黨底要求和進行黨底活動。恩格斯在本文內也就是指這一點而言的。

●●『由上而下的革命』，就是十九世紀六十年代末葉和七十年代初葉地主國家底政

策，該政策是在俾斯麥領導之下所施行的，其目的實際上是爲鞏固普魯士地主的帝制（參看本卷註四）。

業已強大起來的德意志資產階級，曾竭力企圖達到政治上的統治。達到了統治德意志其他各個國家之翁克（即地主）式的普魯士，曾想鞏固地主底勢力來反對發展着的資產階級底勢力，並想建立集中的德意志國家而以普魯士爲其盟主。俾斯麥企圖達到這個目的，其所用的方法就是，一方面，和德意志的中小國家吊膀子，答應減輕牠們的預算案，把許多用費底負擔加在全德意志的預算案中，他方面，對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施兩面的手腕。資產階級所得了的保障，就是施行種種的改良，以掃除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障礙。無疑地，德意志底統一，雖然在翁克式的普魯士領導之下，而對於資產階級，是有利的，正因爲牠促進了德意志的資本主義之發展。而資本主義之發展，又被俾斯麥底政府所利用而滿足地主底利益，地主本身又以資本主義的方法而經營自己的經濟了。同時俾斯麥又對無產階級玩手腕，他擬定施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不記名的、積極的選舉權，並且答應工人有結社底自由。特別要指出的，是俾斯麥曾對「全德工人聯合會」玩手腕：領導該聯合會的是拉沙爾，以後是他的信徒。這個政策底結果，就是以普魯士君主爲首的「德意志帝國」

底建立。不管俾斯麥底反動政策，而無數小國家之統一爲一致的集中的聯合的國家，對於德國經濟之往前發展，無疑地起了進步的作用。

●●布爾塞維克曾指定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三號（十號）舉行和平的反抗示威，以反對臨時政府之延長戰爭的政策。當時所開的工兵代表蘇維埃第一次代表大會（其中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佔多數），禁止了這次的示威。蔡雷特利是最有名的孟塞維克之一，護國派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底首領，他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主席團底會議上發言，主張解除工人底武裝。他說：「和布爾塞維克鬥爭，所要用的，不是空言，不是決議案，而是應當機奪他們手中所有的一切技術上的工具」。列寧說過，蔡雷特利這個言論，是「歷史的和神經錯亂的」，其令人注意的地方就在於：牠證明了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顯然過渡到反革命營壘中去，他們開始公開進攻工人階級。

列寧把蔡雷特利在解除工人底武裝上所起的作用，和法國軍官加文亞克底作用相比，加氏在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後曾任法國陸軍總長，在同年六月事變中他撲滅了巴黎工人底暴動。

●●一九一四年八月四號，社會民主黨黨團在德國國會中曾投票贊成給政府以戰爭的

借款。哈薩代表社會民主黨團底名義去宣讀宣言，最後他說：『我們要投票贊成政府所要求的借款』。當時只有李卜克內西一人發表了反戰爭的宣言，而且在投票的時候他退出了國會會場。

這樣看來，在「第二國際」內人數最多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在戰爭一起的時候，其中絕對大多數（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和梅林格底集團——「國際團」或「斯巴達團」，不在此例）都變了牠的祖國底保護者，就是祖國資產階級底保護者。列寧所說的牠的可恥的破產，也就在此地。

● 列寧是指在民族自決權的辯論中擁護錯誤觀點的人們而言的，這個辯論發生於一九一六年，復起於一九一七年四月全俄的代表會議上。在一九一六年的辯論中，反對列寧的，曾有西歐社會民主黨的左派——拉狄克、盧森堡、潘業普克、黑格龍。在這次辯論中，從俄國布爾塞維克隊伍中有布哈林和皮達科夫底集團起來反對列寧。關於這個問題的詳情，可參看本版列寧選集第九卷中的文章；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關於民族自決的辯論總結，第十章，論對馬克思主義的譏諷和『帝國主義的經濟主義』，第五章，一九一七年四月全俄代表會議上關於民族問題的演說。

● 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這個著作，寫於一九一八年十月至十一月，在同年末印成爲單行本。本書之作，是在考茨基著的無產階級專政這本德文小冊子出版之後，考茨基在該小冊子上企圖批評列寧著的國家與革命一書（見本卷），其實他完全像一個明顯的反革命者，起來反對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列寧這個新著作，主要地是揭破考茨基之曲解和糟蹋馬克思關於國家、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以及擁護俄國的無產階級革命。同時，在無情地批評考茨基，揭破他的言論之反革命的實質的基礎上，列寧把他自己在國家與革命一書內所研究的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根據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加以深一層的發揮。

列寧在本小冊內又分析了十月革命中工農底相互關係問題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如何轉變爲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

● 司徒威主義（由司徒威得名）和勃連唐諾主義（由德國大學教授勃連唐諾得名）附帶地說，其特點就在於，牠們從馬克思主義中，取其承認資本主義之比農奴制和半農奴制爲進步這一點，而拋棄了馬克思主義底實質；無產階級爲自己的專政而作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性和必然性。普列漢諾夫還在歐戰以前已經滾到司徒

威主義一邊去了，他之演到司徒威主義方面，恰恰爲着擁護自己的社會國家主義的立場。普列漢諾夫喜歡背誦對於大戰前的俄國是完全正確的那個論點，即：我們從資本主義發展中所受到的痛苦，不及從資本主義發展之不足中所受到的痛苦爲甚，但是他從這個論點中做出了完全非馬克思主義的結論。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他所提出的唯一的無產階級任務，就是掃除資本主義發展中的障礙，就是說，他僅僅提出了擺在資產階級面前的那些任務，沒有看到這個革命中無產階級底獨立的階級目的，否認這些目的，反對普爾與布爾塞維克對於這些目的的提出，反對他們所提的工農革命民主專政一口號。在普列漢諾夫看來，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無須在無產階級面前提出特殊的階級任務，與資產階級底任務不相符合的任務，只要幫助資產階級，推動牠，和牠聯盟，和牠妥協，不要嚇牠退出革命，不要用布爾塞維克所提出的策略與口號去破壞和牠的統一戰線就得了。歐戰一起，普列漢諾夫就站在公開的社會國家主義的觀點上，此時爲着擁護他自己的保護沙皇俄國的立場，他又拿了同樣的理由，說我們從資本主義發展中所受到的痛苦，不及從資本主義發展之不足中所受到的痛苦爲甚，作爲基本的論據之一。他說過，俄國底失敗，德國之戰勝俄國，要使俄國受經濟上的奴役，要阻止俄國資本主義底發展；

反之，無產階級却願意本國的資本主義底發展，因為只有資本主義底發展才能接近社會主義；所以無產階級應當參加戰爭，來保護沙皇的俄國。至於戰爭之特殊的（帝國主義的）性質，隨戰爭而生長的革命危機在各交戰國底無產階級面前所提出的特殊任務，列寧在「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中所規定的特殊任務，——普列漢諾夫都一一拋棄了。當然，普列漢諾夫也拋棄了擺在俄國無產階級面前的特殊任務——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為的要馬上過渡到社會主義革命，於是乎在世界帝國主義底發展以及帝國主義戰爭所造成的條件之下，現在不是在俄國「清洗道路讓資本主義發展」，而是用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把俄國從資本主義發展底道路轉到社會主義發展底道路。普列漢諾夫又是為了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方便，而否認了這些任務。無論普列漢諾夫，無論俄國九十年代的司徒威和司徒威主義者，都只看了資本主義發展底進步性，而拋棄了無產階級之階級的任務。司徒威持着似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而跑到資產階級營壘中去，同樣，在歐戰期間，普列漢諾夫也解了，糟塌了，閹割了馬克思主義，也完全跑到資產階級的營壘中去了。

●●列寧是指一九〇九年出版的考茨基著的小冊子：到政權之路。該小冊子底題目，

就是關於無產階級底政治革命，無產階級之爭取政權的問題。考茨基分析經濟現象，而得

出結論說，資本主義社會正在進到革命底時期，這個時期完全不似以前的和平發展時期。列寧認為到政權之路，是考茨基底最革命的作品，但是列寧曾指出這個作品中含有改良主義的見解。考茨基說到無產階級底政治革命時，他所了解的革命，就是無產階級之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但是，他沒有一句話提到馬克思底意思：無產階級革命有打破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之必要。考茨基只說馬克思有過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他完全不把這個概念底實質加以分析。

●馬克思和恩格斯究竟怎樣，以及何時何地說過，有打破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之必要，關於這個問題，列寧在本卷裏面國家與革命第三章第一節和第四章第五節說得很詳細。

●無政府主義者蒲魯東主義者（參看本卷註●●）自號為反威權主義者，就是說，否認一切的威權、一切的服從、一切的政權，因此而否認政治鬥爭。

●這裏是指法國小資產階級的政黨——「社會民主派」底政黨，該黨以列德流、羅倫為首領，在一八四八年法國立憲會議上，曾為左派在野黨。對於該黨底活動之估計，以及對牠的階級分析，可參看馬克思著的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和一八四八到一八五一年的法

國階級鬥爭。

●● 關於馬克思和恩格斯底這個更正，可參看列寧底國家與革命第三章第一節。

●● 在歐戰開始後，在世界各國，在背叛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內，即刻開始組成革命的反對派。在德國，這種革命的反對派統一於李卜克內西、盧森堡、蔡特金、梅林、格諸人所領導的「國際團」（「斯巴達團」）之周圍。在法國，在「法國總工會」內部，組成了革命反對派，以蒙納特、美海姆和羅斯美為領導。在英國，在「不列顛社會主義黨」內有兩派互相鬥爭——社會國家主義派和麥克林與非哈爾特所領導的國際主義派。其他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內，也組成了這樣的革命反對派。一九一五年，這些革命反對派參加齊美瓦德會議的大多數代表與列寧所領導的齊美瓦德左派聯合了。

無論各國政府，無論各國正式的社會民主黨，都殘酷地壓迫了革命的少數派，革命的
反對派。

●● 列寧是指一九一七年四月資產階級各政黨底報紙和鼓動家所進行的卑鄙醜惡的運動——攻擊和誣毀布爾塞維克的運動。資產階級利用列寧與其他僑民曾乘坐封閉的火車從瑞士經過德國而回到俄國一事，作為這個運動的裏由。資產階級誣毀列寧和一般布爾塞維

克爲德國的暗探，以及得了德國的金錢替德國帝國主義者出力。社會革命黨人曾經擁護資產階級誣譏布爾塞維克的宣傳。

●希洛克是沙士比亞底悲劇：《威尼斯的商人》中的主角，是一種吝嗇的殘酷的高利貸者。舉例來說，希洛克對於自己的債務人不作任何的讓步，如果債務人不按期償還債款，那末，他就根據契約要求從債務人身上割「一磅肉」。

●第一個工人代表蘇維埃，在一九〇五年夏天罷工時產生於伊萬諾夫·伏茲業奧斯克。在十月罷工時，在許多其他的大工業中心，也產生了工人代表蘇維埃。蘇維埃往往是從罷工委員會中組成的。一九〇五年的彼得堡蘇維埃起了主要的作用，而有全俄的意義。莫斯科蘇維埃也盡了極大的作用，牠領導了莫斯科十二月的運動，宣佈了總罷工，並使總罷工轉爲武裝暴動。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都贊助了蘇維埃之組織，可是對於蘇維埃之作用和意義問題，就發生了不同的意見。孟塞維克認爲蘇維埃應當成爲「革命本身自治機關」，「不依賴」任何政黨。布爾塞維克認爲蘇維埃是「無產階級之直接的羣衆鬥爭機關」、暴動機關和新的革命政權機關，牠們應當由無產階級政黨去領導。

●●從一九一七年三月（二月）起，社會革命黨人和孟塞維克提出了「一切政權歸立

憲會議」的口號，但在實際上，他們和資產階級極力遷延立憲會議之召集。十月革命把政權交到蘇維埃手裏去了，此後這個口號，無非就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底口號，因為政權交給立憲會議，無異於推翻蘇維埃政權。在一九一八到一九二〇年的國內戰爭中，一切反革命的份子都在這個口號周圍聯合起來。

●●「民主會議」，是在郭尼洛夫謀叛之後由克倫斯基政府組成的，其目的在於鞏固臨時政府之已動搖的威權。民主會議於九月二十七號（十四號）至十月五號（九月二十二號）舉行於彼得格勒。民主會議實際上沒有絲毫的威權。政府不理牠的決定。政府只想利用民主會議以為遷延召集立憲會議之口實，和鞏固資產階級政權之手段。

●●自從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號在巴黎發生暴動之後，梯也爾底資產階級政府逃往凡爾賽，並且從此開始圖謀撲滅「巴黎公社」。該政府始初勸俾斯麥攜帶圍攻巴黎的普魯士軍隊去佔據革命的巴黎，但是俾斯麥不接受這個提議。如此，俾斯麥便迫得那些無力和「巴黎公社」作鬥爭的凡爾賽人趕快決定要與俾斯麥締結對法國很難受的和約。凡爾賽人不得不同意他們所不大願意的條約，他們便得了俾斯麥之助力以鎮壓巴黎。梯也爾底凡爾賽政府因與俾斯麥訂了條約，得了武力，借此壓服了革命的巴黎。

● 戈果爾的彼特魯什卡，是戈果爾著的《死魂靈》中的登場人物之一，是個奴僕。他的出色處，就在於他機械地讀了滿架書籍，而不懂其中的內容。所謂『以戈果爾書中的彼特魯什卡底態度』去研究歷史，這就是只見歷史底純粹外表，而不去體會歷史事變之意思和意義。

● 奧倫堡哥薩克兵底將領都多夫，於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在烏拉爾南部和窩瓦河沿岸，領導了反革命的戰爭，來反對蘇維埃政權。

軍官克拉斯諾夫，於一九一八年在頓河領導了反革命的戰爭，來反對蘇維埃政權。

關於捷克人的反革命暴動，可參看本卷註三七。

● 此地所謂『積極份子』，是指當時積極參加反革命底武裝鬥爭來反對蘇維埃政權，以及參加了資產階級底各種反革命的鬥爭的右派孟塞維克。

● 一九一八年英、法兩國政府曾組織了捷克斯拉夫人的反革命戰爭，來反對蘇維埃共和國。還在一九一七年夏天，臨時政府將在戰爭時俘虜來的捷克斯拉夫人組成一個軍團，而派牠到西方防線上和德國人作戰。在一九一八年布勒斯特和約之後，捷克人的指揮官請求蘇維埃政府派該軍團到法國。「人民委員會」同意了他的請求。當該軍團途行於萍

沙至伊爾庫次克的西伯利亞鐵路幹線上時，捷克人的指揮官得了「協約國」底上述政府之指示、以及得了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之同意，即下了暴動令。一九二〇年蘇維埃的紅軍完全戰勝了捷克斯拉夫人所開始的以及高察克所繼續的反革命戰爭。自從紅軍撲滅高察克之後，捷克斯拉夫軍隊即經過海參崴而退兵至捷克斯拉夫。

● 在一七八九到一七九四年的法國大革命的時候，政權首先落到自由君主派的大資產階級手裏，然後轉到中等資產階級底較革命的階層手裏，嗣後又轉到以雅可賓派為領導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手裏，自此以後，革命政府就得組織對各封建君主國家所進行的武裝干涉之抵抗，並且和牠們作革命的戰爭。以貴族為將領的舊軍隊是保護封建帝制和地主的，這種軍隊當然不適宜於革命戰爭。雅可賓派勢必要重新組織軍隊：訓練了新的民主的各級軍官；施行了中央政府底政治代表；在軍隊中組織了廣大的政治工作，並給軍隊以報紙等等。這個軍隊之所以強固，在因為牠是真正的革命軍，歐洲各個封建君主國家都不能克服牠。

● 基督教的無政府主義，是一個思潮，牠批評了國家、正式的教會、私有財產、以及整個的現存制度，但是同時否認了一切暴力之必要，否認了一般的鬥爭——政治鬥爭

也在內。他們認爲用基督教的行動——「不以暴力去對抗邪惡」，以及人格的修養，可以改變現存制度。俄國有名的作家托爾斯泰，就是基督教無政府主義底理論家，特別是在俄國範圍以內。托爾斯泰學說大半是在小資產階級的智識界中有相當的流行。這個學說是對奴役俄國農民的國家與破壞農民經濟基礎的資本主義之一種特殊的反抗底表現。他表示了農民底革命鬥爭之不成熟。只有克服了這種情緒，農民才能够表現出自己是俄國革命中的一種革命力量。

●「斯巴達團」(斯巴達是古代羅馬暴動奴隸底一個首領底名字)是由李卜克內西、盧森堡、馬哈列夫斯基等在德國秘密組織起來的。斯巴達派作了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鼓動工作，並且和背叛了社會主義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作了鬥爭。「斯巴達團」底成立經過如下：

自從社會民主黨的國會黨團投票贊成了戰爭借款之後，一九一四年九月十號，李卜克內西、梅林格、盧森堡和蔡特金，聲明了不同意「德國社會民主黨」底正式的立場。一九一五年二月，盧森堡和梅林格實行創辦關於馬克思主義底理論與實際的月刊——國際，同年四月出版了第一期(以後沒有繼續出版)，然後他們又組織「國際團」，而通過了盧森

堡所起草的特別的政綱。該團以後改名爲「斯巴達團」，其所出版的雜誌也用這名稱。

在齊美瓦德代表會議上，「斯巴達團」底代表只有一個。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都沒有參加這個代表會議；前者在軍隊中，後者在牢獄中。

一九一六年，由正式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中，分出了所謂「獨立派」，以考茨基、希法亭等爲領導，而組成了一個特別的政黨，當時「斯巴達團」從策略上着想而加入了該黨，但是，在「獨立派」黨內，「斯巴達團」保存其爲一個特別的集團。自從德國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和由謝德曼派社會民主黨人和「獨立派」組成了政府之後，「斯巴達團」遂與「獨立派」斷絕關係，同年十二月間，該團即不復存在，而與其他幾個組織共同成立了「德國共產黨」。

●● 這是指一九一八年初德國軍隊之佔領芬蘭、烏克蘭、萊希維亞，愛沙尼亞。一九一八年正月和二月，芬蘭起了革命。暴動的工人得了農民運動底助力打倒了資產階級政府，政府不得不退到芬蘭北部。三月和四月德國的軍隊來幫助資產階級政府，資產階級得了這個助力把工人鎮壓下去了。在烏克蘭，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彼得留拉派，借德國軍隊底幫助而推翻了烏克蘭尚未鞏固的蘇維埃，然後德國的將軍們推倒了民族主義者底政府

（「烏克蘭拉達」），而以斯科洛巴茨基總司令底黑幫政府去代替了牠。德國之佔領萊多維亞和愛沙尼亞，消滅了該兩國的蘇維埃，逼得工人運動陷於秘密環境中，並把這兩國底反革命勢力組織於自己的周圍。

當列寧說到德國無產階級之背叛俄國革命和國際革命時，他是指德國所佔領的區域中身穿軍服的德國工農，當時盡了客觀上反動的作用，這是由於社會民主黨人掩護了帝國主義的政府和用全力阻止了德國本地工人的革命運動底發展。

●● 在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革命的時候，普列漢諾夫把俄國革命底性質問題，俄國社會民主派對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態度問題，以及選舉國會時社會民主派能否幫助在野黨（就是說，自由派）問題，去質問西歐社會民主黨底許多領袖，當時考茨基作了一篇論文名為俄國革命底動力與前途，來回答普列漢諾夫底問題。那時候考茨基還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在這篇論文中堅決地推翻了孟塞維克底觀點，而其對於俄國革命底動力和前途之估計中，很接近了布爾塞維克。一九〇六年布爾塞維克將考茨基這篇論文譯成俄文，並由列寧作序出版了。列寧在這篇序言上把考茨基底觀點轉述如下：『俄國的革命，不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因為資產階級不屬於俄國目前革命運動底動力。同時俄國的革命，不是社會主

義的革命，因為牠無論如何不能使無產階級走上單獨的統治或專政。在俄國革命中，社會民主黨可以取得勝利，而且應當力求取得勝利。但是，沒有其他各階級底幫助，只有一個無產階級底勝利，是不能成爲目前革命底勝利的。在目前革命底客觀條件下，那一階級就是無產階級底同盟者呢？就是農民；『在革命鬥爭底整個時期中，只在無產階級和農民中間才有鞏固的相同利益』。考茨基所有這些論點——列寧寫道——再好沒有的證實了『俄國社會民主黨」革命派底策略，就是說，布爾塞維克底策略』（見列寧全集第十卷，二二九頁；着重點是列寧加上的）。

●此地列寧大概是指一八四八年末馬克思底文章：『資產階級與反革命』（普魯士革命底總結），在這篇文章內，馬克思把一八四八年德國革命中資產階級底作用和一六四八年英國革命與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中資產階級底作用作一比較。馬克思說：『不要把普魯士三月革命（就是說，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編者註）和一六四八年英國革命混爲一談，也不要把他和一七八九年法國革命混爲一談』。馬克思繼續說：在後兩種革命中，『資產階級曾爲真正站在運動底領導地位的一個階級。無產階級和不屬於資產階級的城市居民階，或層者還沒有任何與資產階級分離的利益，或者還不成爲獨立發展的階級或階級底一部分。』

因此，凡在他們實行反對了資產階級的地方，——如一七九三年和一七九四年在法國就是這樣，——他們僅僅爲實現資產階級底利益而鬥爭，雖然他們所取的姿勢是和資產階級底姿勢不同——。『普魯士資產階級與法國資產階級之不同，就在於牠不會是一個擁護整個現代社會而反對舊社會代表（帝制與貴族界）的階級。牠降低到某個等級底水平線上，既與皇室對立，又與民衆對立，對於牠們倆都抱着反對的情緒，對於自己的敵人中之每個敵人都抱着不堅決的態度，因爲牠看見了牠們倆或在自己的前面或在自己的後面；牠從最初起就趨向於背叛民衆，以及和舊社會底皇室代表妥協，因爲牠自己也屬於舊社會之列——。不相信自己，不相信民衆，沒有全世界歷史的使命；衆人唾罵的老頭子，自認爲不能不爲自己本身老詭計而指導強有力的民衆之青年志氣並且轉移這些志氣鋒銳，——失了視覺、聽覺、頭重齒豁，四肢百體一無所用的老頭子，——三月革命後掌握普魯士國家大柄的普魯士資產階級，就是如此』。由當時德意志各個單獨國家所組成的普魯士底資產階級如此，整個德意志底資產階級在一八四八年革命中也是如此。這個牙齒脫落又爲衆人唾罵老頭子，其結局就是實行和反革命妥協而反對工農，幫助反革命去打倒革命。一八七四年恩格斯在其德國農民戰爭一書底序言中，說明德國資產階級與反革命妥協的原因，他

說：當資產階級『開始看到牠的伴侶——無產階級——開始勝過牠：』的時候，『牠便失掉單獨的政治統治的能力』而『在自己的周圍去找同盟者，牠依據情勢或與同盟者瓜分自己的統治，或把這個統治完全讓給他們。』在德國一八四八年革命的時候，德國資產階級正是處於這樣的地位。恩格斯說：『當時德國資產階級已經害怕了，而且牠之害怕德國無產階級，不及害怕法國無產階級這樣厲害』。一八四八年六月，法國無產階級在巴黎企圖用武裝暴動的手段去奪取政權。這個企圖曾被鎮壓下去了。但是這個企圖表示給德國資產階級看，牠『還是要發生的』。恩格斯又說：『德國無產階級正處於充分有力的覺醒狀態，能夠證明給資產階級看，在德國也已經播下這些種子，且這些種子能夠給這樣的收穫』（恩格斯、德國農民戰爭、序言）。在俄國，在一九〇五年到一九〇七年第一次革命中，我們有了更強大的、更有組織的、而且由布爾塞維克黨所領導的無產階級，所以俄國的資產階級對於沙皇制度，比一八四八年的德國資產階級，已經更加沒有牙根了，牠更加和沙皇制度妥協了。牠出賣了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的革命，在這個革命之後，牠實行和沙皇制度與地主結了公開的聯盟，在一九一七年二月，當工農（穿上軍服的）打倒了專制制度時，牠企圖恢復帝制，用米哈伊爾來代替尼古拉。如此，在資產階級革命中，——

對於一八四八年的德國，對於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和一九一七年二月的俄國，——所謂「不要比資產階級跑得遠」，這就是說不要比與「皇室」妥協，與沙皇制度妥協，與反革命妥協跑得遠。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組織上完全和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分離了，而形成了一個獨立的政黨，名爲「左派社會革命黨（國際主義者）」。

十一月終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同意了加入蘇維埃政府而任委員之職。布爾塞維克所以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聯合的緣故，因爲後者在這個時期中多少是澈底地表示了農民底革命趨勢，農民之求得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志向。

一九一八年正月到二月，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布爾塞維克中間，已經發生嚴重的爭論，所爭論的是關於布勒斯特和約問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起來反對訂立和約，在布勒斯特條約簽字後，他們退出了「人民委員會」。

至一九一八年夏天，除對外政策問題的爭論外，又發生了關於五穀壟斷的問題，關於五穀格價政策的問題，關於貧農委員會底任務以及派遣糧食隊到鄉村中去等問題的爭論。隨着鄉村中階級鬥爭底發展，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變成了富農底喉舌，富農對鄉村中社會主

義革命的反抗底代表者。一九一八年七月六號，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莫斯科掀起了武裝暴動來反對蘇維埃政權。

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底暴動，在開始時就表示出是必然遭失敗的，因為無論在紅軍中，在工人中，在莫斯科和一般國內的勞動者中，牠都不能找到同情者。由於紅軍和勞動羣衆底出力，到七月七號就把暴動肅清了。

自從兩天間被鎮壓下去的暴動之後，一部份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轉到秘密環境中去了，並且進行了積極的武裝鬥爭以反對蘇維埃政府，而另一部份人則中斥了自己的中央委員會底政策，贊成了和布爾塞維克合作，並且組成了兩個獨立的政黨——「人民共產黨」和「革命共產黨」。這兩個政黨存在了不久，牠們的大部份黨員都加入了布爾塞維克的「蘇聯共產黨」。

●●在二月革命後所產生的農民蘇維埃，是由全體農民——連富農也在內——選舉出來的。在這個時期中，鄉村裏面還沒有經過農民政治分化。富農利用其在鄉村中的影響，往往在農民蘇維埃中取得了領導作用。正因為這樣，在二月革命前數月中，農民蘇維埃乃處於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底影響之下和領導之下。但是，隨着農民羣衆之日益明白的

看清楚了握着政權的社會革命黨人，祇是空談解決土地問題來欺騙農民，在鄉村中便開始了直接暴動，這些暴動雖然被討伐軍所鎮壓了，但是他們又隨十月革命之生長而長大起來。無論一般地在鄉村中，無論局部地在農民蘇維埃中，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便一天一天地失掉了自己的影響。十月革命宣佈了剝奪地主並把他們的土地轉交農民去使用，這便給了右派社會革命黨人底影響之最後的殘餘以堅決的打擊。這樣情形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和十二月（新歷）所舉行的農民代表底非常會議，以及第二次代表大會中，已經表現了。右派社會革命黨和孟塞維克所領導的富農的少數，當時曾不得不脫離代表大會。這兩次代表大會，是在布爾塞維克和左派社會革命黨人領導之下舉行的，牠們承認了蘇維埃政權，而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選舉的農民代表蘇維埃全俄執行委員會，已經和工兵代表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合併了。這兩次農民代表大會表示出，在鄉村中發生之農民底階級的政治分化之迅速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當時還沒有完全結束，就在一九一八年上半期在鄉村裏還是如此。這爲什麼是這樣，而鄉村政治分化底過程是何時完結的，——列寧在往後幾頁書中已經詳細地說明了。

●●列寧是指一八七一年四月十二號馬克思給顧格曼的信中的下面一段話：「如果你

讀拿破崙第三政變記底最後一章，你就可以看到，照我的意見，法國革命之最近將來的高漲，其企圖將不是把官僚軍事機關一手轉交他手，爲向來的情形一樣，而是破壞這個機關。在歐洲大陸上一切真正的人民革命之先決條件，恰恰就是這樣」。

●●在一九一八年七月左派社會革命黨人起暴動而反對蘇維埃政權時，他們的黨底中央致電給反對捷克斯拉夫人的戰線上的紅軍總指揮謨拉維夫——左派社會革命黨底黨員，報告關於莫斯科的暴動以反對德國宣戰的消息。謨拉維夫即刻下令兵士從前線退兵而開拔到莫斯科。這樣便大大地擾亂了和減弱了我們反對捷克斯拉夫人的戰線。但是謨拉維夫底命令沒有實行，這由於前線上布爾塞維克的黨的領導的緣故，而謨拉維夫本人則自殺而死了。

●●土地委員會是根據一九一七年五月四號（四月二十一號）臨時政府底決定而組織起來的，在中央（主要的委員會）、在各省、各縣、各區，都有這些組織。牠們的任務，就是替立憲會議收集土地改良的材料和準備這個改良。但是立憲會議底召集不斷地遷延，而農民雖有右派社會革命黨人之許諾，却沒有得到土地。這引起了許多省份中夏末和秋間許多自發的農民暴動。區土地委員會常常領導這些農民暴動，——刈割及分配地主的麥子、

毀滅地主的莊院、分配地主的農具等等的暴動。克倫斯基底政府（當時右派社會革命黨底有名領袖，如奧克仙蒂夫和馬斯洛夫，都加入了克倫斯基底政府，而且馬斯洛夫擔任了農務總長一職），派了更反動的軍隊去鎮壓農民暴動，並逮捕了暴動底領袖——而區土地委員會底委員也在內。被捕者坐於莫斯科獄中，直至十月革命暴動時，才被莫斯科革命軍事委員會解放出來。

●●貧農委員會，是根據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一號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底法令，於同年夏天成立起來的，此時黨與蘇維埃政權組織了反對富農而爭取麵包的農民隊伍。貧農委員會所執行的任務，就是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統一鄉村的貧農，反對富農，為鄉村中社會主義革命而鬥爭，為實行鄉村中無產階級專政底原則而鬥爭。貧農委員會做了莫大的工作以促進鄉村底分化，並以貧農中農的蘇維埃來代替富農的蘇維埃。

●●這是指一九一八年夏天布哈林為聯絡斯巴達派（參看本卷註釋●●）出發到外國的時候所寫的關於社會主義革命與俄國無產階級專政時無產階級底任務的提綱。這些提綱曾由「斯巴達團」秘密地散佈於德國。在本文所涉及的該提綱第二十四條說道：「其次應當提到大地產之完全讓渡。土地與池塘曾被宣布為『公共的財產』。往後的任務就是：租

織國家的農業、集體耕種過去的封建大地產、統一小經濟爲大的單位和集體的管理（所謂『農業公社』等等）。

① ● 孟格爾，是個維也納（奧地利）法政教授，在其各個著作中發揮了他的『勞動底人民國家』之理論，其實他的這個國家與普通的資產階級民主制沒有什麼分別。孟格爾是『法律家社會主義者』底小資產階級學派之最大的前輩。『法律家社會主義者』所發揮的理論就是：經過『政治與經濟的強迫制度之民主化』的道路，資本主義和平地『合法地』轉變爲社會主義的社會。

① ● 『自由人民國家』（換言之，就是施行普選權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這個口號，曾載在一八七五年哥達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德國社會民主黨』底綱領中，而作爲綱領的要求。這個口號是從拉沙爾和他的信徒們（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德國馬克思主義者——『愛森拉赫派』，曾與拉沙爾底信徒們統一起來了）那裏拿來的。他們用了這個口號來代替馬克思底無產階級專政底觀念。馬克思本人在其一八七五年五月五號給白拉克的信（哥達綱領批評）中，以及恩格斯在其同年三月十八號給培培爾的信中，都嚴格地批評了這個口號。關於這個口號以及馬克思和恩格斯對牠的態度，列齊在編入本卷的『國家與革命』第一章

第四節和第四章第四節內詳細地說過了。

●●論『民主』和專政這篇文章，列寧寫於一九一八年末德奧兩國有革命形勢的時期，登載於一九一九年正月三號真理報第二期上。在十一月革命之後，革命羣衆底鬥爭熱情還是在增長起來；然而多數的羣衆，對社會民主黨的革命作用的信仰，還沒有消滅，因此羣衆運動底領導，就落到社會民主黨人底手裏去了；這些社會民主黨人，或者是會竭力企圖削弱革命運動的右派謝德曼派，或者是號召羣衆爲『純粹的』民主而鬥爭，且轉移其目光，不要他們去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的獨立派中間派（考茨基派）。祇有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所領導的共產主義者，才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作爲無產階級和僱農羣衆底任務。

列寧在本文內指出兩種社會民主黨人（謝德曼派和考茨基派）在保護資產階級專政和反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鬥爭中是一致的。

●●列寧在『共產國際』第一次世界大會（一九一九年三月二號至六號）上關於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和報告，把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問題中——無產階級專政問題中，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之基本原則，與一切假馬克思主義的見解，非常明晰

地分別清楚。提綱底基本目的，——指出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專政、資產階級國家和無產階級（蘇維埃）國家，是完全相反的東西。提綱所注意的就是：無產階級革命底基本問題——無產階級專政，蘇維埃政權，即無產階級專政底形式，以及和西歐工人階級對資產階級的代議制與資產階級的民主制所拒絕的空希望作鬥爭。後來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派底分化、「共產國際」底擁護者及其反對者之間的分化，就是根據本提綱對於社會主義革命中無產階級任務之實質底明了解而發生的了。

●● 一九一九年正月，德國無產階級底領袖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在柏林工人和兵士舉行暴動以反對社會民主黨人底政府時被捕。

在走向監獄的路上，軍官們打死了李卜克內西和盧森堡。兇手形式上會受着處分，但是軍法處替他們辯護，說罪過「沒有證實」。對於這次刺殺以及替兇手辯護，社會民主黨人實負有全部責任。

●● 在古代希臘共和國中的民主，曾為奴隸主底民主。民主的管理機關——解決國事的國民會議——僅僅由居民中佔少數的「自由公民」組成的，而在居民中又是土地和奴隸底大私有主所統治的。奴隸以及被征服地方底居民，沒有享受過參加管理國家的任何

權利。

在中世紀底城市中的民主制，曾為城市商業資產階級與手工業資產階級底地方自治形式。就在這裏，形式上的民主制，祇是掩飾城市資產階級富庶階層底統治的東西。

在發展的資產階級國家中的民主制和以前的民主制形式之不同的所在，就在於形式上參加管理國家的權利，幾乎普及於一切公民。這樣一來，在資產階級民主制之下的形式上的平等，達到極廣大的範圍。可是在實際上，這於民主制是保護資本主義的剝削，掩飾資產階級底統治的東西。在實際上，在資產階級的民主制之下，管理國家的是大資本。當資產階級宣布民主的自由——言論、集會、出版等等的自由——的時候，資產階級知道，勞動者底廣大羣衆不利用這些自由，因為利用這些自由的必要條件——會場、印刷所等等——是為資本家底私有財產。資產階級的自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僅僅是欺騙勞動羣衆的東西。在實際上，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僅僅又是為着有產者的少數人的民主制，資本家底民主制。

這樣一來，在無產階級革命以前的民主制，雖然牠的形式與範圍有了改變，但牠無論過去現在都不過是為統治者的少數人所享受的民主制，不過是壓迫被剝削者的多數人的工

具。祇有無產階級革命和建立以蘇維埃共和國為形式的無產階級專政，才是真正使勞動者底廣大羣衆去參加管理國家，就是說，祇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制，是為勞動者的多數人民享受的民主制。

●●在一九一八年正月底，在德國發生了政治總罷工。在總罷工一開始的時候，已經開始選舉工人蘇維埃。德國這些第一次的蘇維埃底作用，祇限於領導罷工運動，一到罷工完結時，他們就停止了自己的活動。

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初，組織蘇維埃的新浪潮又高漲了。在基爾，革命海員建立了兵士蘇維埃，該蘇維埃成了軍艦上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各城市中革命運動底中心。在基爾暴動之日，兵士蘇維埃已經成了城市中和軍艦上實在的政權，使警察受其支配，把糧食監督拿到自己手裏，等等。當時在漢堡，政權也轉到工兵代表蘇維埃手裏。在基爾暴動直接影響下，在布連門也選出工兵代表蘇維埃而在盧卑克和不倫甕特，則選出了兵士代表蘇維埃。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五號，在柏林及德國其他工業城市中，開始了總罷工。柏林各大工廠革命代表蘇維埃——不久改組為柏林工人代表蘇維埃——曾為這個運動底中心。及後在一切工業城市中，也跟着柏林而開始組織工兵代表蘇維埃了。蘇維埃活動底擴大，必然推

動了牠們和已有的國家政權作鬥爭，因為蘇維埃與資產階級國家和平共居，是不可能的。因此，擁護資產階級代議制國家的執政的社會民主黨人，採取了一切方法，去制止蘇維埃作用之加強。獨立社會民主派（考茨基派）企圖把代議制和蘇維埃系統聯結起來。祇有斯巴達派會真正爲着政權轉到蘇維埃手裏而作鬥爭。社會民主黨人在工人羣衆中之強大影響，以及共產主義者幼稚組織之薄弱，結果使右派社會民主黨人謝德曼派和獨立社會民主派在蘇維埃中站了領導的地位。德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第二次代表大會在一九一九年四月）是在他們領導之下舉行的。當時「德國共產黨」未能把蘇維埃，如我們布爾塞維克黨於一九一七年把蘇維埃從俄國孟塞維克和社會民主黨人手中奪取過來一樣的從德國孟塞維克手裏奪取過來。德國蘇維埃沒有變成了暴動機關和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機關，牠們沒有變成無產階級專政底機關而死亡了。

●● 工廠代表委員會 (Shop stewards committees)，是在世界大戰時由英國革命工人組成的。在帝國主義戰爭時候，英國的職工聯合會，完全站在社會愛國主義底立場上，宣佈了國內和平以及拒絕了罷工鬥爭，爲的是不要削弱戰爭中自己本國的資產階級。至於職工運動底革命份子，則實行反對與資產階級的和平，組織了罷工鬥爭，並且建立了工人

委員會和工廠代表委員會，以領導罷工鬥爭，而與反動工會對抗。

在許多地方，這些委員會底領導曾操在共產主義份子手裏。自俄國十月革命之後，在英國工人階級底革命份子當中，對於將工廠代表委員會底系統改組為蘇維埃系統的思想，也一天一天地通行起來了；但在英國工人中，革命的高漲沒有發展到能使英國當時成立蘇維埃那樣的程度。

①② 「第二國際」伯恩代表會議，舉行於一九一九年二月，是爲戰後社會叛徒第一次國際代表會議，其目的在於恢復「第二國際」。參加這次會議的，有由各國派送的四十八個代表，其中有考茨基式的中間派底代表，而以考茨基本人爲領導的德國獨立社會民主派也在內。代表會議顯然表現了國家主義的性質，而且完全站在保護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與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的立場上。代表會議曾尋找戰爭底罪人，並給了交戰的雙方及其社會主義各政黨以「相互的寬赦」。關於殖民地問題，該代表會議通過了考茨基所提出的決議案，承認了帝國主義之剝削殖民地是必不可免的，所需要的不過是減輕這個剝削而已。關於工人立法問題，代表會議決定要參加協約國底資本家及其政府底代表會議，並選出了參加這種會議的自己的代表。祇有反對派集團（共二十人）之抗議，迫得社會叛徒底伯恩

代表沒有通過考茨基、培恩斯坦、以及俄國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底代表所提出的關於資備無產階級革命的提議，即沒有公開站在帝國主義者底武裝干涉方面，以及俄國內部反革命方面。

● 在一九一七年三月到七月這個時期中，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在工兵代表蘇維埃中佔了絕對多數。這一點在蘇維埃全俄第一次代表大會底成份中也可以表現出來，在這次代表大會中，共有七〇九個代表，布爾塞維克只有一〇三個代表，就是說，等於全數百分之十三。還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事變以前，孟塞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已開始失掉他們在蘇維埃中的領導，特別在七月事變之後，及後因鄂尼洛夫叛亂，從八月起布爾塞維克迅速奪得了蘇維埃。孟塞維克一失掉自己在蘇維埃中的領導，他們也就不再稱贊蘇維埃為「革命民主」底機關了。

● ● 「農民蘇維埃」底口號，是由德國社會叛徒謝德曼派提出來的，提此口號是有一定目的的——把富農所領導的農民蘇維埃和革命的工人運動對立起來，藉此以保證富農在鄉村中的影響。大家都知道，在走向十月革命的道路中，布爾塞維克對於鄉村的基本口號，就是使僱農與貧農和工業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爲了這個目的，列寧在一九一七年四月

已經提出了貧農與佃農底蘇維埃口號，然後提出了組織農業工人底工會。德國共產主義者之提出佃農與貧農底蘇維埃口號以對抗謝德曼式的「農民蘇維埃」，如列寧在此地所說他們是按我們的黨在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中所走的道路前進的。

●在匈牙利，自從蘇維埃政權成立後，於一九一九年無產階級革命的時候，曾施行了組織城市蘇維埃與鄉村蘇維埃的辦法。

●此地列寧是指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號（十月二十六號）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土地法令」。該法令無代價地廢除了地主土地私有權，將地主的財產、以及皇室的、廟宇的、教堂的土地、同牠們的一切活的和不活的農具與建築物，一概轉交區土地委員會和縣農民代表蘇維埃處理。向來廣大的農民羣衆，在農民會議和蘇維埃底許多建議中提出了關於沒收地主土地和將牠轉給農民使用的要求，至十月革命後的第二天，他們便滿足了自己的這些要求。

●論專政問題底歷史一文，最初於一九二〇年十一月，登載於共產國際雜誌第十四期上。列寧作這篇文章，是爲着急待揭破西歐「左的」社會民主派獨立派——考茨基派之「左的」不正確的論斷；當時，考茨基派虛偽地假裝同意於俄國無產階級專政了，但是他

他們否認西歐有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和可能。他們斷定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概念，是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中產生出來的，是由布爾塞維克發明出來的，又說這個概念不適用於西歐階級鬥爭底條件。據他們的意見，在西歐，在政權轉到無產階級手裏之後，民主共和國應當保存起來，而且他們所謂民主，就是已經存在的，即資產階級的民主。因此，他們認為加入「共產國際」的「條件」（要求承認以無產階級革命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之必要）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在本文內，列寧指出，馬克思曾着重說過，在革命中得了勝利的階級有建立自己的專政以實現自己的階級任務之必要。本文底後半篇是節錄立憲民主派底勝利和工黨底任務的小冊子之一段，這裏指出，還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中，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中間關於專政口號的爭論，正與西歐社會民主派之反對「共產國際」所涉及的爭論一樣。

● 在一九〇三年四月第二次黨的代表大會上所通過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黨綱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問題，曾有下列的規定：

「無產階級底社會革命，首先就是以生產資料與流通資料底社會公有制去代替這些資料底私有制，實行社會生產過程之有計劃的組織，以保證社會全體人員底幸福與各方面的

發展，而消滅社會中劃分階級的現象，這樣一來，便解放全體被壓迫的人類，因為社會中一部份人之剝削另一部份人的現象，都完全消滅了。這個社會革命底必需條件，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就是說，由無產階級來奪取使自己可以鎮壓剝削者底反抗的政權。『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底黨綱這一段話，以與牠的全部總論，現在都包括『在蘇聯共產黨』黨綱之內。

●●此地列齊是指一九〇五年十月莫斯科的武裝暴動，這次的暴動，是由『莫斯科工人代表蘇維埃』所宣布的總罷工中生長起來的。一九〇六年列齊寫了一篇『莫斯科暴動底激刺』（見中文列齊選集第六卷）的文章，專論莫斯科的暴動。

●●這是指一八四八年的德國革命。是年三月柏林的暴動，未曾推倒皇權，但是牠迫得普皇答應『自由』和召集國會。同時組織了新的內閣，曾有自由資產階級底兩個代表——堪普號仁和甘士曼，加入新閣。堪普號仁成了新閣底首領。馬克思曾稱這個堪普號仁底『三月內閣』為『大資產者』底內閣。關於這時候德國大資產階級以及一般資產階級底地位與作用，可看本卷註釋●●中馬克思對牠的批評。

●●馬克思是指佛蘭克福的國民會議，該會議召集於德國一八四八年三月革命之後，

其目的是在制定全德的憲法。該會議多半是革命前期末官吏和資產者組成的。在出席的代表中間，有許多大學教授，因此馬克思諷佛蘭克福的國民會議為「學者會議」。會議中的多數是屬於自由資產階級，其所具的一切特性，就是在反動勢力之前畏首畏尾，在工農革命運動之前寒心喪胆，出賣這個運動，與皇室勾結，凡此一切也是當時德國資產階級底本色（參看本卷註釋第①②）。如果馬克思稱這種資產階級為頭重齒豁的老頭子，那末恩格斯（同馬克思一起）就稱佛蘭克福的會議為「老太婆底會議」。

●● 根據一九〇五年八月十九號（六號）所公布的法律而預定召集的有建議權的國會，就叫做「布里根國會」。這個有建議權的機關，當然是官僚式的參議院之官僚式的新附屬品，該機關底草案，是由內務部長布里根領導之下制定起來的，由此得名為「布里根國會」。關於「布里根國會」以及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對牠的態度，詳見中文版列寧選集第六卷抵制布里根國會與暴動的文章內。

●● 此地列寧是指一九〇五年秋天學生的政治罷課，以及立憲民主派的教授們想破壞這些罷課的企圖。

●● 此地列寧所說的「憲法」，就是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號沙皇的宣言，以及後來維

特所頒布的關於國會和選舉國會的新法；沙皇的宣言公布於十月總罷工之後，答應召集國民代表機關，並推廣選舉權到工人中；而維特的新法是在十二月莫斯科暴動時頒布，是代替布里根的法律的（參看註釋①）。

●列寧是指一個具體的歷史事實。斯皮里多諾娃是「社會革命黨」底黨員，於一九〇五年被捕，被告為刺殺官吏魯仁諾夫斯基（他是領導鎮壓譚波夫省農民運動一個人）。她被捕後受了哥薩克軍官奧拉莫夫方面之殘酷打問，而奧拉莫夫後來又被社會革命黨人打死了。

●列寧是指一九〇五年革命時候沙皇統治積極的走狗們。關於奧拉莫夫可看註七一；杜爾諾窩是維特內閣裏的內務總長，鎮壓一九〇五年革命的一切辦法之施行者；杜巴索夫是個海軍將官，極端的反動家，鎮壓了許多省份中的農民運動，當其任莫斯科的省長時，他因鎮壓了莫斯科十二月的武裝暴動，以及組織了不經法庭而槍殺工人的征討，聲名特別彰著；明恩是謝米諾夫團底京都衛隊司令官，他在鎮壓莫斯科的十二月暴動時直接指揮了軍隊，並下了命令「不許有被捕者」，就是說，把一切淪為俘虜的革命工人就地槍決。

●●此地列審譏笑爲一切庸人所特有的對資產階級法律的卑躬屈節的行爲，這種行爲又爲資產階級的科學所鞏固起來。資產階級的法律學，不解釋現行法律之社會根源，不揭開這個法律所保護的那些階級利益。牠的目的，只是推究這些法律底字眼，而不是批評這些法律。同時資產階級的科學崇拜那些有產階級利益的法律。在牠看來，這些法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這個科學認爲一切破壞這些法律或越出資產階級的法律範圍與秩序範圍之外的行動，都是不可容許的。因此資產階級的法律學，在大體上是用以鞏固庸人頭腦中的偏見，根據這些偏見，認爲資產階級國家底法律與這些法律所保護的社會制度，是不可動搖的。

●●《無題雜誌》，出版於一九〇六年，是由半立憲民主派的集團——古斯科娃、普羅科波維赤、波古查斯基等等所創辦的。

●●總罷工委員會，是在一九〇六年成立於各大工人中心城區，其目的在於統一該城或該區底一切企業中的罷工運動，政治總罷工底大浪潮，是在牠們領導之下掀起來的。罷工委員會產生於工人代表蘇維埃之先，且爲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之基礎（如在伊萬諾夫、伏茲業與斯克等），這是一般的現象。

●●這是第第一國會——維特國會底時期（一九〇六年），此時立憲民主黨人，歡天喜地的稱贊『所謂憲法』（列齊說的），同時抱了假的希望，認為這個國會——實際上儘是沙皇政府下的建議機關——就是真正的國會了。

●●關於維持與東亞、澳洲和非洲的交通的輪船公司之補助金問題，於一八八七年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底隊伍中引起了嚴重的爭論。政府要求撥款四百四十萬馬克作為這些補助金，其目的在擴大德國在殖民地 and 半殖民地各國市場中之影響。社會民主黨的國會黨團，在國會中投票反對政府關於撥款的要求，但是在黨團內部對於這個問題發生了很大的爭論，這個爭論，就在投票之後還繼續着。黨團底多數（七人中之四人）認為，所要求的補助金之一部份（即補助東亞和澳洲的航線的），可以支付，因為牠似乎是用於加速和促進各國人民間之和平的交通，而不是用於殖民地的政策上。黨團底少數堅決地表示了反對任何的補助金。黨底中央機關報社會民主派，也站在少數底觀點上。爭論的結果，少數得了勝利。恩格斯認為這個調協就是社會民主派對黨團的勝利。

●●『少年派』是在一八九〇年形成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中之一個黨內派別底名稱。自從廢除禁止社會主義的法令，以及一八九〇年二月選舉中社會民主黨得了很大的勝利之

後，執行了黨底領導中心之職權的國會黨團，對於革命的工人運動之領導，表示了消極。可以局部地指出來說的，譬如，牠對於紀念一八九〇年的五一節的事情，不給任何的指示，這個紀念節是奮鬥的無產階級底國際團結日，而且上年在巴黎舉行的社會主義國際大會恰恰第一次通過紀念五一節的決議。不僅如此，當柏林社會民主派集團，發表了號召五一舉行總罷工的宣言時，國會黨團號召不要罷工，至少在罷工會引起衝突的地方，不要罷工。黨團底號召，竟發生了這樣的結果：很鄭重地接受舉行罷工的，只有在漢堡一個地方。對國會黨團底這個策略路線之不滿，表現於黨內反對派之形成及其與黨的領導作鬥爭。這些事實上面，這個鬥爭便以『少年派』與『老年派』開爭的名稱，載於歷史中。『少年派』從左批評了黨的領導，歸咎『老年派』為促進黨底腐化，為以小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來代替無產階級的原則，等等。在『少年派』中曾有健全的革命核心——真正革命的工人份子。但是領導這個運動的青年作家（普爾·安斯特、普爾·堪夫美爾、甘斯·米勒、布龍諾·維列），是有過無政府主義與半無政府主義的趨勢的。他們從社會民主黨內被開除以後，一部份完全跑到無政府主義方面去了，一部份跑到右派機會主義方面去了。

●列寧是指立憲民主派與孟塞維克底立場之接近。在俄國第一次革命時期中，司徒

威是爲立憲民主派的北極星底主筆，而白朗克是爲半立憲民主派的半孟塞維克的我們的生
活底主筆。

國 家 與 革 命

分 冊 第 一 冊 伍 角 伍 分

8 5

著 者 列 賓

譯 者 莫 鍾 吉

發 售 處 各 大 書 店

發 行 所 華 北 書 局

中 華 民 國 十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